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Г. Арбатов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

徐葵 张达楠等译

新华出版社

苏联政治内幕：

知情者的见证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 著

徐葵 张达楠 等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俄）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9

（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内部发行）

书名原文：Затянувшееся Выздоровление

ISBN 7-5011-4187-8

Ⅰ.苏… Ⅱ.①阿… ②徐… Ⅲ.政治-概况-苏联-1964～ Ⅳ.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241 号

Затянувшееся Выздоровление

Г·А·Арбатов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 著

徐 葵 张达楠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4 插页 387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187-8/D·668 定价：28.00 元（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上图：1928年作者5岁时同
父母在敖德萨。
下图：1942年作者在战争期间。



1962年作者（后排左起第二人）获得他本人的第一枚公民奖章时与勃列日涅夫等人在一起。作者右边是契尔年科，任当时最高苏维埃办公厅主任。坐在中间的勃列日涅夫是当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排最右端是阿·鲁缅采夫，是当时布拉格出版的国际马克思主义杂志《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的主编。



1973年作者在莫斯科与爱德华·肯尼迪合影，此时肯尼迪到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做讲演。





上图：1973年在扎维多沃冬季花园与勃列日涅夫在一起。当时勃列日涅夫的身体还比较健康。

下图：1972年同乔治·布什在一起。布什当时是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1983年作者在讨论裁军问题的达特茅斯理事会的一个工作小组会议上。



1985年，作者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邀请访问中国。中间下蹲者是作者的学生卢金，现任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

译者的话

去年，在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段苏联历史的过程中，我阅读了近几年俄罗斯出版的一批人物评传和回忆录等著作。其中有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所著的回忆录：《耽误了的痊愈（1953—1985年）——当代人的见证》。此书由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出版社在本书里封上的简介中说："作者向读者叙述了他对斯大林去世到改革开始之间我国历史上这段复杂和重要时期的回忆和思考。在这段时期中，他从'近处'进行了观察，有时还参与了各项重要的政治事件，并直接为许多政治领导人做过工作。"这部回忆录对我研究勃列日涅夫这段时期提供了不少帮助。我觉得，如能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可在不小程度上有助于我国读者增加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这段历史的了解。因此我建议新华出版社出版本书的中译版，这个建议得到了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于是我们就共同与作者联系出版中文版事宜。作者对此欣然表示同意，并告诉我们，他已对他的回忆录的第一版（俄文版）作过修改，并已出了第二版（英文版），由美国兰登书屋于1993年出版发行，他还给我们提供了英文版本。作者希望中文版的译文按英文版进行校核和补充。我们这个译本就是根据第一版俄文版翻译，再按第二版英文版校核和补充的。

对照这本回忆录的两个版本可以看出，两个版本的大部分内容是相同的，但也有不少不同之处。首先是书名不同。英文版的书名为《制度——苏联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一生》。英文版在书名中突出"制度"二字，意在帮助读者看到苏联人从斯大林去世

到苏联解体近40年的时间中经历了哪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从而更好地了解什么是苏联的制度和俄罗斯用以替代这种制度的可能的前景。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贝·塔尔伯特为英文版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前言，一开头就对英文版的书名提出了他的解释。他说，“现在苏联已不复存在，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仍然使人感到伤脑筋：这个跨越了11个时区、占有1/6地球土地面积、毁灭或饿死了成千成百万公民的，却又是把第一个人送上宇宙、赢得了一个超级大国称号、在40多年时间中使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关注的不寻常的政治大杂烩，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回过头去看，苏联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有生存力的国家。它的2.8亿人口讲着太多的语言，彼此有着太多的怨恨，都不喜欢把他们紧紧地束缚于‘全联盟’首都莫斯科的联系。苏联实际上也不具有帝国的特征，尽管人们常常把它称为帝国，这样称呼它的最有名人物当属里根。俄罗斯通常被认为是这个帝国的宗主国，可是到头来俄罗斯也只是这个各族人民的监狱中又一个不满的囚徒而已，而当监狱大门被打开时它也要求出狱，成为又一个要独立的国家。如果苏联既不是一个国家，又不是一个帝国，那么它又是什么呢？我想，最好的名称就是阿尔巴托夫用作他的书名的那个词，即苏联是一种制度，而根据我的辞典，制度的意义就是‘由许多从属于一个共同计划或服务于一个共同目的的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统一体。’”

其次，第二版同第一版相比，在结构上也有较大的改动。首先。第一版只写到1985年为止，第二版则写到苏联解体之后，增加了一个很长的跋：“改革及其以后”。作者在跋中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评论。另外，作者把本书章目也作了调整。第一版共九章，第二版扩展为十章，增加了第二章“我的家庭，我的青年和战争年代”和第十章“研究所：我们如何‘发现’了美国”。这两部分原来在第一版中都收在本书

的附录中，作为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的材料。第一版中原来单独有“关于那个时期的几个领袖人物”一章，即第九章，第二版中这部分内容不单独设章，而合并到第九章“停滞年代”中。这样调整之后，全书章目比第一版显得更加前后连贯和完整了。

第三，作者在第二版中对苏联当年某些政治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也有修改之处，看来这反映了作者在1985年后对苏联那段历史中的一些人和事的思想认识的发展。但第二版英文版中，有些地方把俄文版中原有的反映苏联当年围绕某些政治事件而进行的思想理论和政策问题上的争论的比较详细的材料和叙述作了压缩或精简。这也许是出于考虑美国一般读者对这些细节不一定有太大兴趣的缘故。可是在我们看来，这些材料对中国读者了解苏联却是很有用的，也是中国读者会感到兴趣的，因此我们在中译本中仍予保留。第一版俄文版的附录中还有两节，一节题名《军方是如何“整”我的》，另一节题名《跟随库西宁所做的工作》。在第二版英文版中，前一节内容被融入第七章，后一节则被删节。这一节内容主要是介绍库西宁在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上的思想观点，我们觉得这些材料我国读者也是会有兴趣的，所以我们仍把这一节作为附录加以保留。

至于书名，我们感到，第一版俄文版的书名已经有些过时，而第二版英文版的书名则对我国读者可能有些费解。因此我们另起了一个书名：《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个书名我们想是符合本书内容的，也是容易为我国读者所理解的。

这里我还想说明一下促使我建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几点想法。

我首先考虑的是作者本人的情况。格·阿尔巴托夫出生于1923年，是苏联2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父亲是犹太族人，因而他有一半犹太血统，这种血统关系使他在苏联

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不少特殊的遭遇和感受。他年轻时参加了卫国战争，战后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外文出版社、《哲学问题》和《新时代》杂志社当过编辑，后来又到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多年，曾为苏联领导人库西宁、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后来又为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工作过，曾参与苏共中央一些重要文件和苏联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从60年代后期起，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苏联科学院，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创办了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并长期担任该所所长。他曾是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他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政治活动家。他的国外阅历也比较广，小时候就到过德国，目睹了希特勒上台时的情景。60年代以后同美国和西欧各国有很多交往。因为是学者，所以他比较强调尊重事实和科学，对很多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因为是政治活动家，所以他比较接近领导层，从近处观察到了很多事情，堪称是一位“知情者”。这样一个人物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几十年经历进行的回顾和反思，反映了苏联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看过本书后可以感觉到，作者对这部回忆录的写作态度是严肃和认真的。他从1987年开始写作，曾经数易其稿，到1990年才完稿。他认为，他这一代人应根据自己的阅历把后斯大林时期的详细历史写下来，要趁这段重要和复杂的历史时期的许多事件的见证人和目击者还活着的时候，让他们把话说出来，尤其是那些曾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些事件的人，以便总结历史经验。这就是促使作者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从书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对许多事件和问题的叙述和评论是坦率和敞开的。

其次我考虑的是本书包含的材料和内容。我觉得本书的材料很丰富。书中讲到的很多事情和内幕，是我们中国读者，包括许多苏联问题研究工作者在内，所不知道或不清楚的。从内容上

看，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跨度大。一般回忆录往往只写某段时期和某些事件，而这本回忆录几乎涵盖了作者所经历的苏联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开始，一直写到90年代上半期的叶利钦时期。甚至通过对作者本人的家庭和父亲的叙述还涉及到了斯大林时期，特别是30年代的镇压运动和战后初期的思想政治运动。

三是涉及的问题和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讲到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几十年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从政治到经济，从内政到外交，从文化艺术到社会思想，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都涉及到了。作者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看作是一个严重病态的社会，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十年应该是苏联从病态中痊愈过来，恢复社会正常生活的一个过程，但是由于革新和保守两种思想和力量的曲折和复杂的斗争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个痊愈过程被耽误和延迟了。这是本书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作者对许多人和事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尤其是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领袖人物，作者根据自己同他们的接触和从近处进行的观察，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分析和评论。在第二版中，作者还补充了他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一些观察和分析，还对盖达尔推行的“休克疗法”提出了否定的看法。由于作者的本职工作是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他对苏联这几十年中的学术思潮和学术领域方面的思想斗争和发展变化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又由于作者从事的主要是国际问题的研究，所以书中对苏联对外关系的论述也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其中包括苏中关系、苏美关系、苏联同东欧国家关系、苏联的缓和政策和裁军政策，等等。

书中第三章《中国吹来的风》是讲60年代初中苏两党的论战的。阿尔巴托夫作为苏共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196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而且是当时苏联中央发表的告苏共党员的公开信的起草人之一。关于中苏两党的这场论战，邓小平同志

在他的有名的题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讲话中，已作了深刻的总结。他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在提到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时，他还说，“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4页）邓小平同志对中苏两党的这场论战所作的这个原则性总结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有了这个原则性总结作指导，我国学者自然还需要对这段两党两国关系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总结，以便吸取教训，推进中俄两国面向21世纪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两国的长期睦邻友好关系。而为了研究这段历史，了解苏方当时在论战中的观点和他们对论战的看法，这对我们也是很需要的。有趣的是，阿尔巴托夫在《中国吹来的风》这一章中告诉我们，中方当时反对苏共20大路线的立场，客观上倒有助于苏共坚持20大路线的人在苏联加强自己的立场和地位，使他们在当时的复杂处境中借到了反击保守派的东风。这一点大概是我们当时进行论战时所始料不及的，现在读来对我们还好像是条新闻。

我考虑推荐这本书的第四个出发点，是我们深入研究苏联历史和苏联与俄罗斯问题的需要。由于种种原因，应该承认，我们过去对苏联历史事实和历史情况的了解和掌握是相当不全面的，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对我们研究苏联历史和深入、正确地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带来不小的困难。不充分掌握可靠的事实材料，不弄清许多被歪曲了的历史真相，要想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那是很困难的。这些年俄罗斯出版了许多档案材料、回忆录和人物评传等图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研究材料。我国各出版社几年来已翻译出版了一部分，这是

十分可喜的。但是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图书材料我们还没有翻译过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翻译出版一些这方面的图书资料。虽然现在俄罗斯的学者和作者不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问题上观点都很不一致，争论也很多，但只要他们的著作在探讨问题时态度严肃，并有丰富的材料，总可增加我们对苏联和俄罗斯的了解，而且对我们来说对比不同的观点也可更有助于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包括对本书作者阿尔巴托夫，俄罗斯学者中对他和他的观点的评价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我相信，他在这本书中提供的大量材料会有助于我们增加对苏联当代历史的了解，至于他的许多思想观点，我国读者也会在阅读之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参加本书翻译的都是长期从事苏联问题研究和翻译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他们愿意发挥自己的余热，为苏联和俄罗斯研究继续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贡献。他们在本书翻译中的分工是：徐葵（第一、第三章和跋）、张达楠（第四、五章）、王器（第九章中关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部分）、梅沙（第九章）、韩维（第六章）、李禄（第二、第八章）、林野（第七章的大部分）、徐肇儒（第七章的一部分和附录）。本书最初按第一版从俄文译出，由张达楠统校；最后由徐葵核对俄、英文（第二版）两个版本，进行统校和增补。本书因翻译时间比较匆促，错误在所难免，尚祈读者帮助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徐　葵

1998年6月18日

作者为中文版写的序言

我高兴地得知，新华出版社对我的书有兴趣，并准备出中文版。我所以感到高兴，不仅仅是因为当有人对你的书表示有兴趣时，这是一种荣幸。事情首先在于，据我看来，在中国人们并不很了解苏联和俄罗斯不久前的政治历史和当代政治，正如在俄罗斯（也许在独联体其他国家中也是如此）人们并不很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一样。

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原因之一是，在我们两个国家中，有关本国不久前和当前政治的著作都写得不多，特别是同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相比较的话。再加上两个国家中都曾有过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对本国作客观分析的书籍难以问世，更不要说对本国政策和本国社会有批评的作品了。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要想翻译一些东西也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可译。此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苏两国间存在着敌对、怀疑和不信任关系，在这种状况下要把已经出版的上述题材的少量著作翻译过来并加以出版也是不可能的。

我当然并不奢望，我这本书能够填补过去积累起来的一切空白。但是我仍然希望，它在某种程度上将是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向前跨出的一步。

现在让我介绍一下奉献给中国读者的这本书。它最初于1991年春天在莫斯科用《被延误的痊愈：当代人的见证》的书名出版。出版后即被购买一空，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首先是1991年的八月政变以及其后发生的苏联的解体和以“休克疗法”为名的经济改革——尽管它并没有治愈经济，相反却把经济

带入了更加尖锐的危机，还有车臣战争，等等）使社会注意力转向了许多新的问题。而对许多人来说，本书中所论述的东西似乎仅仅是属于历史的、已经过时了的东西。但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按照我写作的意图，本书的主题就是我们社会摆脱极权主义的昨天的困难和复杂过程，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因此它还不是历史，而是我们的今天，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明天。

本书于1992和1993年在美国出了两版，书名叫《制度》（我同意了出版者建议的这个书名），于1993年还在德国出版。在国外出版的版本中，我作了一些改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使西方读者更易于了解书中涉及的问题，同样也是为了略微说一说后来发生的事件。

今天在中文版中，我不想继续这样做，因为我正在写我的回忆录的第二卷，在第二卷中我将详细叙述最近15年来的事件。也许中国出版者对出这一卷也会有兴趣，因此我就不想在本卷中丢三言两语地叙述那些重要的事情了。

读者会看到，本书主要是讲苏联和它的后斯大林时期历史（1985年以前，也就是“改革”以前）的，同时考虑到我的专业和职务，自然也讲到苏美关系。

书中也有不少地方讲到中国，主要是联系到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来讲的。还联系到我在我们的对华关系领域中也曾有过的工作经历来讲的（关于这一点书中都有叙述）。

我想，苏联和中国相互对每一方的历史进程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不去讲古代的历史。可是，俄国发生的1917年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诞生和巩固，无疑曾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这以后，开始时，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好（几乎是田园诗般的），促成这一点的有政治上的共同性、相互的帮助，以及不仅是双方领导人还有两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相互存在的深厚感情。然

而，后来一切都变得大大复杂起来了。开始时使两国接近的那些原因，也在不小的程度上变成了使两国关系复杂化的原因。我指的是这一事实，即两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几乎都是同一的，因此一方在体制、秩序、政策上作出每一个重大改变，客观上都会成为对另一方的一种挑战。加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到处都是一样的，而由于苏联仿佛已经铺好了通向未来的道路——就是在苏联铺的那种道路——谁脱离莫斯科的模式，在它的正统追随者看来，就是对原则的背叛。斯大林逝世后在共产主义和解放运动中曾经展开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真实的或者仅仅是被怀疑的），在后来关系的复杂化方面，可能也起了某种作用。但是历史的这一页是值得专门写书（肯定不止写一本书）的另一个题材。

本书中所讲的仅仅是作者直接观察到的和这样那样地参与过的一些插曲。

由于上面提到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基本社会原则的共同性，在苏联和其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中迟早应该开始的变革，不可避免地也对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的国内形势和上层的政治斗争产生了影响。

我很早以前就想到过一个比喻。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阵营”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比喻为一列火车。苏联从一开始就是火车头。如果它急转变，火车后边的一二节车厢就会出轨。在斯大林去世和苏共20大之后，出轨的是匈牙利。民主德国在1953年，波兰在1956年也处在出轨的边缘上。在赫鲁晓夫被撤职和苏联企图回到但又没有全部回到过去曾占统治地位的秩序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出了轨。顺便说，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个事件也都影响到了苏联的发展，推迟了它的改革进程，加强了保守力量的阵地。

中国是如此之大和独立，因此它不会因为苏联政策中发生的

曲折而“倾覆”。但是我觉得，对这个巨大的国家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苏联认为，中国提出“百花齐放”的方针正好说明了这种影响。但是，不久之后，这个方针就被收起来了，而那些曾经盛开的“花朵”则被无情地剪掉了。

随后发生的是苏中关系明显的和迅速加深的恶化。我不是中国问题和它的对苏政策和对苏关系的专家，所以我不想去分析关系恶化的原因。当时在莫斯科，人们谈论的是，中国当局对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态度变坏了，甚至在中国发生了对待苏联专家的一些事件，毛泽东企图占据斯大林的地位充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后来谈论的是中国对相当大一部分苏联领土提出了领土要求（达曼斯基岛[1]事件似乎证实了这方面甚至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我们中许多人从国外报道中得知，苏联停止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中国和苏联领导人个人之间存在敌对情绪和苏联领导人不讲分寸、缺乏涵养，北京对苏联同美国改善关系感到不满，等等。

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国领导越来越积极和尖锐地指责苏共20大的决定和莫斯科宣传的其他一些理论判断），斗争很快就扩展到经济领域，后来也扩展到了军事领域。在边界两边开始大规模地加强军事阵地，后来在中国展开了建设大批的地下防空洞运动。

不久之后，斗争具有了如此尖锐的性质，以致于我有时产生了怀疑：究竟谁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还是中国？我还有过一个怀疑：中国领导是不是有意这样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便使美国人相信，现在他们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可以大大加强对苏联的压力而获得地缘政治上的巨大好处。华盛顿无论如何是看到了这一点的，正是从60年代起华盛顿开

---

① 即珍宝岛。——译注

始考虑如何在自己的全球政策中更好地打“中国牌”。这条路线的热烈维护者之一就是基辛格，后来弄清楚还有尼克松。

这些事情都是众所周知的。本书中只不过增加了某些概括和我得以直接观察到的一些细节。特别是作为参加于1963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那段时期里中苏最后一次最高级会谈的苏联代表团的顾问所观察到的一些细节。还有当我在苏共中央联络部的工作中也曾处理对华关系时所观察到的一些细节。正是在那时候，我亲自从安德罗波夫那里知道了1964年秋天紧接着赫鲁晓夫被撤职后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参加十月革命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些情节。

形势总的说变得很复杂。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国内事务、国内政策常常是紧密地同对外事务和政策交织在一起的。而且两者又是互相影响的。

特别是中国的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形势对我们的国内事务产生了影响，而我们的国内事务本身又对我们的对外政策包括对我们的对华关系产生了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几乎在所有国家中，经常平行地同时存在着两条斗争阵线。一条是国内斗争阵线，其中包括领导层内的和政治精英队伍中的斗争。另一条阵线是在国际舞台上和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斗争，这种利益有时是真实的，有时则是想象的，或者甚至只是反映国内斗争的利益的。

60年代，在我的国家里，这两条阵线也在中国方向上交织在一起了。一方面，在莫斯科围绕国内政策的总路线进行着斗争，也就是要不要走20大、非斯大林化、发展民主、进行经济改革、降低“冷战”温度、改善同西方关系的道路。或者是倒退回去，取消20大和22大的决定，不再实行和平共处和取消和平共处这个概念本身，以及取消最近一个时期的其他一些理论“创新”（例如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走向社会的和平

道路等）。

由于当时的中国领导恰恰因我们要走这两条道路中的第一条道路而尖锐地宣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者，甚至在实际上把要我们放弃这条政治路线作为和解的条件，因此当时同中国友好的主张在苏联几乎就成了回到正统立场上去的同义语。而同中国领导的尖锐的意识形态论战就同保卫苏共20大后在我们的政治和理论中出现的一切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

这里简单地（书中有详细论述）讲一件事情。60年代初，赫鲁晓夫，或者是由于害怕自己的自由主义政策走得太远了，或者是因为受到了自己的保守主义同事的压力，显然企图停止对过去的进一步批评和使国家民主化的努力。他是从艺术开始的——其实这个转折很可能是由他周围的人挑动起来的，这些人在莫斯科新的展览大厅中举行的绘画展览开幕前的最后时刻弄来了一批苏联先锋派的绘画作品（我还是认为，可能是赫鲁晓夫希望有人挑动他，甚或参与了这档事）。赫鲁晓夫看了先锋派的绘画作品，当着前来参加绘画展览开幕式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和新闻记者的面，大发其火（或者装出大发其火的样子），指责先锋派画家们犯了弥天大罪，用有些甚至过去在书报上都不许刊印的那种语言辱骂他们。

这犹如一个信号，在这以后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开始了全线进攻（赫鲁晓夫本人在这之后他组织的两次同作家的会见上对作家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与其他的活动家则在其他方向展开了进攻）。决定在1963年召开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我们预期在这个运动中这次全会将把所有意识形态问题搞它个“黑白分明”。

恰好在此时，同中国领导的论战的尖锐化（其信号就是中国领导发表的致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和意味着直接干预我们内部事务的“公开信”）倒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领导的，首先是赫鲁

晓夫的注意力，转向了同中国领导人的论战，甚至转向维护受到了中国方面尖锐指责的苏共20大的政策。因此，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的全部意图都泡汤了，结果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状况即使没有什么变化，但也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变得更坏。

但是同中国的论战使我们得到的基本上都是消极的后果。为加强所谓的“东方战线”支付了大量的开支，重又产生了陷进“敌对包围”的感觉，经常担心“美中勾结”反对苏联，对太平洋地区的新的意义迟迟不能理解，最后是当我们的东方邻居走上经济改革的道路时我们长期对重要和有趣的中国经验不予注意。

同中国敌对的年代在我们一部分主管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干部中养成了一种特定的心理。他们沉溺于敌对和意识形态斗争如此之深，以致于不仅很晚才注意到那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还阻碍我们的领导人和社会各界去了解那些变化。这是很容易做到的，由于当时我们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同中国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是高度集中掌握的，实质上是由一两个工作人员控制的，自然他们也依靠更广泛一点的一圈人。

只是在国家新的最高领导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种垄断才被打破。关于已经形成的这种形势的不正常性和危险性，基本上不是由中国问题专家，而不得不由“外行”人，即由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上主管其他地区的专家来向新领导作说明。

我认为，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们已经克服了60、70年代所产生的互相敌视和冷淡的惯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同中国注定要做邻居，不论对我们两国来说，还是对整个国际关系来说，很多事情都将取决于我们的友好关系和进行合作与相互理解的意愿。

回过来说奉献给中国读者的这本书，我想再一次强调，尽管书中有不少篇幅讲到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但是它的基本主题是讲

苏美关系，是讲处在从极权主义制度走向我希望或迟或早总要到来的正常生活的复杂过渡时期的苏联。

最后，我要感谢使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成为可能而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时间和精力的所有中国同事。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名誉所长、管理委员会主席

格·阿·阿尔巴托夫

1998年8月

目　　录

一、我为什么拿起笔来写这本书

我积极从事科学研究、编辑杂志和政治活动的时间，正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一段十分重要的、令人极感兴趣的时期，而对许多事件的参加者来说又是困难的、包含着不少风险的时期。最近50—60年中，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触及到我这一代人，也就是所有在20年代初出生的人。

这代人对自己的记忆是从30年代开始的。那些记忆是同那时经常受到歌颂的劳动和创造的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的，我和我的同龄人当时是从报刊、书籍、电影、政治家的演说以及从包括自己亲友在内的目击者的叙述中（谁都听到过这些叙述）知道这些事情的。但同样也是同使30年代成为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的悠久历史上最阴暗的10年之一的一切，亦即同消灭富农和饥荒，同消灭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阶级的开端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也是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触及成千成百万人的大规模镇压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我同代的大多数人所亲眼看到的，亲身感受的和永世难忘的。对此我可以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判断，因为对我来说，镇压不是什么遥远和抽象的东西。镇压确实无误地不仅整死了我的许多朋友的双亲，而且整死了我的双亲的许多朋友，镇压触及到了我的亲属，后来也触及到了我的父亲。虽然从

那时的情况来看，他还算是极其幸运的：他按因给人造成悲痛而著名的刑法第58条（关于背叛和反革命罪的）受到起诉后，“仅仅”坐了一年监牢就被释放了，法庭判决书的摘录中说，那是“因缺乏犯罪构成要件”。但是，直到斯大林去世，这并没有使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没有使我，得以免受各种各样的政治怀疑，甚至政治歧视。

而当这10年消逝之际，二次世界大战就瞄准我这一代人而来。1941年6月21日，也就是在德国入侵苏联的前夜，我就应召入伍穿上了军装。我18岁成了“卡秋莎”连连长，1944年21岁的我以大尉军衔和二级卫国战争残废者身份走完了自己的战争历程，因严重的、在那时几乎经常是致命的肺病（当时尚未发明新药）而复员（我是少数几个幸运者之一，现代医学技术和外科手术帮了我们忙）。

作为大学生，后来作为出版社编辑和报刊记者，我经历和体验了种种谎言、蠢行和一件件残暴的事件——战后的思想讨伐和新的政治迫害的发作，这时我对很多事情已有所认识和了解了。

最后，我作为编辑、记者、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而起草的一些理论文件的参加者，其后又作为党中央的工作人员，作为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政治的研究所的所长，从近处观察和体验了这个给人以希望的、却又被延误了几个10年之久的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痊愈”过程。这是一个艰巨的、矛盾的、往往是痛苦的非斯大林化的过程，是人民和国家恢复正常生活、回向正常状况的过程。这是对未来满怀希望的年代，是党显得十分巩固的年代。而我有时则以某种方式亲自参与了构成这个过程的一些事件。说实在的，关于这一切，目前还很难作为往事来写。特别是现在，当国家还处于动荡之中，我感受到这一社会的号召和责任的压力。不仅是因为我担任过的公职（在很多年中我还是苏共中央委员），而且首先是作为自己国家的一个公民，作为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

的儿子，作为差不多在70年前出生的、多灾多难的一代人的一名代表。

我曾经接触过许多重大事件，也有机会遇见过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知名的一些大人物[1]，有时还跟他们工作过，因而早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把我所记得的事情，把我的观察、回忆和由此引发的思考都写下来。在改革的年代里，当许多禁区最终被撤除，并开辟了讲真话和议论十分敏感的问题的可能性时，这个想法就转变成一种不可压制的冲动。然而，真要去实现这些计划，却比我最初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难于挤出时间来（当然，不是由于我因年龄关系而想降低自己的创作积极性，须知为创作剩下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更为复杂的是另一个问题：最近几年，不仅社会变革，还有我们对过去和现在、对事件的真实性、对衡量事物的价值观等的认识，都大大加快了发展速度，以致我们对自己和对所写的东西的要求水平也不断提高。因此对已写出来的东西很难不作新的加工或重写，很难划上句号。

说实话：最初的稿件我还是在1987年前就写下的。但是，每次重新拿起这些稿件，几乎都得从头改写。这也是由于事实上只能从自己头脑里一滴一滴地把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认识、观点和陈旧看法挤出去的缘故。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平常的、痛苦的、需要时间的过程。不用讳言，我同其他回忆录作者一样面临着两个诱惑：一是算老账；二是在事后把自己写得比当时更聪明、诚实和勇敢。我希望，我已作了最大的努力不为这些诱惑而歪曲事实真相。但是，到一定的时刻，我还是鼓起了勇气，划下了句号。

---

① 其中有尤里·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还有60—80年代的许多苏联领导人以及许多知名的外国政治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

这倒不是因为我已经理解了一切和弄清了一切——大概还不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些属于我这一代和具有这类经历的人，现在大家就开始写作和出版后斯大林时代的详细历史，这是极端重要的。

当然，这不是说，关于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主义的问题都已解决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却忘记了，斯大林执政了 30 年，而从他去世之日起已过了 40 多年——这是十分困难的、曲曲折折的、矛盾重重的 40 多年。我确信，这些年代的主要历史任务和主要内容恰恰是在于把社会从不可避免的因极权专政而产生的全面变型的可怕病症中治好，从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基础本身开始得到康复。

这个康复过程直到戏剧性的改革年代进行得相当缓慢。但这是不足为奇的。

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在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之后，留存下来的常常是一片烧焦了的土地，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例子说明，在这种专政之后，跟随而来的或者是长时期的社会萧条，或者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解体。的确，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牺牲品的不是所谓的东欧卫星国，而是我们国家自己。

斯大林之后的几个 10 年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或许，这是我们革命后的全部历史中同 20 年代上半期一样的最重要的经验），依靠这种经验，我们可把改革推向前进。但是，思考，更不用说撰写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的尝试，却少得可怜——只能在报刊上看到有数的一些文章而已，也只有少数人去阅读。赫鲁晓夫回忆录和他儿子的回忆录也许是唯一的例外。

这些文章，从其材料的可靠性、思想的深刻性和写作水平来看，自然是有差别的。我不准备，也不想在此加以评论。但是，不管它们有那些优点和缺点，这样的文章是太少太少了。特别是关于 1964 年赫鲁晓夫被撤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虽然写过一些

有意思的采用诉讼记录或小品文之类笔法的文章，但它们替代不了历史。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什么关于我们国家最近这段历史的著作如此之少？我不知道。我只希望，这类著作将会多起来。更何况将来档案开放的时候，或许会发现档案并不那么多。最近几十年来，常常听说，政治局进行的一些讨论是不作记录的。而有些十分重要的决定（包括出兵阿富汗的决定）甚至往往不是在政治局会议（尽管政治局也不具备作这种决定的宪法权力）上，而干脆是在几个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上作出的。还有那些公开讲过的或发表过的东西，往往同实际情况也相距甚远。在严酷的斯大林时代，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详细的书信，或书信体的作品，也没有留下什么日记，而这类书信和日记对研究过去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何等宝贵的史料啊！首先是全面的恐怖起了阻碍作用。再是那个时代的狂风暴雨般的速度、那时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也使人们无法安下心来写详细的书信和日记。在很多方面，我国人民失去了把他们的生活详细记录下来的习惯。

因此，我认为，当我们历史上这段重要和复杂的时期的许多事件的见证人和目击者还活着的时候，应该让他们把话说出来，尤其是对曾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些事件的人，不管他们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是多么微小。

应该说，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用这些论据来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的惰性以及由于一生谨慎而产生的某些内在的心理障碍。这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的。但我要立刻声明，我并不自认为我已做了多大的工作。这本书中所叙述的，首先是斯大林去世和苏共 20 大之后我们的社会政治思想解放和政策解放所走过的那条确是痛苦的道路上发生的一些我所记得的重大的插曲。我要强调，这是一些插曲。斯大林逝世后系统的政策和政治思想发展中，只有靠许多人多年的努力才能写出来。

由于两个原因，我对这个题材——我们痛苦的社会政治思想解放和政策解放过程中的困难——特别感有兴趣。

一个原因完全是主观上的。这个题材对我来说比较亲近，我对于为克服斯大林主义的后遗症而进行了种种努力这个方面确实了解得更多些。

另一个原因则是客观上的。这就是思想解放本身（这个过程还远未结束）对国家的更新，对改革，对我们的整个未来所具有的巨大的和真正关键性的意义。

钦吉兹·艾特马托夫曾说唱过（或许是编写过）一个关于曼库尔特人的传奇故事，这些人的头颅被人用生皮带紧箍起来。这使他们失去了思维能力，完全变成了顺从和驯服的奴隶。斯大林主义的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企图使人们丧失思想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的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这个意图未能全部实现——不然也就不会有 20 大，不会有改革。但是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在他们的统治年代仍然实现了他们意图中的很多事情。而这一切对精神创作和精神生活领域——对文化艺术、对社会科学和对自然科学，也对我国人民直到今天的整个思想意识和政治行为都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假如还需要那些象征性的证明来说明这一点的话，那么“伟大领袖”之死本身就提供了这种证明。那时候，整个社会——无论如何可说是它的大多数——听到领袖之死就陷入那种深沉而虚假的举世悲痛和对未来的全然非理性的恐惧之中而惊呆了。它的有良心的、有思想的代表者中有些人公开地（我相信，也是真诚地）宣称，今后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歌颂已故的领袖，除了已经存在的成千上万的纪念碑之外，作为补充还要在人们的头脑里树立某种永世的、前所未有的、高不可即的纪念碑。这种群众性癫狂

的象征（我不否认，当时我并不这样认识，而是像周围所有人一样感到难过和悲痛，只有很少的例外）就是“同领袖告别”的那几天。那是真正的血腥的追悼日，癫狂的群众拼命涌向工会大厦，结果如果不是数千人，那么也有数百人被踩死。

但是比所有象征性的东西令人更加深感沉重的，是社会精神生活的真实状况。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意识的贫困、社会知识潜力遭受的危险破坏，特别明显地表现为社会政治思想的下降。出现了可悲的悖理现象：正当革命胜利之后展开新社会的建设，因而特别尖锐地需要能够指明尚未探索过的前进道路的、先进的创造性思想的时候，社会思想却被斯大林主义的教条禁锢起来了。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在十月革命 70 周年前不久，在考虑我在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准备做的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发言时，我曾试图寻找一些即使是大概的、但可用某种方式加以衡量和对比的参数来说明这种代价。也许，理论的发展，即使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可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可能是这种参数中的一个。我从 1917 年往后，而不是往前数了 70 年，我出乎意料地发现，那正好是 1847 年，也就是写出《共产党宣言》之前一年，正是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开端。

在这头 70 年中出现的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还有列宁写的所有早期的著作，直至《国家与革命》。属于这 70 年的还有倍倍尔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李卜克内西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然而第二个 70 年又如何呢？

当然，这期间有列宁的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但仅仅是开始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些主要方面的论述。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而且还有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肯定也有不少有意义的创作。但是由于斯大林的镇压，由于个人迷信的整个思想气氛，那些著作都未进入创作交流中去，对国家的实际政治只

产生了很微小的影响。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原则重要性的决议大体上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诚然，这次代表大会是开得太迟了，斯大林也从未对它有什么好感。这之后再过了不少时间，则有苏共20大的一些论点，这些论点曾起了巨大的政治作用，但当时尚未在理论上得到应有的发展。一句话，革命后70年创作书目是少得十分可怜的，即使是就官方的、国家的、唯一被允许的理论而言，也是如此。

完全清楚，这种状况完全不是因为不存在发展社会政治思想的客观需要而形成的。相反，这种需要不仅存在，而且日益增长。它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随着这70年来迈出的改革的急剧步伐而增长。我提一下一个事实。比马克思多活11年的恩格斯死于1895年。在他死后约两个10年的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为列宁提供了作出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结论的根据。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著作中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不是从实质上来谈论这部著作中所作出的那些结论，但其中许多结论曾推进了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至于国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对我们来说，它的发展随着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的胜利而已经终结了。这之后，国外所写的一切都被认为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阴谋的一部分，我们只能通过对它们的批判中知道这些哲学、政治理论和经济学派。外国图书被收藏在图书馆的“特书部”的深处，都被列入“保密”范围。(图书检察员在这些书上盖上一个六角型的图章。图章中有他自己的编号，用行话说这是上了一个“螺钉”，对“绝密”书则上“双重螺钉”。)甚至对专家来说，要接触这些书也是困难的。其他群众只有通过专家的评论中去了解外国的思想。其结果是，除了谴责、戴帽子和捏造的东西之外，很难在书架上找到什么作品。

苏联的专家、学者、科学家和学生与世界几个10年的社会

政治思想的发展相隔绝。我想我们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感觉到这一差距的后果，除非采取紧急步骤，包括出版20世纪西方主要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著作和课本。我们国家的人民在所有这些领域中需要接受再教育。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爆发了俄国革命（实际上是两次），奥匈帝国解体了，霍亨索伦王朝、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政权在德国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风暴席卷了欧洲和亚洲，革命在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中取得了胜利，殖民主义崩溃了，出现了核武器，至少发生了两次科技革命，所有阶级的面貌和社会的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今天，这个进程还在迅速发展。

但是在70多年时间中，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多少有一点儿能说得上是合适的反映，因此也就不可能在政策中得到应有的考虑。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我们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把责任推到马克思主义身上是不正确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长期来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灵活的、对改革开放的、不怕抛弃陈旧观念的、善于吸收一切新事物的理论而发展的。(重温我们的科学理论的奠基人的著作，你决不会指责他们是教条主义，倒会指责他们过于沉醉于新事物)。或许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对世界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凯恩斯主义只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但是，在斯大林时期，起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后来则变成了宗教。更有甚者，如果用这一类比来看的话，那么先是急急忙忙地从教徒那里把旧约收回，后来又把新约收回——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还有列宁著作的真实思想。留给教徒们的只有唯一的“宗教教科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它的可悲地出了名的第4章）以及“伟大领袖”的文集、小册

子、文章和讲演。

这真是一场悲剧，精神和智能的悲剧。为自己的胜利而自豪的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这场悲剧。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曾受到人类全部科学和文化发展的鼓舞，应成为这份伟大遗产的继承者和增值者。

是的，我们经受了这场悲剧，但是悲剧还不是灭亡。而我首先想叙述的，就是我们是如何克服这场悲剧的后果的，是如何在思想和精神上获得解放的。我要描绘曾统治我们的社会和形成了我们的思想的这个制度。这是我对我自己和对俄罗斯的明天的责任。但是我想从个人的一些早期历史写起，以便帮助读者了解我是谁，我的家庭、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包括我的战争年代是什么样的。

二、我的家庭，我的青年和战争年代

除了我的祖父母以外，我对我的家族史一无所知。家族史一般是贵族和富有者的特权。我是普通老百姓的后代，他们对遥远的祖辈一般并无很大的兴趣。此外，在上个世纪中我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经常发生变化和变动的混乱情况下，要跟踪家史也是很困难的。而且也常常是不安全的。谁知道你在你的祖先中会发现什么人呢？也许是个反革命分子或牧师，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按斯大林主义的标准，他会不会毁了你的前程，甚或是你的生命呢？

我从叙述我的家庭开始。我父亲于 1954 年去世，就在他 54 岁生日的前几天。那时我已是一个 30 岁的成人，但是我并不理解，他在他年轻的一生中经历了多么复杂的生活。我只是在后来，当我在年龄上超越他的时候，才懂得了这一点。但从他去世之时起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对我没有能在他生前同他详谈一切总是深感遗憾，甚至内疚。

这种感情也许对每一个失去亲人的人都是共同的。只有在他去世后我们才突然感到此人是多么重要，并对失去的每一刻同他相伴的瞬间都觉得遗憾。

我的父亲1900年出生在当年的叶卡捷琳娜格勒省（现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偏僻农乡的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这是一个有点不寻常的犹太农民家庭，而且据我所知，都是相当困难的农民。他们如此贫穷，所以想方设法把我的父亲送进敖德萨的一所技工学校上学，这已是一件喜事。我父亲在7岁那年就在敖德萨一家工厂里当过铸工（制模工人）。1918年2月他17岁时入了党（像那个动荡的年代中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很早就开始了政治活动），后来参加了国内战争。而当战争结束了的时候，又过上了当年对共产党员来说普普通通的生活——起初被派去做党的工作，后来被派去搞经济工作，之后又做党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农村里干活，后来，命运又使他来到了赫尔松，在那里他结了婚，我是在1923年5月在那儿出生的。过了两年，父亲被委任为敖德萨一家罐头厂厂长。1930年，根据为挑选干部而从莫斯科派来的一个委员会的推荐，他被派到国外——苏联驻德国商务代表处工作（当时都是这么做的）。我们在那里住到1935年，我目睹和记住了当年的许多事件：尖锐的经济危机，希特勒上台，法西斯主义的确立……。最后一年，当时我已经12岁，在汉堡的一所外国人学校学习，这一年，鲜明的记忆令我终生难忘。

1935年我们家庭回到莫斯科，父亲开始在外贸人民委员部（那时政府部门都用这个名称）工作。1938年他被撤职，与他同时被撤职的还有在“斯大林之前”（即在斯大林当权之前）入党而尚未遭逮捕的大多数党员（关于这一点他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告诉我的）。他设法在列宁图书馆找到了一份馆长行政助理的工作。但后来他还是没有躲过那个时代的灾难——他被捕了，被指控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并被囚禁了一年。被释放后直到去世一直是做经济工作（他的最后一个微不足道的、但却非常麻烦的职位是俄罗斯联邦林业部建筑办事处主任）。

我要说，我与父亲从来没有机会详细谈谈心，这并非因为我们之间有什么隔阂。不，我们从内心里是亲近的，一有机会就交谈。我很敬重他，向他请教，倾听他的意见。我那时觉得，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我父亲这个人虽然没有受过良好的正式教育，但他是一个学识渊博、智慧非凡和天赋令人羡慕的人。孩提时代我就记得，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他怎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德语，又那么快就学会了法语（1935 年我们在巴黎住了 4 个月）。他也能用英语阅读，翻译过恩格斯的通信。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后来，在我成了大学生、随后又当了出版社的编辑和新闻工作者、非常清楚地弄清了政治与经济的本质之后才认识到的。他也对我持信任态度，并且为我参加了战争、为我最初发表的文章而感到自豪。

但虽然如此，还是有许多事情父亲是绝对不愿和我谈的。其中当然包括斯大林。还有 20 至 30 年代的党内斗争，大规模的镇压和集体化。谈到自己被镇压的熟人或朋友中间的某个人的时候，他会说，他相信他是无辜的，或者会说，某某是告密者，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但却不下任何结论！也不谈自己被捕的任何情况，除了一些狱中生活细节之外！尤其是有关领袖们的事，只字不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过父亲如此小心谨慎的原因。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人们是可以理解他这种谨慎的。他怕我把他说的话传给我的朋友，他们又把这些话传给别人，所以他对我什么也不说。令人费解的是，当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打完仗回来了，我以为他可以信任我了，而他确实是默默地这样做的。可是他仍然长期保持沉默。

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和贝利亚被捕之后，我们才开始促膝交谈。只可惜，时间很短，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他过去不能如此与我交谈。他回答我说，他本人尽管有长

期的、经受过锻炼的政治经验，但他发现很难保持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完整性。他对我说："我知道得太多，我经历的太多。"他不愿意在如此困难和危险的时候把同样的重负转加到我的肩上。要把你所知道和了解的所有事情同你对某种理想的信念联系在一起并保持思想和精神的平衡是越来越困难了。"我是为你担心。"父亲说。当然，他也是为全家担心——如果你在哪儿干了蠢事，不幸就会降临在全家身上。这就是他保持沉默的原因。母亲生气时说，他就爱"搓小球"（父亲有个习惯，爱把偶然掉在身边的纸片、面包屑等用手指揉成小球），虽然他也能快活起来（特别是两杯酒入肚以后）。但就是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很少谈论政治。

应该承认，在困难的年月，不仅是他，就是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直觉救了的。有些话题他是不谈的，而我不知为什么也从未提过任何不适当的或危险的问题。在那令人苦恼的年月中人们养成了一种"第六政治感觉"。如果缺乏第六政治感觉，那么你就必遭灭亡。还在14—15岁时，我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连完全无辜的人、好人、诚实的人、忠于自己国家的人也被当局抓起来，并消灭了。我熟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他们都是我同学的父母，我父亲的朋友。我当时认为完全有可能把父亲抓走。1937—1938年，每天晚上我都惴惴不安地睡下，甚至默念着，有点像俗世的人们祷告一样："但愿别把父亲抓走！"况且我们当时住的是外交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房子，几乎每天都要从那里抓走几个人。在我们年级，整整一半学生的家长都被捕了，同学们也通过令人极端厌恶的、有损尊严的仪式宣布与父亲或母亲脱离关系。

我有三四个要好的同龄人都被逮捕并判了罪，虽然他们还是未成年人，另外有几个人，后来我才知道，被招募为告密者。

斯大林去世后，当危险的巨石略微向后移开一点的时候，随着最初的变化征兆——为"医生谋杀案"平反、逮捕贝利亚、当时报纸上刚刚开始不点名地提到"个人迷信"，这时，父亲才第

一次开始跟我坦率地讲述过去的事情。主要不是讲 20 年代（如果他活得更久一些，大概我们也会谈到这个时期），而是讲更痛苦的、在他的生活中（通过他也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的 30 年代。

我没有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如今已是尽人皆知的东西。或许，许多东西当时就连他本人也不知道。我发现，在斯大林时期，恐惧不仅使人们不敢说禁止说的事情，而且也往往不敢想被禁止的东西。可能在这方面是自我保全的本能在起作用。人的思想不是总能够隐藏到底的。如果老是警觉地、专门地注意一个人的话，每个人几乎都或迟或早地要自我暴露。在这一点上，大概乔治·奥威尔是对的。

从我所记得的当时的谈话中我得出一个结论：父亲把自己在党内的同龄人、参加过革命和革命之后发生的那些事情的人严格地划分成了四类：

第一类是狂热分子。正像他所说的，任何一种运动，任何一种思想，或许都会有狂热分子；这与其说是一种坚定信念，倒不如说是一种思维和心理状态。这种人不管怎样都会成为盲目的忠诚信徒。他的朋友当中也有这样的人，有几个在我们家里我也见过。他给我讲过，好像是在 1938 年，他向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北方海上航路总局局务委员会委员 п·г·库利科夫（从内战时起就是同事）——提了一个问题：发生什么事啦？怎么他们都认识的一些无限忠于党和国家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都突然成了“人民的敌人”啦？对于这种情况，他举了几个人的名字。而作为对他的回答，他得到的却是一顿愤怒的指责：“阿尔卡季，你，一个诚实的共产党员，怎么竟能想这样的事呢？——要完全相信党，相信斯大林。”可就在那一夜，库利科夫本人被捕了。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但当他从集中营回来时我父亲已去世了。他被恢复了名誉，恢复了权利，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个人特定退休金

领取者。我同他经常见面、聊天——为了纪念父亲，我一直同他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直到他去世。令人吃惊的是，尽管他历经磨难，却依然如故，不说是个狂热分子，也是一位盲目信仰到底的人。虽然他不再神化斯大林，但仍坚决捍卫斯大林所建立的制度。有一次，在激烈争论之后，我在气头上对他说："像您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这样的人，白给关了起来，又白给放了。你如果有权的话，还会让一切回到'美好的旧时代'去。"他甚至听了也没有生气。

第二类就是那种残酷无情、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他们可以适应各种制度，而且制度越严厉，就越能为他们的升迁创造更多的机会。在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中，在党龄很长的（甚至在革命前就入党的）布尔什维克中也有这样的人，在后来入党的党员中这样的人更多。父亲举了几个人的名字。这些人不值得去重复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地位不太高的人。但相当一批这样的钻营之徒——如维辛斯基和 30 年代的克格勃头头们——都爬上了高位，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在 30 年代的大规模镇压、撒谎和告密时期爬上去的。

第三类是"并不卑鄙的玩世不恭的人"。他们简直是什么都不相信，只是为了地位和升迁装作相信的样子。他们所迷恋的就是官位。但同时又尽可能避免做肮脏事，也不想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父亲的朋友和熟人中也有这样的人，他对他们是宽容、甚至是温厚的，但他不敬重这种人。有一次我的问题具体涉及到他的一位同事，他便回答我说："要知道，大多数人都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恶人。他们只不过是想过得好一些，因此不应该鄙视那些不想搞下流勾当、不危害他人而使自己过得好一些的人。"

最后第四类是"温和的信仰者"。他们的信念中含有理性，他们忠于本质的社会主义理想，忠诚地准备为他们的信念贡献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不相信领导人告诉他们的那些没有意义的事

情，更不愿出卖别人或踩着别人的尸首往上爬。他们既不是狂热分子，也不是玩世不恭之徒。我父亲就属于这一类。

当然，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人们也遇见过真正的英雄，尽管这样的人很稀少。我问父亲：他和他的朋友们相信不相信反对“人民的敌人”的那场歇斯底里的运动，包括1936—1938年的轰动一时的审判案？父亲回答说：他和（他相信）朋友中的许多人心里都不相信。但除了最亲近的同事，人们相互都不谈此事。他说，他们很快就了解到，对被捕的人都进行拷问，不仅逼迫他们坦白，而且还要他们说假口供，尽管他们开始时对此觉得不能相信。有一次我问他：“难道从来都没有人、甚至连在沙皇年代历尽艰辛的老布尔什维克当中，也没有人提出抗议吗？”父亲说，公开表态的人很少：全部问题在于，人们受到了愚弄，以至于相信为了伟大的事业就会有各种牺牲，而当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要提出抗议已经晚了。

他给我讲过有关一位苏联驻日本商务代表（我又要怪自己没有记下姓名）的事情。1937年，这位商务代表回到莫斯科并立即就赶上了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当时司空见惯的党的会议。这次会议的议程就是讨论把一个“人民的敌人”和对他未曾表现出“警惕性”的一批人（也就是没有谴责他、出卖他或揭露他的那些人）开除出党的问题。这个人第一次目睹这种丑恶的表演，他坐着，听着，后来就走到讲台上，感情冲动地说了一通愤怒的话：“出了什么事啦？我们大家堕落到了多么卑鄙、多么胆怯的地步！明明我们都知道这些人是诚实的共产党员，是自己的同志，可谁也不为他们说一句话。我们真可耻！我们不能这样活着。”好像大致就是这样，至少我是这样记住了父亲的叙述。驻日商务代表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是一阵鼓掌声。父亲说，这在当时那种普遍怯懦和精神变态的情况下是特别令人吃惊的。但这位讲演者在走出人民委员部大楼时就立

刻遭逮捕。

我从我家的朋友和熟人那里了解到，大家都认为父亲是一个和善而有耐性的人，许多人都喜欢他，包括他坐牢时同一囚房的囚友。自己一生中这悲惨的一年，他只是在斯大林死后才给我讲的。我想，他之所以这时才对我讲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怕人知道他违背了当初他签署的“不泄露”保证（凡是被释放出狱的人都立了这种字据），而是因为，在1953年以前，他简直就不相信他（可能我也是）不会再到这个通往斯大林时代的痛苦之源的道路走一次，所以他不愿回忆痛苦的往事，也不去想将来可能碰到的厄运。

他于1941年年底因被指控反革命怠工而被捕。（可能有人突然想起他以前曾在德国工作过。只有那时的审问者的病态想象力才能使他们怀疑我父亲、一个犹太人能当纳粹的奸细）。法庭（我想那是改为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内务部部队法庭。我父亲在受侦讯时就被送进乌里扬诺夫斯克的监狱）判他8年徒刑。父亲回忆说，庭长（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直到去世都以景仰的心情记着他的名字——很遗憾，他的名字却没有留在我的记忆中）宣读完判决书，马上嗫嚅着对父亲说：“赶快上诉。”父亲不知所措地问：“你说什么?”庭长没有回答，走出了法庭大堂。当然，上诉书是递上去了。庭长推翻了他作的判决，把案子移交给了另一位侦查员。过了几个月，此案重新审理。同一法庭在1942年12月因为缺乏犯罪事实而宣告父亲无罪。所以，即使在古拉格群岛旁边，也可能遇到一位正派的人。

他在向我讲述在狱中度过的这一年的时候，没有痛苦和怨恨（按照当时的标准，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要知道，他仅坐了一年牢，而且在那个困难时期他还被恢复了名誉），甚至还很幽默。他回忆说，他的囚房里押了近40个人，有不少都是政治犯，其中有爱沙尼亚的一位前海军将军，有苏联军队的几位将军和军

官，还有几个转狱而来的莫斯科人。也有刑事犯。无论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都对父亲不错。

家里保存着父亲从狱中带回的几件纪念品：一件是父亲在狱中庆祝与我母亲结婚 20 周年时，不知哪位狱友给缝的荷包（用的是从床垫抽下来的彩线），一件是一位很有艺术天赋的刑事犯用燕麦面包瓤塑的一个镶有父亲侧面像的“颈饰”（很像），这个像章到今天还留着。它已变得像石块一样，这说明了当时面包质地之差。

即使经历了这样的折磨，父亲也没有丧失他对事业（他从 18 岁起就把自己的生命与这个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信仰。虽然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在走着怎样的薄冰，一切都会多么轻而易举地、迅速地以不可逆转的悲剧告终。

我觉得，下面一点帮助父亲忍受住了一切困难并且没有被摧毁：他是一个工作非常积极的人，狂热地忠于自己的工作，无论指派他干什么事情都是如此。他到晚年（自然，这几年我记得更清楚些）仍把全副精力倾注在工作上，为工作中的每一次失败而痛心，每一成就而高兴，是工作过分紧张缩短了他的寿命。我记得他一直被列宁图书馆的事情吸引着，那正是列宁图书馆的新楼启用的时候。当然，他也经常回忆起 30 年代初在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当时他面临的任务就是要以低价购买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一切，为此节省外汇。

但父亲只是向我吐露了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这我不仅要怪当时的环境，还要怪我自己：自己的事太忙，总是把重大的话题往后推，推到空一点的时候。可如今已什么也谈不成了。

我母亲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比父亲小一岁，但比他多活了 23 年。

她的双亲全都务农。外祖母年轻的时候曾在新阿斯卡尼亚的著名的德国垦殖地主伐里茨—费因家族当雇农。关于这件事，有

一次我曾给这个家族的一位著名的在列支敦士登定居的后辈讲过——命运使我们又相聚了。我的外祖父生于格罗特诺省，后去南乌克兰，在那里遇见了外祖母。后来，他们迁到了赫尔松，住在郊外的农村中，生活很俭朴，直到去世都不识字，但把几个孩子都培养出来了——让他们受到了中学教育。我母亲后来当了小学教员。她做了好几年流浪儿童的工作。

妈妈是一位聪慧的妇女，有着非常刚强的性格（父亲则相反，是一个温和的人）。这种性格帮助她忍受住了命运的打击，我想也帮助她拯救了家庭。对她来说，最沉重的一年就是 1942 年。当时我在前线，父亲在狱中，她和我 3 岁的弟弟被疏散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住了近一年。她到郊外的村庄去，用剩下来的一点衣服或别的什么东西换点儿吃的来养活小儿子，准备一些被允许带给父亲的食物和烟草。有一天她冒着严寒走过结冰的伏尔加河到对岸，再爬上河崖上的高高的石阶，才到达监狱。

当然，是她，是她的勇敢精神，在那段饥饿的日子里救了父亲，救了弟弟，后来又救了我——当我患着开放性肺结核从前线回来并且要死的时候，又是母亲，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东西拿到市场上换了黄油和蜂蜜给我送到医院来……

母亲非常爱自己的丈夫。他沉痛地忍受住了他的去世，但是她没有被摧垮。她还要把我的弟弟拉扯成人（他当时在学校读书）。在她 1977 年去世之前我一直跟她很亲密。虽然如此，我至今仍受着良心的责备——当时我是可以给她更多的关心和帮助的。我想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大家对父母都有欠着一笔未还清的债的感觉。

从 1930 年至 1935 年，我家住在德国，我们在那里经历了大萧条、希特勒的上台和法西斯主义的得胜。我到德国时整 7 岁，离开那年是 12 岁半，但我已懂得很多事情。我父亲和他的朋友

们的谈话内容主要是政治。我已懂德语，所以我阅读有关政治事件的书刊，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和在街上看到的也都是有关政治的事情。我最后一年在汉堡上德语学校时，就在那里的教室里目睹了情况的急剧变化，背景大不相同（从共产党到法西斯）的孩子们都在那里学习，还常常打架。

早年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国外的经历使我对西方和对资本主义养成了一种冷静的看法。后来在我的一生中，我对两种极端具有了一种免疫力。一种极端是我们的宣传所炮制的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和西方社会的看法。特别是所谓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对人道主义理想和人的精神的鄙视、对外政策中天生的侵略性，等等。另一种极端是把西方理想化的观念，认为西方具有充分的自由和正义，是生活普遍富裕的王国。当时，直到今天，我仍牢记着关于法西斯得势的难忘的印象。那时，我从我父亲的德国朋友的心情和神色中，从他们后来的遭遇中，从他们表露出来的对正在无可抗拒地到来的灾难的恐惧和困惑中看到了那些现实。我仅仅因为我是一个俄罗斯人而曾在街上和学校里遇到过对我的兽性般的敌视。有好多次当我和我的朋友出外散步，并用俄语高声谈话时，周围就有人用最下流的语言骂我们；有一次我们碰上一群白俄移民儿童，我们竟挨了他们的揍。我见过野蛮的军国主义，见过法西斯集会和成千上万失去了人的面孔而变成野兽般的人举行的火炬游行。我见到过反犹童子军捣毁犹太人开的商店的事件，等等。

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街对面（我还记得我们的地址：柏林奥斯堡格街一号）。我是那家出售办公用品和学校文具的小铺的常客。我熟悉那个店主，虽然并未特别注意他是哪个民族的，至少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有一天早晨我上学的时候，看到小铺橱窗上贴了一个六角星和用来侮辱犹太人的一个驼背怪人的像。两个突击队员站在上了锁的店门前面，

门上贴了一张招贴：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那天从学校回来后和在以后几天中，我发现那家小店被关闭了。一星期后来了一个新的店主，那个人明显地是个百分之百的亚利安人。这之后我就根本不想踏进那家铺子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1933—1934年。那时我家在辛夏伊默先生家租了两间房。我们同他们全家成了朋友。辛夏伊默先生是在一次大战中获得崇高奖励的英雄和伤员，在当地一家银行里当一个小职员。他和我父亲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辛夏伊默是个犹太人，同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女儿苏珊信她母亲的教（当时她和我都已10岁，但还不满11岁）。

当时的政治形势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十分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辛夏伊默先生作为战争英雄和伤员享有一定优待（即使是按照1933—1934年希特勒的法律）。另一方面，谁也不知道这个家庭能维持多久。这时，对犹太人的迫害越来越猖狂。母亲和女儿经常处在压力之下，因为她们破坏了必须保持种族纯洁性的新法律。移居国外意味着放弃他们全部积蓄，放弃辛夏伊默先生的工作，放弃他们的房子和养老金。而他们又能去哪里呢？

当德国的反犹政策在其后几年中达到新的高潮的时候，我们常想到辛夏伊默一家，不知他们的遭遇如何。1969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我在电视上讲了一次话，报上有些文章提到了我和我的研究所，《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还登了我的照片。我回国后，发现由《时代》杂志编辑部转寄来的几封信。其中有一封是辛夏伊默的夫人和女儿从美国堪萨斯市写的。尽管有很大困难，那个家庭还是得以在1938年离开德国，从而躲过了许许多多人遭遇的那种命运。辛夏伊默先生则在到达美国后不久就去世了。

我一生都牢记着个人对德国法西斯的体会和经历。这些体会和经历在许多方面决定了我对世界上和我自己国家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的看法。

当我家在1935年秋天回国的时候[①]，集体化年代的饥荒已经过去。食品配给制刚被取消，生活状况已有改善。可是政治气氛却开始变得不祥，不过，1934年12月斯大林的助手基洛夫被刺杀后进行的镇压虽已开始，到1935年秋天形势还不算太坏。那时大家甚至还有一些欣慰感，因为大家认为我们正在走向民主化；不久之后就开始了对新宪法草案的大众讨论。

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高兴的事，但是回国也意味着要过比较贫困和原始的生活，尽管我们怀抱着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回到莫斯科后，我们开始住在我父亲一个同事的一个套间的一两间小房间里，他因外贸事务出国了。只是到了1938年我们才得到了我们自己的两个房间，那时我已有一个弟弟，已是四口之家，只能靠稀少的一些生活必需品过日子。更糟糕的是，我一点一点地开始感觉到人和人之间的越来越多的虚伪和政治上的残忍；这是一种痛苦的经历，特别是对我的一些朋友和我来说，因为我们在信念上都爱国家，爱我们的社会，爱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理想。

但青春年华可以克服一切，尽管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坏，我同我许多同学一样，还是上学、入党，喜欢体育运动，结交朋友，其中有些人至今仍是我的好友。30年代后期紧张的政治和思想形势是压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的日益沉重的负担。有些人垮下去了，消沉下去了；有些人变得邪恶起来，开始参加领导上发动的那些政治游戏。也有人开始对一切都胆颤心惊，学会适应一切，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还有人甘心受人利用，在当时那

---

① 那次回国很匆忙。有人指责我母亲出身贵族。幸运的是，当她找到了她的出身证后，我们就毫不费力地驳斥了这种指控（至今我还保留着她的出身证）。我父亲后来说，那次指控使我们找到了出身证，可以说是因祸得福。由于这场指控，我们在1935年底回到了莫斯科。如果我们晚几年在1937年大逮捕时回国，我父亲，或许还有我母亲，可能会立即被押送去监狱，并丢掉性命。

种气氛中成了拿津贴的告密者。

在回顾当年的时候，我想估算一下，当时那种情况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无疑我变得更谨慎了，我需要采取适当的行为方式和靠政治本能来适应这种形势。但是我没有垮掉。总的是我接受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但是我也没有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在我身上真正得到发展比较晚，早年时它只以潜在的形式存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也逃避不了遭受愚弄。但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傻瓜。我不允许任何人用意识形态的废渣塞满我的脑袋，但是我也不能避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教条主义化的影响。而最重要的是，我保持了我的荣誉，虽然我希望读者不要以为我这样讲是不够谦虚。我不是在否定或者神化我们的体制的意义上说这句话的。如果我否定我们的制度的话，我不可能活下来。我也不是在不作任何妥协的意义上这样说的。这不仅是一个个人的生存和生活待遇的问题。如果你觉得你尚有机会在对外政策或在有关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面作出贡献，你就得遵守游戏规则，准备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作出妥协。只有当你把取得的成就同你所作的妥协加以衡量比较之后，你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

这不是说，即使是在双方的平衡一般说来更有利于成就一方的情况下，你就能逃避对自己的错误和失误应负的责任。不，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尽管我并不总是对问题保持沉默，但我仍然要为自己在反对错误东西和捍卫正确东西中表现不够坚决而承担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从未出卖过任何人，从未指控过任何人，从未参与过整人和“压服人”的运动。这当然不是什么可以夸耀的成就。不过，这至少也能说明一点问题。我可以说，在极权主义制度下，要做到这样也不是容易的。我能够这样做，不仅仅是由于我的人品，也是由于我的运气好。我是说克格勃未曾迫使我去出卖或指控什么人。

在我们的政论文章中现在进行着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有何区别的热烈辩论。我同意那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把极权主义看作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要求每一个个人都参加进去，去努力实现统治者制定的目标，而贬低和无视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斯大林时期的情况就是如此。权威主义并不要求你去参加，而只要求你完全服从。但这也是够糟糕、够危险的。所以我不同意有人认为在向市场经济和民主过渡时必须要有权威主义的看法。权威主义是与民主绝然对立的，它迫使人民服从统治者的意志，不允许他们参与政治，或对政治施加影响。

要正确地评价斯大林之后的历史，重要的是必须知道，我们需要使自己从压在我们身上的包袱下面解放出来，包括那个被扭曲了的道德观的包袱。难道当期望你或要求你去做某件坏事的时候，你仅仅避免参与，这就可算是一种勇敢的行动吗？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不能算是。在极权主义社会里，可以算是。有时候，甚至可以算是很英勇的行动。

当希特勒的军队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进攻苏联时，我的青年时代突然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活是短暂的、但它给我的一生都打下了烙印，其意义由于服了兵役，参加了战争，我更快地成熟起来了，在作判断或决定时，有了更多的独立自主性。我的这段经历甚至使我变得更有勇气。

我应该说，战场上的勇敢同平时作为公民的勇敢不是等量的。在作战时英勇善战的小伙子们在长官面前往往成了可怜的懦夫和随波逐流者。我还记得战时有这样一个笑话：“战士，你怕德国人吗?”

“不怕。”

“那你怕谁?”

“怕司务长。”

归根到底因为你日常的福利都取决于他：多给一份（定量配

给的）面包和一份粥，给一副新包脚布，如果特别走运，还可能闹一双“小牛皮”皮靴穿。总之，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司务长”对你的态度可以意味着你能否生存的问题。

我是在我国历史上非常可怕的时期走向成熟的。我曾经参加过战争，那段经历有助于我在成长时具有更多的自尊感和已履行了自己天职的感觉，而没有自卑感，它使我增加了某些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重要的，它帮助我保持了自己的个性。

坦率地说，在战争年代我是幸运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活下来了。

第一，我遇到的危险和肉体上的艰苦比较小，因为我不是在步兵部队里，不是在坦克兵部队，也不是在反坦克炮兵或团队炮兵中作战，而是在火箭炮部队里用著名的“卡秋莎”作战。我们比步兵部队的生活当然要轻松些。在我的同志中，我当时被认为是相当勇敢而又非常大胆的，主要是因为前线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炮兵侦察队度过的，这就是说，我得靠近步兵阵地，有时还要走在步兵的前面。虽然如此，在卡秋莎部队里毕竟还是危险性小一些，活下来的人比较多，尽管我们部队也有很多人阵亡或负伤。盖过这一切的是，在一个使用新式、强大和高度秘密的武器的团队里服役，本身就很激动人心，甚至富有浪漫色彩，尤其是对一位年轻军官来说。

第二，我不是在苏军遭遇的战事最坏的时刻参与作战的。我没有轮上经受大撤退、惊慌、被包围和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失败。比我早几个月参军的许多和我一样的军官，他们经历了这些情况，精神上垮下来了，心理上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我觉得庆幸的是，命运没有让我经受战争头几个月的苦难。但是，我看到了战争各个关键阶段：1941年秋天的莫斯科，从1941年到1943年这段非常艰巨和充满危险的时期，我们开始反攻时，战争的整个进程就改变了，虽然我们仍然遭受了一些可怕的、而且常常是不

必要的损失。

但是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军官的呢？我想我是本能地感觉到战争正在临近，我要去参军。

1941 年年初，我在九年级的下半年上学时，我就决定去上军校。起初，不知为什么，列宁格勒的通讯学校吸引了我。我记得，我还给那个学校写了信。但后来我叔叔来看望我们。1941 年他已是少校，一个坦克旅的炮兵司令。驻防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地区。他当过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函授生，劝我不要去通讯学校，而去当炮兵。

我向莫斯科克拉辛第一炮兵学校递交了各种证件。我在战争开始前一天进入该校。我们在那里完成了 6 个月的突击培训，而不是通常的二年制的训练。

我们开始时学习使用重炮，后来改为学习使用火箭炮。6 月里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看到了这些新武器。我们还以为这是一些"浮筒"。我们注意到这些"浮筒"数量极大，而且经常一批一批来，一批一批走，后来我们知道它们都上前线去了。

1941 年 10 月中旬，莫斯科的局势变得非常紧张。我们在学校里对这一点不是马上感觉到的，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于战争状况，对敌人从 1941 年 7 月开始的对莫斯科的轰炸也习以为常了。在轰炸时，我们去灭火，站成包围圈，注意捕捉放信号弹的人，即给德国驾驶员指点目标的"信号弹手"（我没见逮住过一个这样的破坏者），不然，就躲进防空洞。敌人第一次轰炸莫斯科时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当时，紧靠着炮校的白俄罗斯铁路铁轨两旁着火了，一夜之间炸毁了几列运输弹药的军用列车。

就这样，在 10 月的一个昏暗的、已经很冷的日子里，我们整个炮兵连都被调到司令部外面并挨个被叫到指挥员办公室去。那里有个委员会——有三位军人，两位文职人员，同每个人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轮到我了。他们问我："学员同志，如果

交给你一种秘密技术装备，而且出现了危险，就是它可能落到敌人手里，您能不能牺牲个人生命把它炸掉?”我说：“当然能。”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谈话好像是故意假设的，甚至是过分夸张和不真诚的，但在当时那些日子里这是完全正常的。

谈完话后，我同其他7名学员被带到军校大院的一个角落。那儿，在小矮墙后面放着我们说的那个“浮筒”。有人向我宣布说，我被指定为炮长，其余7个人都是我这门炮的炮手。从“浮筒”上揭下布罩，看见下面有一个像是有8个轨道的东西，确切地说，像安在一个支架上的、能上下、左右自由转动的上、下两层的活动小屋。让我们看了炮弹，实际上是火箭，约4英尺长，43公斤重。给我们演示了怎么发射：从座舱里出来，把挡风玻璃上的装甲挡板放下，然后转动一个专门设计的操纵盘把火箭一个接着一个放出去。还让我们看了放在机架上的两箱梯恩梯炸药(每箱25公斤)，在危险的情况下要将炸药引爆。后来，在前线，我曾想：干嘛要坐在火药上逞英雄呢？完全可以把电引信弄长点儿，引进壕堑或用缓燃导火索去引爆，而根本用不着同火箭同归于尽。但按照当时我们上级头脑中的想法，这个时代就要求人们自我牺牲，或者司令员们是想把我们这些了解这种秘密技术装备的战士与这种装备一起消灭掉?

第二天我们沿着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向某地进发，然后又下到公路一侧。我们在一个地方放了炮。我从未弄明白，这是朝敌人打炮呢，还是一次演习？但我什么时候也忘记不了：火箭的呼啸声震耳欲聋（因为你正坐在呼啸而出的火箭底下），看到的却是烈焰熊熊，烟雾腾腾，尘土飞扬，每发射一枚火箭，炮身就颤抖一下，而每辆车都发射了16枚火箭。

次日叫我们回到炮校，把“卡秋莎”收走了，发了卡宾枪，从早到晚进行队列训练：“一一二!”“大步走!”“立正!”练个没完。我们弄不明白：他们想要我们干什么。那时其他部队正在莫

斯科郊外作战。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把未经训练的公民匆忙地组建成新的战斗单位，他们列队开往 40—50 公里以外的前线，而我们却在做着无聊的事情。可谁也未曾想到，这是在准备阅兵式。

11 月 7 日国庆日，我们很早就起来了，去吃早饭，这是节日早餐，还发了白面包和黄油，尽管德国人已临近莫斯科的门口。但还没容把食品送到嘴边，就响起了警报。我们排好队就出发了，直接奔红场，炮校走在阅兵式队列的前面。这时我们才懂得我们不顾敌人轰炸的危险，是在举行传统的阅兵式。我排在队伍的右翼靠中间的一个地方。我心情激动，甚至有点乱了脚步，但很快又纠正过来了——在还没走到陵墓前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云层低垂（可能这是决定举行阅兵式的一个因素），下着雪。我们戴着钢盔，雪在套圈固着在盔壳钢板上的地方融化了，后来就结了冰。勃洛克[①]的诗篇《用玫瑰花扎成的白色花冠……》和《十二个》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我在想，我们是遵守教规者还是苦难的圣徒？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又根本不是——给参加阅兵式的每个人（据说是根据人民委员的命令，也就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都发了 100 克伏特加酒。那是我第一次喝下半玻璃杯的伏特加。

后来，炮校被迫迁到乌拉尔的米阿斯，临近新年时，我以中尉军衔在那里毕业。此后，新编的部队先是驻在阿尔斯克附近的鞑靼，接着又驻在莫斯科整训，后来登上列车开往前线。沿途列车曾遭到两次轰炸。

这里，我想把话题转到 1990 年的 5 月。我已经同我们的一些将军（甚至还同一位元帅）就压缩军费开支、裁减军备和进行

---

① 勃洛克（1880—1921），俄国诗人，《十二个》（1918）是诗人第一部歌颂现代革命的长诗。——译注

军事改革问题进行了半年的公开论战（起先是在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会议上，后来又在报刊上）。将军们对我很凶恶，像魔鬼一样。5月11日晚（我正同一位副所长和一位顺路来访的客人在办公室坐着），突然电话铃响了——是政府的自动电话系统的电话。我摘下话筒——不知是谁的嗓音："是格奥尔吉·阿尔卡季耶维奇吗？"我说："是。"对方说："我知道，明天是您的生日，想向您祝贺，祝您健康和取得成绩。"停顿了一下。我说："对不起，我不认识您。"对方又说："我是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我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我这儿有一本书，我们部的中央档案馆在书里收集了有关您的战斗履历、军事履历和你们团的历史的文件。怎么转给您呀？"我说了我们的地址，说离国防部不远。对方回答："那也好，也许明天我顺路捎去。"

他一大早就送到所里来了，我还没到所里，于是秘书就把礼物收下了。这份礼物对我来说确实很珍贵。那本书里有同我的团队和我有关的一些文件的副本，甚至还有一些照片。我过去从未见过这些文件，它们使我感到高兴。我没有想到过，我有如此好的战时记录。虽然我和亚佐夫通话时在场的人都在猜测：这种姿态或许意味着什么？我想可能是为了表示和解。我的副所长用另一种方式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军事首领为什么要去查阿尔巴托夫的档案材料呢？莫不是为了寻找一些"败坏"别人名誉的材料？这些问题没有找到答案。

我讲这些都是为了说明，我要引用的这些文件是从何而来的。那是从221独立近卫炮兵营（我以侦察主任的身份开始在这个营服役）的《战斗行动日志》中来的。"1942年3月13日，加里宁铁路第65号段——机车司机和炮兵二连中士弗拉基米罗夫被打死并就地安葬。炮兵二连司务长弗罗洛夫和战士多夫加柳克负伤，他们被送往奥斯塔什科夫市医院。"

"1942年3月15日19:00，第84号段。遭轰炸。无伤亡。

一辆战车被击毁。”

顺便说说，在对我们的火车进行第一次轰炸时，有三个人遭到不幸，一人被炸死，两人负伤。那时他们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把没有爆炸的小炸弹从停在月台上的车上投出去，炸弹不大，也就比手榴弹大一些，其中有一颗炸弹在手里就爆炸了。我的战争年代不是没有可能就这样容易地结束。

后来，转战加里宁方面军、草原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参加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又在斯摩棱斯克州度过了艰苦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打了防御战和佯攻性的进攻战，后来，在库尔斯克战役后又是进攻，一直打到第聂伯河，又在卡涅夫以南强渡第聂伯河，后来驻扎在切尔卡瑟（1985年我被授予该市荣誉市民称号）……在那里，我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被送往后方，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当时还没有治肺结核的药，前面我已经写了，是人工气胸和外科技术、给我治疗的大夫（我偶然地遇上的这位大夫是我一位中学同学的母亲，这位同学也在前线打过仗），还有我母亲和母亲的关怀拯救了我。1944年夏天我作为卫国战争二等残废军人复员。

我战斗得如何？我是尽力而为的。从亚佐夫1990年转给我的文件看（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我的上级认为我打得不错。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太谦虚，但我想从我的战斗记录中摘引几段：

1942年8月25日炮兵营营部上报的“战斗鉴定”说：“阿尔巴托夫指挥的炮兵连在同德国占领者战斗期间取得了良好的战果。没有出现让法西斯恶棍从炮连的炮火下逃掉的情况。在执行战斗任务时，阿尔巴托夫把组织、支配和领导等项工作都做得很内行，很文明。8月6日他的炮兵连消灭了敌人一个步兵连以上的兵力和一个迫击炮连。以本人在战斗中所作出的勇敢的榜样教育了部下。”

1942年10月22日的“战斗鉴定”说：“阿尔巴托夫在炮兵

营期间，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勇敢的、坚定的、守纪律的、神态端庄的文明的指挥员。在与德国占领者的战斗中，阿尔巴托夫作出了勇敢的榜样，在炮兵营执行消灭希特勒匪帮的战斗任务时，个人指挥了全营的火力。他是一位文明的、熟悉并精通自己的业务职责、对自己对部下要求都很严格、在本营全体官兵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炮兵指挥员。建议由阿尔巴托夫同志担任炮兵营营长职务。"这是一份对我评价很高的呈文——在我19岁的时候！但我当时并未得到这项任命，正如我后来才知道的，就因为我父亲当时作为"人民的敌人"正在蹲监狱。不过，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保密，因此这份鉴定性质的呈文我在1990年才第一次见到，竟致我连怨恨和失望的理由都没有。

1943年4月14日的"战斗鉴定"说："（阿尔巴托夫同志）能胜任工作，在执行侦察的战斗任务时（我那时是团侦察主任）能提供珍贵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我炮兵不止一次地进行齐射并消灭了数百个法西斯匪徒。"同时又写道："……（该同志）遵守纪律不够，不注意提高自己。"但结论是："在部下中间享有威信，思想意识坚定不移，精神坚韧不拔。"我一再尽力地回忆，为什么仅此一次——说了责备我的话。后来，在一位同团的战友的帮助下，我回忆起来了。有一次在改编时（我们得到了新技术装备）没事干，我们就四个人一起玩牌——玩朴烈弗兰斯（一种纸牌游戏）。团政委（就是他写的鉴定）——一位"搞过地下工作"的老学究——信步走进了房间，狠狠地批评了我们，批评了很长时间，说我们是"牌迷"。于是他忍不住了，往"战斗鉴定"里写了两句不好的话。

后面的一次（也就在半年之后）不是由政委、而是由团长签署的嘉奖报告，也就是1943年9月10日的"呈请嘉奖的报告"写道："（阿尔巴托夫同志是一位）朝气蓬勃、勇敢无畏的侦察兵。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敌情资料，团队则根

据这些情报射击。9月4日，他在前沿观察所弄清了敌人在古桑和皮利片科两村的主要集结区，团队向这两处发出两次齐射。之后，我军顺利向前挺进并占领了两个居民点。9月5日，阿尔巴托夫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不顾危险，不怕死，在开阔地带准确地确定了敌人防御阵地的前沿，之后，我军众炮齐射。炮击之后，我军控制了制高点并继续向前推进。”

当然，在给请功的时候，往往评价偏高，不乏溢美之词。但看起来毕竟舒服。总的说来，我却是在战事不多的方面军作战——在加里宁方面军（在韦利日市、杰米多夫市等）、在草原方面军、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从奥博扬到泽尼科夫，后来又沿戈戈列夫斯基各地——大索罗钦齐和米尔哥罗德，后来是佐洛托诺沙，卡涅夫，切尔卡瑟）。我离开团队以后，团队又去了科尔孙—舍甫琴科斯基、别利齐和雅西、布加勒斯特和克罗什、塞格德、布达佩斯和布尔诺。于是这个团队成了切尔卡瑟荣膺红旗勋章的团，成了获得苏沃洛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和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的第17近卫迫击炮团。

我的短暂的戎马生涯对我后来的生活和我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我有时回忆起我的战时经历时，仍存着对职责、对战斗的同志情谊、对只要有一点力量就准备战斗到底的认识的怀旧情绪。

但我的经历也为我揭开了军队、军役和卫国战争的神秘面纱，抹去了多年来在我们中间培育起来的在军队、军役和卫国战争周围的超浪漫主义的光环。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我也清楚地了解了军队制度的丑恶的方面（尽管当时我们那里的制度要比现在纯洁得多，正常得多），尤其是了解到这些制度为恣意妄为、为衔级高的凌辱衔级低的、为粗野军人的行为、为那些愚昧无知、庸庸碌碌的人的飞黄腾达、为任人唯亲等等丑恶的现象和行为开辟了多么广阔的天地！我也了解到，我们军队的一些战役是

如何进行的：犯了多少错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使我对上面的吹嘘感到怀疑，并对各种类型的军国主义感到反感。

我不是武装力量的敌人，军队的敌人。但是，我不能用多年培养成习惯的“口气”来谈论武装力量，因为我国战后的全部发展及其“顶峰”——停滞时期也在军队中和军队领导人中间产生了许多消极的东西，与此同时，军方成了一条政治上的神牛。我不能不提出批评，尤其是在军工综合体的利益如此明显地开始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相抵触之后。

这就导致了我已经提到的我与部分将领的冲突，在冲突过程中，我的对手们表现出了极端的敌意，而某些人则是以斯大林时期的告密行为和给对方贴标签、扣“帽子”的典型方式行事的。当我开始论战的时候，对此是有所准备的，并对自己决定参加论战比较满意。整个这段插曲帮助我发起了多年以来第一次探讨战争问题和军事政策问题的公开辩论。同时也使我能够揭露出军工综合体的自私自利的主旨在我们这里也有所表现，它们试图让政治服从于军工综合体。

今天，我确信，我们社会的非军事化，也如同国际关系的非军事化一样，不仅是进步的最重要的前提，而且也是人类活下去的条件。我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一个最重要的现实。我是根据我的战争经验而采取自己的立场的。苏联社会的非军事化已成为在经济改革和民主化中取得成功和实现我国的政治稳定的一个前提。这就是为什么对军国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从我开始从事报刊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时起，就成了我所喜爱的主题。我记得我是在 1955 年开始写这个问题的文章的。那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你能略微勇敢一点写作了，但那还是在 20 大之前，到 20 大时这个问题上某些禁令才被取消。我的主要论点是军国主义已历史地注定要消亡，必须加以消除。

1944 年 7 月，我从部队医院出来，成了一名二等战争伤残

者。伤残程度是倒数第二级：你可因此不一定要去工作，可以只管自己。我领取食物券和每月约90卢布的抚恤金（那时用90卢布和食物券可以买到允许你购买的足够的东西，但是还不够按市场价格去买一瓶伏特加酒）。后来，问题出现了：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我的家庭生活虽不富裕，但尚能在经济上支持我去学习几年，于是我决定去学习。

实际上，我对此已经考虑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甚至还挑好了一所学校。1943年秋天，当我还在前线的时候，我在《消息报》上看到一段消息，说莫斯科大学将开设一个国际事务系。我记得我曾在战友面前大声说："这是我战后要去的地方。"他们都好心地笑我。当时，结束战争和上大学似乎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谁知道你能否活到那时候？

一年之后，我向莫斯科大学的那个系[①]提出了入学申请，并被接受。我的大学生年代开始了，这几年为我提供了一些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同学和我都还年轻，而且上了一所有名的大学，但是那几年是贫乏和挨饿的几年，这几年使那些希望斯大林在这场严厉地考验了民族的忠诚的战争之后将会同意使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变得宽松一点的人感到失望。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在伟大胜利之后很快就开始了新的迫害和镇压。

这种气氛在我们大学也可察觉出来。我们这些大学生有可能从事外交工作，到国外去。因此，审查极其严厉。我们得填写最长的和最详细的表格，表格有10页长。有关于你和你的家庭成员的各种问题："你和你的家庭成员曾否参加过其他（即非共产党的）政党？""你和你的家庭成员曾否在德军占领区居住过，或当过战俘？""你有无海外关系？如果有，是谁，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你是否与他们通信？"等等，等等。而这种表格每年都

① 几个月之后它成为外交部下属的专业学院。——原注

得填。如果你今年填的表同去年填的没有任何差异，那是上帝帮了你的忙。更糟的是，几乎每年都有一批学生被逮捕。当你要找一点茬子的时候，你总能找到它，况且按照当时的标准，你也不必去找好多茬子：所谓就政治题材进行的不健康谈话，在你宿舍里被告密者发现你的一篇直率暴露思想的日记；或者是一个不小心的学生为了练习外语会话而同一个外国人进行的偶然的接触和交谈，所有这些已足够让一个人被捕和判刑。

斯大林在战后为什么这样做呢？我的猜测是：他是个教条主义者，他记得俄国打败拿破仑之后大批俄国军官和士兵打到国外接受了自由思想，对俄国的生活表示不满。那些军官的探索思想首先为国内的反对派运动、后来又为俄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起义（除农民起义以外）——十二月党人起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根据我的判断，二战之后从国外回国的军人并无这种反叛情绪。但是这些人看到了另一种比较繁荣的生活方式这一事实可能使他们产生了改进自己国内状况的愿望，这种思想对斯大林是完全不合的。

总的说，与过去同样丑恶和嗜血的斯大林主义战后仍在继续，而且犯下了新的恐怖的罪行：一些民族整个遭镇压；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回来的战俘直接被送进我们的集中营；斯大林的反犹主义被升级为政府政策。作出了愚弄人民的种种努力，不让他们了解社会和政治（我们的社会科学从未下降到如此可怜的低下水平），开始了一场反对多项自然科学的运动（遗传学、控制论等等）。用把一个伟大民族文化塞进一个狭窄和丑陋的框子里的办法来玷污这种文化的做法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十月革命后，我国80%的人是文盲。二次大战后，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努力看书学习的国家，成百万的人见过国外的生活。而且新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有文化，有好奇心，不像他们父母一辈那样胆小怕事。

这就是我这一代人成长的整个环境。尽管有种种迫害，我们

受到的教育是相当好的，特别是在我上的大学。我们的教授们是从俄罗斯过去的人才荟萃的学者中留下来的最好的学者，其中很多不久之后都挨了整。

就在1944年秋天，我决定去学英语，并选择美国这个专业。这是一个自愿的决定，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个选择。我的美国朋友们常问我为什么。我想这个选择是一系列直率的考虑的自然结果。战争还在进行，美国是我们的主要盟友，我的同龄人中大多数人对美国的态度是热情和友好的。即使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也都知道美国和苏联在战后世界上将起特殊的作用。还有美国这个国家本身无疑是很有趣的。

当我毕业后要给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尽管我是全年级最优秀的学生，而且毕业成绩优良，而且是在前线得过奖的军官，都无法给我分配工作。学生分配委员会的主席（一个名叫西林的人，他是外交部人事处的处长）直率地对我说：我的父亲有过被捕的记录。我回答说：我父亲受到诬告，后已恢复名誉，他对此只耸了耸肩膀。他没有说我父亲是个犹太人，这当然是用来反对我的另一个事实。

无论如何，我还是幸运的。我在上大学的最后一、两年中，曾在课余写过一些书评并为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搞些翻译挣点钱来弥补我的低微的收入。看来，出版社的编辑喜欢我为他们做的工作，因为他们写信给学校要求把我调到他们那里去工作。

我的主要任务是阅读美、英、德等国的政治、经济和哲学书籍，挑选最有意思的书籍和文章，以便译出来，作为参考材料供内部出版（供领导参阅）。我在我一生中从未像那四年中那样阅读那么多政治书籍。这项工作为我以后做报刊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知识。

顺便说说，这家出版社是颇不平常的。它是根据斯大林在1945年提出的倡议于1946年创建的。主要目的是为苏联了解世

界上的知识和文化打开一个窗户（这是我认为斯大林在战争结束时或紧接战争之后尚未计划搞对抗，而是希望在某种程度的合作基础上保持关系的论据之一）。

计划设立一个庞大的出版社。共有 14 个编辑室。涵盖了所有学术领域——从物理和数学到经济、国际关系和文学。工作人员的工资更比其他出版社，包括有名望的政治出版社的高一两倍，而政治出版社是由苏共中央直接管的。拨给了外文出版社大量外汇，我们订购的期刊和书籍比苏联任何单位都多。

鲍里斯·苏霍夫，党中央机关的一名高级干部，被任命为社长。他当时是相当有名的，被认为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意识形态新星”。

1947 年底或 1948 年初，我为出版社做些自由撰稿工作，认识那里的不少工作人员。（我得接受审查，以便被允许接触外国书刊的“机密”。）此时，外文出版社已到了它的福星衰落的阶段。显然，最初的计划并未得到贯彻，至少未按原方案执行。国际和国内政治条件都改变了。整人的事已经开始，书报检查越来越严厉了，要出版任何外国的社会政治书籍是越来越困难了。取代开放的窗户的是一个钥匙孔，至少是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是如此。

我在外文出版社一直工作到 1953 年。那年我庆祝我的 30 岁生日。1953 年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斯大林的逝世。如果回顾当时在苏联的这样一个历史交接点上我在生活中是怎样一个人，我应该说我既不是一个盲目的狂热分子，也不是一个追名逐利之徒。我也不是玩世不恭之辈。（也许我还没有时间变得玩世不恭：斯大林已去世和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虽然我不认为我想成为怎样一个人物。）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我不是一个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而在别人面前伪装成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秘密“进步分子”和“改革者”。

用我已故父亲的分类来说，我像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有理性的信仰者”。这种信仰是在很良好的土壤上，是在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的土壤上繁荣起来的，它的根子可追溯到早期的基督教思想。我要引用已故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的一句话：“每个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已是半个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理想的吸引力可能变成对它的巨大威胁，因为它使权力追求者和暴君用社会主义来伪装自己。）

同时，我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态度更比一般人强，这是由于我的家庭的经验和我的爱好想问题的头脑。此外，我对西方和我自己国家的错误概念和偏见要少一些，幻想也少一些。而且我后来也有机会跟一些有趣的、有创造性的人在一起工作，而在1957 年以后我又得到了接近一些苏联领导人的机会。

三、斯大林的逝世：在希望和失望之间

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和使读者了解我对情况的熟悉程度，在我叙述所发生的事件时，我有时不得不讲一下我的工作和职务情况以及同某些人的关系。我就从后斯大林时期的最初几年，甚至几个月开始讲起。

当斯大林去世时，我在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担任“专门”（“内部”）图书组领导人，负责编辑翻译成俄文并加提要的外国书籍，以秘密文件的形式分送国家领导人参阅（有时分发范围很小）。而且我简直就是在出版社里“挨过来”的。由于1953年1月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了我下面的一个工作人员（不用说，他后来得到平反），我因“政治警惕性迟钝”（这是当年最凶多吉少的指控之一）面临党的严厉处分。而且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上面一级一级给我“加码”。开始是口头批评和警告，最后在党员大会上给了我严重警告处分，这次党员大会是在苏共莫斯科市委和苏共中央的阴沉地默不作声的代表（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苏共中央的代表是一位叫姆拉奇科夫斯卡娅的、有那样一个具有明显意思的

姓名[1]的人参加下进行的。据我所知，当时区委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而出版社领导则打算把我撤职。如果不发生政治气氛的急剧转变，等待着我的就是这些处分，或许还会更糟[2]。对“人民敌人”缺乏“政治警惕”的罪名很容易导致刑事迫害。在1953年，似乎开始了一个新的1937年。

所以，即使我想不问政治，可是由于个人的原因我也不能不关心政治。因此我对当时的气氛记得十分清楚。

有经验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他过一年后去世）尤其不会不注意到1952年秋天举行的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的调子和马林科夫在会上做的总结报告中用的某些标题，甚至某些词汇。那些词汇同1937年的用语惊奇地相似。当时也强调必须巩固党的纪律，改进干部政策，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意指批判运动，“抓坏人”）。当时设置了一个庞大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同时还建立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常务局”，这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显然在高层领导中正在策划人员的重大调整。

在1952年末和1953年初，报纸上，特别是对整个宣传起定调作用的《真理报》社论中，开始夹杂地出现1937年使用的一些词汇。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关于“资本主义包围”的老调（而这是在欧洲许多国家中和在中国发生了如此明显的变化的条件下！）和关于社会主义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敌人的行动就变得越奸诈的“规律”。

而1953年1月在发表有关“医生杀人犯”的文章和表扬利

---

① 作者此处是指姆拉奇科夫斯卡 мрачковская 这个姓的词根，同俄语阴沉 мрачный 这个词的词根相同，并有相同的意义。——译注

② 当我对之未表现足够“政治警惕”的那个人——瓦京·里格斯基上午不来上班时，我打电话问他母亲是怎么回事。她说：“哦，真可怕”。“他是病了吗？”“不，要糟得多。”“他是不是还活着？”“是的，但要糟得多”。“那是怎么回事？”“他昨夜被克格勃逮走了。”——原注

季娅·季舒克（“揭露”“医生杀人犯”的告密者）的材料之后，在大众媒介上开始出现真正的歇斯底里，它确确实实地反映了社会上的政治和精神气氛，煽起了群众的狂热。这种狂热在30年代也总是同大规模的镇压相随而行的。我后来从出版社的同事那里得知，对他们已作好了进行镇压的有关准备，这些人在“伟大领袖”去世后又被聘请到，更正确地说，是回到国家安全机关去工作了。[①]

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仇恨和歇斯底里运动。尽管在出版社工作时（以及我从军队复员后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时），我和我的同龄人曾经有机会获得了大量的体会和感受，而谁如果有心的话，也可对某些施行思想强制、思想奴役、甚至钳制思想的方法有所体验。战后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如反对对西方的“卑躬屈膝”，反“世界主义”，反对文学、电影、音乐、遗传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中的各种“偏向”，一个接着一个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看到，一些全然无辜的人如何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挞伐”，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经验已足以理解这些事情。许多人在内心为这些事情深感难受，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这几乎就等于是自杀。就像这样，许多人也已懂得，当时一些荒谬的事却被当作科学真理来宣扬。谁要是对把无辜的人说成有罪，或对把荒谬之事说成真理表示怀疑，谁就会遭到无情

---

① 他们中的一个叫鲍里斯·马诺伊洛维奇·阿法纳西耶夫，是我受党的处分案件的“同案人”，他是保加利亚革命家和苏联的间谍，1948年被逐出间谍机关，后来到出版社。当斯大林去世后，他被请回去做过去的工作。诚然，他很快就退休拿养老金，后来直到他去世之前担任《苏联文学》杂志副主编工作了很多年。他在1954年告诉我，他在克格勃短暂地从事“第二次”工作时确实地知道：1953年初，由于即将“涌进”大批犯人，曾下达过扩大监狱和集中营的“容量”并准备额外数量的车皮以运送犯人的命令。据他说，所有下级机关重又被授予了1937年后基本上只有中央才可“垄断”的对受审者进行殴打和用刑的权力。总之，在斯大林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镇压机关已准备好展开大规模镇压的新的浪潮，“医生杀人犯”案件可能是进行这次镇压的一个信号。后来其他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原注

的迫害。除此之外还加上了愈益凶残的密探和书报检查、打小报告和恐怖气氛，这些东西犹如消蚀一切的硫酸一样，幸好它们还没有把我们的理智和精神消蚀完。

当时我由于年轻，对人生的意义和国家政治的意义都还没有进行很深入的思考。但是不久之后，我就懂得，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大家都明白专制制度下臣民的主要行为规则：小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每一个思想都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不仅是有反叛思想的人，而且还有思想不谨慎的人，都经常不断地被送进监狱）。而且这种警示很起作用。后来我头脑里就产生一种看法，也许，我在斯大林时代之所以没有去思考大的政治问题，与其说是由于年轻，倒不如说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对生活的整个一套安排，似乎从自由自在的大学生年代开始，都是在培育未来的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去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斯大林（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多五六倍[①]）、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期社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尽管是很细心和审慎地——要不然就有可能遭遇很大的麻烦）。一句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种奴化意识。

我想稍微离题插一段话。我第一次阅读乔治·奥威尔[②]的小说《1984》是在1961年。我是带着压抑以及松快的心情阅读的：多好啊，这终于没有实现，“老大哥”的极权主义帝国，正如“老大哥”本人一样，是会死亡的！我想，假如我在十年前读这

---

① 后来曾对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于1951年出版的半官方的《简明哲学辞典》进行过有意思的分析。其中有关斯大林的占15栏，有关列宁、马克思、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的各占3栏，而后有关日丹诺夫的则占了整整6栏。——原注

② 英国作家和政论家，1903—1950，在长篇小说《1984》中把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描写成盛行极权主义的社会制度。——译注

本书，我在思想上会被压抑得垮下来。后来我又觉得，也许不会那样，也许思想之被奴化就奴化在它不允许越轨思想的侵入。它会认为这些都是谬误、荒诞和谎言。因为这样的反应已成为自我保护的条件……

让我回到主题。从1953年3月起，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尽管不是立即就开始，也不是所有人都察觉到。它是胆怯地，非常胆怯地，几乎难以察觉地开始的，它是在磨难中诞生的。

关于未来变革的最初的信号不是来自思想领域，而是来自政治领域。根据来自上面的明确指示（即使是我们这些不久前的大学生也都懂得，这样的决定决不是一个人作出的），在1953年3月中，报纸上停止了关于对已故“领袖”的全民哀悼的报道。稍后，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相随而至：处理“医生案件”的运动被揭露为一件捏造的假案、一件罪行，被捕的医生中尚还活着的都获释放。6月逮捕了贝利亚及其同伙，年底他们被处决。诚然，在处理他们时，也免不了使用从过去时代继承下来的传统手段。当时的领导人觉得，尽管贝利亚杀害、刑讯和折磨了成千上万的苏联人，这还不足以给他定罪。因此，还给他加上了一个似乎曾为英国谍报机关充当间谍的传统罪名①，以便使这个恶棍和刽子手的罪行显得足够严重。

在我们的思想中，1953年的苏共中央九月全会，是以对一些习惯做法、从而也对过去的领导人进行极不寻常的（即使不是

---

① 最近我想到，如果不这么说，那么不论从领导人还是从老百姓的观点来看，对贝利亚的逮捕、起诉和处决都会显得不太好看。我记得我是如何得知他的被捕的。当时我正同我的夫人带着两岁的儿子去我的出生地赫尔松旅行。我们在离敖德萨不远的我姑妈家的别墅里逗留了几天。一天清晨我们被卖报童的清脆的叫声给唤醒了：“贝利亚被揭露是人民的敌人！贝利亚是间谍！”我想我们的人民完全不会习惯于去想他们的“领导人”（几乎每一个办公室都挂着这些领导人的像）中有人可以被判作杀人犯、盗窃犯等罪犯。“间谍”、“叛徒”则不同，那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的人民习惯于这一套。斯大林就是这样引导他们的。——原注

直接的）批评而使人铭记在心的，虽然会上没有点出人名，更不用说斯大林的名字了。会上进行的批评毋宁说是“对事”的。议论了为使农业健康发展和使经济转向人的需要必须采取的重大措施（遗憾的是，当时作出的许多决定都停留在纸面上，但是我现在要谈的是事情的政治和心理方面）。我国同周围世界的关系渐渐地开始解冻了——起初是以作出某些不易察觉的政治姿态和使用某些新词汇的形式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儿那儿，突然出现了当时对我们全新的一个名词“个人迷信”（仍然不提斯大林的名字）。极其重要的一点是，恐怖气氛开始一点一点地减少了。其中包括对讲的话，甚至对“头脑中想”的话实施的恐怖。还有，越来越经常地听到的已不是某某人被捕，而是某某人（往往是你自己熟悉的或知其姓名的人）获释出狱，或死后恢复名誉。

在外交政策中也有某些很重要的变化。起初，我们的领导在外交事务中没有表示任何新的主动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斯大林的逝世所代表的变化是太剧烈了，而且那时候苏联领导内部的形势也太复杂了。总的说，当时的形势决定了，任何倡议，即使是纯粹象征性的，也得来自西方，特别是来自美国。在我看来，情况所以会如此，不仅是由于苏联国内的形势，而且也是由于苏美关系的状况。

在1952年和1953年初，冷战处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苏联，人们都认为两个国家正处在战争的边缘上。在美国发生了一场有关政治原则的尖锐辩论，并在冷战开始时采用了“遏制”政策。这个政策是同乔治·凯南——著名的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和苏联学的元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有些更保守和好战的美国政治家提出了另一个政策，即所谓解放政策。这意味着要把东欧和苏联的一部分，甚至或许是整个苏联（这里有意把边界弄得模糊不清），从共产主义下解放出来。

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1953年我正在编辑詹姆斯·伯恩罕的《遏制还是解放》一书的俄译本，以供“内部”出版，也就是供苏联领导人参考。

在1952年美国的选举运动中，许多接近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领导人（包括后来成为国务卿的杜勒斯）和未来的总统本人都表示他们更喜欢解放思想。我们在莫斯科知道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竞选的胜利、他的政府的组成和杜勒斯兄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所起的突出政治作用，使苏联领导人相信，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变得更加强硬。

1953年4月1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美国编辑协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不但否定了解放政策，而且暗示如果苏联提供这样的机会，美国准备着手争取美苏关系的正常化和改善。这篇讲话对苏联社会和她的许多专家与政治家来说完全是个意外。（我要用一个限定词：我不能代表每个人讲话，因为我那时候同那些制定政策的人还离得很远。）

《消息报》转载了这篇讲话这一事实，对我们中大多数人同样是个意外。这是一个信号，向美国人表示我们已注意到这篇讲话，也向我们自己的公民表示我们要认真对待美国领导人的话，尽管《真理报》同时发表了一篇对这个讲话的批判性评论。

我在这里想离题再插几段话。我们领导人对艾森豪威尔讲话的认真的反应，不管他们那时了解还是不了解，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正好不久以前，我从参加199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艾森豪威尔诞辰100周年的讨论会的乔治·凯南和美国与会者那里了解到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进行的一些辩论的细节。1952年以前，美国驻苏大使凯南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显然是

在斯大林知情的情况下，或者很可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①])，并被迫回国。在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和杜勒斯被任命为国务卿之后不久，杜勒斯于1953年初接见了凯南。这是一次严厉的谈话。杜勒斯说，“我不会给你安排位子了。我给你3个月去找一个新工作吧。”凯南讲起杜勒斯觉得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凯南感到当时美国正在上升的极右势力使他震惊。

凯南结束他的话题说，“几天之后，我被邀请去白宫。我在那里接受委托，担任了三个小组中的一个小组的组长，每个小组的任务是根据自己的看法提出对未来美苏关系的前景的估计。”之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就听取了每个小组的汇报，正是凯南提出了最温和、乐观和建设性的设想，那也就是总统最后支持的方案。总统的那篇讲话就是在这之后不久发表的；显然这是走出的试验性的第一步。（然而，凯南很快还是得离开国务院。）

---

① 凯南教授曾告诉我他是如何被驱逐出莫斯科的。在他被逐前不久，有一个苏联青年来到美国大使馆，说他来自苏联外交部，要见大使，有要事相告。大使被告知后，接见了他。此人告诉凯南，他是已被捕或处决的苏联高级干部的儿子（凯南以为这意味着他是克格勃主席的儿子，或者他是说他是主席的一个朋友），他现在代表许多遭处决和要复仇的高级干部的子女要求美国帮助。凯南肯定这是挑衅；他回答说美国大使馆同这类事情毫无关系，并要那个青年立刻离开。来访者说，“好，但让我在克格勃看不见的情况下离开。”凯南回答说，“你既然知道怎么进来，那么出去是你的事情，你应该早就想过这个问题。”当他的要求被拒绝后，那个年轻人离开了。就在这件明显的挑衅事件后不久，凯南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凯南说，葛罗米柯后来曾告诉他，葛同他被逐出苏联一事没有任何关系。

事情非常巧合：原来我是知道这全部事情的，而且不仅知道，还因此而遭了殃。去访问凯南的那个人叫雅科夫列夫，是那时遭逮捕的炮兵司令的儿子。在他去大使馆后，小雅科夫列夫也被捕了（尽管这并不证明他到大使馆的访问不是一件挑衅）。在受审时，雅科夫列夫心甘情愿地同克格勃勾结起来，并告发了许多人，包括为我工作的瓦京·里格斯基，里的被捕给我带来了很大麻烦。所有被告发的人随后都遭逮捕。

雅科夫列夫从狱中被释后成了一个美国研究工作者。他写过几本书，但他主要是因他的讽刺诗，即他对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谴责而闻名。他曾多次对我进行恶毒攻击。最后，我还要补充一句。他是《犹太共济会阴谋》新版本的作者之一。——原注

为什么我认为艾森豪威尔接受凯南的主张是那么重要，对斯大林逝世后开始的解冻的最初阶段有着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因为外部敌人、紧张的国际局势和外部危险，这一切（不管这些东西是否实际存在，或者是挑拨出来的，或者是完全捏造出来的）对一个在国内进行压制的政权来说是它得以生存的重要前提。至少，它们为这样一个政权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反之，健康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往往会导致镇压的放松和国内政治的正常化和温和化。

这样就一步一步地造成了全国的政治变化和精神觉醒的前提。而这种觉醒很快就开始了。那是从文学和政论文章开始的，正如不论在过去还是以后都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文学和政论文章更加迅速和坚决地对变革作出反映，而变革本身则推动了文学和政治评论。正是在这时候——在斯大林逝世后，但在苏共 20 大之前——大家都听说了在这之前不久发表的并得到出版的瓦·奥维奇金及其追随者的作品。他们勇敢地描写了农村中的悲惨情况，对公众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对正在到来的变革的更为明显的预报者则是爱伦堡的《解冻》，它为整个这段时期起了一个名（而官方立刻就对之进行猛烈的攻击）。随《解冻》之后出现的有 H·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中的真诚》、B·杜金采夫的《不只是为了面包》和其他一些作品。在诗歌中特别迅速地重新唤起了自由的思想。正是在这几年中，诗人 E·叶夫图申科、A·沃兹涅先斯基和 P·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对于国家的思想、道德以及政治生活来说，这一切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和精神上的准备，要接受从苏共 20 大的讲坛上发出的关于过去的真话很可能会更困难和痛苦得多。这些诗歌和评论作品在一段时间中成了人民中喜欢思考的那部分人的精神生活的轴心和变革的气温表，并促使开始思考和学会思考的人数不断增长起来。

这样的作品也许过去也能创作出来，当然，那只能是在当时居统治地位的严酷的恐怖仍未能使最勇敢的人的创作思想窒息住的限度内。只有很少几个人曾为“锁进抽屉”，也就是为未来的几代人而写作。在斯大林时期，这样做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在一定程度上，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同样是如此。

为了批评斯大林主义，开始时甚至不一定需要公开点斯大林的名。停止大逮捕，恢复无辜遭受镇压者的名誉，逮捕和处决贝利亚和其他一些刽子手，在农业中即使不是转折，但准备作出某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在工业中也准备作些改变，在外交政策中进行的对新立场和新路子的探索——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变革正在成熟起来。至少说明了，事情不再会像过去那样。谁知道呢，也许生活将开始根本改变。产生了各种希望，这些希望又鼓舞人们去进行勇敢的思考，也鼓舞最坚定的人去发表勇敢的作品。尽管在当时和后来，人们曾不止一次地发现，曾在客观上起过某种推动作用的领导人自己马上害怕起来，看到从瓶子里放出了魔鬼就向后倒退。于是他们或是亲自出来攻击那些急于“出头露面”的人，或是鼓励别人去进行“攻击”，而一般说来愿意“出击一下”的人总是不会短缺的。

同时人们也清楚了，我们的社会已不再是在思想上铁板一块的了，如果正确地说，尽管当权者作出了一切努力，我们的社会事实上从来就不是思想上完全铁板一块的。解冻暴露了种种矛盾和冲突的潜流。开始了两极化，起初是相当原始的两极化，只知道两个立场的两极化。赞成或者反对变革，换言之，主张抛弃或者维护斯大林的遗产和斯大林的制度。双方都诉诸领导，寄希望于领导。但是领导开头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还没有作出决定。后来清楚了，这是因为恰恰在这些主要问题上领导中存在着深刻的分裂。当时正是在这些主要问题上存在着分裂；事实说明，后来——包括整个后斯大林时代，我在这

里还想指出，还包括改革年代，也是在这些主要问题上存在着分裂。无需争论，今天的意识形态图景已变得多样化、五光十色和复杂得多了。但是，这条分界线依然存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显得更加尖锐，尽管斯大林主义的卫士们今天大多数已宁肯不冠冕堂皇地宣布他们是斯大林主义者了。

沿着起初由政治和文学指出的这条线，首先在社会科学中，但不仅仅在社会科学中，也开始了争论；此时许多自然科学部门，如遗传学、生理学等，也都极其政治化了，政治思想斗争甚至波及到物理学、数学和化学。出现了最初的一些不寻常的批评文章，人们开始更自由地讲话了，一些即使素不相识、但思想观点相同的人很快就学会大致按各人的表态就相互认识，也就是看各人对相对论和控制论的态度，对李森科或科切托夫、格里巴切夫和索弗罗诺夫的态度，对爱伦堡的《解冻》或对叶夫图申科的诗歌的态度。一些态度非常鲜明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包括学者，多年来第一次开始说出自己的观点了。

一般说来，这些人的命运后来是艰难的：几乎每个人都经受了残酷无情的攻击和排挤，还往往遭到长期的贬黜，有时还遭到镇压。对命运的讽刺是，这样的人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院的研究所里和高等学校里却最难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在那里发表那样的意见似乎应该是最为自然的。在这些地方斯大林教条主义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我有机会见证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官方社会科学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是学者们企图摆脱它的束缚和克服它当时用强制和恐怖手段传播的陈旧公式和理论歪曲的最初尝试。当然，那些公式和理论的传播也是由于人们的无知，那时候这种无知实际上成了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整个一代领导人的明显的特征。

所有这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因为从 1953 年秋天起我就被迫离开外文出版社，随后就被邀请到《哲学问题》这家学术杂志

社工作。这是一本独特的刊物，是随着战后整肃运动的开始而创刊的，用以取代已在1944年关闭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那本杂志，其明确任务就是不仅对哲学，而且也对其他学科进行“思想监督”。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斯大林时期哲学本身的功能，不说其他的，这是一种独特的“思想警察”的功能，其作用就在于保证所有学科、理论和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表现出应有的忠诚和正统性。

正如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工作者一样，这门学科的工作者在他们十分积极地去执行这项功能，并在哲学本身这个领域中（这里不断进行着争吵）整顿“秩序”的时候，自己也陷进了无法通行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泥坑，沉缅于对“伟大的理论家”斯大林的声势浩大的颂扬。尤其是关于斯大林对语言学的研究在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引起的那场“革命”，出版了无数的文章、小册子和书籍。而对西方哲学则自然是进行凶猛的、简直是骂街式的批评。这种批评的水平是极低的，因为它完全变成了谩骂和侮辱。

不久前我曾见过1951年《布尔什维克》（当时《共产党人》杂志用此名称）杂志第9期上发表的一篇并不优秀，但在这方面却很典型的文章，它是评论莫利斯·康福思[①]的《保卫哲学》一书的。文中讲到西方哲学时就用这类语言：当代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处于衰退和颓废状态，苟延残喘，肮脏可恶，这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衰败的整个深度。接着又给它戴上了一大堆帽子：用对人类的憎恨、种族主义、世界主义的毒素毒害人的意识，鼓吹战争心理和反共歇斯底里，宣传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为最野蛮地镇压整个进步事业的事实辩护。实证主义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哲学，它只是重复已有200年之久的英国神父贝克莱的思

---

① 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译注

想而已。贝·罗素的《逻辑分析》、《哲学的蒙昧主义》，只不过是早就抛进历史垃圾堆的又一种形态的主观唯心主义。而美国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奠基人约翰·杜威则是美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家、顽固不化的唯心主义者、妄图统治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忠实奴仆、肮脏的反苏诽谤运动的参加者（这都引自上面提到过的《简明哲学辞典》）。

其实，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们的哲学家们长期来几乎就用这样的语言在彼此之间和同自己圈子里出来的论敌进行"学术论战"，给他们提出各种不可思议的指责，戴上五花八门的帽子。因此对外国人中的明显的"持不同观点者"，那还需要讲什么客气吗？

斯大林逝世后变革之风自然也吹到了哲学领域。但是这些学科长期藏身于斯大林主义的战壕里，十分顽强地反对变革。1953年秋我到《哲学问题》杂志社工作时，我从内部看到了这种对变革的顽强抵抗。哲学研究所保守的领导（当时的所长是П·Н·费多谢耶夫）和杂志的编辑（先是Ф·В·康斯坦丁诺夫，后是Д·М·卡马里）竭尽全力"坚守阵地"，此时他们当然依靠着苏共中央的相关部门。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已困难得多了。

自然，在哲学阵线中也出现了标志着某种活跃的一些最早的动作，在这方面正是这本杂志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书籍的生产过程比较长，容易被卡住。幸好当时杂志社有几位编委，他们对此起了促进作用（这些编委中我特别要指出Б·М·克德罗夫以及当时的秘书长М·В·西多罗夫）。杂志社许多当时还年轻的同事也有意于探索新事物（其中有Э·А·阿拉布—奥格雷、А·Н·苏博京和Н·Н科久拉，等等）。谁如果舍得花功夫翻一下那几年的杂志的话，他就能发现，大概从1954年中开始，这本杂志上就有了创造性思想的萌芽。出现了一系列批评"官方"哲学家Г·Ф·亚历山德罗夫（特别是亚历山德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哲学史》的作品的文章，批评他“虚无主义地否定所有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意义”，把历史上各种伟大的哲学体系的创造者完全说成是只关心维护现存制度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家。

1955年，在哲学问题的争论中，哲学家A·A·马克西莫夫和P·Я·施泰因曼、物理学家И·B·库兹涅佐夫以及其他一些作者企图宣告相对论违反马克思主义，企图在物理学中重复李森科和普列津特在遗传学中的所作所为，那些反对他们这种企图的人斥责这种企图是反对派的出击，这些人在这场争论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1956年，过去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控制论被完全“恢复名誉”，并得到了承认。在杂志的文章中对李森科学派开始了最早的批判（遗憾的是，这一批判很快就被制止），也进行了一些争取使社会学合法化的尝试。在杂志上开始出现一些新的人名，其中有E·Г·普利马克、Ю·Ф·卡里亚金、Э·Ф·伊利延科夫、A·A·季诺维耶夫等等。

同时，在斯大林逝世后和苏共20大之后的最初几年中，哲学领域的变化和前进主要涉及专门的哲学问题、自然哲学，特别是哲学史。

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虽然不是很快，但在那些学科中也开始了争论、意见的交锋和觉醒。而且这种意见的交锋不像过去斯大林时期那样是由上面布置的，那时要整某某人都是由上面下命令的，而是真正的交锋，是由观点和立场的分歧以及由新与旧的冲突而产生的交锋。

但是哲学（还有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国家与法学）整个说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仍然命定要保持原状。三年时间的浅表的，而且是时常受到钳制的自由化，不可能把遭受了国家和党的强大权力的践踏以及被追求名利之徒、贪图虚荣的无知之辈和狂热的半瓶醋之流的卑鄙欲望的重型碾压机的碾压几乎达30年之久的这块土地，变成肥沃的土壤的。我当时听着年高望重的哲学家们

对这门学科的历史的叙述时，我不禁想起了《圣经》中的几句话："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玛土撒利，玛土撒利生拉麦。……"[①]

只不过这里不是降生，而是消灭。A·M·德波林及其战友们把自己的先辈赶下了社会舞台。A·П·尤金和M·米丁（又是同其战友们）消灭了德波林派"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者（依靠向国家安全机关告密的办法基本上是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尤金的有名的告密书决不是什么神话，这位哲学思想"领袖"在告密书中列上了那些"必须关押"的人的名字，而且总能很快地使自己的判决得到执行）。而在战争前夕才崭露头角的Г·A·亚历山德罗夫及其集团则挤走了"尤金—米丁分子"（他们还得以把有些"尤金—米丁分子"投入监狱），而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自己又成为在哲学中提出下一个时髦货的新贵们的牺牲品……

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情况都是这样。各种"学派"不是在新的概念、思想和理论基础上，而是在对自己的前辈——往往是自己的老师进行揭露、毁灭性的批判和打击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这块"多层蛋糕"中残剩下来的各种集团和各个时期的碎片，仅仅在绝望地抵制哲学返回真正的科学和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上才得以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对这一点是不适应的，对此，正如常言所说的，他们是毫无本领的。社会科学的复兴过程如此艰难和旷日持久，其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不过，这个过程还是开始了。回顾那些觉醒的年代时，我拿定主意要做这样的结论：到50年代中我们的社会毫无疑问是更有观察力了，对自己看得更清醒了，已经摆脱了某些幻想。许多人等待着，期待着。当然，不同的人期待着不同的东西，但总的说来需要变革和变革正在来临的感觉已经成熟起来了。

---

① 《旧约全书·创世纪》第4章第18节。——原注

与此同时，旧的东西仍像很厚的岩层一样躺着不动，所以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使他们大为惊愕，并深深地震动了党和我们整个社会。

关于这篇讲话的传闻迅即传遍了莫斯科。讲话的细节，而且是绝对可靠的细节，我是在讲话的当天晚上从出席大会的尤利亚·帕夫洛维奇·弗兰采夫那里听到的。他当时担任《真理报》的副主编，主管国际问题的报道。他同时是《哲学问题》杂志的编委，在杂志社负责外国哲学和意识形态部，此时我就在这个部工作。他邀请我去他那里谈谈。

那次谈话是开诚坦率的，更何况我们之间不仅有工作关系，而且还是老相识，我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时，他是该学院的院长，从那时起我们就认识。我要顺便指出，对当时的大学生来说，弗兰采夫几乎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一位在这一级人物中越来越少见的有造就的知识分子、著名的埃及学家和哲学史家，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政治上很有见地的人。他当时在大学生中享有民主派的声誉，而在教师面前他则是一名严厉的、爱挑毛病的、讲话不讲情面的首长。弗兰采夫的履历是很不简单的，他一生有不少曲折，受过不少打击，生活迫使他去适应各种情况，特别是当他在维辛斯基任下从学院被调到外交部接任刚遭逮捕的津琴科担任新闻司司长时。

那天晚上，他讲到赫鲁晓夫的讲话时，他表现出真正的激动，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惊讶，尽管他平时享有怀疑家甚至还有犬儒主义者的名声，前者他完全当之无愧，后者对他则并不相称。我还记得他所说的表明他感到出乎意料的那些话。他说："我曾经想过，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发生，也应该发生，但我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弗兰采夫是一个很孤单的人，除了妻子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因此感到需要同人谈谈他的全部印

象和感受，也许这就是他那天晚上邀请我去的原因。现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已经发表，再转述他当时对我讲的话已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还记得，在谈话过程中他有好几次转而用很低的声音讲话——由于习惯的原因，关于斯大林的实话在他看来是那样的可怕。虽然这时候似乎已不应该觉得奇怪了。我记得，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过去知不知道赫鲁晓夫讲的那些事。他说知道。“全都知道吗?”“几乎都知道，除去某些细节以外。”

第二天，全莫斯科都在谈论“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再过几天，全国都谈论开了。在斯大林逝世、处决贝利亚、揭露了很多事情和恢复了很多人的名誉之后已过了三年，对于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来说，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已不可能是那么意外的了，但是就当时整个社会舆论状况来说，仍然是发生了极大的震动。你曾经猜测过的那些事，甚至你在最近几年中已经知道的，或者在好朋友的圈子里已经讨论过的那些事，现在在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坛上讲出来了，大家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赫鲁晓夫的报告很快就在党的所有基层组织中宣读)。

现在回顾当年，也许可以说，20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为了能有说服力地提出问题，就必须说出有关过去的严酷的真话，说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斯大林主义把它带到哪里去了。在这个意义上，揭露斯大林及其罪行是赫鲁晓夫所能做的最有效的行动。

至于在他的报告（我敢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报告，尽管赫鲁晓夫本人还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前后一贯和彻底真实的）之后，远非一切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是另一个问题。这有它自己的原因。

首先是客观原因。人们后来都认识到了，斯大林主义及其遗产，只有经过长期的、尖锐的和波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斗争，才能加以克服。即使是最好的报告和最好的代表大会决议，都不能代替这场斗争和改造整个社会的艰巨工作。

其次是主观原因。领导处于这样的状态，它在过去的三年中仍然未能使党和人民对苏共20大采取的巨大的政治行动，即对同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决裂和在政治上实行巨大转折作好应有的准备。政治局中许多成员，特别是斯大林的老近卫军，反对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看来，也是由于这些原因，20大即使在开头一段时期和开头几年中，也未能把克服斯大林主义的遗产的积极纲领（哪怕是一个短期的）推向前进。

我归因于领导层的状态，不仅是指政治局（当时叫作中央主席团）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不同意20大和对斯大林的批判这一明显事实，问题还在于赫鲁晓夫本人，在于他的立场和他的前后不一贯性。在这方面，人们都说，第一，赫鲁晓夫不可能前后一贯，因为他本人，正如当时所有其他领导人一样，不可能不参与过镇压。第二，他自己从里到外都背着斯大林主义的信念、习性、方式和方法的沉重包袱。第三，他有他个人的一些缺点，如缺少文化、容易冲动、粗暴、不善于自我克制。

我认为这三点都是事实，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影响。但是我想，还有一个使领导上不能制定前后一贯的非斯大林化政策的重要原因。它涉及到促使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动因。毋庸怀疑，斯大林的残暴、狡猾和专横霸道引起了赫鲁晓夫的反感，引起了他的不满，甚至厌恶。也有他个人因斯大林给他施加的、他不得不予以忍受的种种委屈所产生的冤屈情绪，我想其中还有压抑人的尊严的、因而特别使人感受伤害的长期的恐怖。然而我相信，还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这就是赫鲁晓夫同斯大林的老

“近卫军”，首先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间进行的争夺领导和争夺权力的斗争。最初还有贝利亚；他的结局充分证明了这场冲突的极端尖锐程度（按照仍然通行的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失败可以意味着不仅是政治的死亡，而且是肉体的消灭）。在这场困难和危险的斗争中，赫鲁晓夫不能不把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当作他的主要武器之一，有时甚至作为最大的王牌。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提出一个推测，即这一动因，也就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促使赫鲁晓夫决定在党的20大上作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赫鲁晓夫在过去三年内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个政敌——贝利亚，并且通过撤职和在基层党组织的全体党员大会上宣读的秘密通知信中进行极其尖锐的批评的手段，扳倒了另外两个政敌——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是逆主席团多数成员的意志而动的，很可能远不是所有问题都同他们商量过，而是使他们在代表大会上面对既成事实（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米高扬的儿C·A·米高扬写的回忆录的证实）。

可以这样说，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是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为政治生存而斗争的重要工具之一。这次全会是在戏剧性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之后召开的。在主席团会议上主席团多数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当时报道为“追随他们的谢皮洛夫”——全会把他们定性为反党集团——虽然追随他们的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萨布洛夫、别尔乌辛）都反对赫鲁晓夫。实际上是政治局的多数试图搞掉赫鲁晓夫。他们的决定被受到军队支持的中央全会推翻。

其后，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利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以反对自己的政治对手的路线表现得完全明确无误和直截了当。当时并无什么明显的原因，但在大会的报告中和

几乎所有发言中却都大批斯大林和他的尚还活着的战友，这使许多人感到有些奇怪（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不想掩盖这一事实）。显然，在20大上很多话都已说过了，如果是对斯大林本人而言，则当时批得更多。至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其他反党集团成员，他们都已被开除出党，在政治和道义上已遭毁灭。但实际上又为什么把批判斯大林作为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呢？解释只能有一个：赫鲁晓夫害怕（这方面，也许，甚至有什么情报）反党集团成员企图向代表大会发出呼吁，以便对六月全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向代表大会发表声明，要求恢复他们的党籍，这可作为一种依据。这正好有可能促使赫鲁晓夫下决心把代表大会上的讨论转向反斯大林的轨道。在斯大林问题上不断地表现摇摆不定和情况不稳的那段时期中，总的说，这样做是有益的，我觉得，这使得一些保守分子即使在废除赫鲁晓夫之后（特别在党的23大上）要想取消苏共20大的决定也有困难。

有哪些依据可以认为，夺权斗争在促使赫鲁晓夫作出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而事实上是揭露他的罪行（更正确地说，是他的部分罪行）的决定中起了重要的，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呢？我认为，有非常有力的依据。

在这些依据中，我首先可指出赫鲁晓夫本人在批判斯大林主义中的前后不一贯性，他在揭露斯大林当时犯下的罪行和评论已故“领袖”的功绩之间不断地来回摇摆。在功绩中首先还讲到“同党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功绩，也就是说所讲的恰恰是这样一个方面的功绩，正是从这一方面开始了针对自己党和人民的大规模镇压，这种镇压的罪行后来愈演愈烈。相应的溢美词句也被写进了在《纽约时报》发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匆忙起草的苏共中央《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定中，这个决定在很长时期中成了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的典范文件。

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这种摇

摆表现在，甚至在开完党的 20 大之后他就缺乏明确的思想和政治立场。而赫鲁晓夫是能够和应该确定他的明确立场的，尽管在领导层中有各种各样的矛盾，20 大还是给了他巨大的力量和权威。可是，就在讨论代表大会决定的许多党员大会上（在这些大会上也宣读秘密报告）已可看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的老的领导干部在最初不知所措之后很快就清醒过来，极力把代表大会思想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把那些郑重地接受 20 大并希望走得更远些的人加以惩处。当全国，随后也当全世界掀起激烈争论的时候，当人们提出了官方没有回答的大量问题的时候，赫鲁晓夫本人却保持沉默，有时在同外国记者进行匆促的交锋时还发表模棱两可的言论。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的这些评价理解为我企图贬低赫鲁晓夫的功绩，更不要理解为我想把他描绘成一个没有原则的政客和阴谋家。在这方面，他同所有其他人，包括那个不轻松的时期中我们的最诚实的政治家们，都是差不多的。问题多半在于赫鲁晓夫自己的许多表现说明，他是而且不能不是斯大林时代的地地道道的产物。这个时代必然会使各个政治家具有恐惧感，并迫使他们遵循一定的自我保护规则。那些不掌握这套本领的人，在通向政治生涯的阶梯的最初几级上就会掉下来，永远不可能爬到它的顶峰。

但是，我不能不注意到那些亲自认识赫鲁晓夫的人的信念，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时对斯大林的恶感是真诚的。他们还认为，赫鲁晓夫天生的农民智慧，在更大程度上也许是他的政治本能往往推动他去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些决定客观上是会搞垮斯大林体制的。这些决定常常是即兴而作的、粗糙的、未经深思熟虑的，但其目的在于使社会摆脱使它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瘫痪的前景。曾与我讨论过这个问题的那些亲自认识赫鲁晓夫的人认为，例如赫鲁晓夫作出的在我们国家里建立两个党——即“城

市”党和“农村”党——的即使是相当笨拙，但是极其勇敢的尝试，就是这样的一种决定。甚至他后来未能做到的把农村党再分成几个独立的队伍的冒险行动，也不能只视之为随意的即兴之作，而是完全有意识地破除权力巨大的官僚主义机关的垄断的尝试。我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的。政治就是由众多的应力和因素所构成的整合力。

我还想指出这些应力和因素中的一个。

我当时曾有过怀疑：赫鲁晓夫在20大之后看到他自己做了什么，激醒了什么精神，从瓶子里放出了什么魔鬼，他是不是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了？现在我仍然相信和认为，神经上挺不住是赫鲁晓夫的重大错误之一①。在党（我不是指党的上层机关，而是指大批普通党员，他们是有政治积极性的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民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为净化社会和争取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信念、甚至是真诚的热情和干劲被激发出来了。此外，20大还在一定的时间内震呆和束缚住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关，破坏了保守分子的立场。在这种罕见的形势下，在社会上一部分最积极的、具有创造性精神的人士情绪高涨的浪潮中，我们是有可能把变革大大推向前进的，有可能大大超过当时实际上取得的成果的。而最糟糕的是（这里甚至包含着某种挑衅的因素）：人们开始独立地思考，并把他们所想的都讲出来和写出来，可是没有过几个月，有人就企图把这一切重新纳入上面规定的狭窄的框框里（即便比过去的框框要稍宽一些）。而

---

① 回顾过去，我得出了另一个结论。最可能的也许甚至还不是神经挺不住。赫鲁晓夫在内心深处很怕自己表现得太自由主义，他的这种害怕不比他的老斯大林主义者伙伴少些，或许甚至更多。他后来发动的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和对自由作家和艺术家的攻击就是这种表现。但是我的结论也是由于受到了后来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启发，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行为。根据老的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原注

对那些表现特别积极的人则加以惩处和整肃。到 1956 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旧的轨道上去了。

赫鲁晓夫没有决定（或者不能决定）在国内发表他在 20 大上的报告，这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个报告到改革年代才得到发表。有一种说法：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不同意他这样做。因此他就有意识地把他的详细的、几乎是逐字逐句的口述通过当时的路透社记者约翰·雷蒂交给西方发表。当时有人带了一个名叫科斯佳·奥尔洛夫（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是一名前克格勃工作人员）的人去见约翰·雷蒂（见 1990 年 7 月 11 日《莫斯科新闻》）。但是后来，比如说在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一些活动家从党中央（后来又从党内）开除出去的 1957 年中央六月全会之后，赫鲁晓夫是能够这样做的。那时已没有人能阻挠他。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多半是因为他害怕了，所以不敢采取这个重要步骤。

让我们回到 1956 年秋天出现退潮的时候，那时似乎一切都复旧了。但是，实际上什么东西都也不能真正回到旧轨道上去了。虽然那种想把刚刚诞生的新事物纳入僵硬的旧观点框框的企图变得振作起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扑灭了革新的热忱。形成了出现思想政治“双重政权”同时存在的某种古怪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这个长期习惯于思想一律、习惯于精确地执行上面制定的路线的社会变得迷惑起来，变得思想混乱、不知所措了。于是就丧失了社会活力，丧失了速度，也丧失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我曾经思考过，为什么赫鲁晓夫在他取得最大的、实质上是历史性的胜利和从未有过的可能性的时刻采取这种行为、表现出不知所措、甚至恐惧，我把这些问题的原因同样也归之于某些“外部”的因素。首先归结于因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而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的复杂形势，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判断，正是这种形势使得赫鲁晓夫本人缺乏明确的反斯大林的立场。

如果说到国内形势的复杂化，那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的思想“激荡”，这被看作是反对派的思想情绪。虽然，实际上人们所要求的恰恰是去理解和思考20大，并从20大得出应有的结论。但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这已确实使赫鲁晓夫感到害怕，更不要说其他领导人了。对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明是，他同文艺界知识分子代表的几次会见，和他在这方面发表的大量讲话——其内容常常是斯大林主义的，而在形式上则比斯大林更放肆专横。(我在这里有意不提在梯比里斯发生的对维护斯大林的学生游行队伍开枪的悲剧，这个插曲是十分可悲的，但它不属于具有明显表现的那种倾向。）总的说，国内确实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足以使领导上藉此作出后退和表现摇摆。这些摇摆的主要内部根源在于社会上的保守力量对20大路线的抵制，这种抵制是不足为奇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赫鲁晓夫本人立场的不鲜明，甚至模棱两可，确实是令人吃惊的。

至于国际上的事件，则它们很快就具有戏剧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苏共20大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尤其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巨大的困难。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客观上形成了那样的情况，即赫鲁晓夫实际上证实了共产主义的敌人过去讲的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共产党人过去是不信的，他们坚信自己的正确性，因而曾为之进行过辩护。其结果是，许多共产党人感到失望，大批党员退党，一大批党的同情者，特别是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同党疏远了。在某些共产党内，过去不可思议的对苏共和苏联采取批评态度的倾向、谋求意识形态上以及政治上的独立性的欲望和对新策略的探索，等等，都得到了加强。在一些共产党内发生了内部危机，某些派别分裂出去了；在另一些共产党内则完全改变了路线。

也有许多人，包括在苏联国内，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赫鲁

晓夫和苏共 20 大。

这些都是十分严重的指责。当政治家和政治领导人需要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尤其是揭露势必会引起相应的社会反应的罪行时，这类指责在这种形势下已成为保守派使用的传统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把引起这些反应的责任加在犯错误和罪行的人身上，而是加在企图纠正它们的人身上。20 大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上面讲到的各国共产党所遇到的困难，是我们或迟或早总是要为斯大林的恶行、为外国共产党人对之长期视而不见、甚至为之辩护、或者加以否认，认为（许多人是真心的，因为是受了蒙骗，有些人则不是）长期来对苏联提出的所有指责全是反共分子的宣传谰言的事实而不得不付出的应有的代价。

这里事情的复杂性还在于，从 1917 年以来有人确曾对苏联制造过大量的谰言，而这成了外国共产党人对有关苏联在 30 年代及其以后所做的一些事情，包括许多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可信材料，仍然不予置信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许许多多外国共产党人还对苏联和斯大林具有一种神圣的、几乎是狂热的敬仰，在动机上往往是高尚的，但在原则上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对一切都要怀疑！”——这句马克思的箴言被遗忘了）。

这种敬仰牢固地存在于千百万人，包括许多诚实的、聪明的、还有杰出的人物的思想中。这当然有它自己的历史原因。诸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法西斯的恐怖、1929—1932 年大危机的困难，这些都是原因。这一切在外国的左翼社会舆论和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寄希望于光辉未来的强烈愿望和切身需要。对他们中很多人来说，苏维埃国家很快就成为这种希望，其后又不知不觉地走出了下一步，把对光辉未来的希望同“领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如果客观地讲，不能说这种希望只是一种幻想，或者欺骗。苏联在早期曾在新的生活中反映出一些民主的思想，后来又成为战胜纳粹主义的最主要力量。

毫无疑问，外国共产党人的盲目信仰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成为欧洲的致命危险的时候。但是这种盲目信仰和对斯大林的无条件的支持不仅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党是有害的，它们对苏联和革命后进行的全部试验（不管是好是坏）也是有害的。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外国共产党人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可能使斯大林受到约束。

然而，这无论如何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不在外国共产党人身上，而在犯了那些罪行的人的身上。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对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对左翼政治力量（包括劳动大众、进步人士、社会民主党人等）负有巨大的责任。他们败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理想的声誉，粗暴地无视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我曾有机会同外国共产党人打了不少交道，他们中有我的许多朋友，因此我很了解他们在苏共 20 大后，后来又在改革年代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我把这些问题讲得详细些。

现在让我们回到 1956 年。那时，国外对苏共的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国内对讨论苏共政策的压制使赫鲁晓夫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勇敢地前进，一方面承认每个党的完全的自主权，给予他们探索摆脱他们所遇到的困难的道路的充分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集中精力勇敢地推进国内的改革，从而提高苏共的威望，增加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第二条是：正如已在国内发生的那样，急于打退堂鼓，仅限于对新的世界现实作出在苏共 20 大上作过的几点不多的让步（我指的是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关于战争有可能避免，有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和承认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等几个论断）。但与此同时则要极力使这些党不去反思意识形态问题、政治和策略问题，还要保持某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形式和使之“纪律化”的某些工具。遗憾的是，他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这条道路不可能也没有解决人们期望解决的那些问

题。虽然，说老实话，我不相信在当时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下有可能作出别的选择。

当然，即使认为第一个选择更为可取，也不能把召开最初几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某些积极东西（尤其它们是在“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之后，正好是从1956年开始召开的），以及克服某些旧的政治教条和使理论更接近于新的生活现实的一些尝试都一笔勾销。但是事实总归是事实，这些措施未能制止各国共产党的困难的增加，也未能完全克服我们对待其他共产党的大国主义（在这点上更正确地说是“大党主义”）态度，同样也未能克服在对待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

看来，这一选择的最糟糕的后果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在赫鲁晓夫和当时的整个领导对东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的政治危机作出的反应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而在苏联国内，人们对这些国家中发生的暴风雨般的事件感到很不是滋味。诚然起初曾使政治讨论活跃起来，但后来很快就加以制止，并给保守派和斯大林主义分子不但提供了经上面批准的一个借口，而且也提供了同那些真正接受20大的人进行斗争的有效武器。因为在这些事件中呈现出了反革命和反苏活动的幽灵，而在我们这里历来就常利用这类幽灵来镇压不同政见，以及一般的自由思想。

我通过自己的经验，即在《哲学问题》杂志社工作的经验，很快就看到了，这项武器是如何迅即被积极利用的。在1956年，这本杂志发表了几篇大胆的文章，其中包括第5期上的、引起了广泛反应的Б·А·纳扎罗夫和О·В·格里德涅娃的文章《谈话剧和戏剧的落后问题》。（这是苏联的一个老传统，由于严格的书报

检查，只好通过对文学、戏剧或艺术的争论来讨论政治问题。）由于发表了这篇文章，在波匈事件之后，我们的杂志（还有其他一些刊物）立即就挨整。我至今仍感到遗憾：当时因害怕而撤下来的文章中有我和 Э·阿拉布—奥格雷合写（根据高尔基州的材料）的我国第一篇社会学调查材料《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犯罪的原因》。

一句话，在很多年中，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者来说，被指责为企图把我们推向“匈牙利事件”，或具有“波兰情绪”，那是很危险的。我想，虽然我由于没有 1956 年 6 月全会速记记录和在它之前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记录（如果作了记录的话）而无法用文件来证明，斯大林主义分子曾利用匈牙利和波兰的事件不仅在“底下”，而且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中同他们的思想敌人进行斗争。特别是在 1957 年 6 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他们的同伙采取的剥夺赫鲁晓夫权力的图谋中，他们是不会不利用这一点的。

后来被叫做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中发生的事件和苏联内部形势发展之间的复杂的相互联系这一事实是显然可见的，在很多方面也是自然的，尤其是在最初阶段。但是，遗憾的是，至今这种相互联系对苏联自己（当然也对大家庭的其他国家）常有消极的影响。下面我将就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再谈到这个问题（当然也要就 60 年代和后来在 80 年代中国的事件的发展谈这个问题，那里情况比较特殊，需要专门加以研究，这也将在后面来做）。为什么事情的发展一般总是对我们，对我们的改革不利？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责任。

从斯大林年代开始，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中的官方观点都认为，苏联所建立的是唯一真正的，也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形式。其他国家只是在制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细节时才具有考虑民族特点的微小权利，只能重复和照搬

我们的经验。因此，对苏联模式的任何偏离都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被认为是企图建立另一个普遍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向我们的挑战。把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模式如此普遍化，就会不知不觉地使我们的人在观察大家庭中别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时，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一切：这比我们好，还是坏？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他国家中的事件进程就影响到了我们内部的斗争，造成意见和情绪的两极化，加强一部分人的立场，削弱另一部分人的立场。反之，我们国家中发生的这些或那些变化也在邻国引起了尖锐的反响，有时就像一列很长的火车在急转弯时把最后一节车厢甩出轨道一样。

出现的形势常常对彼此都有危险，于是就经常产生影响邻国的事件进程，甚至干预它们的事务的欲望。因为那里某种过程的发展可以不仅被理解为不可取的，而且可以理解为对我们内部稳定的威胁。

只是到 80 年代末期，我们才最后停止认为自己有权垄断真理，停止把自己看作“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停止对邻国和盟友的内部事务的干预，情况对我们，也对他们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不再把别国的事看作是我们内部的事，这样也就排除了进行干涉的动因。于是也就防止了许多外交问题的复杂化。

自然，我们对外政策上的这一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些国家，如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对社会革新缺乏准备，往往示威性地坚持旧的立场。他们这种立场是过去在我们的影响或压力下形成的，而现在却成了同苏联展开的进程反其道而行之的立场（这里表现出一个严酷的历史悖论：我们放弃干预他们的事务，也放弃用武力去纠正过去在我们的武力影响下所造成的东西，而他们在变革方面的迟缓却导致他们国内紧张状况的加剧和随之而来的爆炸。在一些国家中还给民主力量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由于 1989 年东欧和中欧国家中发生的剧变，我们对待这些国家的新政策不仅成了党内和国内争论的目标，而且成了政治斗争的目标。尤其是从苏共中央全会的讲坛上提出了对我们的政治领导的批评，批评他们的路线导致了“社会主义体系的垮台”，使我们失去了“缓冲带”，破坏了我国的安全。我坚决不同意这些指责。

社会主义的理想，我认为是合理的和美好的，这种理想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部分。我们在早期的基督教思想，在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的作品中，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民主运动中，都能找到这些理想。但是社会主义不论在哪里都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而存在。我们曾经试图推翻这条真理（顺便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用武力把社会主义（按照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改造强加给一系列欧洲国家。只要一旦放弃“社会主义强制”的政策，就毫不奇怪地可以看到：在大多数这类国家中，我们培植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没有扎下自己牢固的根，并不具备任何活力。

这是就问题的社会方面而言。至于对外政策方面，那么针对领导的有些指责（例如关于失掉“缓冲带”）充满了不能接受的帝国思想，完全不符合今天世界的现实。批评他们的政策有损于我们国家安全的指责也是错误的，是同国际关系的现实相矛盾的。

后来，在 1990 年 6 月 15 日，我曾在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国际政策发过言。我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安全并不因为我们不再把那些向北约出卖苏联军事秘密的人（报刊报道，齐奥塞斯库和过去的一些波兰活动家经常这样做）当作盟友而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不能把用武力拉进联盟的那些国家看作自己的可靠盟友。相反，抛弃关于盟友的幻想只会加强我们的安全。

此外，为了维护这个虚假的联盟（我指的是华约），我们不

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常常诉诸武装干涉：如1953年在民主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对波兰曾经处于采取这种行动的边缘上。每一次采取这种行动都导致紧张局势的尖锐化、同西方关系的恶化和军备竞赛的升级。而只要存在着不是真正自愿的而是强制结成的联盟，也就存在着引起一切可能后果的新的干涉的可能性，直至在欧洲爆发巨大的武装冲突。难道这是对安全的贡献吗？

我们大家（也不是所有的人）对这一点都是有过体会的，不过那是在后来。当时，在1956年，我们的政治认识和政策的发展还要过好多年才能达到这个阶段。当时我们的领导人缺乏应有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成熟性，对形势不是这样看的。

由此就出现了我们对匈牙利的武装干涉（我要作一点保留：我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冷战联系在一起的，这场冷战也是由美国的宣传和地下活动煽动起来的）。匈牙利为这些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代价。首先是我们国内已经遇到许多困难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和改革政策被刹住车了。

我们对匈牙利的干涉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使我们领导内部的形势更加复杂化，领导上的内部斗争变得更尖锐起来，有时更富有戏剧性。这也更增加了赫鲁晓夫推行他的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政策的困难。

但是我不想把一切困难都归因于外部形势。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在20大上对斯大林进行的尖锐批判，是走向未知世界和走向他不能预见的许多问题的豁出命去的勇敢步骤。我在后来曾不止一次地想过，要采取这个步骤是要有某种敢于冒险的品性的，赫鲁晓夫的性格、心理素质和脾气中就有这种品性，这种品性是他取得某些成就的前提，也是他犯下许多错误和遭致失败的原因。

不管一些客观因素的作用有多大，应该看到，为解决所产生

的困难往往存在着几个行动方案，而不是一个行动方案。如果说赫鲁晓夫经常地，过于经常地从中选择一种不是直接引向前进的方案，而是选择停止前进，或是走弯弯曲曲的道路的方案，有时选择的即使不说是后退，也是走到斜道上去的方案，那么我认为，其原因已不仅仅在于客观因素，而且也在于此人本身的一定的思想和政治定向了。

他的几十年的活动不能只归结为召开了苏共20大和在内外政策中作出的一系列其他重大的正确决定。他也有严重的错误，作出过不是勇往直前的、而是向后倒退的决定。这些决定不是由什么人或什么事从外面强加给他的。赫鲁晓夫尽管也有不少笨拙的谋士，但他自己无疑是有自己的主意的。他在20大后不久就猛烈地批评创作知识分子（后来他还曾多次这样做过），还重新树立了李森科在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当这位伪科学家的帮手之一在苏联科学院的院士选举中未被选上时，赫鲁晓夫大发脾气，几乎要把科学院解散）。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公开的政治审判（对A·西尼亚夫斯基和Ю·丹尼埃尔）就是在他当政时进行的。我更不用去讲一些不正确的经济决策和外交决策了。可是问题还不仅在于这些具体的行动。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判断，这些行动反映了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某种有机的方面。

我觉得，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为这个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线索。我指的不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在晚年，在他已经退休和不再追求任何政治目的（因而是真诚的）的时候，他还禁不住要崇扬斯大林，包括重申斯大林曾对敌人“坚决斗争”。他关于自己政治生涯的开始的回忆在这方面更能说明问题。须知这是事实，即赫鲁晓夫在他的生命的终端，在经受了和反思了很多事情之后，他毫不怀疑他是对的，他一点也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他以不加掩饰的心安理得的心情叙述了他在工业学院渡过的年代，而且几乎只讲一件事——在那里人们如何同“右”的、“左”的和其他敌

人斗争，他如何积极参加这个斗争，成为这场斗争的一个领导人，这又如何使他引起了斯大林对他的赏识，斯大林是如何从他的也在这个学院学习的妻子那里了解到赫鲁晓夫的“战斗”业绩的。

从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质来看，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产儿”。他是在这样一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在那个时候不需要什么知识和才能，而只需要无条件的服从，准备时刻向上面给他指出的（或者提示的）敌人，或者他自己出于对形势的理解和作出相应反应的政治本能而发现的敌人发起进攻。遵循这个本能，他几乎毫不停歇地而且同其他许多斯大林的战友相比以更少的损失渡过了最困难的斯大林年代，即从 30 年代初一直到“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他总是一级一级地往上升迁，直至斯大林去世的时刻（比如，同米高扬，甚至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人都不同）。他变得如此的高贵显要，以致于 1953 年 3 月得以占有最强大的一个政治阵地。他成为一长制的领导人之后，对大权独揽，对周围人的阿谀奉承和绝对服从表现出像斯大林那样的巨大兴趣（尽管，可以说，这一切已采用“尘世的”、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形式，已不是那么毫无控制地，主要的是已无可比拟地变得不那么残暴了——至少是已不流血和不用刑）。

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在他的政策中得到反映。总之，其结果是，沿着 20 大指出的道路的前进运动进行得不仅缓慢，而且很不平衡，有时木然不动，陷于停顿中断，或向后倒退，后来在某些接着到来的政治事件的影响下又代之以新的前进运动。就这样经过了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之后的麻痹状态和一定的后退之后，1957 年苏共的 6 月全会又使党活跃起来。后来又出现了长时间的政治上的昏睡状态，这种状态到同中国领导人开始进行论战（论战的中心也是关于 20 大和斯大林的作用问题）和召开苏共 22 大时才中断。

讲这一切不是为了贬低赫鲁晓夫的确实巨大的功绩。而是为了更全面和准确地介绍他、他的时代和他的历史地位。

这位活动家的政治面貌的矛盾性是不足为奇的。如果他不是在自己的某些很重要的信念和素质上以及在自己的性格上成为真诚的同斯大林思想观点一致的人，他不仅无法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且也可能无法活下来（甚至许多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活下来，要知道这是事实）。因此，也只有赫鲁晓夫那样一个多少具有这些缺点的人，才能起到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但是，即使如此，他自然应该有，也确实有他的大的长处。如有时近乎冒险主义的、政治上的勇敢精神，也许当时的领导人中除他之外没有人敢于决定逮捕贝利亚，敢于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另外，正如俗话说的，这个人的心还是正的。

我所指的是一个毋庸怀疑的事实，即这个人尽管过去是个坚定的斯大林分子，是当时策划的不少肮脏事情的参与者，但是当他能够进行回顾思考和表现自己意志的时候，他还是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起来反对斯大林和揭露斯大林的罪行。这一点同上面所讲的，尤其是同赫鲁晓夫把反对个人迷信作为自己手中的进行夺权斗争的武器这一方面并不矛盾。

因为当时仍然存在着作出其他选择的可能。在斯大林问题上，赫鲁晓夫，正如莫洛托夫等人一样，是自己作出了站在堡垒的哪一边的选择。当然，莫洛托夫是积极参与了斯大林的暴行的。但是赫鲁晓夫也是参与了（即使少些）这些暴行的。而且莫洛托夫同赫鲁晓夫不同，还吃过斯大林的苦头。他的妻子被关进监狱。他（同米高扬一起）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特别是最后几个月遭贬黜，在苏共 19 大之后甚至不被允许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

而且莫洛托夫很可能会遭逮捕，也许还会受到公开审判。可

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斯大林分子。他从来不表示忏悔。而赫鲁晓夫却能转变过来，同他多年来所确信的并以之为生的许多东西决裂。他的巨大的政治功绩就在这里。这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

代表大会唤醒了人民的意识。当然，也有个别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良心从未泯没，他们没有被吓住，或者没有保持沉默，尽管这样的人很少，其中能活下来的更是寥寥无几。代表大会如果说不是培育了一代人（“60年代的人”这个词已成为通用的词），那也培育了一大批有思想的新人——作家、诗人、评论家和人数要少一些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某些政治家。新思想开始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了，这些思想，正如我们后来得以确信的，并没有被完全压制下去，甚至在最糟糕的停滞年代也没有被扼制住。我认为，这是导致许多年后到来的改革和公开性时期的一个必要和重要的源泉，是新的政治思维的一个预告者。

然而，另一方面，在社会思想的很多领域中旧的教条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只是略微改变了色彩的同样的一些老人继续进行着统治。他们阻挠、窒息四周，而当出现机会的时候就摧残20大在思想和精神上所造就的那些人（有时还相当成功）。因为官方路线和官方制定思想政策的人（即使没有官方路线）就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也常常有可能不仅把别人的嘴封住，而且无情地损害他们的尊严，压制他们，迫使他们表示服从（让我们记得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而在停滞的年代，很多人都挨到了残酷和无情的惩处。

苏共20大后行成的形势可以概括为：党宣布了斯大林活动中的错误和罪行（虽然当时不这样叫）——即破坏法制、搞镇压、滥用权力（他把权力变成个人的绝对权力）、大搞个人迷信。也说出了这些错误的某些后果，例如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失败和失利。但与此同时，大家认为，并常常说意识形态本身、列宁之

后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党的路线本身一直是正确的（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则加以严厉的整肃）。在这样的条件下，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只能追求一个目的——在原有的理论、思想、概念和模式（虽然现在已把它们同斯大林分开）的基础上争取更顺利地前进。这不仅涉及国内事务，也涉及仍然保留了许多过去定下来的概念的外交事务。这些概念包括：把世界分成两个体系，认为两个体系的斗争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不断深入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等等。当然，生活对这种形势作出了一定的纠正，迫使人们在这儿或那儿作出某些改动。但总的说来，情况就是如此，而在停滞年代甚至变得更加阴暗。

政治上的这个巨大矛盾，决定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文化和科学的某些领域中所出现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图景。在文学和艺术中，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那些“旧时代的英雄”，那些依靠阿谀奉承在斯大林年代的最令人反感的整肃运动中向上爬的人依然神气活现。有人甚至尽力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批判，不许公开提起过去的那些肮脏事情。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名字，一些新的人，他们往往是很不轻松地打开前进的道路，开始吸引了社会对他们的注意，并对人们的思想情绪产生重大的影响。

文学的总面貌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在老的《星火》和《十月》杂志旁边，出现了新的《新世界》和《青春》，出版了一期《文学莫斯科》，出版了索尔仁尼琴、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坚德里亚科夫、阿克肖诺夫、涅克拉索夫等一系列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情况要差得多。总的说，它们的情况变化不太大，尽管在形式上也开始使用了摘自最近一些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定中一些新的论断和提法。

但是，社会政治思想也还是觉醒起来了，觉醒起来的力量努

力寻找出路。更不用说，这些力量的发展——对这一点，个别的(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人还不多）政治活动家也感觉到了——已成为社会的客观需要。

也许，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在理论的发展一般处于停滞或者前进极慢的状况下，在这里或者那里仍然出现了某种自由思想的“绿洲”——一般是在具有足够勇气和威望的领导人的周围，这些领导人自己也愿意并有能力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四、创造性思想的“绿洲”

我认为我一生非常走运：我曾在好几个这样的“绿洲”里工作过，而且是在我35岁到45岁这一年富力强卓有成效的年龄段里。

库西宁的创作集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科书

我进入第一个这样的“绿洲”纯属偶然。我已经讲过，在1957年初为了防止即将面临的不愉快事件，我不得不赶快调换工作——从《哲学问题》杂志社转到《新时代》杂志社。在那里有过一次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在我一生中起着重大作用的会晤，这就是与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库西宁的会晤。他从《新时代》杂志创办之日起就是其编委的（不公开）成员。

库西宁，祖籍芬兰，是我国及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和享有盛名的人物。当我开始在《新时代》杂志社工作时，他已近75岁，几乎已处于退休的境况（他只保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的荣誉职务）。可是在苏共中央（1957年）六月全会上，由于他不顾情面地以及据说旗帜

鲜明并有说服力地起来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对企图撤掉赫鲁晓夫的整个集团，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和中央主席团委员。

其实，甚至在早些时候领导就想起了他。1956 年，看来是在 20 大之后不久，中央委员会曾作出决定要编写几本社会科学主要学科——政治经济学、党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方面的教科书。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一书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要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同时应该适用于最广大的读者，应该是既以苏联读者也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普及读物。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科书编写组的任务，苏共中央也就委托给了库西宁。

之所以决定赶快编写这些著作，可以认为这是由于斯大林在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系列思想被“推倒”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名誉扫地之后形成了真空，因此自然希望无论如何要填补上这个真空。可是，正如往往发生的那样，一个好的想法在其实现的过程中会被歪曲，会将其精髓阉割掉。实现编写这些新书的任务时情况更是这样，这首先是因为这个任务基本上交给了原先那些专搞意识形态的人及其助手们去搞，而正是他们长期地、不遗余力地在各个知识领域里培植了斯大林的教条主义。

苏共中央宣传部正是从这些人中间为库西宁挑选了编写组人员，可能也是利用了库西宁对社会科学界和政论界的人不甚了解的缺陷。当然，也不排除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领导，尤其是那位 Φ·B·康斯坦丁诺夫部长不知道其他人或者不信任他们。不管怎么样，当 1957 年初库西宁看完了由塞给他的那些编写人员写的初稿之后，正如后来库西宁给我们讲的那样，他起先感到沮丧，而后来就赶快寻找新人（诚然，只是在他当上了中央书记之后才得以具体实现这个意图。在此之前，中央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顽固地反对给编写组补充人员，因此没有一个新人参加编写工

作)。我到《新时代》编辑部工作后4个月，收到了要我参加库西宁的新的编写组的建议。

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在1957年4月中旬，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女士（原来是一位秘书）问我是不是阿尔巴托夫，并说："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库西宁要同你讲话。我给你接通电话。"于是我听到了我已经熟悉的库西宁的声音。因为我在编辑部会议上已多次见到过他并听过他的讲话。他说："喂，格奥尔吉·阿尔卡季耶维奇，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能见一次面吗?"我说当然可以，他邀请我当天晚上去他家里。他的家就在有名的政府公寓，也就是著名作家尤里·特里丰诺夫在一部同名小说中所描绘的那幢"滨河街公寓"。

那幢建筑属20和30年代的建筑式样，就建在克里姆林宫对面的莫斯科河和一条运河之间的一个岛上，显得巨大而灰暗。只有著名的政治家、党和政府的头头、著名将领、老一辈革命家和接近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作家才能住在那里。他们中许多人在1937年到1938年间成了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他们的家属也跟着他们或进监狱，或被流放，至少也得搬出公寓，把住房让给新头头。

那天晚上我来到库西宁的陈设简陋的套间，那套住房有三四个房间，最大的一间是他的书房。我惊奇地发现他的书桌旁有一条从天花板挂下来的健身链。随后我又注意到对面墙上还有一个健身架。主人看到我的惊奇的神情，就拉住健身链往上拽了几下，对于已75岁的他来说，这几下显然相当有劲。他做完后说："你得锻炼，不然就会老得更快。"

我们转过话题谈工作。库西宁建议我参加编写组。他说我将会接到党中央的一个电话。几天后我被请去见宣传部副部长B·斯纳斯京，他详细地盘问我是怎么认识库西宁的。他说他将让我参加编写组，将会告诉我什么时候和到什么地方去报到。这之

后，党中央似乎把我“忘”了；党的意识形态干部很不愿意让新的“不合适的”人参加重要的课题。只是在两个月之后，当命运把库西宁推到党的等级制的最高层的时候，一切都变了。这时斯纳斯京给我来了电话，并用恼怒的声音问道：“你怎么还没有去纳戈尔尼（党中央在莫斯科郊外的休养地，编写组就在那里工作）？我给你两个小时收拾东西；你可以拨个电话要一辆汽车。”

不久以后我弄清楚了，库西宁是怎么会看中我的。原来当我调到《新时代》杂志社后，我开始写很多文章，由于我来自科学院的一个杂志社，那份杂志在理论上要比《新时代》这份政治周刊份量重得多，所以我的文章曾引起他的注意。他曾向另一位编委——列夫·马克西莫维奇·舍伊金（他的笔名是谢金）问过我的情况。舍伊金是位出色的、专搞国际问题的，但遗憾的是在世时没有受到重视的新闻记者，库西宁非常尊敬、器重甚至喜爱他。库西宁已认识他很多年，因此非常信任他。看来，我得到了很好的推荐，不久也就和舍伊金本人一样被邀参加了编写组。从那时刻起直到库西宁生命的最后日子一直帮他完成他的创造性事业的莫大荣誉就落在了我们两个人以及当时也被邀参加编写组的亚历克赛·斯捷潘诺维奇·别利亚科夫身上。后者曾是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后来成为库西宁的助手，而再后来当了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我们为库西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起草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的讣告和波德戈尔内在葬礼上致的悼辞（赫鲁晓夫是非常尊敬库西宁的，可是当时他在埃及访问，如果他在的话，可能他会亲自致悼辞）。

在新参加编写组的其他人中间，我想提一下哲学家Ю·А·梅尔维尔和А·А·马卡罗夫斯基教授。在编写哲学章节的个别阶段上，还吸引了阿斯穆斯教授（他是老一代最优秀哲学家之一，同时他醉心于天文学，他来到编写组所在的莫斯科郊区中央别墅村的时候带了一架很大的望远镜）和当时还是位年轻的非常有才能

的科学家Ю·Н·谢苗诺夫，他根据库西宁的请求撰写对当时的教科书来说是非正统的关于社会进步的一章。为了修改各经济章节，库西宁邀请了А·Г·米列伊科夫斯基（后来当了院士）和С·А·维戈茨基教授。还邀请了一位老专家Г·斯特鲁米林院士当顾问和撰写一系列有关章节的段落。门德尔松教授也曾作为咨询专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最后，邀请了一些按库西宁的想法对教科书有重大意义的其他课题方面的作者。他最大的愿望是，详尽地、实事求是地和从新的角度阐明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主要问题、政治斗争的战略策略、马克思主义对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问题的态度以及对国家的态度（所有这些都写进了教科书，放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内容广泛的，早先幸而尚未对它的研究对象下过教条主义定义的科目下面）。研究这些问题的工作首先交给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别利亚科夫和谢金以及我，还有Б·М·莱布索恩——他是我国研究党和党的建设问题的极其出色的真正专家之一，他具有甚至能把平淡无奇、老生常谈的题目写得引人入胜的才能。关于国家这一节的编写工作，还吸收了在《共产党人》杂志社工作的Ф·М·布尔拉茨基参加。

我无法一一提到这项工作的所有参与者。有时候，还吸收了最初编写组的一些人参加部分问题的讨论（他们原先写的东西，除了一些章节的标题外，什么也没有剩下）。我所提到的人都是真正作为创作集体的编写组的基本成员，他们相互交叉进行加工，评论相互的稿件，而有时替对方改写整段整段的文字。然后进行非常重要的最终定稿工作。库西宁本人直接参加最后定稿，而别利亚科夫、谢金和我也参加这项工作。

应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从学习开始我们的工作的，更确切地说是从重新学习并摒弃几乎已深入每个人的脑海成了他的第二天性的教条开始的。也就是说，必须从掌握对我们来说不那么简

单的本事开始，即要对惯用的概念、引文及常讲的道理提出质疑，要把它们同生活的现实情况进行对照并力图找到真理。库西宁在这方面是个出色的老师。尽管年事已高，可他头脑清醒，善于接受新思想并具有当时对我们来说很不习惯的那种思路灵活和随时准备进行大胆探索的特点。大概就在那时候我第一次体会到我们大家是多么落后。我说句老实话，他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时刻都在用脑筋思考的人。

只是后来我和我的同事们才知道，列宁曾发现并高度评价过库西宁的这个特点。在我们开始工作几个月以后，出版了新的一卷载有列宁给季诺维也夫的信的《列宁文集》。季诺维也夫抱怨说，负责写共产国际民族问题决议草案的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工作上“总是”拖拖拉拉。列宁回答他说：“他了解情况并善于思考”。而在括弧中列宁用德文明显地暗示补充说“这在革命者当中是很难得的”。[①]

这是准确的评语。大家在同库西宁的交往中几乎都能亲身体会到他对一切都是经过思考的。你会感到他同你谈话时每句话后面都有一个在思考中的和不断对之进行检验并推敲的思想，他对你的每一个问题、每一句评语，都认真地加以思考、衡量和评论。理解这种情况的人都感到，尽管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平易近人、作风民主（这在当时的首长中也是异乎寻常的），可是在开初之时同他谈话和一起工作，虽然觉得很有意思，但也不简单，因为你时刻都会感到很紧张，要很警觉，不要不经思考就随便讲话。后来，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了，我们不可能在“老爷子”（我们在背后这样称呼他）面前装得高明于我们的实际水平，这样一来，我们的举止也就开始自然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家也变得稍微聪明了点儿——在一个具有巨大智力的人面前，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50卷第455页。——译注

在与他的交往中，你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动员起自己的全部智力潜力来。很可能优秀的，由真正聪明人组成的创作集体的力量也就在于此。这种集体的力量照例要强于它的参加者的智力潜力总和所能提供的力量。一旦形成“大脑临界质”，不仅会显露出相互丰富和创作竞赛的效果，而且会产生独特的智力总爆炸。

每一个同库西宁共过事的人还都有另一个新发现，这就是关于政治的新观念。这观念对我们来说尤其是新的，因为我们的思想多年来受斯大林主义的污染，已变得迟钝了。在同这个人的交往中，我们懂得了，应该将政治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创造性过程，这个过程把明确的目的观念同经常探索的方法和手段结合起来，把战略同策略结合起来，把科学同艺术结合起来（库西宁在解释最后一个结合时有一次曾异常准确地指出：“对政治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知道，而且也要善于去做”）。总之，过去我们有时曾读过的，但要么没有理解，要么理解成抽象理论的那些东西，在同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交谈中，就变得生动具体了。

库西宁是欧洲工人运动、早期“左派”社会民主主义、成熟的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最好时期（如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时期）的十分优良传统的活生生的传播者，这些传统对我们那时来说已是极其遥远的东西了。除此之外，他还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他会写诗作曲，化不少时间从事文艺学研究）。

总之，对于参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人员来说，这项工作好像一所真正的“大学”，时间持续了一年多一点，课程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我们观念摆脱了神秘色彩的和回复到列宁对政治的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我之所以强调事情的这个方面，是因为在我国形成的具体条件下，在我们过去的情况下（那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大量东西被疏忽、没有被认知，甚至没有被察觉），在当时现实存在的社会

意识的形式和特点中，回到真正的、未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歪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乃是走上社会政治思想解放道路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第一步。这就是在思想上使苏联社会得到更新的第一阶段的实质和主要内容。把这门学说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再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使之适应新的世界现实，这只能是下一阶段的事了。开始时是“回到列宁”，然后才是“从列宁再前进”——这是社会思想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道路。虽然这方面也必然会有一系列重要的例外情况，如当时就存在着国家的切身政治利益要求以新的态度迅速加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现实生活那时就已经要求人们去发展列宁的思想，立即超越列宁的思想向前发展，而把详细的理论论证任务留待以后去解决。这涉及和平共处和战争不是不可避免问题，革命形式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的多样性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库西宁是发展这些思想以及恢复列宁主义原先的内容和清除其斯大林年代留下的积垢的最合适的人物。因为他不仅理解列宁的思想，而且敢于把这些思想同当代新的现实情况进行对比。对他来说，这些思想不是抽象概念，不是崇拜的圣像，而是他本人也生活其中的和他记忆犹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现实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是那时我们党内唯一一位极其深刻地觉察到斯大林远远地背离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认清斯大林给我国和整个解放运动带来的损失的活动家。

如果抛开由库西宁领导的编写组成员的“自我教育”不讲，那么编写组的工作实际上有些什么成果呢？

首先是编写出了这本教科书，而如果按官方的叫法则是编了一本教学参考书。尽管我作为编写组成员不便来讲这个问题，但我深信写出了一部当时极其不寻常的著作。当然，从我们今天的知识和对问题的理解角度来看，这本教科书在内容上没有走得太远，也不是书中提出的所有问题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鉴于这

本书第一版是在30年前出的，因此也就不应对作者们有所指责。但是，不久前当我仔细地重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感到惊奇的恰恰是另一点，即书中很多段落，甚至是整个章节在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得体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悲的，要是没有如此长期的停滞，这本书可能早就过时了。但同时这也表明它的创作水平不错。就是按当时的标准，这本教科书也可以被看作是苏共20大以后在苏联政治思想上出现进展的明显证明。库西宁亲自撰写的序言（当时的叫法也不一般，叫“导论”），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很大程度在形式上就是最好的证明。序言是用非常优美的语言写成的，写得不俗气，对刚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怀有信任感，而且没有丝毫傲慢的态度。我觉得，在教科书中（至少在它的大部分章节中），多少年来第一次得以摆脱过去长期以来以及在此之后撰写我国政治书籍所使用的党八股语言，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有的地方甚至是用地道的俄语来阐述政治思想的理论。

至于内容，我在这里只谈一个问题，即如何把个人迷信剖析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的问题。

我不是夸大教科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那一节的优点，但是当时这是在苏共中央作出人所共知的决议之后首次进行独立分析个人迷信的尝试，而且这种分析超出了用当年困难的国内外条件要求高度集中和铁的纪律来为个人迷信作开脱的框框。这一节写得非常费劲（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最后阶段这一节是我自己加工的）。库西宁的一个主要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般说，具有为当时社会所更需要的和反映社会需求的一些品质的某种总和的人才能成为领袖。不管怎样，客观规律性在这里是起了作用的。

例如，在列宁逝世之后，苏联社会所需要的首先是要树立对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当

然，也需要统一、集中和纪律，因为舍此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当时未必能生存下来。斯大林好像体现了这些品质，他坚定地站在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的立场上。

但是，全部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需求可能发生变化，而这时领袖却还是原先的。而当人们竟然迫使（常常是用暴力）社会去适应领袖的品质、愿望和观点的时候，此时就为各种各样的歪曲和变形开辟了道路。这里就已经是主观因素在充分地发挥作用了。当时库西宁也就论述到此为止，看来他也不可能走得更远了。可是在编写组讨论时，他也曾肯定地说过由此得出的结论：这种转折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没有发育充分的、可迫使领袖改变自己的政策或撤掉他的国家领导职务的一些民主机制来限制领袖的权力，主观因素就会获得大大超越可允许范围的广阔天地来施展其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机制，就会开始发生不幸的事，而且常常是非常大的不幸，有时正如历史上常发生的那样，是致命的不幸。

应该承认，我后来也曾不止一次地认为，这种历史也在赫鲁晓夫身上重演了。斯大林去世之后，当时社会正需要新的领袖具备这样一些品质，如大胆，有能力进行坚决的转变，甚至可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准备冒大的风险。可是后来，原来是优点的东西却变成了缺点。赫鲁晓夫虽能“炸毁”原先的秩序，可是他不能改造这些秩序，更不能建立新秩序。而在苏共20大以后，恰恰是这个问题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越来越明显地看出，赫鲁晓夫已开始日暮途穷，他能够给国家提供的东西越来越少。不仅如此，他渐渐地滑向老的一套，甚至在他诅咒过的对领导人的个人迷信方面也是这样。

后来勃列日涅夫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到赫鲁晓夫时期快结束的时候，急需要的是稳定，甚至是从无休无止的人员调整和来回折腾中得到一定的喘息。勃列日涅夫正好怕乱求稳，厌恶变革。

可是一旦其他的社会需求成为首要需求时，领导人的这些品质就又开始成为对社会有害的东西，变成了导致停滞的重要前提。在这两种场合下（也同斯大林时代那样），可以说社会得到了多于它原初想要得到的东西。可是社会却得不到保护，原因是没有民主机制。

这已经不是教科书的内容，而是由库西宁引发出来一些想法。而且这些想法也可以说是马后炮了。

库西宁在对斯大林专制独裁及其性质和后果的评论上是非常严厉的，他从不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历史需要”和“严格要求”等借口来掩饰斯大林专制独裁与社会主义以及与共产主义理想的不相容。当然，那时他不可能把他所想的一切都公开说出来。从教科书里阐述的思想开始，库西宁逐步得出了一个他在1964年自己生命快结束时才说出的关于革命后的制度蜕变成个人专制的重要的理论和政治结论。

现在仍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这本书上来。关于个人迷信这一节在当时非常重要，也非常为人们所注目，但是这一节也像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各章一样，只是作为通常的“教科书”的一个章节，完全不是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和与众不同之处。我认为，真正的创造性突破（当然是按当时的规模来说）是这本书的政治部分，即在论述我国的政策、论述解放运动的政策与策略的部分。

总之，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大部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科书付印前夕读到这本书的评论者都认为，这本教科书在当时是可以成为我国意识形态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可是它没有成为重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当时已出版的，与之竞争的同类教科书的有名望的作者，甚至我党的官方思想家们的嫉妒（当时编写苏共新纲领的工作即将开始，开始时赫鲁晓夫委托库西宁来领导这项工作，可是后来“老爷子”被一些较机灵的“理

论家”挤掉了，这无疑影响到这个文件的质量)。但是主要的毕竟是其他原因。1959 年出版这本教科书时，反对苏共 20 大方针的保守派已经具有相当势力。正是这帮保守的反对派一眼就看清这本书的用意所在。

例如，这本书就未必会对苏斯洛夫的口味。我的几位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的朋友就曾讲过，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伊利切夫也不赏识我们的教科书。曾有传闻，这位顽固不化的斯大林分子在他领导的部里的负责干部小圈子里曾把这本由库西宁主编的教科书称作是“社会民主党”的教科书。当时保守派(尤其是社会科学学院的保守派)马上就把这些评价接过去到处去传播。正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导的不予赏识，这样一本教科书的印数也少得可怜。

在报刊上，实际上没有人对这本教科书写过评论文章，谁也没有指出它的真正成就。谁也不关心党校系统学习这本教科书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这本书在国内没有得到应有的普及和声望。

但是，如果谈到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理论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他们中有很多人读过这本教科书)，那么他们从中获得了不少可供思考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本教科书是起到了它的作用的。国外的共产党人也阅读了这本教科书(它曾用几种主要的欧洲语言翻译出版)。

我认为，这本总共历时 3 年多(指两版的时间)的著作，也由于编写组提出的思想通过库西宁本人和同其一起工作的人(其中某些人不久就在苏共中央机关里担任了重要职务)终于找到用于政治的途径而成了我国政治思想发展中的某座里程碑。而这些思想对解决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也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系数不太高，可是在那时候这也是很

重要的，因为当时无论是理论还是社会和政治思想几乎在原地踏步，没有丝毫进展。不仅如此，斯大林主义还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开始反扑。

在结束讲述编写《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科书的工作的时候，鉴于库西宁不仅在这项工作中而且在苏共20大之后的危机年代里发展我国政治和理论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个人作用，我想引用同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密切合作的别利亚科夫（他不仅在理论工作上而且在政治工作上曾当过库西宁的助手）的一段评论。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库西宁毫不妥协地反对教条主义、狭隘宗派主义和'左倾'过火行为。由于基于丰富阅历长期思考的结果，他非常了解我们国内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切。而对解决堆积如山的问题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则是他的热烈愿望。可是他极为谨慎，这是他以往的全部经历导致的。在苏联共产党里，他毕竟是个'外国人'，同时还是个'前社会民主党人'，而且他还有曾作为'人民的敌人'而被捕过的妻子和儿子——在斯大林年代这使得他比别人两倍三倍地容易遭到致命打击，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也没百分之百地成为'自家人'。作为'思考很多'的人，他大概经常在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方面表现迟缓，他这个'缺点'也使他防止作仓促而冲动的发言，不去轻率地'卷入某种争吵'。可是在决定性时刻，他会勇敢行事，义无反顾。1957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在政治局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争论（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命运）中，在解决一系列政治问题时，他就是这样的。过于信任赫鲁晓夫，甚至在这方面表现的某种乐观情绪（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到教科书上，特别是反映在它的第二版上），有时也对库西宁起干扰作用。但是，这种态度是真诚的——可能库西宁在赫鲁晓夫身上和他的活动中看到克服斯大林主义以及回到他忘我地献身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最初理想的唯一良机。

“我觉得，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认为自己的作用和自己的使命是成为连结列宁和列宁主义同苏联后斯大林领导的桥梁。当然，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列宁和库西宁所生活的时代的差异。对于列宁来说，客观上主要是同‘来自右边的修正主义’和第二国际的斗争。后来反‘左倾’斗争提到了首要位置。列宁也看到了‘左倾’的危险，但是寄希望于‘左倾共产主义是一种……很年轻的思潮’‘容易治好’[①]。可是这个希望没有能实现，其中包括在革命取得胜利的两个最重要的大国——俄国和中国。

“但是，重要的是库西宁接过了由列宁手里掉下来的反左斗争的线索并继续将其拓展下去，在不轻松的条件下，他尽可能地揭穿某些共产党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能够葬送运动的‘左倾病’和假马克思主义词藻。”

我认为，别利亚科夫画出了库西宁的恰如其分的政治肖像，因此我也就没太多要补充的了。

我要补充的第一点是我观察到的政治方面的情况。库西宁总是回避谈过去，因为一谈过去就会涉及到他个人的某些话题。看来，在他过去的历史上有着他本人不能容忍的事情。据我纯粹想当然的猜测，他在当时既不能也不敢出来保护那些遭斯大林镇压的亲人和同志们，因此也就不愿意回忆这些人命关天的场景。而且，安德罗波夫给我讲过，他在卡累利阿工作期间，是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把他从“列宁格勒案件”的沉重灾难中救了出来。1939年末1940年初的事件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当时库西宁正好领导了由斯大林建立的所谓芬兰“泰里约基政府”。我曾不止一次地好容易克服自己想问他这段经历的强大诱惑力。而他本人则从未谈起过这段历史，这可能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在某方面有过错，尽管在那时候他未必能为避免事件的悲剧性发展做些什么。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82页。——译注

后来我想，在斯大林时代他受过很多屈辱和恐惧。这也就是别利亚科夫准确指出的他那种特别敬重，在某种程度上是盲目敬重和忠于赫鲁晓夫的原因之一。我记得我们同库西宁的唯一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我和谢金对写赫鲁晓夫访美的散文集《面向美国》获列宁奖金表示愤懑，结果我们挨了他一顿狠狠的训斥。

其次再补充另一个我观察到的纯属他个人的情况。库西宁最突出的是他的文化修养特别高，这一点是当时其他位高权重的政治干部完全不能望其项背的，而且也不仅仅在受的教育和总的文化水平方面（这两方面他不是靠家庭而是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获得的，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而且在待人，其中包括对待地位比他低的人和下属的态度方面。这里举一个很小的事例：库西宁每年二到三次（通常是新年、五月节日和十一月节日以后的1—2周），在星期日邀请所有和他（或工作上或创作上）直接共事的人（从知名的学者、党务工作者到自己的秘书们）到他别墅作一整天客，而且还邀请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起参加。这是忘掉一切职务差别和年龄差异的非常有意思和愉快的日子。

最后要补充的是一个较为严肃的结论。如果看一下后斯大林年代的政治局（当时是主席团）的成员组成，那么就可以看到，在各次人数众多的人员更替中，尽管在赫鲁晓夫周围有大量早就为人们忘却的像科兹洛夫、基里连科、福尔采娃、穆希金诺夫、波德戈尔内之类的人，可是能起好影响和促进作用的人，最终能在复杂的政治问题上真正诚心诚意地讲出自己的意见或提出建议的人却非常之少。这样的人我知道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库西宁，另一个我认为是米高扬（我同他只是点头之交）。1989年初，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尼基托维奇在讨论1962年“加勒比海事件”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他父亲的一段回忆录，其中谈到正是这两个人曾警告过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可能带来危险的后

果。这证明了我上述的看法，我感到非常高兴。当然，他们是用极其谨慎、符合当时政治局内的关系准则，但对赫鲁晓夫本人来说却明确无误的方式提出警告的——他们说，他们将对他的提案投赞成票，但这仅仅是出于对赫鲁晓夫的信任；赫鲁晓夫对此也完全理解："他（指库西宁）的答复把全部责任放到了我身上。我非常尊敬库西宁同志，知道他是正直的和真诚的，所以我对此也是从善意方面去理解的。"[①]唯一的另一位表示怀疑（仍然是用非常谨慎的方式，但这在当时需要有勇气）的政治局委员是米高扬。他反对的意见就是"我们正在下决心走上危险的一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就这个问题说道："这一点我本人也已讲了。我甚至这样说过，如果说得概略一点儿，这是走在冒险边缘的一步。冒险在于，在拯救古巴的同时，我们自己可能卷入最艰难的从未见过的火箭核战争中。"

在我看来，我能补充说的是，这不仅是冒险，而且是犯罪。我个人认为，将导弹运往古巴，这是赫鲁晓夫最危险的失误，而加勒比海危机则是苏联和美国政策中最大错误的结果。但是现在再来谈库西宁的时候，我想说，这个插曲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它首先说明库西宁在政治上有洞察力，他觉察到了所采取步骤的危险性。同时也说明他具有原则性，在当时要反对领袖的意见简直是不可能的复杂情况下，他还是找到了机会让赫鲁晓夫知道自己的担忧。其次也说明，由于上面已提到的一系列原因，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过分信任赫鲁晓夫，甚至在极端重要的形势下没有克服自己胆小怕事的毛病。

我用这么多篇幅来回忆库西宁以及和他一起编写《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工作情况，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人和这件事在我一生中起了巨大作用。我认为，这里所讲的是把由苏共 20 大

---

① 引文得到 C·H·赫鲁晓夫的同意。——原注

作出的我们对于世界和自己的认识上一个突破加以发展和扩大，在发展社会政治思想中真正向前跨出一步的最初的严肃尝试，虽然在当时甚至这样的一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但由库西宁领导的编写组仍不失为当时很少有的创造性思想的“绿洲”，虽不是唯一的“绿洲”。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我不是创建这个所的参与者，但可以说是它的见证人，是关心这个所并与该所科研人员有密切联系的目击者（我有幸在这个所工作过，不过已是在稍后的1963—1964年，即在建所后6年多以后了）。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成立，也是苏共20大的直接结果。到50年代中期，苏联仍保留着一种不可理喻的荒谬情况：在国内建立的许多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中竟没有一个研究国际课题——外国、对外政策、国际经济问题和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所。唯一的例外是有一个在革命以前很久就建立的老所——东方学研究所，可是它研究的几乎全都是语言、文化和历史问题。

但在过去，情况并不就是这样的。不用说，共产国际曾有过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以及与其有关的组织（显然所有这些研究机构也都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而终止了自己的存在）。除此之外，也曾存在过一个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它先是属于社会主义科学院，后来归共产主义科学院，而从30年代初开始则改组成为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它从1924年办到1947年，在撤销之前有120名研究人员（这几乎是那时候苏联科学院最大的人文研究所）。所长是E·C·瓦尔加院士，他长时间是斯大林信得过的顾问。这使得瓦尔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大胆地议论问题

（瓦尔加本人以及同他共事的几个匈牙利人之所以在30年代没有遭到迫害，也就不言而喻了），并有机会去认真研究当时的经济景气问题以及经济周期理论和西方的经济危机。显然，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革命运动的高涨同危机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课题受到了苏联的领导人和研究世界经济问题的专家的极大关注。该研究所还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矛盾与冲突以及战争威胁的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来斯大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对瓦尔加本人和对他的见解不感兴趣了。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面前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这就是当时的国家计委主席、政治局委员、自认为是实际经济和经济学方面的独断权威的A·沃兹涅先斯基。[①]他对瓦尔加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批评他“美化”资本主义和提出了存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所因此不久就关闭，变成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本主义研究室，它的一些研究人员遭逮捕，不少人被解雇。在以后的9年时间里，研究世界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科研工作实际上停止进行，而只是为支持由上头钦定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的论点找找论据。

瓦尔加曾经想要反抗。据曾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工作过的佩夫兹纳的回忆，瓦尔加曾“写信给斯大林反对关闭研究所。可是这一次斯大林没有接见他，而是将信转给了日丹诺夫。日丹诺夫会见了瓦尔加并告诉他说，问题（指关闭研究所）已经决定了，中央委员会感兴趣的主要的是进行有助于尽快解决‘赶超’任务的比较研究，而只有从事苏联经济和外国经济研究的专

---

① 他本人不久就被无辜地逮捕和处决。他死后被恢复了名誉。当然，他既不是间谍，也不是叛徒，但是，我认为在恢复历史真相时，我们也不能讳而不说蒙难者本人的并不体面的真实情况。——原注

家在一起工作才有可能进行这种比较研究”。在评论这段绝对可信的话的时候，我只能说，在当时（1947 年）甚至我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也无法相信，我国领导人对世界和世界经济的认识，对我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认识竟是如此肤浅，如此武断。但是，日丹诺夫的这个解释是否可信呢？

这里我再引一段佩夫兹纳的讲话，他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次斯大林不再理睬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战前也有人对瓦尔加和研究所进行攻击，可是斯大林保护了他们）并将其关闭呢？在这方面沃兹涅先斯基的个人原因未必能起决定性作用。我估计，这个荒谬的决定是出于斯大林的战后对外政策方针。这个方针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也遭受到最严重的挫败，它的总危机正在继续加深，必须作好对资本主义进行最后的致命打击的准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像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这样的机构了。因为这个所的存在本身就带有不相信资本主义会不可避免地很快死亡的成分。”

我对这个分析是否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把握。为了不致产生误解，我想指出，佩夫兹纳所讲的（对资本主义的）“最后的致命打击”当然不是指军事打击，不是指苏联及其盟国的“革命战争”——这个问题我和他后来曾专门讨论过，而是指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在全世界的高涨。从斯大林在战争快结束时给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提出不要急于进行革命的建议（尽管当时意大利和法国的形势看来像是革命形势），同意和平解决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问题以及准备在其他一些地方进行妥协（包括 1951 年的朝鲜和平谈判）和特别致力于利用西方知识分子的反核情绪以争取他们的同情等方面看，我认为他表现出来的这种谨慎态度表明，他并不确信资本主义即将寿终正寝和已到了进行“最后的致命打击”的时候。与此同时，在他的政策中，在他的历次政治声明里，也未表示过真想要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愿望（在

战争年代他还是善于找到这种办法的），未提出过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倡议。可是，我们的宣传调门却越来越气势汹汹和毫无妥协之意，而关于资本主义的宣传和估计则离真实情况越来越远。

荒谬的奇谈怪论不仅出于平庸的记者和专职的宣传工作者之口，而且也出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也包括斯大林本人之口。他在他的最后一部理论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就曾写道："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而事实上"冷战"的出现倒使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及其盟国！至于说到美、英、法经济发展的前景，斯大林则斩钉截铁地说："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而这些话却正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持续达20年之久的、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增长时期开始的前夕写的。

在这个时期，斯大林对资本主义除了不信任和仇恨之外，推行两个不同的政策。一个是相当谨慎的，甚至是不争当赢家的政策，它并不追求任何现实目标。这一政策的思想可能是在等待资本主义在它本身的罪恶和冲突的重负下垮台。另一个政策则是开展大喊大叫、满口大话、气势汹汹的反资本主义宣传。斯大林本人是否相信这种宣传，则另当别论，我对此无从作答。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佩夫兹纳教授所说的关于关闭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的真正原因的意见。

我之所以详细地谈这件事，是想让读者对斯大林晚年我国社会政治思想之所以每况愈下的另一个原因有所了解，那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了对周围世界和世界经济、对资本主义、对归结为两个体系对抗（即所谓"对阵"）的国际关系的最肤浅、幼稚的观念。可是很多年以来，我们不想摈弃这些观念，不仅如此，还作为不动摇的信条被硬塞进我们整整一代专家学者的脑袋里。

我觉得，正是在这种背景上，无论是成立世界经济和国际关

系研究所的意义还是由此而产生的困难就变得清晰可见了。

从选所长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开始就遇上了困难。正如瓦尔加给他的朋友们所讲的《我所依据的是已故的 H·H·伊诺泽姆采夫和其他人的亲耳所闻》，当时苏共中央科学部经济科学局局长 K·И·库兹涅佐娃（她在她能施加影响的所有事情上都起了最坏的作用）坚持推荐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某教研究主任 И·И·库兹明诺夫当所长。全体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都知道这个人是个彻头彻尾而且寻衅好斗的教条主义者，是他的专业范围里最极端斯大林主义的化身（他长期以来直到去世之前一直是在经济学尤其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推行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元凶之一）。这里有一个当时很典型的细节：虽然这一切是发生在 20 大之后，而且领导也给研究所下达了从新的角度看世界并提供世界的真实状况的要求，可是作为苏共中央机关的科学部恰恰是把库兹明诺夫作为所长人选上报书记处。

但是，对于刚建的研究所和科研工作来说，可庆幸的是，他遇上了一位非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就是阿努沙万·阿加福诺维奇·阿尔祖马尼扬，他 1953 年来到莫斯科，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理论问题研究室主任；不久他就成为该研究所副所长。在解决任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问题的时候，阿尔祖马尼扬在学术界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可是他有一张有力的王牌，他是米高扬的好朋友和亲戚（他们是连襟）。显然，这保证了对他的任命，虽然正式处理这个问题的不是米高扬，而是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和科学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谢皮洛夫。我想，谢皮洛夫在内心也是偏向阿尔祖马尼扬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曾把瓦尔加请到自己那里问他关于所长人选的意见，不用说，意见自然是反对库兹明诺夫，同意阿努沙万·阿加福诺维奇。

我讲这些不是叫阿尔祖马尼扬或米高扬难堪。看来，任人唯亲不一定总是坏事。米高扬在那些年代是领导层中思想最进步最

善于思考的人之一，他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反对头等保守的人选并任命较为进步的人选（即使是他的亲戚）的事实，只能算作他的功绩。

阿尔祖马尼扬不仅在建立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并使其成为重要的科学中心方面，而且在撰写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新型的学术著作方面都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取得这些成就是不容易的。而对于阿尔祖马尼扬个人（我相信，还有曾支持过他并以这种支持给予他力量和勇气的米高扬）的这个作用，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首先，新研究所的所长必须克服一些巨大而坚固的障碍。

障碍之一是，我们大多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专家所具有的观念是极端教条主义的和宣言式的观念，而许多在学术上定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也同样地陈旧落后。他们中的某些人自己也不完全相信说资本主义极度困难，在困难中拼命挣扎和濒临灭亡的那些描写，可是他们仍然认为继续把这种说法告诉广大听众是正常的和必要的。这种情况的全部荒谬性（而对科学界来说则是悲剧）在于，这种立场甚至还谈不上是有意识地要骗人。根本问题是，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之一就是不能把社会科学置于宣传框架之外。社会科学的地位被降低到只能充当政策的奴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辞句来论证领导人的每一个新的政治花招，即使这种花招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20大从符合决策者需要的视角使情况有了变化。他们已经需要了解真实情况，至少要知道世界的客观状况（诚然，在领导层里很多人未必理解这一点，但是库西宁和米高扬，可能还有谢皮洛夫是肯定感觉到这一点了）。但是，在过去报刊上甚至学术出版物中常用的刻板公式却基本上原封未动，而且仍有很多警惕性很高的“基本原则捍卫者”和政治上的正统派守护着报刊和出版物。而且上级对这些人也从不加以阻挠，即使他们把任何一本

含有新思想、使人耳目一新、不落俗套的书说得一无是处也罢，而如果这些书的作者冒犯了“神圣的”教条，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情况当然使得阿尔祖马尼扬想把研究所扩展成新型的研究中心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稍后一些时候，在60年代初，我同他有过一次有关这个话题的详谈。阿努沙万·阿加福诺维奇坦率地讲了他是如何摆脱困境的。当时，无论是研究所编的杂志还是出版的书籍，都恪守了必要的正统思想。只要读一读这些书以及最初几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那时的杂志上，有人继续喋喋不休地数落着资本主义经济“岌岌可危、摇摆不稳”及其“新的动荡”和“危机”日益临近，并许下苏联将在不远的将来在所有重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上“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诺言。可是，同时在上报领导的材料里写的却是比较真实的情况。正如那时阿尔祖马尼扬说的，在编写上报材料的过程中和为写报告而进行的内部讨论中干部成长起来了，人们渐渐地摆脱教条主义，学会用新的观点进行写作。后来，这也渐渐地开始影响到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

应该说，后来在60年代末的时候，当我以新任命的所长的身份来解决另一个研究所——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75年起改名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建所问题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次谈话。我在某些方面也不得不同样走这条路。虽然当时的情况已允许（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在公开出版物里更大胆更现实地写文章了，已有一些大好机会不对陈腐的教条顶礼膜拜，而就某些问题发表意见。当然，条件是你本人愿意冒风险，准备挨批评，可能还要挨整。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去冒这个风险，总的来说，按在沉重的历史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我们苏联人的观念来看，这已不是太大的风险（已经不会由于写了首长不中意的文章而被抓去坐大牢了）。

对阿尔祖马尼扬来说，第二个重大障碍是干部问题。由于长期没有对干部的需求，因此干部来源受到很大的限制。当然，所里还留下了不少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的老人。但是，要靠为数不多的仍在工作的人（其中也有严肃的专家М·И·鲁宾施泰因、В·Я·阿博尔京、Я·А·佩夫兹纳等人）来配备这么大的研究所（当时一下子就给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300个人的编制）是不可能的。阿努沙万·阿加福诺维奇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勇气。首先是，他录用了一批从斯大林劳改营回来的专家（С·А·达林、Е·А·格罗莫夫、В·В·祖布恰尼诺夫），以及长期以来被排斥或因这种或那种政治指控而被驱逐出学术界的人(В·И·卡普兰、А·А·门德尔松、Е·Л·赫梅利尼茨卡娅等人)。与此同时，他还大胆地聘用了一大批年轻人（其中有担任重要职务的)。在这批年轻人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阿努沙万·阿加福诺维奇未来的接班人，这就是经他关怀备至地培养和没有辜负他期望的Н·Н·伊诺泽姆采夫。除了他以外，还有В·А·马尔丁诺夫、В·Л·佳古年科、О·Н·贝科夫、Г·Е·斯科罗夫、Т·Т·季莫费耶夫、Е·С·黑辛、В·В·雷马洛夫、И·М·奥萨恰亚、С·М·尼基京等人。再补充一句，阿尔祖马尼扬从在研究所工作一开始就同瓦尔加保持最密切的学术上的联系和私人接触。后来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即伊诺泽姆采夫和马尔丁诺夫，接替他当了所长。

这里我想简要地插些话，本书中将多次提到伊诺泽姆采夫，所以我想对他作些介绍。他是我的知心朋友，他对发展苏联的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对苏联政治的知识化，起了很大的作用。我遇见他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大学生。他有一个很好的经历，他从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成为《真理报》编辑助理（在我们国家里对一个40岁的人来说，这是很高的职位），后来又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有时候我曾想，他在他的职位上，特别是在同国家领导人打

交道的时候，表现太谨慎了。可是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策略家。在有些问题上，他表现很大胆和勇敢。在一次中央全会上，他发表了一篇讲话，建议大大改革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抛弃在这一领域中根深蒂固的教条。这使他增加了许多新的敌人。（这是我所记得的在改革以前唯一一次在中央全会上不用写好的讲稿发言的场合，这一情况本身就是对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保守分子的一种冒犯）。伊诺泽姆采夫完全有条件承担更高的职务，但是保守派很快就把他视作“异己”。此外，他们还把他的研究所看作对领导人传播“有害的”西方影响的一个源泉（他当时可直接接触许多领导人）。

现在再回头来说阿尔祖马尼扬。

他遇到的第三个障碍就是学术界多年来确立的似乎已达到了钢筋水泥般坚固程度的行政命令作风及其孪生物——对新生的非正统思想的恐惧。这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是阿尔祖马尼扬的个人品质，如他为人作风正派，不容忍采取整人的做法（而有人是采取这种做法的），相反，对别人的意见，其中包括相当大胆的意见（当然只要是用应有的方式并且是在小范围内讲的）却采取容忍态度。而当需要解雇那些辜负厚望、拖工作后腿的研究人员时，他也表现出坚决果断（自然，他也没有能避免选错人，但他竭力迅速纠正错误）。所有这一切促使在研究所里形成了同志式的气氛，创造了进行相当自由和创造性讨论的条件，而没有这两个条件，要形成富于创造性的集体并使其正常发展简直是不可能的。应该说，正是这种情况使我放弃一系列其他有意思的聘请，而于 1962 年年末到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

自然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这个新建研究所在苏共 20 大以后的头几年里具体提供了些什么？它是用什么帮助创造性思想的发展，而尤其重要的是，是用什么推动政策发展的？

如果不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议论，并且考虑到留给阿尔祖马尼

扬及其周围的人的理论遗产又如此拙劣不堪，那么可以说，研究所在建所的头几年就已作出了不少贡献。首先他得以使老的教条松弛下来，并为用比较现实的眼光看世界、看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关系打开道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些远远没有立刻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刊中得到反映。特别因为在被吸收到研究所工作的老专家中，有很多人（虽然不是所有人）习惯于老的、我想说是诚心诚意的“共产国际式”的教条主义。这些老专家有的在当时也是受害者，有时甚至曾为非正统思想吃过苦头。其实这并不怎么奇怪：要知道，30 年代和 40 年代理论上争论的东西往往是一些非常不重要的和学究式的问题。有时连争论的问题本身也完全是臆造出来的，只是用来作为一个借口对由于某种原因被认为已不中用的人进行迫害。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此时研究人员所关心的已完全是另外一些问题，因此阿尔祖马尼扬也不得不碰上这样一种局面，即那些来所工作的人员不是总能轻而易举地面向新的现实和新的要优先研究的课题。

但是，在研究所里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不算多，但得到阿尔祖马尼扬个人信任的学者小组，这些人得到了较大的学术自由。此外，还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他们发表非正统的看法。这些人是为领导搞研究的，而且工作得相当有成效。例如，他们上报的一个材料，介绍西方出现了一个专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经济学派，这个报告就产生了影响（不久苏联也出版了这样的学术研究，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客观的）。另一份介绍西欧经济一体化并说明这是一种现实的报告，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而在此之前，我国的专家们同记者们一起都把一体化说成是反动的捏造，是宣传，是某些人的阴谋。还曾提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这些报告常常引起保守派的不满，他们企图切断或至少严格控制向领导上报信息的新渠道。

有一份报告批评了我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方式（这份

报告是斯科罗夫写的），于是发生了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阿尔祖马尼扬把这份报告印了50份，分发到主要是从事援助“第三世界”的“各有关单位”，其中包括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这个单位的领导告状告到了苏斯洛夫那里。苏斯洛夫随即召见了阿尔祖马尼扬。据后来阿尔祖马尼扬在所党委的内部会议上通报说（这是所里一位老同志给我讲的），苏斯洛夫给他宣布了大约是下面的指示：“阿尔祖马尼扬，我和你都是老党员，你记得并知道反对派是怎样活动的吧——他们写各种纲领并擅自散发。这样做是不行的。你们如果写报告，请先给我们这里送一份来，然后由我们来决定发送给哪些人。”

阿尔祖马尼扬非常坚决地（鉴于他同米高扬有亲属关系并且有打通必要关系而且是相当高层的关系的非凡才能，所以他还毫无恐惧地）抵制了这个指示，他仍继续编写并按自己的意愿发送报告材料[①]。

阿尔祖马尼扬和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还有一个对政治思想和政策施加影响的重要渠道，这就是起草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发言。阿努沙万·阿加福诺维奇经常参加这项工作（后来他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也参加过这项工作）。他本人虽然是个聪明、机智、善于接受新思想，而又非常谨慎的人，但他写文章的速度很慢而且文字也不太好。总的说来，他的才能主要是在组织学术研究工作，挑选和培养学者方面，而不是在他的创作方面。因

---

① 有意思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晚年（可能就是根据那位苏斯洛夫的建议）曾正式下令禁止向部门领导人和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发送报告和其他材料——所有材料都应报送“苏共中央”，也就是报送由契尔年科主持的总务部。然后再由总务部的无名官员决定上报材料的命运：大部分是扔入字纸篓，另一部分则转发给党中央的一至两个部，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学者们的劳动成果才能冲破重重关卡到达领导的手里。自然，这种情况学术集体很快就感觉出来，这样一来甚至促使学者们积极工作的道德动因也被打消了。更糟的是他们已不仅不再写报告，而且连想也不去想了：既然你的想法谁都不需要，还有什么必要去费这个心？——原注

此，参加这项工作的经常是所里的一批为他或往往是“替他”写作，并得到他信任的主要研究人员。在写作时展开争论的过程中(我在1962—1964年间也不止一次地参加过这些争论)，往往会产生出很有意思的思想。其中有一些思想写进了文章，而另一些思想，正如我们估计的，阿尔祖马尼扬也总能找到机会转达给领导。

尽管所有这一切离新的政治思维，尤其是现代新思维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毕竟有助于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解决。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不景气、西方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等等武断的说法被抛弃了，一些新的概念，如现实的西欧一体化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化等等，被确立起来并在政治领域中得到了传播。也逐渐产生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论，树立了对统计学和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较为客观的态度。正是在那个时候提出了这些经济理论具有双重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和批判功能）的论点。在这个论点的掩护下，尽管很困难但仍出版了由阿尔祖马尼扬撰写长篇序言的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

当然，研究所的工作也有严重失误。阿尔祖马尼扬，以及据我所知还有他的一部分研究人员，也都陷入了50年代下半期的盲目乐观情绪里。他们不仅没有力图使领导回到现实中来，而且还支持领导上的幻想，认为苏联在经济上会很快赶上和超过美国，并随后建成共产主义。这些幻想后来写进了苏共纲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被尖锐批判甚至挖苦嘲笑的目标。我认为，在这种盲目乐观中，除了因新政策取得初步成就（这种成就的确有过）而陷入某种陶醉（我不想用“冲昏头脑”这个名声不好的词）外，斯大林时代的沉重残余也是起了作用的。这些残余表现为：一方面是有关本国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知识水平非常之低，对自己的社会和现实问题之多了解极差，另一方面是害怕同领导上争论和使领导上不快，总愿意对领导随声附和，做些使他们高

兴的事，说些使他们愉快的话。遗憾的是，就是阿尔祖马尼扬及其同事们也没有摆脱这些缺点，而在那些势力更大、地位更高的人身上这些缺点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主要的方面，研究所及其首任领导人在使我国社会思想和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部门从长期昏睡中苏醒过来，从教条主义麻木状态中觉醒过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完全弥补了他们的缺点。在这方面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似乎成了新一代国际经济学家和一部分对外政策专家的“孵化器”。经过研究所这座熔炉锻炼的人，后来在我国学术界，部分人还在政界担任了要职。此外，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还好像是个树根，从这个根上逐渐地发芽形成了科学院的一批研究所——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

所有这一切总合起来意味着在发展我国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当然，这一大步不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而是就当时的实际历史过程和政治过程来说的。在这里，我想再一次引用佩夫兹纳的，在我看来是非常细致的观察。他写道：“从现在的立场回顾过去，可以这样说，最近几年，在理论、意识形态和政策（对内对外政策）领域里已有很大进步，可是在经济领域却还没有显著的进展。而在那些岁月（50 年代下半期到 60 年代初），一切都是‘相反’——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农业和住宅建筑业中）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可是在对外政策上则是忽冷忽热，危险摇摆（从戴维营会谈[①]到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至于说到意识形态和理论，那么在这方面仍保留着

---

① 指 1959 年赫鲁晓夫成功地访美，当时产生了将会很快结束“冷战”的希望（遗憾的是没有能实现）。戴维营是美国总统的郊外别墅，基本会谈在那里进行。——原注

斯大林遗产占统地位的局面……”

情况的确是这样。所以当时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创造性思想的“绿洲”，而且进行着活动，这一情况就显得更有重要意义了。阿尔祖马尼扬建立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属于这种“绿洲”。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及其主编鲁缅采夫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总部设在布拉格。这本杂志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合资的事业而创办的。我很难估计这本杂志在推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加强相互谅解方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想是起了积极作用，因为杂志在一定程度上对制止消极的东西起了促进作用，帮助共产党人养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能持宽容态度，持宽容态度的艺术长期以来对他们已成为十分遥远，甚至遭到蔑视或禁止的东西。在当时客观条件下要想做更多的事恐怕也不可能，因为杂志是 1958 年才创建的，而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的“大分裂”开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情况太复杂，甚至太严峻了。

如果我肯定地说杂志是创造性思想的“绿洲”，那我首先是指它对我国和我党所起的作用。在评价这个作用时，是不能用评价教科书或研究所的那些标准来衡量杂志的。这本杂志至少在我最熟悉的那个时期（我 1960 年到 1962 年底在那里工作）没有提出过新的理论概念和新的政治思想，虽然它也登载过不少从中能找到新概念新思想的有价值的文章。但杂志刊印的材料的总的体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学的——与当时我党和绝大多数其他共产党的理论性和政治性杂志的体裁稍有不同。苏联读者都积极主动地找这本杂志来读。因此，总的说来，它在形成对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问题（历史上这些问题对我们非常重要）、国际政策问题甚至马列主义理论问题的新看法新观点上是起了促进作用的。所有这一切本身也已经是有益的了。

但是，我觉得，这本杂志还成了培养理论和政治骨干的学校，这也是它为我国社会政治思想的解放及后来的发展作出的相当重要的贡献。这些理论和政治骨干后来肩负着虽吃力不讨好但极其重要的使命——在赫鲁晓夫领导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阻止理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滑坡和倒退，还要参与架设某种介于苏共20大和改革之间的智能桥梁和跨越停滞深渊的桥梁，同时还要参与修建防止斯大林主义的反扑的街垒。不仅如此，很多当时在杂志社工作过并在杂志社这个集体里思想上政治上成熟起来的人，很荣幸地为准备和形成改革和政治新思维的理论基础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首先是苏共20大创造了总的政治和精神环境。其次是归功于主编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鲁缅采夫个人。他愿意并且也不害怕吸收有才能的创作人员到杂志社来工作，随时准备保护他们，克服保守派的抵制。保守派对杂志社苏联部的看法完全不同，把它看成是当时党中央机关的延伸，因此总是力图把大量平庸的党员塞进编辑部。

虽然如此，鲁缅采夫还是得以在杂志社邀集了数量多得惊人的很不错的、后来证明是有发展前途的人（我说的是开头几年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些人，因为杂志编辑部在布拉格，在那里工作是临时出差，所以工作人员经常变动）。在这些人中间，我想提一下：A·C·切尔尼亚耶夫，Г·X·沙赫纳扎罗夫（有趣的是，由于命运的安排，这两位在做了几乎30年政治理论工作之后，当上了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并在理论和政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过由于我们的传统都是不署名的）。

当然，要造成这种境况，为同志式的无拘束的关系保证条

件，仅仅把一些不错的、有才干的人邀集在一起是不够的。为此还需要一个条件，这就是保证言论思想自由（当然是在合理的、为那还不轻松的时代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消除长期以来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第二天性的为自己的言论（写出来的和甚至是说出来的）、思想和情绪担惊受怕的心理。为了营造这种环境、这种氛围，鼓励创造性工作，保护成为攻击目标的人们，[①]鲁缅采夫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过去，鲁缅采夫曾在社会科学界和党中央机关担任过重要职务。他是在斯大林晚年进行的经济争论时出的名：鲁缅采夫的著作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因而也就被委派担任刚设立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这个领导职务，后来当上了《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而从这里被派往布拉格。

我不准备来评价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知道在老一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中间，能像他这样认真地接受苏共20大思想并成为为实现这些思想而奋斗、而且有很大勇气的战士的人，却为数很少。我在这里提前说一下，在苏共中央（1964年）十月全会之后，他担任了《真理报》的领导并且表现十分出色。他写的一篇文章《论知识分子》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的上级对此十分不满。为此就将他调到苏联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可是没有多久保守派就把他从这个岗位以及从由他创建的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岗

---

① 我自己曾得到过他的支持。1960年初当我同意去杂志社工作时，我的上司康斯坦丁诺夫就进行阻挠（当时我在《共产党人》杂志社工作，而他是主编）。他采用的方法是他那一代人所惯用的方法，他给党中央的负责干部打了一个电话，说了我不少坏话。他说我政治立场不稳，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中表现不成熟，受到了修正主义的影响，不应把我派往国外。鲁缅采夫获悉了这段谈话。他要求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审查一下杂志社党的会议在我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对我提出的指责的讨论情况，并作出一个会议记录。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康斯坦丁诺夫没有出席那次会，而我得以被派往布拉格到杂志社任职。从此开始了我与鲁缅采夫的终身的个人关系，后来我也有过给他提供帮助的机会。——原注

位上排挤下来。

鲁缅采夫在杂志社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前面指出的，他营造了富于创造性的“自由”氛围（当然，我们全体当时的年轻工作者在这方面给了他大力帮助)。我不知道，他是否完全理解这种氛围对于同他一起工作的人的智力成长和政治发展的意义，但重要的是要看结果。除此之外，他还简直是个大好人，是个正派的正直的人，对他来说，在自己周围营造这种环境、这种自由思想的“绿洲”在我看来，是他天生的愿望。当然，这种愿望也不是毫不费力自然而然地实现的。

在杂志社的苏联部，也有着（在那个时候也不可能没有）完全像斯大林时代苏共中央工作人员那种人，而且都担任要职。他们想在那里营造完全是另一种对他们合适的气氛。杂志社苏联部党组织书记、苏共中央某部副部长 И·T·维诺格拉多夫在这方面起了特殊作用。在他以及一小批支持他的人（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同莫斯科中央委员会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大部分苏联编辑人员之间，实质上是由对 20 大方针的态度而造成的政治上互不信任不断增强，直到爆发公开冲突。公开冲突的最高潮是党组织的改选大会，会上维诺格拉多夫遭到尖锐批评，并且丢人地彻底落选。鲁缅采夫没有站到他的一边，而在内心里是支持批评他的人的，这样也就决定了冲突的结局。我想，在这方面鲁缅采夫同莫斯科之间可能有过不愉快的谈话。

由于这样解决了内部矛盾，毫无疑问杂志得到了好处。政治导向更明确，编辑部集体的环境更宽松了。

我再重复一遍，杂志未必能对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势有明显的影响，尽管它是关心国际事务的人们的有益的辅助读物。可是，杂志帮助了相当一批较年轻理论工作者和政治工作者成长为能用更宽广和更开放的眼光去看世界，看其他国家和国际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看政策的人。因为我们大家是在同外国

共产党人经常接触的情况下工作的，参加对他们写的文章的讨论和编辑，所以学会了不仅分析本国的问题也分析他们的问题，学会了理解别人，而主要的是懂得了你不可能垄断真理，而且还存在着其他观点，不一定要同意这些观点，但不能不考虑这些观点。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基本的和很自然的事。但是你不能忘记那时我们还刚刚开始，而且是痛苦地从斯大林主义的精神枷锁中摆脱出来。从这点上说，这本杂志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培训基地；接触不同的观点是有其成效的。确实，在杂志社工作的人中间很多人不久就担任了党政重要职务或从事理论工作。

安德罗波夫和他在党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的咨议员们

从30年代后期开始，党中央同克格勃分享着最高的政治权力，而斯大林当然凌驾于它们之上。斯大林去世后，克格勃虽然还保留着某些控制，但已不能同党抗衡。党中央成了整个权力结构的核心。

人们在报纸上可以读到许多新的法律的文本、给某些人颁发勋章和奖章的命令、政府关于农业和教育或工业的决定、甚至有关政治逮捕和审讯的报告，等等。但是只有熟悉内情的人才知道，所有这些法案事先都是由党中央的政治局或书记处作出决定，并由一个全能的机关起草的（经常也是由机关建议的），在成千的党的官僚手中集中着巨大的权力，尽管没有一个法律中提到过他们的名字。

按照老的规矩，我不可能梦想到党中央这块“圣地”去工作。我父亲是个犹太人，而且曾作为“反革命”被逮捕过。我还有某种修正主义者的名声，这意味着我的思想和言论是不够正统的，或者不是严格地“同党一条心的”。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我所

不知道的问题。当安德罗波夫提议我到他主管的党中央的部中担任重要工作时，曾同克格勃的人事部门发生过一些麻烦，但他克服了它们的反对意见。我想没有库西宁的支持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库西宁那时仍是党中央的书记和政治局的委员。但是为什么安德罗波夫的人要我去党中央机关工作呢？我已说过，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上台后的头几年中，领导人对社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并不感到有多大的需要。

50年代后期，由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外部困难和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恶化，这种观念改变了。很清楚，我们不能简单地靠发命令或让克格勃去解决出现的所有问题。领导上认识到原先的方法已不适用，发号施令的做法不仅无效而且有害。领导上也懂得了，在已经开始的论战中需要极其周密地对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论据进行推敲。当然，也就需要更周密地起草有关文件和准备发言材料，以便使它们对国内和国外的公众更具吸引力。

原先的班子无法满足这些需要，因为它适应的完全是另一种时代、另一种秩序和职能。这就迫使苏共中央国际部和联络部在60年代一开始就设立咨议员这个对苏共中央机关来说完全是崭新的职务。在中央这两个部里都由这些咨议员组成了所谓分部，1965年又改称为咨议员组（按中央机关干部级别，咨议员相当于处长，而咨议员组组长相当于副部长。这从各方面来看已是相当高的职位）。这方面的新颖之处不仅是这个组的称谓和职能（实质上仍是研究性质的），而且是多年以来第一次聘请相当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参加中央机关的工作（后来在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和其他部也建立了这种咨议员制度）。起初，咨议员们在中央机关显得与众不同（至少在外表上）。但由于这方面的需要量大而且迫切，国际部和联络部两个部长又想找一些优秀人才，因此在这些人中间也就不乏当时党组织完全生疏的甚至深恶痛绝的

“有自由思想的人”。

我是1964年5月被聘到安德罗波夫部里当咨议员的，一直工作到1967年年终。我可以说，由他招募建立的这个咨议员组是当时最出色的创造性思想“绿洲”之一（也就是从1961年建立这个组起到1967年安德罗波夫由中央委员会调到克格勃为止。他的调动彻底限制了中央联络部咨议员组进行工作的条件和所能发挥的作用，甚至改变了它的实际地位）。

我是1958年经库西宁介绍就认识安德罗波夫的，库西宁在卡累利阿工作期间就对他非常了解。后来，我们多次在完成各种写作任务时相遇。为了参加写文章，我曾不止一次地从布拉格被召回莫斯科，而回莫斯科后，我执行这些任务的时间要比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做本职工作的时间多得多。因此在调到联络部的时候，我对安德罗波夫及其咨议员们已经非常了解。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之外，如果不讨论一下党中央机关干部那时候的生活方式，对他们形象的描绘将是不完全的。许多人主要是由于受追求权力和进入一个特殊圈子的思想的驱使而进入中央机关的。在封皮上印着苏共中央委员会字样的红色工作证就是属于这个圈子的证明。这种工作证被称为“随处可去的通行证”，拿了这个通行证你几乎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很难说人们对党中央的干部主要抱的是什么态度，是尊敬，是拍马屁，还是恐惧。人们从幼年开始就被灌输要对执政党的成员表示尊敬的思想，因为党一直教导我们要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时代的光荣、智慧和良心”（这是印在党证第一页上的列宁的话）。掩盖在这个表层底下的却是恐惧和奉承。

党中央高级干部的工资不算太高（当时每月工资在270—600卢布之间），但是那只是他们实际所得的一部分。我最初的工资是每月400卢布，只比在研究所和报社里职位相同的人的工资略多一点。但是我的职位还有很多津贴。每年我们去休假的时

候，还有额外的一个月的收入，此外，每年还有同样数量的一份奖金。政府还支付70%的去休假地的费用，并为我们的夫人支付50%的费用，外加旅费开支。总起来，这些费用约占我们工资的20%。

高级机关干部的主要津贴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食堂（作为一种伪装，它的官方名称是"医疗饮食食堂"）。每个月的中饭和晚饭餐券官方定价为140卢布，但我们只需付一半的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那个食堂吃饭，人们用他们的餐券到那里去买各种食品，买到的食品供他们的全家食用还绰绰有余。那个食堂出售许多最昂贵的食品包括鱼子酱、高级鱼类、由专门工厂生产的质量大大超过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肠以及上等的高级糖果和水果。当我第一次把我的4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10%，而普通的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60—70%。此外，党中央还有一些很好的咖啡厅和许多得到补贴的小食部。

住房是我们得到的第二项主要津贴。和党中央的所有干部一样，我的住房权利是严格按我的职位来定的。过去好多年中，我曾同我的妻子、儿子和岳母同住一间180平方英尺的房间里，并同其他十家（总共43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两个卫生间。现在我第一次得到了有一个卧室的单独套间。我记得我的妻子和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能相信我们的好运气，常常夜间醒来在套间里走走以便确信我们不是在做梦。后来当我的职位得到升迁时，我们搬进了有两间卧室的套间，再后又搬进有三间卧室的套间。所有这一切，对一个不是党中央干部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得到的。

医疗照顾是第三项津贴。给党中央干部看病的医生比普通医院的医生要高明得多。党中央的医院有最好的设备、药品和舒适

的病房。党中央还在全国最好的地方有一整套疗养所和休养所网。

还有许多其他的福利补贴。例如，每个周末你可去莫斯科郊外的一个修养地，只需象征性地付点钱（当时是每人每天一个卢布）。在夏季，你甚至可以付很少一点钱在修养地租用一个大套间。党中央还设有缝纫铺、修鞋铺、专门的机票和车票订购处以及其他许多服务设施。

所有福利都是严格地根据职务的高低来调配的，包括你的套间和别墅中的房间的多少，你能住进哪栋楼或去哪个修养地，去哪个门诊部或医院看病，到哪里去休假（达到一定级别后，你就可以带夫人出国旅游，最初可去东欧国家，后来也可去一些西欧国家或古巴等国）。使用汽车的情况特别复杂。每位部长，我想还有第一副部长都有一辆专车和两个司机。其他副部长和相当于副部级的干部可从车队要车。职务更低的干部则只能在工作时间和为了公务要车，如果要去克里姆林宫食堂买东西，则必须两三个人共要一辆车。

当我到党中央机关工作时，在那里可看到两种明显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种是过去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在战争前后提拔起来的那批干部，文化水平比较低，在他们身上还有过去的禁欲主义行为规则的残余。这批人穿着一般都很单调，都用一个调子讲话和思考问题。他们对人总是哼哼哈哈，守口如瓶，小心翼翼地把任何感情的流露都掩盖起来。他们几乎都参与过谴责无辜者和对人进行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的种种活动，因而他们彼此之间不论有多大的矛盾，也总是互相支持。

另一种是党中央新来的干部的生活方式。他们可分成两批人。年轻人中的大多数是通过机关上来的干部。他们从共青团开始，沿着机关的阶梯往上爬。我很不喜欢这些人，他们所看重的

只是各种有用的关系（他们很容易搞到这些关系），除少数例外，他们都是一些玩世不恭的和没有原则的追名逐利之徒。他们同他们的老同事们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同西方有一些联系。你不能说他们很有文化，但他们所受的教育比那批老的干部要多，思想也更开放。

当第一批知识分子出现在党中央机关的时候，他们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后来却不得不把这批怪人当作主要力量。

这批知识分子和年轻的名利之徒的到来改变了党中央的生活方式，甚至在工作时人们除谈论工作和足球外，也开始谈论政治、艺术和文学了。党中央干部的交往圈子也扩大了，许多人同“自由思考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建立了经常的但又是小心翼翼的联系。他们的衣着也是不同的。

新一代的机关干部使上面的头头们对下面干部的个人生活问题变得更加容忍了。离婚或再婚不再必然会导致解雇。

我相信所有这些变化对后来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是有明显影响的。首先是使得党中央委员会和整个中央机关这个金字塔的塔尖不显得那么神秘了。

革命以后，由于我们的困难的生活条件，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极权不仅仅是收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上层的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

那时候，布尔拉茨基是党中央联络部的咨议员组组长，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他的生涯并不很走运。在咨议员中，有鲍文和沙赫纳扎罗夫。鲍文后来成为很有名的政论家、记者和政治人物。沙赫纳扎罗夫在社会科学、政治和文学方面都很有成

就，但是他的著作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例如，在1968或1969年，他的一部科学幻想著作的清样被编辑送交党中央审查时，交到了苏斯洛夫手上。苏斯洛夫看了大为生气，结果沙赫纳扎罗夫被逐出党中央机关达数年之久。与我同事的还有三个人，一个是经济学家博戈莫洛夫，他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有名的政治人物。另一个是希什林，他是一个政治学家和政论家。第三个是格拉西莫夫，他后来成为外交部的发言人。

在政治上，他们都反对斯大林主义，支持民主改革，主张在文化方面采取较为自由的政策，也希望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在这点上他们都是一致的。那时候，这一政治纲领有一个代号，就叫20大方针。他们的那些政治观点，在不久以前还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异端邪说，现在同20大联系起来也就成为合法的了。

我们这些咨议员的个性都很丰富多彩，特别是鲍文，他后来成了我的亲密朋友之一。我是1958年在《共产党人》杂志社工作时第一次认识他的，那时他几乎是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哲学研究生，刚被请来参加工作。从他的经历来看，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寻常的。那时他已经30岁。他曾取得罗斯托夫大学的法学学位，并在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区里当过法官。后来，他升任党的工作，成为党的区委书记。在他面前打开了在党的工作岗位上升迁的光辉前景。可是他却决定到莫斯科去当一名哲学研究生。与此同时，为了弥补他的知识中的空白，他又报考了有名的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当一名函授生。

鲍文为人聪明，坦率，有独立思考能力，甚至在赫鲁晓夫"解冻"的年月里，他的不少思想听起来也像是异端邪说。他很爱生活。他爱吃，而且吃得很多，成了一个大胖子。我很少遇见像他这样一个喝上一两杯酒就能推心置腹地深入交谈的伙伴。

但是，鲍文确是一个非常有知识和工作非常勤奋的人。他也

曾遇到过麻烦，有时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更多地是由于他的非正统的观点。例如，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他曾多年失宠，原因之一，就是他在 1968 年批评了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保守派和斯大林主义者一直恨他。他被逐出党中央机关后，到《消息报》当评论员，又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记者。后来勃列日涅夫又把鲍文召回去为他工作。

鲍文有成为我们的一个杰出政治思想家的潜力。但是，当时的体制不需要他，也不能容忍他。这对他和对我们的制度都是一个损失。

安德罗波夫作为苏共中央书记，在自己周围建立了这样一个由一批有才能的和比较能独立思考的人组成的咨议员组，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他的确感到有此需要，并经常花很多时间同咨议员们在一起工作。他是在工作，而不只是给大家布置任务。在遇到复杂情况时（而这种情况当时相当多），几乎每次当工作进入结束阶段，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总是聚集到安德罗波夫办公室，大家脱下上衣准备工作，而他也拿起钢笔，大家就这样开始集体创作。这种创作方法对参加者是非常有意思的，通常也是很富有成效的。在工作过程中，常发生激烈争论，而这种争论又往往涉及到其他不相干的但又总是重要的话题。总之，如果用科学院惯用的语言来说的话，这些工作变成了引人入胜的理论和政治研讨会。这种工作方法对我们这些咨议员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想对安德罗波夫也一样，否则他根本就不会采用这种方法了。这是一批第一次冲过党的机关干部的“铁幕”向权力中心突破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仍然只能充当顾问或咨议员。我们在这个部里做了些什么呢？大多是日常的工作。我们起草各种文件、党中央的决议草案、提交领导人的各种参阅材料和领导人的各种讲话等等。

我们在这样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些什么呢？首先，这项工作

使我们懂得了政治过程的内部运转情况。因为我们接受的任务照例与抽象理论不搭界，而是与政治有关。同时，安德罗波夫善于从政治上（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公式化地和宣传式地）思考问题。通过安德罗波夫去了解政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安德罗波夫是位不寻常的人，不仅很有智慧，而且有搞政治的特殊天赋。他不向意识形态屈服，他讲究务实，要求的是实际结果。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正式教育（只读过内河航运技术中专!），可是他读过很多历史、文学和哲学著作，知道的东西也很多。在知识渊博这一点上，无疑他超过他在领导层中的其他同事，包括那些从高等院校毕业，或至少上过高级党校的同事。此外，他还多才多艺，而依我不在行的看法，他诗歌也写得很好，还有音乐天赋，他唱得不错，还会弹钢琴和吉他。

同时，我想，安德罗波夫从自己同咨议员们的谈话、讨论和争论中，在和他们一起工作时，也吸取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因为在那些岁月里，党的高级干部的交往圈子是极其狭窄的，通常是非常乏味的。这个圈子基本上只限于一些同级的党的高级干部，再加上一些个人的朋友（说老实话，我形成了一种印象，即从斯大林时代起，不同“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交往成了上层人物一条不成文的行为准则；依我之见，这个准则的生命力比它的创始人还长久)。

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他充实了自己的知识——不仅充实了学术问题上的知识（部分咨议员在这方面是相当有学问的），而且增加了许多书讯知识（本国的和外国的新书）和有关文化动态及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最后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这种日常工作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为安德罗波夫开辟了获得关于日常生活信息的重要补充渠道，成了了解非正统看法和意见的源泉，也就是说这正好开辟了获得恰恰是我们领导人最缺乏的信息渠道。

安德罗波夫充分地获得了这一类信息，因为他一开始就定了（而且时不时地反复提及）一条规则：“在这个房间谈话，要开诚布公，要绝对敞开思想，谁都不要隐瞒自己的意见。一出这门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那时就得按通行的规则行事！”

因此，我们都遵循这条规则，公务之外尽量不说不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有什么事不对安德罗波夫讲，或者不直率地讲，那只是一些小问题和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我想，我们同安德罗波夫坦诚交谈，包括谈那些“难题”，如民族问题、知识分子的不满、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那些内外政策，是我们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事们和我都把这看成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将信息或想法上达给领导的少数渠道之一。至于说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他给我们讲得很多，当然不是什么都讲。而我们也不会奢望他这样做。他总是耐心地听我们讲，甚至耐心地听他可能不爱听的事情，而我不记得他有过仅仅因为他不爱听而打断某个人讲一个重要问题的情况。他对所听到的东西常常不加评论，不作反应，那是另一个问题。而有时为了摆摆样子，他也会维护一下正统路线，实际上他本人也不大相信它是正确的。我们知道他发表这些言论是因为情况要求他这样做。有时候我们甚至感觉到，他担心在他办公室可能安装了窃听器，他表示支持正统路线只是为了防备窃听。

所有这些都是触动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的心弦和回忆的。的确当时是很有意思的。安德罗波夫和咨议员组的努力究竟对苏联的政治思想和对政治本身的进化提供了哪些有用的东西？

我想从我们直接研究的问题，即从同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我将仍使用当时通用的术语）的关系讲起。如果根据 1989 年发生的事件来看，当然就难讲 60 年代上半期所做的事情对这些事件有什么“好处”了。不过，我想当时我们毕竟还是得以避免了某些我们不久就遇到的问题。例如，安德罗波夫本人和咨议员组在

争取放松指导我国同东、中欧国家关系的强硬路线原则上就起了促进作用。我指的是那种观念，即认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我们享有特权，可以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最少也能指导和教训别国，强迫它们在所有方面照搬我国的榜样。这些观念甚至在 20 大之后，60 年代中期依然是很多苏共的工作人员，首先是苏共中央机关（包括安德罗波夫领导的联络部）工作人员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我们曾竭力推荐另一种观念以取代这种思维方法，即要尊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经验，对背离我国榜样和现行一切的做法持宽容态度，理解将关系建立在考虑相互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的必要性。当然一切都只能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向我们表明这些限度是很狭窄的。

限度何在？我们能把限度推到多远呢？在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曾经是两种相反思想和政治主张的人相互较量的战场。我们力图尽可能扩大这种强加于人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则的限度。我们意识到过度强硬的控制更易引发新的爆炸，而放松那些“原则”使我们在国内也可取得更大的灵活性和行动自由。

那时候，即使是我们中间最勇敢的人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提出每个卫星国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完全自由的问题。尽管我们提出的建议是细小的，但在这方面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劲。不过我想，在这几年里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诚然，不是去和应该做的比，而主要是和过去做的比）。

如我们提出了（虽遗憾的是，还远不是解决）关于摈弃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心态和传统的必要性，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的问题。

还有我觉得苏共中央联络部在那几年对其作出一定贡献的另一件事是，对对外政策和对同西方的关系确立了较为现实和较为广泛的看法。巩固和论证了对和平共处的新态度——指出和平共处不是策略，更不是宣传和暂时的喘息，而是现实的可能和必

要，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绝不会取消这种可能性和必要性。

接下来要讲的，我认为特别重要，这就是在“赫鲁晓夫时代”，由于大踏步地倒退和对斯大林主义的让步而暗淡没落的时候，以及在苏共中央（1964 年）十月全会之后政治路线开始动摇不定的时期，我们和其他支持 20 大方针的人们一道尽力设法利用各种可能性以保住这个方针。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制止已开始的政治上的逆转，那么也至少得以使之逆转得慢一些。

当然，我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这种影响力是存在的。当时的政治斗争已进入了所谓激烈的阵地战阶段。那时即使由于领导人在他们的文件和讲话里提及某些“关键”词和政治概念（如“个人迷信”、“20 大”、“和平共处”等等），也会决定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上进行的那些搏斗的结局。有时它们会影响到政治上的决策，有时则仅仅影响到一些书、文章、电影或剧本的命运，但是它们总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和精神气氛。当然，我们总希望安德罗波夫能将我们共同提出的主张和论据传达给领导，并引起他们的注意。

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后面较详细一点地阐述。在结束关于使社会思想在那些不简单的岁月里得到发展的基地和“绿洲”的话题时，我要再重复说一下，我所提到的只是我曾在那里工作过并同它们休戚相关的那些“绿洲”。无疑，那时还存在有其他“绿洲”。关于那些“绿洲”的情况，我希望由对它们比较了解的人来撰写。

在评价这些“绿洲”的作用时，我当然不会认为，在斯大林统治下已变成荒漠的社会政治思想界已在这些“绿洲”的影响下生气勃勃地复活起来，变成了百花盛开的花园。很遗憾，这种事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相反，环境很快就开始变坏，创造性思想界又遭到限制，遭到迫害。尽管这样，这些“绿洲”的作用

不应低估。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绿洲”里发展起来的思想，毕竟使我们社会的智能气氛活跃起来并跟上了时代，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撒下了种子，多年以后这些种子发芽成长，将可能在改革年代里起到重要的作用。

五、中国吹来的风

我们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谈论相互依存乃是当代世界社会和国家生活的一个特点。但是，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现象早就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影响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据此，我曾讲到过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对苏共20大所造成的我们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而波匈事件本身也受到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的巨大影响）。我在后面还要继续谈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对我国国内事态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总的来说，无论是波匈事件的影响，还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人们已经写了很多，而对于上述事件的目击者来说，很多事情他们早就亲眼目睹，无须更多地解说。可是“中国因素”对我国的影响就很少引起注意，尽管这种影响有时相当大而且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例如，毛泽东对苏共20大作出反应时，曾提出“百花齐放”的口号，那时我们很多人似乎觉得，这是指在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中允许意见多元化和可自由地表达与坚持意见，所以这在我们党内和国内不仅受到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而且也受到所有支持20大的人们的热烈拥护。可是，斯大林分子进行了报复，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让“百花”齐放后就开始铲除

它们，整个事情似乎变成了一种陷害。不过50年代下半期中国的“百花齐放”和其他事件还没有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没有尖锐地和直接地触及到我国政策的主要方面和政治纲领本身。

60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同中国的争吵和冲突成了现实。不仅如此，苏共与中共之间开始了尖锐的（有时是残酷无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这种斗争也就很快扩展到整个国家关系上。这场冲突和所展开的斗争成了60年代和70年代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值得专门研究。苏联和中国终究是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从冲突的起因（和每一方错误的程度）角度以及从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复杂时期的关系史本身和这种关系对世界形势的影响的角度去研究。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这场冲突对我国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些分析。

毛泽东在对苏联领导人进行的政治斗争中，把对我国内部事务施加影响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他的纲领是一个好战的斯大林主义纲领，为斯大林辩护，认为斯大林政策中最令人厌恶的方面具有历史合理性，把暴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当作主要政治工具而加以神圣化。这个政治纲领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和“伟大舵手”的语录本就足够了。他还坚决为战争不可避免论辩护。最后是毛泽东的达到荒谬绝伦的个人迷信。

可以想象，毛泽东提出这个政治纲领，主要目的是为了国内的需要，如加强个人专权，分散人民的注意力，巩固自己的权力等等，但显然也意在将这些观点输出到苏联。他们要求我们放弃20大方针，公开“悔过”和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冲突发展得如此迅猛，以致于造成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某种危险的印象。但应该顺便谈一下，从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我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计划过进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可以同样肯定，中国

也没有计划过要进犯我国。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那时候碰到了现实的政治威胁和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不理解两者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情况。这就把同中国的关系问题推到了首要位置。

既然中国成了敌人，它所推行的全部政策自然就被认为是声名很臭的。很自然，在1962—1964年间，中国因素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加强了20大支持者的阵地。事态的发展是，同中国的冲突对从1962年末起经常返回到斯大林主义的赫鲁晓夫的政策倒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中国的争论，给反斯大林主义者提供了一种机会，使他们在维护我们的政策时就许多在当时已成为禁区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公开发表意见。这个难得的机会特别可贵，因为当时我国各级领导几乎一致地开始把对民主改革的呼吁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压下去，而鼓励相反的非常保守的路线。

同中国人的争论所造成的这种形势在文学、艺术、科学、社会理论和政治方面都带来了新的机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过长期斗争之后终于发表了。这不仅成了文学上的事件，而且也在学术界和史学界有所反映。再如，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著作《让历史来审判》正是在这个时期送到一个出版社的。[1]在社会上又重新开展了，甚至是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开展了关于斯大林主义等政治问题的争论，而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主要问题。

这不能不使保守派惊恐起来，而他们很多人仍处在领导岗位上。1962年11月底，他们利用在莫斯科练马场办的美术展览会策划了一次名符其实的挑衅事件。这次活动的主谋（除了当时的

---

① 顺便说一下，不久咨议员组也收到一份这本书的原稿。我们想帮他出版，但没有成功。——原注

美术协会领导人外）是在中央意识形态部主管文化工作的波利卡尔波夫和实质上是主管这个部的当时的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伊利切夫。

这件事的实质大家都已清楚，关于所发生的一切，作为这个活动的直接受害者的艺术家们也已写了不少。在事实方面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只是要说一下，就在这个基本上是正统的、符合官方审美观和方针的展览会开幕的前夕，有人通过花言巧语、威迫利诱的办法从一批享有“左派”、“先锋派”甚至“抽象派”声誉的艺术家那里弄到了他们的作品。用这些作品连夜加班在练马场二楼布置了一个陈列厅。策划这个阴谋的人是知道赫鲁晓夫的口味的，知道他容易冲动和脾气粗暴，他们指望他当场发怒。

他们没有算错，正是按照他们的打算，赫鲁晓夫当场大发其火。一个面临着许多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大国领导人，由于受到一批艺术作品的政治内容的冒犯而对全国大发政治雷霆，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段历史标志了国内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势发展中的一个十分明显的分水岭，开始了非常明显的向右转。诚然，我应该说，直到今天我仍怀疑，当时“左派”和“先锋派”的绘画和雕塑作品是否是赫鲁晓夫发这样大的火的真正原因（而且这火发了很久，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虽然被展览会触怒，可是他的愤怒和大发雷霆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题发挥，是故意夸张的。很可能他担心他在22大以后向左“转”得太远了，而想找个借口返回到比较正统的政策上来。我认为，这完全是他惯用的手法：操纵政治犹如逆风驾驶帆船，需要急剧地抢风转向。

但在对外政策上也发出了同样的恶毒语言。在1960年巴黎最高级会晤前夕，我是一名记者。当时我问自己，赫鲁晓夫将带什么方案去巴黎？他将如何实现几个月前访美时自己所燃起的希望？当5月初发生了有名的美国U—2间谍飞机事件，我们逮住

了美国飞行员鲍威尔时，他发表了一通愤怒的言论。我确信，这种不满的爆发（尽管这事件本身给我们提供了作出尖锐反应的充分理由）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装出来的。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抓住这个事由来作为躲避进行严肃会谈的借口，他对这次重大的最高级会晤没有做任何真正的准备，这一点在后来的几年里可看得更加清楚。

让我们回到所谈的话题上来。很难说，赫鲁晓夫真正想的是什么。不过，在这个惹祸的展览会之后，国内的意识形态情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各地此起彼伏地掀起了批判运动，形成了类似1956 年末至 1957 年初的形势，甚至比其更糟的形势。而且事情绝不仅仅局限于造型艺术界和文学界。这种“拧紧螺丝钉”的习惯做法推广到了非常广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战线。人们以忧虑的心情等待着预定在 1963 年夏天召开的专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苏共中央全会。仍旧是那位伊利切夫被预先确定为向全会作报告的人。他在这个时期发挥了疯狂的主动性，据很多知道内情的人的看法，他指望在全会上成为中央主席团委员或至少成为主席团候补委员，通过这个途径来超过自己的竞争对手（其中首先是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全会的任务，非常明显只可能有一个，即在意识形态上加强压制，而在筹备全会的过程中党中央机关的起草班子已在努力把苏共 20 大上，甚至在不久前召开的 22 大上提出的问题置于不受公众注意的位置了。

正好在这几个月里，甚至在全会召开前的几周里，“中国因素”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恰恰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消除了这个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宫廷政变”的图谋，使得我国意识形态生活重新（是重新，遗憾的是，不是长期）回到非斯大林主义时的道路上来。

1963 年年中，苏中关系的事态发展得非常迅猛。我不排除，这些事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国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以及某些国际

事件所促成的。但是，我认为多半也是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由于中国展开的内部斗争的逻辑和需要。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文化大革命”，其领导不能不对苏共20大和22大进行攻击，不能不起来为斯大林、为斯大林秩序以及个人迷信的“制度”本身辩护。

1963年6月14日，正是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苏共中央全会在莫斯科开幕的前夕（全会预定在6月18—21日进行），中国公布了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全面攻击苏联的政策和苏联的领导，当然也包括苏共20大和22大。苏联领导把这理解为公开挑战，理解为中国领导人完全不准备同我们和解的证明。

这封公开信是在两党代表举行盼望已久的正式会谈之前出现的。当全会的与会者了解了中国公开信的内容后，苏中争论自然成了全会讨论的中心问题，而不再是抽象派和文艺工作者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再是伊利切夫关于意识形态的发言中专门阐述的那些话题（当然他也不得不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临时调整发言的基调）。意识形态专家们的“大阴谋”也就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真正重要的国内生活和国际关系问题，重新成了意识形态生活的中心。这些问题是：反对核威胁、争取确立和平共处原则和裁军（裁军是个迫切的但需要论证的问题，因为赫鲁晓夫为了腾出资金来解决特别尖锐的国内问题，采取了单方面裁减军队的措施）。还有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加强法制、发展民主、提高苏联人的生活水平等问题。

当这些问题不仅成为国内讨论的对象，而且成为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卷入其中的国际大争论（这恰恰发生在1962—1963年）的对象时候，很明显必须对在争论中所涉及到的问题进行更周密的理论加工。尤其是赫鲁晓夫最初对此抱的态度太轻率，说话太随便，使论敌有了可乘之隙。

而这就意味着，苏共中央机关理论工作者，首先是它的两个国际部及其咨议员们的“灿烂时刻”到了。当时我还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可是大部分时间是完成中央委员会委托的任务（我当时已收到调往中央担任咨议员的正式调令）。这样一来，我被正式任命为苏共中共两党代表会谈期间我国代表团的顾问。

对这次谈判本身我记忆犹新。谈判是1963年7月5日到20日在沃罗比约夫公路上的一幢当时新建的，非常庞大豪华但不太适合这种工作的迎宾馆内进行的。工作一开始，立即就形成了非常离奇的谈判节奏和方式。这甚至不是谈判，而是慢吞吞的长达两周之久的依次交换单方面的声明，这些声明总是首先竭力批评对方，其次是为自己是正确的并且是马克思主义正统进行辩护。

谈判具体的进行情况是这样的。苏方代表发言，宣读自己的声明（据我所记得的，代表团其他成员有时则作事先商量好的补充发言）。在这之后就休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时中国同志回自己的大使馆，用密码将我们的声明文本，很可能加上自己的评论和建议电报北京。之后就是等待北京的回电，那时我们形成了这种印象，即这种回电通常就是回答我们的声明的发言稿。次日，他们在会上宣读这个发言稿，读完后又再休会，而我方代表团的团员和顾问们照例又通宵达旦地工作，准备下一个声明，供我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在次日会议上宣读。

可是，有一天正当这种奇怪的谈判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方代表团的部分顾问被派去完成另一项紧急任务——起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正如副标题所说明的，是致苏联的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而实际上当然也是致全世界的。我敢说，这个文件（它的篇幅很大，在《真理报》上发表时占了好几个整版，而其后不久出版的小册子有60多页）写作的速度是创纪录的——我们是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起草初稿

的，有近30个小时（一天一夜加上第二天的部分时间）没有出办公室，而且是一页接着一页地传给中央书记们进行修改的（初稿某些地方的修改更动是很明显的）。7月14日，“公开信”连同6月14日中国给我们的“公开信”一起公布。[①]

应该说，两党代表的会谈以及后来的“公开信”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论据，更深入地论证20大路线。这项工作的参与者，包括若干位中央书记（首先是安德罗波夫）以及咨议员和顾问们都曾尽量利用这个机会。我想，我们大家是理解这个时机的分量的，并懂得利用中共6月14日的信来加强对从1962年年末起掀起的又一轮新斯大林主义浪潮发起反攻（尽管是小小的反攻，但总是反攻吧!）是多么重要。

不久前我重读了一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想从我们今天的观点和观念的立场来分析这封信。应该说，我以为参加起草这个文件的同志们，基本上不用为参与这项工作而感到羞愧。当然，要跳出当时存在的观点的框框毕竟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个文件在关于世界和国际事务的问题上，关于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和解放斗争道路的问题上，包含了不少过时的、幼稚的和简单化的概念。在很多段落中可以看出这个文件撰写和定稿

① 为什么搞得这样仓促（尤其是在谈判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发表“公开信”，给中方7月20日中断谈判提供了借口），其原因只能进行猜测了。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赫鲁晓夫性情急燥、容易冲动和刚愎自用。另一个原因是，赫鲁晓夫及其许多同事担心中国领导会竭尽全力来在苏联、在苏联公民中间扩散自己的信，当然更不用说向其他国家和其他政党扩散了。问题在于，在赫鲁晓夫的弱点中，有一个弱点，在我看来，是害怕被人揭露他背离马列主义（很可能，这种惧怕心理从他青年时期，从30年代就在心中扎了根）。因此，最可能是他一开始就决定根本不在我国报刊公布中国的“公开信”（可能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有另外的理由——不给就苏共20大提出的问题掀起新一轮争论提供口实，不再激起人们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和20大提出的新理论的兴趣，等等）。尽管官方的说法自然是另一种的，说什么我们所以不公布中共的“公开信”，是因为我们担心这会破坏两党代表会晤前夕的气氛（可是在会晤正在劲头上的时候还是公布了!）。——原注

都很仓促的痕迹（不过，我认为，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来修改定稿的话，那么这个文件很可能由于要“冲淡”或删掉一些观点较为鲜明的段落和新思想，而代之以惯用的千篇一律的公式、刻板的陈词滥调和政治套话，——这个文件的几个主要定稿人苏斯洛夫、伊利切夫和萨秋科夫等人是玩这一套的真正能手——因而不会变得更好，反而会变得更糟）。

我觉得，在这封“公开信”（当然就其理论和政治水平以及政论的鲜明性来说，全信是不均匀的）里，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还是明显地比以前的文件前进了几步。

这里摘录几段。

“在个人迷信时期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彷徨的气氛已经永远消逝了。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人的生活更好了，享受着社会主义的福利。请问一问获得了新住宅的工人（这样的人数以百万计！），问一问晚年得到了保障的领养老金者，问一问富足的集体农民，问一问成千上万在个人迷信时期受到不应有的迫害而已经恢复自由和名誉的人，你们就会知道，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方针的胜利对苏联人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请问一问那些父母在个人迷信时期成了镇压的受害者的人，承认他们的父母兄弟是正直的人，他们自己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变节者，而是苏维埃祖国值得尊敬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儿女，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①]

当然，所有这些今天听起来已经平淡无奇了。可是，在这之前在党的文件里可没有同人民这样谈过话，而且不仅仅是在形式上（就是形式也同过去不同，换掉了传统的刻板样式和词藻华丽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0—601页。——译注

可供朗诵的文体)。过去在这种文件里总是矫揉造作，用哲理性的议论来掩盖着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和它带给千百万人的苦难。

诚然，可以指责作者们在这里把愿望当作现实。可是，首先"游戏规则"曾经是这样的，而其次，所谈的确实是斯大林之后发生的惊人变化(现在人们好像把它忘掉了)。例如，在赫鲁晓夫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之前，普通养老金(不是个人特殊养老金)的最高额是20卢布，而现在已是120卢布。斯大林执政期间，除了给当官的和社会"名流"盖过一些住宅外，几乎没有进行住宅建设，而现在千百万人——并且都是普通老百姓而不是负责工作人员——开始获得住宅。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明显提高，而且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同最低生活费挂钩。更不用说为无辜判决有罪的人恢复名誉和大大减少因政治理由的逮捕了(很遗憾，不是完全停止了这种逮捕)。

"公开信"特别联系到核战争的威胁，在解释和平共处政策问题上向前迈出了最重大的步伐。首先是论证了争取和平和防止核战争的斗争乃是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中国同志则攻击我们对西方的政策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按他们的说法马列主义要求共产党人集中注意去消灭帝国主义。他们认为和平共处是空想，因为只要还存在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

在苏共的"公开信"里批驳了这些论点，而使用的附加说明要比以往争论时少得多。我们坦率和明了地谈到现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给战争概念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

"公开信"直接了当地得出了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的结论(尽管后来这种说法曾在很长时间里被禁止使用)，它结束了对宣讲核战争后果的大实话的禁忌(两三年以后又重新触动这种禁忌了)。关于核战争后果的大实话，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我国多年来一直受到压制，它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表现，说它会在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攻击和对我们搞"核讹诈和核

威胁”时破坏军民用战争手段对付帝国主义的意志。

在“公开信”里也写道，在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中，能够把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阶级利益联合起来，因为“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它会消灭所有落进其破坏作用范围内的人”。[①]最后是，比以往更加坚决地提出了裁军问题，论证了裁军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以及裁军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当你今天读这个文件时，你不会不注意到，其中还有很多过去斯大林时代的“胎记”。在通篇文件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对我们自己思想的一些怀疑之处[②]。在我们对当时中国领导的论战所作的答复中，还可看到我们有一种不难察觉的害怕心理，生怕失去我们在“革命性”上，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和准备牺牲一切尽力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解放斗争问题上的领导地位。

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洗刷掉斯大林主义的污垢，在新的政治思维的路上还只是迈出最初的而且是非常胆怯的步子，因而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完全错误的立场。从这一点上看，我国领导对中国共产党 6 月 14 日的信最初作出不予公布的对策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的了。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企图在苏联人和我国共产党员中广

---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82 页。——译注

② 举一个典型例子，这就是不知哪一位定稿人在关于同核威胁作斗争那一节里塞进了一句格言。这句格言是违反逻辑的，人们读后可以认为这句话是从当时论战的一个对手那里抄过来并仓促译成俄文的。这句话说：“不言而喻，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争，各国人民一定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这是无可争辩的。”（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05 页）而这句话是在前面已给读者明白无误地说明，如果爆发核战争的话将没有人活下来去埋葬死者的思想之后加上去的。——原注

泛散发自己的“信”而大发雷霆，也就不能看作是毫无根据的了。所以“中国因素”在当时还有其另一面，即它对我国社会思想和政治的发展也起了阻碍作用。

这一点在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当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就得到了大量的证明。那时可以发现，尽管人们无数次地对党的文件，对支持党的新的政治路线的宣言和决议表示安全一致，可是在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及党政机关中，在舆论界的领导人和一般群众中，很多人所持的政治立场与中国的立场相去不远。这些人甚至准备放弃 20 大通过的某些改革路线。

但与此同时，在 1963 年年中到 1964 年初这段时间，国内的意识形态气氛有所改善。这种改善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同中共领导论战的效应。在一段时间里几乎禁止谈论的一些话题，如对个人迷信的批评、斯大林的迫害、主张发扬民主、主张和平共处、要求增加对西方的了解等等，又重新得以在报刊公开讨论了。就在 1963 年的夏天，美、英、苏签订了第一个裁军条约，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在国内围绕发展这条路线所发生的重大意识形态和政治事件中，值得一提的是苏共中央（1964 年）三月全会。在它的议事日程上，同中共的论战占了特殊地位。苏斯洛夫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篇幅很大但不很令人感兴趣甚至枯燥无味的报告（报告名曰“关于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可是在讨论时，最使人感兴趣的却是库西宁的发言——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发言（他三个月之后就去世）。他在这个发言中论证说，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宣布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和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政权有蜕变成“个人独裁”的可能。也就是说会造成完全与这些目标和理想背道而驰的局面。

开始时，我们的报纸甚至没敢把库西宁的发言加以发表（这个发言是在他安葬那天——1965 年 5 月 19 日才在《真理报》上

发表的)。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苏斯洛夫和库西宁两个发言的对比太明显了。库西宁的发言中拿斯大林主义作类比，并提出了对将来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警告，这一点太明显了。库西宁讲到我们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讲到如果我们真正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那我们应该摈弃什么，摆脱什么。

库西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据我当时的观察，他关于这些问题想了很多。在中央二月全会后不久，我通过他的助手伊万诺夫受领了一项任务——考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第三版的工作计划。几天之后，我同库西宁通了一次电话（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我向他汇报了，我认为哪些章节需要进行特别大的修改，哪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他听我说完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这样的意见，即他认为对这本书要进行大改。他指出了需要修改补充的主要问题：国家、革命后的政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普遍规律性和民族特点、专政与民主(以前我们不敢把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任务（那是我们当时的任务，因为苏共党纲中宣布说，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共产主义，而到 1980 年应该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最后是一整套有关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裁军以及在争取和平和民主改造的斗争中的阶级同盟等问题。总之，修改计划是要把很多理论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大大地向前推进。

不久，“中国因素”开始在我们生活中起了一种相当不同的作用。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吹来的风变了，这种变化是在好多年以后才发生的。而倒是因为赫鲁晓夫下台后，另外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我们自己逐渐开始把 20 大的很多主张推到了次要位置，有时甚至放弃这些主张。因此，新的领导并不因中国领导对我国的政策进行甚至是最尖锐的攻击而感到难堪，因为这些指责可被认为是针对赫鲁晓夫的。第一，党和政府中的保守派开始

表现出同中国人和解的愿望，他们同中国人有不少共同的政治观点。其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很快转变为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和使人类幸福的正确道路的意识形态争论。第三是中国同志由于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全神贯注于国内的纠纷和领导层的斗争，很快也就顾不上同苏联人进行理论争论了。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对我们越来越关心的事不是我国的内部事务，而是我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边境开始军事冲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了有相当份量的核潜力，而后来又加上了它开始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里，中国的成功的改革又重新使这个国家以及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成为我国国内事务中的某种因素，当时我们也越来越对改革问题感兴趣。而最先在苏联开始谈论必须彻底改善苏中关系的人，恰恰是那些在60年代初的争论过程中反对中国立场最彻底最强硬的人。又重新产生了关于两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所解决的任务具有共同性的看法，这种看法从新的角度提出了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的问题。

六、1964年“宫庭政变”和争夺勃列日涅夫的“心”的斗争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废黜，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宫庭政变”。中央全会批准他的辞职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苏共中央全会是在赫鲁晓夫从休假中被召回并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被迫提出申请辞呈之后召开的，会议的召开只是为了批准他辞呈的决议，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

那时我已是党中央机关中比较高级的干部。我们正在莫斯科郊外花不少时间来完成一项交付给我们的最新任务，也许是赫鲁晓夫的一篇讲话，或者是党的某个政治宣言，对此我已记不清了。几天之后我们注意到，似乎领导上对我们的工作失去了兴趣。新来的人带来了一些传闻。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最后，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进城去打听发生了什么事。几小时后他打电话来，但只说了一句话：“他们正在攻击最高领导。”

到10月14日晚上，写作小组中大多数人都溜走了。我们两三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那天是最近上天的宇航员将从宇宙轨道返回，电视上放映了旧的资料剪辑，加加林正踏上铺在机场上的红地毯。我们已看过那个剪辑很多遍了，所以我们知道下一个

镜头就是加加林走向赫鲁晓夫。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镜头到加加林走上地毯就中断了。

接着电视播放了不是由赫鲁晓夫，而是由正在调整自己的假牙的、显得紧张不安的米高扬欢迎宇航员的镜头。我们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给党中央打了电话，回话是让我们去那里。

我们按照吩咐直接到了波诺马廖夫的助手 B·沙波什尼科夫的办公室。那里聚集着来自党中央两个国际部的一大堆人。你可以感觉到紧张的气氛——人们交换着不安的眼色，喝着茶。当我们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说，赫鲁晓夫被推翻了。这话一定是严肃认真的，因为没有人胆敢大声开这样的玩笑。但是谁也不能回答任何其他的问题。

不久电话铃响了。沙波什尼科夫听着对方的话问道："任命了谁?"随即他向我们宣布，赫鲁晓夫已被撤职，去过领养老金的生活；勃列日涅夫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人们对这场政变没有反应，这是非常奇怪的，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思考过。实际上在党内和国内对这种非法行动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满情绪。相反，对这一行动几乎到处都是赞同，人们甚至为之感到高兴（许多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心：因为替代赫鲁晓夫的是一些不受广泛拥护的，甚至没有多少声望的人物，那是另一个问题）。

你也许会认为，在赫鲁晓夫领导党和国家的时代，他为社会各阶层，为苏联人所做的一切，按理会使他享有相当高的声望，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说实在的，当时他被罢免并没有使人感到惊奇，因为赫鲁晓夫的威望甚至他在社会各界人士中所受到的尊敬急剧下降，已经太明显了。

赫鲁晓夫声望的丧失未必能用最后两三年在内政外交上的失败来解释，虽然他有过这些失败的事实（如肉类、奶类价格的提

高、新切尔卡斯克的流血事件及加勒比海危机)。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许多人都已感觉到赫鲁晓夫及其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和个人的声望，原因是他奉行的是虎头蛇尾的、半途而废的政策（好像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把这种政策比作企图跳两下子以跃过深渊)。因此，在关键时刻到来时，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几乎引起了所有人的忿怒。

当时许多人已经很清楚，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了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他的回忆录就是证明。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讲他是怎样劝说诺沃提尼的："您要揭露内幕，揭露滥用权力的事实，如果你们那里有这种事实的话，而这些事实是存在的，我知道是有的……如果您不这样做，别人也会做的，而您将处于难堪的境地。诺沃提尼没有听我的话。大家知道，他本人和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怎样的结局。"接着下边有一段非常典型的议论："如果我们不揭露斯大林，那我们可能将会出现比捷克斯洛伐克更加尖锐的事件。"[①]对于进行这种揭露的必要性本身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可是这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赫鲁晓夫却只字未提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改革。虽然那时在苏联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已显示这种改革的必要性。

也许，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认识就在于此，而他至死也没有摆脱这个错误认识。总的看来，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个人，他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对消除我们社会

① 见《星火》杂志 1989 年第 28 期，第 31 页。——原注

生活各个方面（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出现的深刻的变形现象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我不认为赫鲁晓夫对这些变形现象没有看到，我认为，那些把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对党进行的改革视为对官僚权势的摧毁的人是正确的。但是，我读他的回忆录时感到震惊的是，他或者对一些明显的事情完全视而不见，或者是顽固地相信那些老的谎言，即使是他后来的经验已揭穿了这些谎言的时候仍然如此。例如在回忆录中，他似乎一本正经地说，在挑选领导人问题上，用哪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的问题可经常提到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去解决。没有这一点，“我不知道党会变成什么样的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这样讲的时候，似乎他已经忘记了中央委员会是按照领导层中少数阴谋家的命令给他的辞呈盖上橡皮图章的。好像他这个在斯大林宫庭的走廊里“修炼出来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这种阴谋手段建立自己的仕途的，而当需要消灭更多对手时完全靠武力（如贝利亚的例子）。

我的看法是，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识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像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办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而赫鲁晓夫是不想的），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变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弃过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将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里用了库西宁的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显然他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全部涵意）的许多机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那么领导党和国家就可能简单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还欣赏对他本人的颂扬，当然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凶险的血腥的个人迷信，但毕竟也是十分有害的，而且诋毁了他的主要成就——在20大上对斯大林的揭露。我认为不能把赫鲁晓夫

这种前后不一贯的原因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打算（争权），尽管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

主要问题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当然，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推动了革新社会的深刻的政治过程。这是赫鲁晓夫的巨大功劳。但是，要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不了解也看不到其他任务，因此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当然，甚至政治分析家在当时，也不见得就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更何况广大社会阶层。但是，在社会意识中有一个普遍的想法已经成熟，这就是认为赫鲁晓夫的政策没有什么前途，认为他至少是个没有用的人了。这就决定了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思想情绪，而举止行为往往过火，讲话非常粗鲁的赫鲁晓夫过去总是受工人和农民欢迎的。

在 1964 年 9 月中，我妻子拉我到离家不远的一家电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在放正片之前照常放了一段新闻片。我记得如同昨天刚看过那样清楚，头条新闻是中亚某地一条新运河的竣工仪式。在场的有赫鲁晓夫和其他一些官员。他跑到尚未放水的运河河床，做着手势，说着什么。然后他又吃力地攀登上来。电影院的观众中爆发了一阵哄笑声。对领袖显示不尊重的这种群众场面还是很少有的。两星期以后（也许是政变之前 10 天），我们再次去那家电影院，又一次放映了赫鲁晓夫在头条新闻中出现的新闻片（宇航员尼古拉耶夫和捷列什科娃的婚礼）。这一次观众中发出了高声和长时间的哄笑声。我们离开电影院时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群众的这种情绪自然使得搞政变更加容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政变组织者，正像戈尔巴乔夫的失去名望鼓励了 1991 年 8 月反对他的政变组织者一样。但是，鲜明的对比是，1964 年没有一个人上街维护赫鲁晓夫，而 1991 年成千上万的人起来

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赤手空拳的群众挫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秘密警察力量。

至于那些反对赫鲁晓夫的策划者、阴谋家，这些人的动机不是出自任何伟大的“理想”，而是出自追求权力的欲望，或者出自丢掉自己的官位的恐惧，但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勃列日涅夫当然是他们中的一个。我认识勃列日涅夫，我不止一次地参加了起草他的讲话稿和一些党内文件的写作组的工作。关于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我在后面还要讲。但是，根据我对他的全部了解，有一点是我确信不疑的：他本人未必是策划这场阴谋的头头和主宰。假设这场政变是集体谋划的，那他最多只能是三四个主要策划者之一。但是，从我所知道和了解的全部情况（这里我要说明，我知道和了解的并不是全部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比较武断和强硬的波德戈尔内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苏斯洛夫也不可能不参加。而策划这场政变的非常明显的人物还是谢列平。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贪图功名的，也很武断的人，自青年时代起就学会了一套玩弄机关权术的本事。最主要的是他已有自己的班子，有一个真正的“影子政府”（包括“影子政治局”）。他比刚从外省调来的其他人更容易组建这种班子。看来，他在当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就从事这些活动了。

此后，谢列平不仅一直与很多后来担任重要职务的过去的共青团干部保持着牢固的联系，而且还推荐和提升他们，特别是在十月全会之前的那些岁月里。他以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的身份主管选拔和安置干部工作更是如此。作为克格勃的主席，他最关心的是：在克格勃的领导岗位上要有自己的人，包括自己的继任人谢米恰斯内。我不知道谢列平是否是策划阴谋的头头，我认为他和波德戈尔内都是头头，但至少他是波德戈尔内的“主要助手”和“打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他在机关

里有一个绰号，叫“铁拳舒里克”[1]），他能成为“打手”，因为他有谢米恰斯内和克格勃、内务部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充分支持（内务部的领导也是与谢列平亲近的人，他是过去共青团的负责干部季库诺夫）。米罗诺夫也属于“共青团帮”，他是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主管军队、克格勃、内务部、法院和检察院。

后来，有人告诉我，接近谢列平集团的还有当时的总参谋长比留佐夫元帅，他也知道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计划，可能也参与了此事（比留佐夫和米罗诺夫在十月全会之后，没有几天，在南斯拉夫境内死于飞机失事，他们是应邀参加贝尔格莱德解放20周年庆祝活动的）。所以，那些强人都是站在政变者一边的。

令人感到可悲的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在我们国家，军人通常都是参与这类国内事务的。这在逮捕贝利亚时特别明显：不用说有一批将军直接领导实施了逮捕，而部队也开进了莫斯科，占领了克格勃各分队的兵营，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另一个例子是1957年六月全会的日子里，朱可夫元帅和支持他的武装力量也是这样直接帮助赫鲁晓夫挫败了莫洛托夫及其集团的。

后来，赫鲁晓夫恩将仇报，在一次例行的中央全会上，而且是在朱可夫不在场的情况下（当时他在国外）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搞“波拿巴主义”，有“政治野心”。由此可见，他只是重复了斯大林的做法。他们两个都害怕有武装力量作后盾的非常有影响的对手。但是，在这方面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军人愿意并同意参加内部政治斗争，而政治领导人同意也愿意在这一斗争中依靠他们，他们双方都应考虑后果——军人应考虑的是有人将害怕他们并企图使他们起不了危害作用，而政治家应考虑的是，他们必须对军人有所戒备。主要的是，社会将永远担心事态会发生不希望发生的转折。

---

[1] 舒里克是谢列平的名字亚历山大的爱称。——译注

正因为如此，如保持原有的状况，不把军队置于政治（包括代表制）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就不能发展民主。因此很自然。在某个阶段就会提出军队非政治化的问题。更晚一些时候，我们就碰到了这个问题——那已经是在改革年代了。

再回来谈 1964 年 10 月，我想谈一谈来自于刚发表不久的一些人的回忆录中的一种说法。他们说赫鲁晓夫在休假之前就有人向他报告了这一阴谋的信息，但是他已无能为力。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可是，如果这信息的可信程度即使很小，那也很难设想，这样一位为夺取政权经过无数战火考验的充满活力的人会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去休假。但是，对于另一点我几乎是深信不疑的，这就是在中央主席团开会的前夕，为了使赫鲁晓夫别打算反抗，向他说明了：谁参加了这次行动，谁又支持了这次行动。赫鲁晓夫非常明白，在当时大部分是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力机制条件下是什么决定了这件事，因此他也就真的立即呈递了请求退休的报告。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对如此不符合赫鲁晓夫性格的消极被动状态和不进行斗争的情况作出解释。虽然我不排除，他本人精神上受到某种挫折，他真的是累了，由于领导这个问题成堆的国家而疲备不堪，他也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一个能证实有关阴谋的说法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事件发生前夕，非常巧妙地从莫斯科撵走了赫鲁晓夫圈内的人（其中包括派往国外出差，而这是需要由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正式决定的）。首先撵走的是所谓“新闻小集团”的领导、大众传媒的新闻界人物（《真理报》编辑 П·萨秋科夫、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 M·哈尔拉莫夫等人）。我不认为，他们曾对准备采取的行动进行抗拒，但可看出策划者们是非常理解列宁对革命者的建议的：首先要占领邮局、电报局、电话局。不过他们使这个建议现代化了，把大众传媒放在了首位。

确实如此，在发生主要事件前夕的夜晚，曾在中央某部担任

安德罗波夫的副手之一的H·梅夏采夫带着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的全权证书来到了该委员会[1]。他长期在民警部门和克格勃工作，确实没有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然而他是“铁拳舒里克”的好朋友和最信任的人。被任命为塔斯社领导人的也是过去的共青团干部，曾当过《共青团真理报》编辑的Д·戈留诺夫。

这些和另一些有关事件的片断清楚地表明了所讲的事情真相是什么。我把搞掉赫鲁晓夫这件事定性为政变，既不是要肯定，也不是要谴责这一行动。需要对赫鲁晓夫和当时国内情况比我有多得多的了解，才能对事件的进程作出最后的判断。我也不想进行道德说教：赫鲁晓夫本人曾不止一次地使用老的、斯大林主义内部产生的非民主的“游戏规则”。我也不知道过去当出现更换领导人的需要时，除政变之外，还有其他更换领导人的方法。这仍然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最弱的一个方面。赫鲁晓夫原则上对更换接班人的意义是明白的，他曾对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人的任期采取了限制——只能担任两届，这在当时可将苏共中央书记任职时间限制为8年。但是，由于附带说明里有关于“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这个期限的说法，他就没有坚持住上面提到的原则，从而彻底打破了限制的规定。

促使我写关于阴谋的这个题目的动机在于以下两点：首先，我想引起大家注意，斯大林死后我们已经有过一次“宫廷政变”，现在还保留着政治机制很多不完善的方面，这就使得有可能进行这种政变。在正在实施的政治改革的框架内一定要改变现状。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规定合乎宪法的领导人更迭方式。其

---

① 后来，亲眼见到他来到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人讲了一段能说明在准备和完成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时的心理状况的有趣的往事。梅夏采夫到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后，提出的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按钮在哪儿?”当时在场的人们没有立即明白，他指的是切断向太空发送电波的按钮，也就是能“砍掉”一切广播和电视节目转播的按钮。——原注

次，赫鲁晓夫被罢免并不是由于原则方面的原因。阴谋策划者们在大的政治方针上没有共同的目标，也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他们多半是根据自私自利的考虑行事的，首先是想攫取或保持权力，或者担心丢失自己高官的位置。

赫鲁晓夫是被人用阴谋手段推翻的，不管策划者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他们力图用社会主义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证明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是正确的。在主席团会议及随后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正是这样来谈这个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绝不排除，某些参加这一行动的人们自己确信：他们是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人的理智和良心经常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并找到了非常合适的、合乎道德的立场，把自己的利益同全国人民的利益视为一体。鉴于当时赫鲁晓夫领导国家的状况，要这么做是并不那么困难的。

领导人更换了，但是，随着换班将采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什么样的政策，该树立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呢？这些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因为正像指出的那样，上台执政的人根本没有统一的、多少有点明确的政治思想纲领。

不是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消息灵通和了解形势的人们一开始都明白这一点的。我记得在中央十月全会之后第一天早上，安德罗波夫召集了联络部的领导干部，包括几位咨议员，向他们通报形势（不知为什么在他的第一副部长Л·Н·托尔库诺夫的办公室里召集大家。此人不久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当介绍完中央全会的情况后，他用以下几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话（这几句话一直铭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赫鲁晓夫被免职并不是因为他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奉行了和平共处政策，而是因为他在进行这个批判和奉行的政策上虎头蛇尾，前后不一贯。"

唉！很快就开始清楚了，安德罗波夫完全看错了[①]（我简直想象不出为什么了解事情真相的他会有意对我们说假话）。两周之后，我们就得到了有关这方面的第一个信号。根据传统，要做报告的 11 月 7 日快到了，做报告的任务委托给新当选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这也完全是自然的事。给安德罗波夫（及其咨议小组）下达的任务是起草报告的一部分，而且一反常规，不是撰写对外政策部分，而是撰写对内政策部分。我们把这一任务看作是对我们部长信任的标志（并不排除，从勃列日涅夫本人方面来说，这如果不是信任的标志，那就是一种检验），于是，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我不记得细节，但是我们撰写了一份观点非常进步的有关部分报告的初稿，并把它交给了杰米契夫。他的任务是和与他接近的几个同志把各章节综合在一起，用同一风格审核后交给发言人。

当我们看到“最后产品”时，它使我们十分尴尬——我们初

---

① 鉴于 1969 年底出现了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Г·И·沃罗诺夫电视和报刊的访谈录（阿朱别依的一篇文章也用了这篇访谈录），我不得不说，他关于安德罗波夫在赶赫鲁晓夫下台中所起作用的回忆是有错误的。这指的是沃罗诺夫所说的一段插曲。当时他应勃列日涅夫的邀请去扎维多沃打猎，在那里他遇上了安德罗波夫，他说安德罗波夫向未来的总书记汇报谁支持他反对赫鲁晓夫。对此我不相信，这不仅是因为安德罗波夫不喜欢打猎，大家知道，如果去扎维多沃，那他简直就破坏了搞阴谋活动的起码规则。更重要的是，安德罗波夫不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十月全会之后，差不多半年他失宠被黜，是稍后在 1965 年末或 1966 年才开始受到领导的信任。很可能是沃罗诺夫把安德罗波夫与某人弄混了，我甚至能猜到是同谁弄混了。特别是根据他说的那段事，是他同勃列日涅夫，似乎还有安德罗波夫，一起在扎维多沃回莫斯科的路上，沃罗诺夫从在汽车里的谈话中才知道让安德罗波夫在这场阴谋活动中担任的角色，是收集赫鲁晓夫过去在莫斯科和乌克兰的工作中，主要能了解有关非法镇压的、有损于他声望的材料。其实安德罗波夫同这种材料，同克格勃、党中央或其他中央机关的档案没有关系，或者说，直到 1967 年 5 月任命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之前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很可能是 1964 年沃罗诺夫在扎维多沃遇到的并从那里一起坐车回莫斯科的，不是安德罗波夫，而是谢米恰斯内。记忆在这里给他帮了倒忙（尤其是从那时起已经过了 1/4 世纪了！）。他已记不住谁在什么时候当上了克格勃主席，谁能够在 1964 年收集败坏赫鲁晓夫名誉的材料。——原注

稿中所有内容最丰富、观点最鲜明、含有进步的政治论述的段落都消失了。我们写的一些段落和句子被拆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像孤儿院的清汤里的几块肥肉漂浮在文章中。（由于赫鲁晓夫曾让杰米契夫当过农业化学化方面的书记，当时杰米契夫有"化学家"的绰号，因此他就以善于破坏各种文本而著称，可是他却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一直藏而不露。）

当然，这使我们失望，但是还不能说明没有好的希望。特别是开始出现了对立性质的信号，比如，有几位咨议员就被委托为宪法日撰写《真理报》社论（那时候是 12 月 5 日斯大林宪法日举行庆祝活动）。我们完成了写作任务，文章的重点是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谴责镇压行为和必须发展民主。文章是按原稿发表的。但是过了几周之后，我们就已经毫不怀疑安德罗波夫最初的判断完全错了（另一方面，对我来说，这首先证明了他没有参加过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

但是，为了不打乱事件发生的顺序，首先我说一说 11 月 7 日发生的事。这一次是在经过很长时间中断来往之后，由周恩来率领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国代表团，来参加我们的节日。大家都明白，这是试探，企图弄清苏联新领导"关心的是什么"。但是，另一方面，周恩来是中国领导人当中表现温和的人，他访问莫斯科可以看作是明智地解决中苏关系问题的一次良机（或者相反，是精心策划的一着，目的是使我们在苏联和国际舆论面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种想法在头脑里也出现过）。因此，对这次访问有着不同的看法，至少在我们这些中央联络部的咨议员这里是如此。一方面为我们新领导人会不会放弃重要的政治原则而开始出现不安，而同时又希望能结束两国之间越来越白热化的敌对局面。

节日这天我在联络部值班，坐在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机旁。傍晚的时候，安德罗波夫接待室来了电话，他的秘书转告我，安德

罗波夫请我去一下。我从大楼四层下到三层，走进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办公室，他坐在写字台旁忧虑地陷入沉思，用一种心不在焉的眼光看着窗外。我向他问候，并向他祝贺节日。他也作了节日祝贺并立即开始激动地说起来。

刚刚结束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传统的节日招待会。马利诺夫斯基（当时的国防部长）酒喝多了一点，说了句带有挑衅性的反美祝酒词，得罪了美国驻苏大使。安德罗波夫说："这是第一个坏消息，所有各国首都都警惕地关注着来自莫斯科的每一句话，企图以此判断新领导人的政策，而这时候发生了这种事……"但是，正像谚语所说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走向马利诺夫斯基，为他的"精彩的反帝祝酒词"表示祝贺。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继续说："我站在一旁，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不仅领导人，而且还有外交使团都见到了这个场面。这时马利诺夫斯基完全毫无顾忌地对周恩来说："让我们为中苏友谊干杯，我们现在已经把自己的尼基塔赶走了，你们也可以对毛泽东这样做，那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啦！"周恩来脸色发白，他气愤地说了几句，转身就离开了招待会会场。对此，你能说些什么？

想到这种场面，我向安德罗波夫说："也许，这还不是坏事，犯不着为此烦恼。"他立即沉默并思考了一下，然后微笑起来。至此对话就结束了。

几天之后，代表团回去了。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在和安德罗波夫单独谈话时，他又提到了我们11月7日所讲的事，并说："米高扬最后把问题说死了，"他向中国人宣告：我们丝毫不会放弃自己原先的政治立场。安德罗波夫似乎是顺便作一句评论说："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喜欢米高扬的讲话。"同时使我明白在这件事情上他不会回答任何其他的问题。

这些谈话，使我对1965年1月所发生的事情有所准备。华

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议临近了。中央主席团讨论了由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签署的给我方代表团的指示草案（由咨议员会同几个外交部工作人员一起起草了基本稿）。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进行了十月全会之后第一次关于对外政策的深入而具体的讨论。

安德罗波夫从会议上回来时情绪很低落，我应该说，他的情绪非常之坏，当他的上级批评他时，他甚至有些张惶失措。我认为这是在他许多同代人身上所存在的对上级的恐惧综合症，这是个人迷信时期的典型产物所造成的。后来，我们知道主席团的一些成员——那时安德罗波夫只是中央书记——猛烈地抨击交上去的那份草案，尖锐地批评它缺乏"阶级立场"、"阶级性"，（"阶级性"这个词后来好几年都成为一个时髦的词了，这个词不管是不是恰当都随便塞入对外政策讲话和文件中）。指责作者在"与帝国主义关系上过分退让"，轻视同自己的"天然盟友"、"阶级兄弟"（我们明白了，这首先指中国人）改善关系和加强团结的措施。从出席会议的人那里我们了解到，表现特别积极的是谢列平，令我惊讶的还有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大部分时间是默不作声，或是察言观色，等待观望。当柯西金开始向他逼进，要求他去访问中国时，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含糊地说："如果你认为非去不可，那你就自己去吧。"

上层开始讨论的主要现实结果是，把我们关于改善与美国和西欧各国关系的建议和创议都给压缩了。而附带的结果是，好像安德罗波夫有好几个月失去了上司对他的好感（他的心情非常不好，之后就病倒了，到了夏天，他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①]

---

① 安德罗波夫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孔采沃医院，当他病情稍好时，从医院用电话通过助手领导联络部的工作。在医院里他还庆祝了自己的生日，我们三位咨议员开玩笑地作诗为他祝贺。几天之后，我们收到了他用诗写的回信。因为尤里·弗拉基米

罗维奇的诗是在困难时候写的，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这个人的某些个性。这里我引上这首诗：

致阿尔巴托夫、鲍文、沙赫纳扎罗夫：

我的朋友们，收到你们的诗，
集体写的赞美的短诗，
我读后不无激动，
之后，我一整天都在叹息：

世界何等奇妙！才华横溢的人，
在我们这里成长壮大，
现在，你看，这些咨议员们，
留下多少他们的巨册和宏论，
又成群地匆匆登上诗坛。

我用颤抖的双手，
握住钢笔的时刻，
想用诗句给你们复信，
和你们一起攀登诗坛高峰。

哦！至高无上的神用手，
为我指定了悲哀的道路起点，
起点就在这里，在医院里，
它简短的称呼就是心肌梗塞。

这是一条每走一步都不知去向的路，
在这条路上心脏受着考验，
引导我们"通过荆棘走向胜利"，
也许一下子就可去见祖宗。

在医院宁静的环境里，
睡觉、吃饭、对未来沉思，
不管是适合还是不适合，
至今我未能想出什么。

我拿定主意说："抽打我几下吧！"
当然，我问心无愧。
当你碰上浑身是刺的人，
你对事情的理解就会更好。

在阳台上晒着太阳，
有时坐在"宝座"上，

即便坐在这个“宝座”上，
也不是出类拔萃之辈，
但是，宝座终究是宝座。

不应该看不起自己，
将来即使你百倍地超过苏格拉底，
但是，你也应该坐在后边去思考。

但是，玩笑开够了，多愁善感的人们！
大家知道，这不是我们的风尚，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有时突然“尘埃蒙住了眼睛”，
有时谁也不知道“是些什么”，
你的胸膛发出了呼叫声，
你将带着一张白痴的丑脸，
茫然若失地投入人间的波涛。

朋友们！这些事，
不久前，我已亲身经历。
请接受我的谢意，
你们百忙中抽出这“美好的瞬间”，
并以高度的灵感，
为我创作了十四行诗句。

这诗有点橄榄油味道，
坦率地说，实在甜蜜！
但是如果为生日纪念而写，
那就慷慨欢呼“万岁”！
如果生活不是橄榄油和蜂蜜，
那生日纪念也就不是生日纪念。

到此搁笔，再读一遍实在无益，
写诗并不是写演说词，
如有不同意见，
下次见面，我们再讨论。

——原注

但是，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前，柯西金在安德罗波夫陪同下确实访问了中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中央主席团1月间发生的那场辩论促成的。

准确点说，代表团乘飞机先到了越南。结果是，正当苏联政府的新首脑出现在越南时，美国人开始轰炸该国北部地区，这就必然增加了不信任感和敌对情绪。我想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严重错误，或者是它用来试探苏联新领导的态度的一次有计划的挑衅。

回国途中，柯西金在北京停留，会见了毛泽东及该国其他领导人。结果是空手而归。此行毫无结果（甚至相反，在这之后，双方关系更加尖锐了），使谁也高兴不起来。但是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这次失败帮助我们摆脱了幻想，以为我们可以容易地和那时的中国理顺关系，而不必在国内外政策的主要问题上无原则地投降。之后，在达曼斯基岛[①]及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武装冲突，又把我们抛向另一个极端——即惧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战争，我们花了太长的时间才摆脱这种恐惧心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大地延误了我们与这个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但是，十月全会之后发生的主要事件，不是在对外政策方面，而是在国内事务方面。这方面的变化开始以相当快的速度显露出来，如领导人当中已形成某些新的观点。要知道，赶赫鲁晓夫下台的策划者们，正如已经指出的，他们没有比较明确的政治思想纲领。因此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着手提出纲领的。他们不仅是没有纲领，而且内部也不团结，所以这个过程是在斗争中进行的——有时是在相当尖锐的，然而主要都是在幕后的斗争中进行的。不久出现的矛盾和分歧同样既反映了不同哲学和思想立场的冲突，也反映了权力斗争的波折。而这种权力斗争在十月全会之

① 即珍宝岛。——译注

后立即在胜利者队伍中变得激烈起来。

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是如何认识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呢？（我所以做此说明，是因为我不相信我所掌握的信息是充分的。）

勃列日涅夫（下边我将多次谈及他本人和他的品德，这同样也是在我的印象和所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写成的）被中央委员会机关及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个能力弱的人，而许多人认为他是个临时性的人物。我不排除，也正因为这样，政变参加者对把他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如果没有普遍接受的担任领袖角色的人，那么别的领导人就会设法寻找妥协人物，尤其是尽可能选能力差的人，而不选被认为是能力较强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列宁逝世后，虽然存在着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样的在群众中有威望和有魅力的人物，但斯大林仍得以如此迅速地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在1953年也可能作出了同样的错误估计，那时他们同意让赫鲁晓夫从莫斯科市委调到党中央，当中央第一书记，以集中精力抓党中央的工作。他们的逻辑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不谙政治、头脑简单的人永远成不了领袖。但是很快发现，他们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关于这一点当时未必有人能够想到，但是情况又第三次在勃列日涅夫身上发生了。那些对被推举出来的新领袖的能力估计不足的人，后来是付出了代价的，因新领袖上台后是有能力保住这个权力的。虽然非常了解勃列日涅夫的人是估计到斗争会有这种结局的。我记得，特别是十月全会两周后，伊诺泽姆采夫把他与阿尔祖马尼扬的谈话告诉了我。阿尔祖马尼扬在战争年代就很了解新上任的第一书记（他在集团军政治部当讲演员，而勃列日涅夫是该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阿尔祖马尼扬在一次非常信任的谈话中这样描述了勃列日涅夫的特点："这个人在权力斗争和安插干部方面是不用别人去教他的。"

但是，党的领袖位置的其他觊觎者是哪些人呢？我想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谢列平。此人在中央机关是大家都非常了解的。战前他曾就读于当时最著名的人文院校——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据他的同窗说，他学习不怎么好？他主要的积极性表现在社会工作上，从共青团工作起家）。后来，不知在什么边远地区经历了战争，因此他到过前线的事实有些人（与他较好的）承认，而另一些人却否认。可再后来就没有人对此去争论了，因为他已开始官运亨通。开始他在共青团工作，很快被提升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又让他当上了克格勃主席（在赫鲁晓夫时期，当时克格勃的工作主要是为无辜的受害者恢复名誉，而不是搞迫害，当然，远不只是进行恢复名誉的工作）。后来他又当上了苏共中央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看来，赫鲁晓夫非常信任他并把最重要的、微妙的工作，尤其是党的干部工作都委托他去做。

我个人对谢列平实际上并不了解（有过几次短暂的会面，交换过几句毫无意义的谈话）。但是，我想，关于他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大多是根据工作和他平时的表现，更多的还是来自熟悉他的人的介绍。他是机关里的最典型的产物，毫无疑问也许是有实力的，也可说是这个阶层最有力量的代表，在机关里相互倾轧的环境中他的自我感觉好像如鱼得水似的。他是一个并不愚蠢，很机灵，意志坚强，虚荣心极重的人。

在权力斗争方面，他有着罕见的、非常重要的、善于将可信的、忠于他的有活动能力的人聚合在他周围的本事。正如上面所说，这些人在十月全会临近之时以及在全会之后不久就被安插在许多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克格勃和内务部、中央最重要的几个部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大众媒体。他实际上自己掌握了一个真正的“影子内阁”，以及一批由他培植准备掌管关键岗位的人。他在外省同样有着牢固的支柱。谢列平把极大的赌注压在了把比较年轻的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自然，通过共

青团工作，他认识了许多人。

至于谢列平的政治观点，他首先主张“整顿秩序”。虽然在赫鲁晓夫时期，他多次发表过反对斯大林的言论，但这绝不会妨碍他和支持他的人在十月全会之后，开始积极地向20大的路线进攻。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谢列平和他的人高声疾呼为恢复“阶级立场”、“阶级性”而斗争，反对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路线。所有这一切，正像当时人们所说的，同大国情绪和沙文主义结合在一起了（虽然这方面主要领唱者是波利扬斯基）。

开始时与谢列平亲近的人们甚至都不掩饰，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临时性人物，“铁拳舒里克”将很快会代替他。他本人也以自己的行为、所做的某些事情以及各种声明证实了这种印象，也许这是他愚蠢的策略上的错误。谢列平立即使对此类事非常敏感、也理解透彻的勃列日涅夫惊觉起来。这也就使惧怕突然出现新的独裁者和恢复斯大林主义的人们团结在勃列日涅夫周围。

勃列日涅夫知道谢列平对他来说是个危险的对手，因此他开始采取对策——按自己的风格，在幕后借助于巧妙的机关权术悄悄地整谢列平。他是如何具体做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到了1965年秋天，看来，谢列平在政治上就已遭到强有力的一击而倒下了。他失去了对极其重要的党的干部部门的控制，而成为主管食品和消费品工业的中央书记。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这等于是政治上的失宠。他甚至还“克制傲慢”，开始尽一切可能争取把自己塑造成忠实于第一书记的人（例如，他改变了自己某次出访的路线，赶到伊尔库茨克加入从蒙古回国的勃列日涅夫的随员班子，以表示“低头认罪”）。

虽然谢列平遭到了失败（我看，他彻底地失去获取权力的机会是在1967年安德罗波夫接替谢米恰斯内当克格勃主席的时候，虽然此前许多和他亲近的人早已被撤了职），但是，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在十月全会之后对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形势产生了不小的

消极影响。

那时，柯西金也被认为可能是勃列日涅夫的另一个竞争者。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有较高文化修养和有学识的人，是位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专家，在某种程度上（实践经验也无法证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比较能接受某些新的经济思想。但是，遗憾的是，在政治问题上，从他对斯大林的态度开始他就是保守的。

当然，柯西金不是一个拥护镇压、专制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例如：在1968年12月我在基斯洛沃茨克[1]散步时我同他（他没有在专门的别墅里，而是在疗养院里疗养，并常常与其他休养人员交往）进行了第一次长时间交谈：当我说到生产大军的指挥员们怎样受到斯大林屠杀的话题时，他很乐意地接着这个话题，热情地回忆起他自己的一些无辜受害的同事。但是，作为政治活动家，柯西金仍然是专横政治制度的产物。他之所以相信这种制度，也许只是因为他不知道其他别的制度。此外，据我所知，甚至他个人对斯大林的态度也是非常热诚的，他忠于斯大林。不管怎么讲，正是斯大林发现和提拔了他，柯西金不能不对“伟大领袖”表示敬仰。

据人们说，温情的回忆也对柯西金的看法起了一定的作用。战争结束后不久，一向是在高加索度假的斯大林，一生中第一次听从了劝说，到克里米亚利瓦季亚宫度假。但是他不喜欢那里，几天之后，他决定转到高加索去。因为斯大林十分害怕坐飞机，而坐火车要绕道，走的时间又太长，所以改乘巡洋舰从海上走。新闻报导把这次一天的航行说成是斯大林巡视我们光荣的黑海舰队。斯大林邀请当时也在克里米亚休假的柯西金及其夫人和自己一起乘船去高加索。据说这给被邀请的客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只要斯大林愿意，他就能成为热情好客的、甚至是

---

① 前苏联最大矿泉疗养地之一。——译注

有魅力的主人。

当然，在与勃列日涅夫的角逐中，柯西金未必能够取胜，因为他身后没有党的机关力量的支持和当时第一书记职务所提供的一切条件。即使按他的气质来说，甚至在缺乏坚强领导人的年代里，他也不是“第一号人物”。这里我不是在智力或者业务能力方面把他与勃列日涅夫相比较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柯西金超过他，但是，如果没有勃列日涅夫，当第一书记的很可能是某一位第三者，而不会是柯西金。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总之，他们之间没有形成持久的角逐局面。可是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仇视，他们周围的一些阴谋家和钻营家们又不断地煽风点火，因而这给1965年的经济改革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柯西金仍旧是位负责管理经济的领导人，而没有成为政治领导人。但是，他的观点在十月全会以后最初几年，而特别是最初几个月，对事情的进展有不小的影响。在经济上总的来说，有非常积极的影响，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在国内政治和思想问题上柯西金是保守的。在对外政策上，则是两种立场参半。最初他非常支持强调“阶级意识”的外交政策，但是，总的说，他赞成与西方保持正常关系并发展贸易。

我不知道波德戈尔内是否觊觎过当一号人物的角色，但是，他比勃列日涅夫更愚昧，更保守一些。苏斯洛夫是根本不想当党和国家的一号人物的角色的。[①]他习惯并适应于当“平凡的红衣主教”的幕后命运主宰者的角色。

我不再谈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因为波利扬斯基、基里连科或马祖罗夫未必会觊觎这个角色。除此之外，对他

---

① 有人对我说：有一天赫鲁晓夫建议苏斯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当时这是个纯粹礼仪性的职位）。他极端不安起来，他同政治局委员们说，他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看来，他更多的是害怕承担个人责任。——原注

们当时的确切立场的细节我根本不了解。但是，他们总的情绪绝不是进步的。如果把这些思想情绪归纳为一类，我判定它们是保守主义，再加上相当的无知和外行。在这个从整体来讲与赫鲁晓夫时代的情况（设想一下，此时没有了赫鲁晓夫本人和米高扬，而在 1964 年之前则是没有库西宁的赫鲁晓夫时期的领导），没有太大区别的总背景下，勃列日涅夫那时绝不是最差的。回过头来看看，我想，勃列日涅夫的力量源泉恰恰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在所有可能参与权力斗争的竞争者都明显地软弱无能，或者他们的政治立场站不住脚，没有吸引力，甚至使人听了就害怕。他的竞争者不是比他还虚弱，就是比他还差劲，这本身就是对国内存在几十年的政治制度的真正的判决。

在对手如此软弱无能的背景下，在这群人中间，勃列日涅夫真正按照已形成的舆论，所具有的为数不多的优点就具有了份量。他的优点之一就是人们觉得他不是一个凶恶和残忍的人。如果同斯大林相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同赫鲁晓夫相比，他确实有这个优点。派你到国外去当大使，或者让你领取特殊养老金退休——这同枪毙你、让你坐大牢或对你用酷刑是不同的，同使你公开出丑（如撤职或开除党籍）也是不同的。赫鲁晓夫对他的敌人就采取后一种办法。

实际的情况也是，这个人平易近人，有民主作风。至少在上台后的最初几年里，他还没有忘记听取人们的意见，对帮助他的人会说声谢谢，甚至在公众场合能承认自己知道的太少。同时也不引起人们怀疑的是，他比较通情达理，不爱走极端，也不会仓促作出决定，然而后来走向了反面，他变得犹豫不决和无所作为。

在上台的头几年中，勃列日涅夫比较容易接近，也不装腔作势，他力图不仅争取交谈者对他的好感，而且总是表示乐于帮助他们，如果他给人委派一项任务，他总是设法使受领任务的人不

感到紧张。

我记得在1965年2月我同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会见。领导上当时决定召开一次新的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同时还决定给不同意我们立场的，或给我们制造麻烦的那些党的领导人发一封由勃列日涅夫签署的信，并由中央派人前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向他们做解释工作。

我被选派飞往古巴去见卡斯特罗。在我出发那天，勃列日涅夫要见我，向我作指示。

在领导人办公室所在的克里姆林宫主楼第5层，有一个警卫和检查岗。我走进勃列日涅夫的接待室，被带到他的助手Г·楚卡诺夫那里。我们谈了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楚卡诺夫说："他们让我们进去"。我们一起走进了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勃列日涅夫坐在一张桌头上的一张小桌子后边。他友好地向我们打了个招呼，又给苏斯洛夫打电话，请他也来参加谈话。

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读一遍。这封信将由两名专门的信使与我乘同一架飞机携带。勃列日涅夫说，他要让我给卡斯特罗带点礼品——卡斯特罗喜欢的格鲁亚葡萄酒和马哈鱼。勃列日涅夫问了我几个问题，问我过去在哪里工作过，在党中央工作了多久。他感到我有点紧张，开始使我平静下来："如果卡斯特罗不接见你，就把信交给劳尔·卡斯特罗或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如果你发现所有人都回避见你，你也不必感到不安，可把信通过我们的大使转交。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我们不知道会如何对待我们的要求。菲德尔对我们生了气。再说，这是我们领导变动后同他们第一次接触。"他还作了这类性质的其他一些指示。

说实话，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样不嫌麻烦地安慰我这个党中央机关的新手，在如何完成这一十分重要的使命上给我提供帮助，这使我感动。(结果，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得到了对我们邀请的肯定答覆：劳尔·卡斯特罗受派来了莫斯科。我在古巴逗

留的第三天，菲德尔·卡斯特罗邀请我去潜泳，并在一起度过了第4天。[①])

另有几次，我也见到了同样的情况。勃列日涅夫的性格是不给他周围的人的生活找麻烦。相反，只要有可能，他总想使关系简单化。

他比起我们某些完全是在机关内部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来说，也还有这样一个优势，即他毕竟不是只有机关工作经验：不管怎么说，他到过前线打过仗，后来参加了对遭到战争破坏的扎波罗热地区的恢复建设，开垦过生荒地，并以中央第二书记的身份领导过国防工业，因此同工业和农业都有联系；此外，他还有在民族共和国工作的经验并领导过最高苏维埃。但是接触面广并未转化为开阔的视野和独立的见解。当时情况差不多到处都一样，当领导就意味着成为这种制度的一个部分。领导者的权力被缩减为把上面的指示向下传达的一种形式。而对那时的机关干部来说典型的领导方法就是催促下面“快点干，快点干”。独立自主精神和首创精神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受欢迎，这对干部的升迁非常有害。

但是，勃列日涅夫的许多缺点一开始也十分明显。他有一个恰如其人的名声，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智力也不高的人（虽然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比起其他领导人，如基里连科、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还是不差的，也许还要好一些）。但是，那些把他形容成非常愚蠢的人是不对的。他不仅有政治上的处世才能，而且具有灵活的机关工作经验，没有这些，在当时的政治座标系中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不！我说的正是勃列日涅夫能够表

---

① 我如此成功地完成任务，甚至使安德罗波夫也感到嫉妒。他认为我把任务完成得如此之好，我将被任命为驻古巴大使（当时正在议论更换驻古巴大使问题）。但他同我谈完后，事情就到此为止。——原注

现出政治敏感、聪明、甚至有政治技巧，比如：在中央十月全会之后，我认为他立即选择了非常正确的、有利的、能取胜的行为方式。

首先，可以说是他在行为方式上竭力“显示”出与赫鲁晓夫的鲜明对照，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人们对他千方百计地大肆颂扬，而起初勃列日涅夫没有这样做；赫鲁晓夫非常爱出头露面，常常出现在报刊、电影和电视屏幕上，而勃列日涅夫则不是这样（也是起初的时候）。起初他没有把自己装扮成“大人物”。他对自己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他甚至要求删去摘自经典著作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

与赫鲁晓夫不同的是，他对每一个问题从不表示自己的意见——在最初几年，他采取了观望、倾听和详细了解情况的态度，一句话，他显得非常谨慎，甚至表现出有些谦虚和一定的自尊（想起晚年的勃列日涅夫，这很难令人相信，但是，开始时是这样的）。如果他就某个问题发表谈话，那他尽可能做到有把握。这一点特别表现在苏共中央 1965 年 5 月全会上，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重要的，由他本人考虑的修改农业经济政策的意见，这些政策保证了农业在一个时期内有显著的提高。

然而，未必有人会怀疑，这个人即使在他的可以说是“极盛”时期，当他还较健康和比较年富力强并且还没有被绝对权力惯坏的时候，他也不具备真正领导人的素质，尤其是不具备一个处于极其复杂时刻的大国领导人的素质，而且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不断增加（关于这一点我下边再讲）。另外这个大国家还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祸害，正需要恢复。不过，第一，我国人民是非常能忍耐的。第二，当时根本没有更好的替代人，或者至少谁也

没有见到过这种可以替代的人……

关于勃列日涅夫的其他缺点，政治和道德品质方面的，我将在下边说，尤其是因为这些缺点不是在最初年代，而是在后来才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的。

这里，我想回到我开始说的问题上，即再谈谈给我们留下一片焦土的专横的极权主义专政的悲剧。这种专政最沉重、时间最长的后果之一，正是在于它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把国家置于软弱无能的领导之下，它消灭了千百万的优秀的人，使社会机体失血过多。它同时又建立了切断最能干和有才华的人的发展道路，却保证那些平庸之辈和无原则的钻营之徒（他们只善于争权夺利，搞阴谋，但不善于领导一个复杂的国家和解决国家出现的问题）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制度。

我不同意现在流行的关于革命后历史时期的简单化划分方法，即按那些同一些领导人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灾难来确定分期，如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后来是赫鲁晓夫唯意志论时期，再后来是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谈不上这些“后来”时期。斯大林个人迷信，如果如实地说，他的残酷的暴政、专制、专断的令人最痛心的后果之一，就是他将国家的未来置于危险境地，其中包括使国家陷于整整几代的软弱无能的领导之手。当你想到只是偶然的机会才使我们得以摆脱贝利亚、莫洛托夫、谢列平、波德戈尔内等人，我再重复一遍，那你就会得出结论：也许，我们还算是走运的。

这也就回答了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止一次给自己提出过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赫鲁晓夫，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犯错误？为什么只能采取阴谋手段撤掉他们，而不能像现代有章可循的国家那样进行合法的权力交接。当然，原因不是一个。但是，除了民主制度极不完善或者说根本没有民主制度之外，我想再次指出一点，就是领导都是由一些能力比较弱的，有时是能力非常

弱的人组成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个人迷信的机制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当然在这种条件下，就常常是根本找不出可以接受的人来代替不中用的，或者能力已枯竭的领袖，甚至还在这种领袖建立起比较专横的权力之前也找不出替代人来，而在建立专制权力之后要推翻它就只能使用武力，或借助于“宫庭政变”。

不得不非常遗憾地承认，要是不建立起新的政治机制和新的政治制度，我们就会像任何一个在自己不久前的历史中经历过类似的悲剧的国家一样，注定要陷入这种困境。只有建立新机制和新制度，才能确保强有力的人物，源源不断地进入领导层。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纠正或防止错误决策，并在必要时通过合法的和平途径更换领导人。我国在80年代后期开始的政治改革，其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但这场改革至今仍未完成。当赫鲁晓夫被罢黜的时候，依我看，还有绝大多数拥护20大方针的人都感到很不安和困惑；我们曾觉得失望，后来又获得了希望，我们也曾为局势的不确定性而苦恼。但是，大家仍旧没有失去信心，大家认为在政变之后，勃列日涅夫比其他候选人更为可取，因此值得我们给予支持。

但是，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勃列日涅夫的一些竞争对手和他的一些心腹人物正把党和国家推向右转。亲近他的、跟在他周围的有一帮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和莫斯科的人。那些不同勃列日涅夫竞争，但占据显要领导岗位的保守官员（如基里连科、苏斯洛夫、波利扬斯基、杰米契夫等人）也在使政策向右转，展开了一场可以说是为争取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心的真正斗争。许多人想使他成为右倾保守方针的传播者和主要执行者。这是条为斯大林主义恢复名誉，回到内外政策的陈规旧套的方针。

在这种斗争条件下，不可避免地需要选择立场，我和我的担

任咨议员的同志们当然都是自己决定这种选择的。但是，安德罗波夫使我们较容易地决定了这种选择，因为他很快地确定支持勃列日涅夫，我不认为他仅仅是由于支持领导的习惯几乎成为每个党的工作者第二天性才这样做的。不仅如此，他本人也亲自参与了（当然是谨慎地，是按当时的机关游戏规则参予的）为形成新领袖政治立场的斗争。那时起草每一份文件、每一次讲话稿和许多政治文章时都进行着这种斗争（如果这些起草的文稿分发给中央委员，因此，就会落到中央书记们和中央机关某些工作人员手里，由他们进行讨论）。

在业已形成的形势下，可以说主要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他想要干什么，又想些什么。起初，他非常谨慎，不想在任何事情上，在有关内外政策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上表明态度。如果要问我，他最初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我将很难回答。也许，在很多问题上他没有什么观点，因为勃列日涅夫没有当总书记以前，他甚至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重大的政治问题。他先是随声附和斯大林说的意见，后来是赫鲁晓夫说的意见——如此而已。这种情况在那些年我们的政治实践中已成为一种惯例而不是例外。至少他在大部分令人不安的迫切的政治问题上，从不发表肯定性意见，常常是一言不发，听别人讲(虽然，我不排除，对自己比较亲近的朋友，特别是非常信任的人可能也说点什么)。

因此，在十月全会之后的最初几个月，甚至最初几年，人们对他、对勃列日涅夫吹了很多风，吹了各种各样的风。人们为争取他的“心”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完全不是夸大其词。这场战斗是在各条战线上进行的。

进行斗争的主要场地，当然是苏共中央和政治局和书记处，战斗的余波传到了我们这里，其后又常常传到整个社会上。我们极少有机会进入这两个权力的圣殿，但是，从我们所能感觉到

的，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结论：主导的风是从右翼吹来的。我们的战斗是在较低的，但仍然是较重要的级别上进行的。各种决议、政策建议和讲话的草稿，还有领导人的回忆录，都是在我们这里起草的。在这个级别上，斗争比较公开，而且比较容易看清楚。在特别明显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右翼中，我要提一下特拉佩兹尼科夫，此人是勃列日涅夫早在摩尔达维亚时就看中的。他是一个装腔作势、半瓶子醋的假博学家的典型。后来他成为高级党校的教授。当勃列日涅夫成为总书记时，他把特拉佩兹尼科夫提升为党中央科学和教育部部长。他在那里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和个人品质：反动、爱刁难人、好斗、不诚实，常背信弃义。

同他相匹配的是戈利科夫，后者很久以前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他也自封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样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他像特拉佩兹尼科夫那样，一方面自认为是农业问题专家，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就在报刊上以理论家的面目出现，就各种问题发表文章——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甚至国际问题）。他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斯大林主义者，臭名远扬的反动分子。

他们两人在自己的周围网罗了一群臭味相投的人，展开了进攻，又非常坚决而巧妙地利用了领导人更迭时刻领导上自然容易出现的前后不衔接和犹豫不决，当然，他们还充分利用了同勃列日涅夫个人的亲近关系。他们企图根本改变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针，为此他们经常特别注意做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工作，使他成为他们的靠山，甚至成为他们观点的执行者。在勃列日涅夫的厨房内阁里还有契尔年科、吉洪诺夫、谢洛科夫。他们也都是保守分子，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

斯大林主义者在广泛的战线上发起了他们的进攻。在国内事务方面他们力求废除苏共20大和22大有关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决议，全部恢复斯大林的名誉，还企图把斯大林死后所提出的有关我们国家的过去和现状及有关内外政策的一些新思想宣布为错误

的和政治上有害的。当然，还要在史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恢复陈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在外交事务中，斯大林分子的目的是使政策方针更加强硬，也同样要放弃近年来所出现的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关系问题上的新思想、新观念。他们不仅竭力向勃列日涅夫的耳朵里吹风，而且顽固地要把这些东西写进他的讲稿和党的文件中去。

他们开展的对20大方针的攻击，应该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尽管当时不存在被公认的民主力量的领袖人物。显然，更新社会主义和洗刷掉蒙在社会主义理想上的血腥和污秽的思想不仅在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也在党内得到了大力支持。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某些成员，还有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也反对这种急剧的转变，看来有些奇怪，甚至苏斯洛夫，据我了解，也反对急剧的转变而主张谨慎从事。此外，一大帮中央机关本身的人也加入了日常起草讲话、文件和重要的工作过程中展开的激烈的“阵地战”。在他们当中起一定作用的是两个国际部的咨议员以及中央宣传部的某些负责干部，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参加了这项工作的学者、记者、专家们也起了某种作用。他们都力所能及地抗击了斯大林分子的进攻。

苏共23大是平淡和保守的。但23大没有按照斯大林分子的意愿，推翻20大和22大的决议。可以把它看成是民主力量的部分胜利。在官方文件和讲话中时而还提到党的20大和22大（虽然要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直接批评写进这类文件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这也是一种胜利，尽管现在看来有点不可理解，甚至可笑。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些象征，向公众表明“堡垒”并未失掉。在对外政策上也保留了某些“创新的提法”，其中包括“和平共处”的概念，尽管围绕这个概念在一段时间内曾经出现过尖锐的斗争。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不定，在涉及具体政策问题时也一点一点地得到了克服。1966年夏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政

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批准了向西方建议就建立全欧安全体系进行谈判的主张。也就是说，开始了 9 年之后导致签署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进程。

但是，在当时的力量对比情况下，在这场初战中民主思想并没有能够取胜。斯大林分子占据了某些强大的阵地，这里指的不仅是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岗位上任命了他们的一些人。官方的语调改变了。这些变化是从一些象征性事物开始的，但是在我们这个人们早就学会了在字里行间捉摸言外之意的社会里，它们也是极其重要的。例如，斯大林的名字在批评他的罪行和错误的文章中就不再出现了，却开始越来越经常地从赞扬和肯定的意义上提到他（好像 1965 年 5 月勃列日涅夫做的战胜法西斯德国 20 周年的报告是正面提到斯大林名字的第一个文件）。报刊上的文章中越来越少地去探讨和提到 20 大之后成为热门的那些话题、思想和概念。相反，“阶级性”、“党性”、“思想纯洁性”、“同修正主义作不妥协的斗争”等诸如此类的词汇——从斯大林时代就惯用的全套意识形态词汇——却成了关键性用语。

总而言之，第一次战斗好像是以妥协而告终。一方保留了某些东西，而另一方也得到了一些东西。

关于斯大林分子反攻的另一个较为隐蔽的方面，即我称之为争取勃列日涅夫的“心”的斗争，也可以说是同样的情况。

尽管包括勃列日涅夫亲信在内的保守派粗俗无知，在某些方面还迟钝呆板，可是他们有着重要的力量源泉。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早就非常了解勃列日涅夫，也了解他的弱点，因而能够相当巧妙地利用这些弱点。我想，由于勃列日涅夫开始时是个道地的乡巴佬，几乎没有同多少受过教育、学识渊博的人打过交道，所以他甚至真诚地相信，他以前的心腹们是政治、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行家，他们会帮助他不犯错误和少说错话，而随时都能够给他提示相当有价值的思想。至少他们能够帮他弄清楚某个声

明、建议或提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看来，当勃列日涅夫当了总书记之后，这个问题特别使他焦虑不安。他认为，这时候只要做一点“非马克思主义”的事，他都是完全不应该的，因为全党，甚至全世界都在看着他。而列昂尼德·伊利奇本人在理论修养方面是非常弱的，这一点他非常清楚（起初，他甚至也承认过)。

但是，这些人终究没有能达到他们想的主要目的，即达到垄断“勃列日涅夫的耳朵”，垄断马克思主义“最高祭司”的地位，垄断提供理论咨询意见，尤其是垄断政策咨询意见的专利（的确，他们也想竭力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在这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勃列日涅夫固有的极度谨慎。虽然最初他是信任这些人的，但并不完全有把握，他担心受到误导。因此，他很快也就开始寻找可供选择的不同意见和观点。

我认为，在这种局面下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安德罗波夫很快地而且明确地表明了他对勃列日涅夫的支持（顺便说一下，他对勃列日涅夫是绝对的忠诚的，虽然他不会看不到勃列日涅夫的弱点和最后几年完全没有能力履行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基本职责的情况)。因此，在十月全会之后最初几个月，安德罗波夫就具有向勃列日涅夫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尽管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非常谨慎（我个人常想，他过分谨慎了)，但他是能够在某些问题上对负面压力起到某种抗衡作用的。

不久勃列日涅夫的其他两名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和楚卡诺夫开始起到日益增长的作用。亚历山德罗夫是勃列日涅夫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从外交部借调过来的专职外交官。当然，在智力方面以及在政治和为人正派上，他比戈利科夫和特拉佩兹尼科夫要高出一大截，他至少能够抵制掉他们在外交政策上进行的狂妄攻击。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依我看，亚历山德罗夫是相当保守的。

至于楚卡诺夫，他是一位职业冶金工程师，过去是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大型冶金厂的厂长。勃列日涅夫在提任中央第二书记的时候，把他从地方上调来的目的是让楚卡诺夫帮助他对国防工业实施总领导。而当勃列日涅夫当上总书记后，楚卡诺夫又掌握了更广泛的职能，他开始帮助勃列日涅夫掌管经济事务，而随后又管理其他事务。由于楚卡诺夫不认为自己是各种问题的行家，他开始吸收专业人士来作为咨询专家。

我不能说，楚卡诺夫在一开始对一些斗争特别尖锐的问题，如关于斯大林和20大方针以及关于和平共处等问题就有明确的政治思想立场，但是，他很快找到了正确的参照点。这不仅是因为他非常熟悉勃列日涅夫周围圈子里的人，而且他对他们中多数人都非常反感。这促使他不得不寻求帮助，吸引一些思想进步的人帮助他完成勃列日涅夫交代的任务（他经常向安德罗波夫请教，因为他非常信任安德罗波夫)。这样，在他完成勃列日涅夫交付的任务时，常吸收一些人对他从其他助手里收到的文件和材料进行评论，提出意见，这些人中就有伊诺泽姆采夫、鲍文、扎格拉金、本回忆录作者以及沙赫纳扎罗夫、西塔良、苏哈列夫斯基、阿格拉诺夫斯基等人。

由于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可能，还有许多未提到的人的努力，很快就形成了抵制斯大林分子肆无忌惮地对勃列日涅夫施加的影响的抗衡力量。

当然，那时以及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本人在想什么，他的信仰是什么，他总不能把自己的观念保存得像一张白纸或一块白板，让别人在上面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要知道，他几乎是60岁的人了，他担任过重要职务，几乎经历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在斯大林在世时召开的19大上，他进入了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从这时起成为苏共中央委员。而从1959年起他在莫斯科更重要的岗位上工作

过，如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这里正好有一个特殊现象，按人所共知的美国说法，包含着我们时代（而准确地讲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肮脏的小秘密”。这就是在斯大林时期造就的，而在赫鲁晓夫时期以及后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大概是按同样规则培养和提拔那种类型的领导干部，当“老人们”退出政治舞台时，这种领导干部实际上根本不是政治领导人。除最高领袖之外，行政命令体制不需要政治活动家，相反，他们是行政命令体制的大忌。

娴熟地掌握了机关游戏规则的机关干部、官吏成了典型的领导人。这种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有时虽然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凭，实际上没有什么文化，他了解的马克思主义也仅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范围和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常识，他容忍不了不同的观点和新思想。他不习惯，也不喜欢负责任。这种类型的领导人通常没有坚定的思想政治原则——否则在无休止的破坏和变动中是根本保存不了自己的，但是总的来讲，他们是靠从斯大林主义世界观中汲取少得可怜的思想成长起来的。虽然在赫鲁晓夫之后，这些人有某些改变，已不再走极端，也具有了某些新的政治观念。说实在的，赫鲁晓夫本人心态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这样的。所不同的是他可以更多地为所欲为，除了相信自己之外，可以不听任何人的意见。

当然，这并不排除头脑多少有点清醒，多少有些生活经验的各类活动家，作为个人会对人（当然除了竞争对手）持善意态度，也会有某种程度的求知欲。

勃列日涅夫就属于这种类型的领导人。同时，在这里，我敢同许多人争论，他是典型的这类领导人，而不是他们中最坏的领导人，至少在他领导党和国家最初年代里是这样。我想，我们在重构和恢复历史的真实时，我们不应在历史上树立一个漫画式的斯大林或漫画式的赫鲁晓夫、漫画式的勃列日涅夫，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段漫长的历史以至我们自己也搞成漫画式的了。

当然，这里我们也应该牢记某种“权力的魔力”，在某段时间里它可以使任何一个领导人在人们的眼中成为一个比他原来的本人还出色、魁伟、甚至还聪明的人，使他的一言一行都具有特殊意义。这是权力给予领导人的一种特权，至少在开始时候是这样。至于他如何利用这些条件，特别是在刚开始时的更广泛的条件，则是另外的问题了。

我认为“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是懂得这一点的。他与柯西金一起进行了在农业和工业方面的某些改革，使得第八个五年计划（1965—1970年）成为我国经济史上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至少从开始实行五年计划以来）。在由于罢黜赫鲁晓夫引起局势不稳和向后倒退而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时期，勃列日涅夫即使有过动摇，但仍然保持了稳定。虽然他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也作了后退。在那个时期（我指的是到70年代中期以前这个时期）也在一系列外交政策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到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所有这些积极成果几乎什么也没有剩下。消极趋势实际上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看到这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记在这种衰落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也不要忘记它更深远的原因。

我扯得太远了，再回到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之后的最初几个月和几年里为争取新领导的“心”而斗争这一题目上来。我要说的是，他成为全国第一号人物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很快就开始有变化（也许，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一般讲，在责任上、处世态度上，当然，还有在处理事情的方法上，全国第一号人物和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差别要比在政治局委员之间以及高层与中层的机关官员之间的差别大得多。

用集体领导代替由个人迷信将其发展到极致的大权独揽，并没有使情况有所改变。我国是否有过这种代替，而一般讲这种集

体领导的管理形式是否可能和合适，或者这种形式上只不过是用以取代对稳定和进步确实必需的真正民主的代替品，而且是使具体领袖可不负个人责任，也就是形成某种政治“连环保”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在一边，不去研究。

形成国家第一号人物的这种差别和特殊地位的原因并不是唯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权力，而且是巨大的权力及其对一个人的个人品性的影响。另一个原因仍然是责任。当事情到了需最终做出决定时，最高领导人就应该说“行”或者“不行”——这个责任根本无法推到别人身上。正是在这个边缘上，意见变成了政策，而语言则变为涉及到很多人和国家的利益和命运，有时涉及到国际社会的利益和命运的举动。

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的印象，我和他是在1965年初认识的），勃列日涅夫当上苏共中央书记后，他很难适应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角色，他觉得落在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虽然他对有这么高的地位（说句俏皮话，那是当“沙皇”！）毫无疑问是非常高兴的，但他也感到胆怯，并小心谨慎，他很怕犯错误，怕承担责任。陈旧贫乏的知识和对事物所持的外省人的看法，狭隘的、甚至是小市民的庸俗眼光，这些当然非常严重地加重了他身上的负担（后来，这些都起了很坏的作用）。我觉得有个时候他感到“自己支持不下去了”。后来，他又出现了过于自信和自以为是的毛病，这当然也少不了阿谀奉承者的帮忙，而这种人从斯大林时期起可以说就成为对国家政治领导最大的危险，确切地说，是对各级领导的最大危险。而关于更晚一些时候使他一蹶不振的疾病、年迈甚至颓废，我将单独来谈。

在十月全会之后的最初两三年中，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和政治观点曾有过一段积极的变化。虽然他仍然相信自己的老顾问，但是他开始明白，作为总书记不能只依靠他们这些人，他应该扩大获取信息的渠道，听取更多人的意见（而且是各种不同的意见）。

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开始倾听安德罗波夫这个党的领导人当中不一般、不寻常的代表人物的意见。通过亚历山德罗夫和楚卡诺夫，有时，他自己亲自邀请更广泛的、对那些年代党的机关来说非典型的人去完成任务。同时，勃列日涅夫真的对许多事情发生了兴趣，并愿意听人给他讲（他不喜欢阅读书面报告，他觉得听口头汇报比看书面报告效果好，因此呈报给他的报告，他总是要求读给他听）。因此，正如谚语所说：歌里的词是删不掉的，他起初通过听别人讲接受了很多东西。

真的，这里有个很有趣的规律：新领导人对属于他认为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东西表示感兴趣，并愿意听取和接受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准备公开承认（也是在最初时期）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在文化问题方面，甚至在意识形态和马列主义理论方面都不内行。然而，他确信，他非常熟悉农业，甚至很熟悉实际的经济工作和军事问题。他也非常了解人，了解干部，是党务工作的行家。据我所知，想就这些问题同他交谈时企图说服他，那几乎是毫无用处的。

不管怎样，在那最初的年月里，通过很多人共同的但是分散的努力，得以大大地削弱包括个别政治局委员和勃列日涅夫自己随从中的不够格的理论家在内的最气势汹汹的斯大林分子对新任总书记的影响。当然，这是通过顽强的斗争才做到的。在准备23大的每一个环节上，在代表大会上，甚至在起草每一个文件或讲话稿的过程中都有艰苦的斗争。

我参加过很多次最尖锐的争吵，其中一次是围绕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稿爆发的。这是1966年11月初，他以新领导人的身份第一次出访格鲁吉亚时（当然是为了授予共和国勋章）的讲话稿。讲话的初稿是在特拉佩兹尼科夫和戈利科夫及其格鲁吉亚朋友们的领导下起草的。这份初稿完全是企图公然颂扬斯大林，重新宣布他是伟大领袖。大概勃列日涅夫拿到讲稿后，感到有些疑虑，

将它转给了楚卡诺夫，让他提出意见。虽然楚卡诺夫并不善于识别意识形态方面的微妙之处，但他已非常明白这样一份讲稿会惹出麻烦来。他想在与勃列日涅夫谈话之前，拥有足够的论据，因此他要我给他提供详细的意见。那天较晚的时候，他告诉我，勃列日涅夫要我明早 9 点钟去见他。

为了不破坏对顶头上司安德罗波夫的忠诚，我向他报告了这件事，给他讲了那篇讲话初稿的内容，并征求他的意见。他对我说："好吧，你既然卷入了这件事，那你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没有听出他话中有任何不满之处，也没有要我谨慎从事和避免发生冲突的劝告。我了解他，他这种回答也是我预料之中的。

之后，我就坐下来，开始准备，而且搞得很晚。我经过考虑之后认为，"推翻"讲话初稿的最有效的办法不在于强调需要在政治上表现正直（一个人在揭露斯大林是罪犯之后，现在怎么可以又来颂扬他呢?)，不是抽象地去议论个人迷信的危害以及个人迷信如何有悖于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用最具针对性的论据，去论证新领导人如作这样一篇讲话会对他个人、对党和国家带来极其有害的实际后果。

第一个论据：讲话将会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引起极大的麻烦（我曾在专门做这些国家工作的联络部工作过，从这个问题开始是很自然的)。我决定提醒勃列日涅夫，其中有两个国家的过去被斯大林投进了监狱，而又奇迹般地活下来的人已成为他们的领导人，这就是匈牙利的卡达尔和波兰的哥穆尔卡。第三个国家保加利亚，20 大之后过去的领导人因滥用权力立刻被中央全会撤职，我们在他们那里能做什么，是不是要重新更换领导人？要知道，这正是当地的斯大林分子求之不得的，莫非现在勃列日涅夫在这个本来就够复杂的时刻，真的需要找这种麻烦？

第二个论据：西方国家共产党将会有什么反应。这些党非常

艰难地，而在某些地方、在政治上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领会了 20 大的精神。现在他们该怎么办：站在反对我们的立场上或者重新“原地向后转”，证实对他们如下的指责是正确的，即他们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像奴隶般地随着莫斯科政策的所有变化和折腾转？

第三个论据：国内问题。我不怕麻烦地重新阅读了 22 大的速记记录，当时关于 22 大的记忆还没有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我摘录了其中一些活动家有关反对斯大林的最精彩的发言，这些活动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其中有谢列平、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还有那位姆扎瓦纳泽和其他一些人）。不久前，他们还痛斥斯大林，要求把他的遗骸从陵墓中挖走，为遭受斯大林迫害而蒙难的人建立纪念碑，而在新的总书记发表这篇讲话后，他们在全党、广大的苏联公众和国外公众的眼里将会是怎样的形象呢？他们将如何问心无愧地面对人们呢？或者是勃列日涅夫同志想专门毁坏他们的名誉，以便以后同他们分手？最后一点是，人们会不会向勃列日涅夫本人提出，你过去在哪里？勃列日涅夫同志是否参加了从 19 大起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他在过去十多年中是不是中央委员？

我就是带着这种设想去见勃列日涅夫的，事情完全像我所设想的那样实现了。唯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当我和楚卡诺夫进入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互致问候之后刚坐下来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就建议说：“我们为什么不把安德罗波夫请来呢？”于是立刻就把他请了来。这样一来，我就把在家里准备的全部意见同时向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两人作了汇报。

我感觉到，论据产生了影响，勃列日涅夫显得忧心忡忡，时而打断我的发言，问安德罗波夫是怎么考虑的？而安德罗波夫，依我看，选择了非常成功的策略。他每次在细节上作些不大的变通说法，比如说，“是的，阿尔巴托夫同志有点感情冲动，可能

有的地方说得过了一点，但是，在原则上可以认为会出现他讲的那些损害。”他也补充某些自己的有时是相当有分量的意见。

最终，勃列日涅夫委托我们三人赶快写出新的讲话稿。我不敢说写成的新讲话稿就一定思想深刻和充满新观念，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新讲话稿里，斯大林的名字只提到一次（我简直不能再多提了）——是在格鲁吉亚革命斗争组织者的名单中提到的，而且是按字母顺序排列（就是说接近名单的末尾）。但是，同时在讲话中也提到了20大。在那个时期，特别是考虑到这个讲话是在格鲁吉亚发表的，而当时那里要求恢复斯大林名誉的情绪非常强烈。这样做就是证明以前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问题的已定方针是不可更动的。

我形成了一种印象，后来，在这个插曲（也许有好几个我所不知道的其他类似的插曲）之后，勃列日涅夫关于对待恢复斯大林名誉问题和撤消20大决议问题就谨慎多了。很可能是在十月全会之后，要求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开头由于他自己是“赞成”还是“反对”没有把握，所以没有立即着手考虑有些人怂恿地采取的措施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后果。而怂恿他的人不仅是特拉佩兹尼科夫和戈利科夫，而且还有在党内地位较高的人。

那时（1965—1967年）我觉得，在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形势下，政治方针转向正确路线的机会在增加。产生这种当然是非常谨慎的乐观主义的根据是什么呢?

首先，新的“宫庭政变”和谢列平上台掌权的威胁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勃列日涅夫及时觉察到这种威胁（谢列平在巧妙地进行一次“宫庭政变”时曾经起过巨大作用这一事实，依我看，使勃列日涅夫特别警觉起来）。从1965年秋天起，勃列日涅夫展开了反攻。如果他开始了这场战事，这场战争照例就会进行到底。

对付谢列平也正是如此。[①]“铁拳舒里克”日益失去他的重要性。在1965年秋天，人们清楚地看出，谢列平根本不是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更不是领导人的候选人，而可以说，他只是政治局的“普通”成员。随后，不再让他领导组织党务工作和干部工作，而叫他去掌管商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同时把和谢列平亲近的人调到其他没有政治影响的工作岗位。内务部部长季库诺夫被调任做外交工作，派往罗马尼亚。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梅夏采夫派往澳大利亚当大使，塔斯社社长戈留诺夫被派往非洲的一个国家。对谢列平的最后一击——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是1967年5月谢米恰斯内被撤掉克格勃主席的职务。众所周知，他的继任者是安德罗波夫，据他讲，这个任命对他来说是完全出乎意外的。我记得，政治局作出决定之后的第二天早晨，他顺路到了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把我们这些咨议员们召集在一起，和我们大家告别。他一边笑着一边讲述了苏斯洛夫和佩尔谢是怎样从决定问题的会议一开完就立即把他带到位于卢比扬卡的大楼(他过去对这座大楼总是“敬而远之，绕道而走”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们作介绍的；后来他还对我们讲过，当他自己一

---

① 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对手和竞争者，赫鲁晓夫则是从政治上清算他们——对他们提出某些指控（这些指控是否正确，则是另一码事儿），在全会上和中央委员会的内部信件中猛烈地抨击他们，组织相应的批判运动等等。他正是用这些手段对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这个集团的其他代表人物以及朱可夫元帅的；贝利亚的被捕并被枪决则是唯一的例外，但这是特殊情况。而勃列日涅夫的做法是机关式的。他从领导层当中排挤走了许多人，更不用说米高扬，他这个作为与赫鲁晓夫非常亲近的人的命运在十月全会上就预先决定了，如果单讲政治局成员的话，那么有谢列平、波利扬斯基、沃罗诺夫、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但是他从未对他们提出过公开的指责，也没有出面反对过他们；只是没有任何理由地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事情也就到此了结。处理级别低一点的人也采用这种做法：或让他们领取养老金退休，或调动工作，经常是派往某国当大使，通常不作任何说明，甚至也不同他们进行谈话，也不说为什么，更不听取本人的意见；给寄去一张决定摘录，事情也就办完了。据我所知，勃列日涅夫根本不喜欢进行令人不愉快的谈话，当应向本人当面说点什么时，他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这种谈话。——原注

个人在这座大楼里时，想到过去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不由得一阵瑟缩，感到非常不舒服。[1]

不久事情有了结局——谢列平先从中央书记处除名，然后又从政治局除名。

除了谢列平的下台以外，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发展。正好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斯大林分子的图谋在23大上没有得逞。尽管当时意识形态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仍未稳定，还存在着矛盾，但是，总的来讲，与赫鲁晓夫最后几年的情况未必有多大区别（为了避免误会，我想预先指出，我指的正是最后几年，即1963—1964年，当时在以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顶点和象征的向左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文化政策急剧地向右转了）。形势会好转的希望并没有消失。非常重要的是经济领域的形势很好。早在赫鲁晓夫时期由《真理报》发表哈尔科夫地区的教授利别尔曼的文章，开始的经济讨论仍在继续进行，1965年秋导致制定了一整套非正式的称之为经济改革的实际决议。

最后，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纲领，好像也朝着相当积极的方向演变，所以1967年是显得特别顺利的一年，当我们开始起草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讲话稿的时候，我们对形势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当时像我们这种地位的人只有在起草一些重要发言时，才有可能就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同勃列日涅夫进行交谈）。

---

① 过了一些时候，不是由于生日，就是由于得到某种奖赏，鲍文和我给安德罗波夫送去了一首开玩笑的祝贺诗，诗中在其他话题之间也表达了担心极高的地位会毁了他，怕他会骄傲起来，因为权力会使人变坏。

他也回了一首押韵的诗："某个恶人曾经胡言，仿佛总是权力使人变坏，从此聪明人多年来对此信以为真，却看不到（在此进攻一下！）更多的是人把权力用坏。"

很难同这种看法争论——这也是我们不止一次地碰到的真实情况。但是，回忆起来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在什么时期是什么样子，不由自主地会想到："毕竟、毕竟、毕竟……"可是关于这一点需要专门来谈。——原注

委托起草这个报告的第一稿的任务早在5月初就交给由伊诺泽姆采夫、扎格拉金、鲍文和我组成的写作组。我们竭尽全力去写，想在讲话中把我们看来是最重要的问题都提出来，并对当时最迫切的热门问题作出回答。结果写成了一个长达100页之多的，而且是繁杂的讲话稿。在勃列日涅夫的催促下，我们不得不把草稿交给了他（后来，我想起了库西宁喜欢讲的一句口头语："不要把未写好的稿子给首长和傻瓜们看"）。

这一稿他很不喜欢。我们想，主要原因是讲稿中讲到的新思想太多，用语太严肃，不合他的口味，而且不少地方写得太复杂。部分原因可能是某人在给他念原稿的某些段落时念得枯燥、令他厌烦（我已经说过，他喜欢听人念，不喜欢自己看），因为后来才知道当这些段落从第一稿挪到第二稿后受到了肯定和赞扬。可能还有不知哪一位把他弄糊涂了，给他提了完全是另一种想法和建议，说什么要把报告写得"高度四平八稳"，写成"我们胜利的赞歌"或"我们伟大事业的颂歌"。这些怀疑后来得到了证实。

不管怎么样，向我们传达了他的持否定态度的总评价以及一些意见和建议，他要求尽快起草新的报告稿。不久，我们得知，勃列日涅夫对第一稿相当恼火，以致通过杰米契夫委托另一个写作组去撰写报告（这个组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雅科夫列夫领导）。这项工作是我们同勃列日涅夫本人一起进行的，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进行讨论和辩论的许多机会。最后，在正式的报告里通过某种方式把两份稿子揉合在一起，看来这两份稿子是相通相容的，这主要是由于雅科列夫所起的影响。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报告的最后定稿工作，这项工作在扎维多沃进行了好几个星期，两个写作组和勃列日涅夫的几个助手都参加了这项工作。而在某些阶段勃列日涅夫还邀请了安德罗波夫、波纳马廖夫和杰米契夫参加。在这些非常坦率，而有时非常

热烈的讨论中，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问题，如斯大林及新经济政策问题、没收富农财产及经济改革问题、20 大及创作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与西方国家关系问题等等。同时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非常专注地听讨论发言，有时甚至抛出一些新的题目让大家讨论。那时候还可以和他展开争论，甚至有别人在场也不介意。也曾出现过他大发雷霆，说些刺耳的话，但是经过一两小时，最多到第二天，他又注意倾听不久前的论敌的发言并不断地向他提出问题，也就是向论敌示意，他什么也没有向心里去，一切和过去一样。总之，这还是他对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并且也力图看到这些问题本身的时期。

最后写成的报告，从报告本身来看，即使按当时的标准来评论，也不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由于考虑到那些在起草工作快结束时收到报告稿的政治局委员们提出的意见，把稿子中较为鲜明的思想和精彩的段落都给删掉了，所以报告显得一般化，没有任何特色。另一方面，同勃列日涅夫进行的长达几个星期的讨论则预期会产生结果，从对他的“启蒙”这个意义上说是使人感到有希望的。由于当时改革开始遇到了困难，所以这些讨论涉及到大家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对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国际问题、在经济问题上寻找新的重大的解决办法的必要性，等等。也多次提到了扩大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自由的必要性。当时勃列日涅夫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有一次，他曾说，他仍感到羞愧地记得赫鲁晓夫同知识分子的几次会见（不知为什么他特别记住了赫鲁晓夫对女诗人阿利格尔[①]发脾气的粗暴态度）。他答应十月革命节之后一定接见知识分子代表，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虽然当他被说服必须进行干预时，曾有几次他也出

① 阿利格尔（1915— ），俄罗斯女诗人，是著名长诗《卓娅》的作者，出版过《出生之年》、《怀念勇敢的人们》、《列宁山》等诗集。——译注

面保护过个别戏剧家或作家，使他们避免不幸。我想，1967 年秋天对他来说是首次发生了有关萨哈罗夫院士的问题。我记得这好像是由于萨哈罗夫给他写了第一封信，勃列日涅夫说要接见他，可惜，后来把这件事委托给了苏斯洛夫，而苏斯洛夫则躲开了这次会见。我完全不能肯定，同萨哈罗夫的会见对启发领导人的思想或使萨哈罗夫免遭迫害是否会有一点积极的效果。但是，我感到这个机会是被错过了。

还有一件事，我们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现在好像勃列日涅夫已确信，他的亲信中那些向他施加压力的斯大林分子不仅立场是错误的，而且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政治上也是无知的。不仅如此，他曾单独地对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说（这是他俩“悄悄地”告诉我们的），他决定要和斯大林分子中的一个人——戈利科夫分道扬镳，并下达指示给戈利科夫找别的工作(这一许诺勃列日涅夫也未实现，并和他一起共事到自己去世，尽管后来由于戈利科夫及其狂妄行为在勃列日涅夫那里曾产生了不少冲突)。

不管怎么样，在起草这个用于庆祝活动的讲话之后，我们都十分满意地回家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可以有助于推动政策的积极变化。不幸的是，1968 年却发生了向右转，至少在国内问题是这样。这种向右转不是指斯大林分子一直想要的那种正式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以及谴责 20 大，总之，不是指他们在十月全会后立即开始想要达到的一切，而是发生了另一种情况。即政策变得更强硬，在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拧紧螺帽”，国内的心理和政治气氛明显恶化。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这次向右转的明显标志，也许是向右转的重要原因之一（最低限度是促使我国政治向右发展的深远趋势的催化剂)。从 1968 年 1 月起，我们的领导就已经开始急躁不安起来，这是我通过官方消息和同志们亲眼目睹的事实间接感

觉到的，因为我自已从 1967 年 12 月就离开了中央委员会机关，着手组建美国研究所，直到第二年的秋天与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实际上没有接触。

在当时的国内政治事件中，人们记忆犹新的是 1968 年 2 月或 3 月召开的苏共莫斯科市委员会全体会议，勃列日涅夫参加了此次会议。在这次全会上公开宣布了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实行"拧紧螺帽"的方针，显然这是由于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发展的影响。也许，持不同政见现象的根源应该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一个新词"爱签名的人"也是当时出现的，这是称呼那些在某些保护受迫害的人和受新闻检查机关压制的作品的信函、呼吁书和请愿书上签名的人的。持"不同观点"的人（即持不同政见者）同"爱签名的人"一样，开始被残酷无情地撤职，受到党纪处分。这也涉及到了苏联科学院，尤其是当时的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他在市委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谴责所谓"不忠诚的人"（这篇讲话败坏了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声誉，他所以需要发表这篇讲话，部分地是因为他的妹妹也在"爱签名的人"之列，他对此感到害怕)。新闻检查变得更严格了，许多原先决定出版的文章和著作从编辑部和出版社计划中扣了下来。

斯大林分子马上想方设法利用这个业已形成的形势，开始了他们大肆活动的一年。领导层中最保守的人如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格里申、杰米契夫等，以及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内和社会科学领导机关中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组成的"突击队"都公开出来发起进攻了。

关于 1968 年八月事件我不打算讲了，因为除了众所周知的以外我也没有什么可补充，我只记得，我更多的是感到极度的羞愧，为我国的政策感到羞愧，为我国领导人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因此，当外交部美国处处长科尔年科就一些日常工作给我打电话，并在谈话末尾对我说他正在起草一封给美国总统约翰逊解

释我们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的信时，我极为气愤。我甚至不能平息下来到高加索去休假（我原计划第二天早晨就启程，我家里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那天晚上，我给我的夫人打了电话。当时我不想见任何人，我感到羞愧，感到痛心。

我深信，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其中也有共产党员，也包括那些过去我认为是正统的人（比如1989年已去世的原《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的编辑哈温松）也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也忘不了另一件事。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的一两天我一时气愤，毫不客气地向楚卡诺夫以及克留奇科夫说了我对我国政策所想到的全部看法。克留奇科夫也曾经在中央联络部工作过，后来被安德罗波夫聘请到克格勃担任很高的职务。不管是他，还是楚卡诺夫都没有向首长“出卖”过我。我猜想勃列日涅夫，特别是安德罗波夫，他们意料到并清楚地知道我与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代表（包括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人）对这次行动持什么态度。

正像许多人预先就看到的那样，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对国内形势及整个政治发展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看来，这种影响比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消极。

就这次入侵对我产生的效应来说，它使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统治精英的帝国野心是多么有害（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精英们在一般群众中常常有支持者）。在60年代末，我们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冒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在助长国内的保守趋势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一个停滞时期。

帝国政策在助长保守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此时由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像多米诺骨牌那样解体，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力量自改革开始后第一次加强起来。党、军队和克格勃的保守官员参加了这个反对派。而当帝国的解体扩展到波罗的海国家、摩尔多瓦和高加索国家的时候，这个反对派在这些地区讲俄语居民中的极端分子中得到了

广泛的支持。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的研究。这里我要提醒读者的是，这些反对力量和领导他们的人在为1991年八月政变作心理和政治准备方面曾起了不小的作用。帝国外交政策和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国内政策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我前面曾引过赫鲁晓夫的说法，即如果诺沃提尼听了他的劝告及时揭露了他的前任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所犯的罪行，1968年也就不会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了。我也对他这一说法作过评论，认为单单揭露过去的错误和罪行还是不够的，如果不随之进行深刻的改革的话。但是，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本身来看，赫鲁晓夫可能是正确的。批判过去可以起到通风口、阀门的作用，把阀门打开可以降低社会上的政治压力。特别是如果所有这一切发生在赫鲁晓夫还是苏联领导人的时候的话，这样，捷克斯洛伐克的变革就有可能顺着苏共20大和22大的浪潮而动，因而会得到莫斯科的理解，甚至同情，而不至于被莫斯科看作一种挑战，看作会引起苏联国内问题的挑战。这样，两个国家的政治周期多多少少会是相吻合的，全部事情可以容易地得到解决，而无需进行对抗。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生。1968年初，莫斯科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放弃20大的路线。当时存在着一股要求完全放弃20大路线的政治势力，他们发挥了作用。很自然，他们以及在他们影响下，苏联有很多人一开始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变革持怀疑和越来越不信任的态度。

我国领导人对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所持的消极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其形成不是在1968年7月，也不是在8月，甚至也不是在5月，而很可能是早在1968年1月就形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改革方针本身引起了出于纯粹是国内原因和不愿意走变革之路的敌视态度。布拉格也一定觉察到了这种恶意的敌视态度。依我之见，正是这种态度一开始就促使捷克斯洛伐克党和

国家的温和改革派领导变得激进起来，并把他们推向后来被称之为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和反革命政治力量一边。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引起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国家日益增加的怀疑和不信任。看来，事态的发展就这样螺旋上升，直到发生悲惨的结局。

还有一个情况使得事情越加复杂，我对此非常了解，因为我在中央联络部工作了三年多。这可以说就是机关工作人员中的个人因素，也就是在中央机关中负责某个具体国家的人员的气质的作用。那时候这些高层工作人员仍然保持着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某种心态，即当时苏共中央负责东欧国家的“指导员”不仅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国家的“总督”，而且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他们作为来自莫斯科的党的干部是真理和权威的最终仲裁者。任何人如果反对他的意见就是敌人或最低限度也是修正主义分子。

安德罗波夫明白这种情况。他曾不止一次地讲，工作人员的这种情绪、这种思想作风政治上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会妨碍与盟国发展正常关系。但是，遗憾的是，在这些人当中，他几乎一个人也没有撤换掉。这样在1967年联络部里许多负责处理我国与盟国关系的工作人员，还是用1953年以前的那些标准和心态来思考问题。此外，他们在他们负责的相关国家的党的干部中既有他们信得过的朋友，也有他们不喜欢的敌人。他们逐渐以自己朋友、信得过的人和喜欢的人（这些人也就在那个国家形成某种“莫斯科帮”）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国家。

但是，既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被视为某个国家问题的“专家”，他们按工作的责任向领导报告该国的情况，人们毕竟是相信他们的，也听信他们的意见。

1967年初，我们主管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专家”就是中央联络部处长科列斯尼科夫和我国驻布拉格使馆公使级参赞乌达利佐夫（过去他也在中央联络部工作过，此人不同于科列斯尼科夫，他聪明，甚至有文化素养，但同时也是旧教条坚定不移的拥

护者）。我很难判断他们起的具体作用是什么，但是，我想这个作用小不了。[1]领导人所得到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不正确的惊慌失措的印象，也许就是使双方紧张关系急剧升级的一个原因。

我不知道出兵的致命决定是怎样作出来的。根据我信得过的人们提供的证言，勃列日涅夫把出兵决定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犹豫不决，简直害怕使用军事力量。至于其他苏联领导人，关于他们的立场只能猜测了。大概，现在会出现来自于“布拉格之春”领导人本身的许多可信的材料，这些材料可以根据几乎不间断地进行几个月的谈判中所产生的印象，形成非常肯定的看法。

1979 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是捷克斯洛伐克侨居美国的政治学家瓦伦塔所撰写的《苏联 1968 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对决策的剖析》[2]，这本书是根据他本人的印象、现有的文献以及与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的领导人的谈话写成的。他证实了前面所讲到的对勃列日涅夫的立场的看法是正确的。至于柯西金，据瓦伦塔所下的结论，他反对军事干涉，但是在“主张干涉者”的压力下，他终于也同意了。苏斯洛夫，还有波诺马廖夫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预定在秋天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面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军事干预可能破坏这次会议），几乎一直到最后都在寻求政治解决。

这本书的作者指出，积极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人有：谢列斯特、佩尔谢、波德戈尔内、马谢罗夫、杰米契夫[3]。基里

---

① 这种几乎是对情况通报和判断的垄断，不仅对捷克斯洛伐克是这样，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尤其是苏共中央 1968 年以前负责处理同中国关系的工作组（另一个是负责处理同日本关系的工作组）曾带来很大的政治危害。——原注

② I·瓦伦塔：《苏联 1968 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对决策的剖析》，美国巴尔的摩，1979 年版。——原注

③ I·瓦伦塔：《苏联 1968 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对决策的剖析》，美国巴尔的摩，1979 年版，第 72 页。——原注

连科、谢列平、沃罗诺夫、马祖洛夫这些人的立场，他说他不清楚，因为这些人没有参加谈判。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也坚持军事干涉路线（相反，卡达尔竭力主张避免干涉）。

据我听到的情况，我同时可以说，很遗憾，安德罗波夫也在拥护采取"坚决措施"的人之列，他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得了某种偏执综合症，这也许同他坚信犹豫不决和拖延耽误会导致更严重的流血牺牲有关。我听说他们当中也有乌斯季诺夫。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作出决定时，领导成员中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肯定。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想过，怎么会是这种结果。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伙人（集体）解决政治问题时，采取"坚决的立场"，比较容易，比较简单（我惊奇地发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在美国领导人中也可看到同样的态度）。在那种情况下，需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才能提出要有节制、忍耐和宽容。所以在危机的形势下，国家第一号人物即对国家负有责任的人的作用特别大。很遗憾，勃列日涅夫在这种情况下宁愿藏在别人的背后。

除了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虚假报导和不真实的描绘之外，在这种致命的决策中起巨大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之一是帝国思维的残余，这种思维为你认为是属于自己"切身利益范围"的地区（即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采取这种行动辩护，使这种行动"神圣化"。还有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任何背离你自己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就等于是背叛，是犯罪。我想，勃列日涅夫是赞同这些模式的，并使自己确信：如果不干预事态的进程，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或至少是会损害自己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地位。前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契尔沃年科告诉我1968年6月在某地，勃列日涅夫曾同意仍然需要继续寻找政治解决的办法，

要利用一切可能，避免采用军事力量或者哪怕拖延使用军事力量，那时他曾对大使说，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倾向取得胜利，他就只好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要知道，大家会认为是我把捷克斯洛伐克丢掉了”）。

今天看来，1967年在为领导人工作的那些人员中之所以会产生乐观情绪和希望，是由于他们或者是没有考虑到，或者是低估了在我国作出决策的那些人的根深蒂固的政治倾向和态度。

七　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1968—1974)

斯大林主义被植入我们的社会，曾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而且使用了最极端的手段，一直到大规模的恐怖。它根深蒂固，大概要比赫鲁晓夫在20大作报告时所想到的要深得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很多人仍然坚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我们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变革毫无准备。很多人过去长期受的教育和灌输就是要他们循规蹈矩，完全按照规定的方法行事；他们不会或者害怕表现任何首创精神，进行任何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和承担任何责任。

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和社会设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

我觉得，这似乎就是始于1964年10月以后，特别是1968

年底的（其实，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期我们就已遇到了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问题）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主要动力机制。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有意识地加以推动，他们基本上是在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采取行政措施，这是针对所有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立场上的、决心表明自己反对保守派进攻的那些人的。这些措施通常不采用极端的形式，就是说，很少采取逮捕判刑的手段。一般的做法是革职，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以及用越来越巧妙的手段搞臭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公开诋毁中伤他们，送入精神病院，乃至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等等。[①]

实行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呢？从主观上说，主要目的大概是保卫当时领导上认为的真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秩序的基础。我并不认为，那些人认识到他们力图保卫的社会主义是变了形的，他们实际上是在保卫专制秩序，更精确地说，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但是，客观上情况正是这样。随着意识形态路线的向右转，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

保守分子提出的目标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许多人沉默了。在这一场仍在继续进行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

---

① 以展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为幌子燃起反犹太人情绪的企图在这当中始终起了十分明显和很不光彩的作用。这是围绕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这件事而展开的某种政治游戏。——原注

被置于禁止之列了。

1971年，我的著作《现代国际主义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出版了。尽管书名有点教条味（或者说有点马克思主义思想味儿），但是在当时来说，它在内容上是宽阔的，在对外关系问题的图书中也是并不多见的。在这本书中，我最宝贵的是论证军国主义缺乏基础和不可避免地会失败的那些章节。作为政治工具的军事力量，是我多年来所注意研究的一个课题。我在50年代中就此问题写了我的第一本著作，在1990—1991年又重新研究这个题材，围绕这个问题我同我们的将军和元帅们展开了尖锐的论战。

这本书相当精心地维护了和平共处政策（包括按当时的需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维护）。此外，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提出了一些不寻常的批评意见，某些段落也在美国引起了善意的批评（例如提出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和政治上的专断使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受到破坏，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因此作为革命推动因素的社会主义榜样的力量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的论点）。

另一本书出版于1981年，它包含了我同荷兰记者奥尔特曼斯进行的一系列访谈。它涉及苏联外交政策。尽管总的说它是维护苏联外交政策的，但是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本书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的坦率和自我批评精神，和超出一般水平的写作技巧、对专业的熟悉和论据的充分。

我也写过许多文章。大多是关于外交政策和军事政治问题的。这些文章维护了缓和、裁军和改善苏美关系的思想。但是它们也经常包含对美国的各种行动或美国的社会人士和作者所发表的言论的尖锐批评。我认为，他们发表的一些言论有时是完全值得这样去对待的。在苏联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些文章的。例如，我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在一场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

利者、“没有人会活下来”的论点就引起了不愉快。

我要再次强调说明，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所有这一切都显然是相当弱的、甚至是有调和味道的，而且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但是在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有些胆怯，除了那些出版“自印刊物”和“境外刊物”的人以外，那是一些已同官方政策决裂和企图从境外施加影响的人。我不属于那些人。我即使在今天也并不为此感到遗憾，虽然我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中许多人是尊重的(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他们中间是有分歧的)。

还有一个情况。书报检查的压力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有一点好处，它们迫使你学会善于用词，巧妙地写作，通过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语等方法在字里行间表达重要的思想。在一定程度我是这样做的，我们研究所的绝大多数同事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让我回过头来叙述“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时期开始时的情况。我觉得，社会精神生活中的这些变化给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损失，这种损失后来也给改革带来了额外的困难。当在党的 20 大上，人们第一次说出了关于过去、关于斯大林、关于在全国范围制造的无法无天和犯罪行为的真象时，当第一次试图动员诚实的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及社会一切健康力量起来为争取社会革新而斗争时，很多人以巨大的热情和信心来对待这件事，把它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后一个时期使人产生的失望，以及企图装作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想要人们重新去崇拜不久前已被推倒的和已残缺不全的偶像，想重新粗暴地（而且是笨拙地、令人无法信服地、形式主义地）篡改历史这样一些可耻的图谋，却导致严重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信任的程度，严重削弱人们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服务于伟大事业的献身精神。

相反，所有这一切倒是助长了怀疑论，甚至助长了玩世不恭

和以冷潮热讽看待一切的态度（包括在青年一代人中），以致在改革期间我们不得不全面地面对这些问题。

斯大林主义的复活也曾遭遇到抵抗。一些人不愿意沉默，不愿意妥协，其中最有名的是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不过，还可以举出几十个别的人名来。另有许多人则在体制内部进行斗争，其中一些人遭到了迫害，受到了惩处。我只举一个例子，即卡皮察院士。关于他的崇高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只是在公布了他致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信及其他信函后才得以了解。然而，过去有些人曾抱怨他没有在保护遭受迫害的人的集体信函上签名。后来弄清楚了，卡皮察所以没有签名不是由于缺乏勇气，而只是因为他认为采用另一种方法更有效，即采用由他个人亲自向领导人写信以保护某些人或抗议某些行动的方法。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就这样做，并准备为那些人承担个人的责任。并非所有的人都像卡皮察那样勇敢，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有那样的名望，因而还有那样的可能性。不过，各自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尽自己的力量（当然还有勇气）设法做一些好事，特别是阻止滑向斯大林主义，这样的人过去并非少数。

在改革时期，人们曾越来越多地向以前从政的那些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在1985年以前做了些什么？这样的问题有几次也向我公开地提出过。这就是当时的苏共科米州委书记梅利尼科夫在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上，高尔基铁路局长马秋欣在苏联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和后来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对我曾提出的问题，而且指责我向过去的领导人提出过建议，因此，说我现在就没有权利谈论政治问题。对于来自这些极端保守的、固步自封的人们的指责，我作出了回答，表示愿意对我过去提出的每一个建议负责，然而，同时我又强调指出，无论是过去或现在我都坚持同样的思想和政策（为了简明扼要起见，我可以把它称为20大的路线）。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还是要提一提。这个问题是在选举运动中当面向我提出来的："无论从你的著作或言论来看，可以说你不是斯大林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拥护者，你甚至还发表过拥护进步政策的言论。可是，要知道其他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和格里戈连科将军等人——曾经进行了坚决而勇敢得多的斗争。为什么你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呢?"

我当时回答说，第一，在停滞时期就是在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反对当时政策的，也有不同的观点。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尽管尊重他们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我远远不是都能同意他们所有人的意见。还有，第二，如果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把像我这样的人同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萨哈罗夫）融合在一起，那我就不会把那些奋勇向体制公开挑战并同它决裂的人同那些力求从内部改变体制的人相对立起来。

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这里尽管某些基本政治立场相同，但是也会有不同的观点。我以为，从真正影响政策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把退出或被逐出体制的政治批评人士的奋斗同留在体制内部设法影响政治的那些人的奋斗结合起来。

说到这里，我要对像萨哈罗夫院士那样的人士英勇的大无畏精神给以应有的评价。他们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经历了危险和苦难。他们是英雄，甚至是蒙难者。没有他们的奋斗，我国革新的过程未必会发展得如此迅速和深刻。但是，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千百万人的奋斗，没有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在十分平凡的日常斗争中设法阻止反动势力，斯大林式的保守主义的攻势，没有他们努力捍卫和推进民主、和平共处和经济改革的思想，也未必会有作为一种进化过程的革新过程。

而我越是深入思考，就恰恰越相信进化论。激进的政变、革命，始于"正当的暴力"，通常都演变成了为暴力而暴力，继而成为独裁者或暴君轻易的猎物。当然，也有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

主张非暴力变革。但是，为了使非暴力变革成为这一过程的有机部分，需要从体制内部进行奋斗。

我说这一些并不意味我没有看到我的行为和我的著作中的错误和缺点。错误嘛，当然是有过。回顾过去，我尤其不能不承认这样一点，即虽然看到了国家所走的道路的危险性，但是对危险的深度估计不足。同样，对需要变革的规模也估计不足。不是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策——即使把我当作一切正确，局面也未必会改观。但是，不承认这一点不行。我不愿意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我想在事后显得比原来实际上的我更聪明，更有先见之明，更有原则性。

由这个错误还派生出了其他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反对不正确的决策时斗争不够坚决，过于保持沉默和忍耐，以及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够坚决。当然，调和主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这一代人也沾染上了这个毛病，虽然在程度上比我们的老同志轻一点。也许，这种调和主义还使人下意识地产生一种救世的幻想，以为自己在从事某种重要而有益的事业，促使自己对于只顾做一些“小”事（尤其是帮助受到不公正对待而感到委屈或遭受打击的人，以及“开导”首长，等等）感到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不过，另一方面，处于我这样地位的人过去究竟能做些什么真正有益的事呢？这些“小”事积累起来真的就这样不重要吗？特别是如果再加上那一份经常性的、创造性的工作——既是我个人的工作，又是与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有关的工作。这项工作——当然啦，不仅是我的，而且也是几十个人的，也许还是几百个人的——就是在最停滞的时期也为人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觉醒，为新的政治思维作了准备。

在社会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历史时期后，终于从社会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出现了开始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战友们。不过，为改革作准备并参加改革的还有其他许多人。

我说这些，丝毫也不是想去占有那些曾向邪恶公开挑战并像在战场上厮杀一样同邪恶作斗争的那些人的英勇精神和功劳。但是，社会发展毕竟比战争复杂，它需要把各种力量和施加影响的方式结合起来。主要的是在斯大林主义反攻时期要有效地反对斯大林主义复辟，并为随后的社会革新作好准备。

重要的是还应记得，斯大林主义在6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反攻，它的目标不但针对人，而且还针对思想，针对历史事实，以及针对人们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和平、关于政治的新观念。当保守势力发动反攻的时候，他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可供采用的办法。

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所有的关键岗位已经全都落到他们手上。赫鲁晓夫时期建立的以伊利切夫为首的意识形态部已被一分为三。第一个新建的是科学部，它落入特拉佩兹尼科夫之手，并且立即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发起反攻的主要堡垒。第二个是文化部，头头是绍罗，他曾任苏共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书记，主管意识形态。他的为人，据我的看法，凡是来自上面的政策，他都照办不误，虽然本人不是十分卖力，但是，却放任手下一些“嗜血成性”的家伙在文化界为所欲为。由于还在以前就在文化艺术创作团体和许多编辑部里建立了坚固的斯大林主义堡垒，所以对这帮人来说，不仅阻止前进运动，而且在广泛的战线上为极端保守的斯大林主义观点开辟道路，同时压制与他们对立的一切观点，都不用花费多大的力气。

第三个部是宣传部，它是从“伊利切夫帝国”分出来的，那里的事情比较复杂。在斯捷帕科夫被撤职（显然是因为他亲近谢列平的缘故）后，这个部在1972年前一直没有部长。这期间由第一副部长雅科夫列夫任代理部长。在宣传部内，只有（而且特别是）雅科夫列夫及为数极少的几个与他观点一致的人曾设法有所作为，以便阻挡猖獗的保守主义的浪潮。为此雅科夫列夫很快

就付出了代价。借口是他的一篇登载在《文学报》上关于国际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当时在舆论界激起了一阵喧闹。

这实质上是第一篇严肃的公开捍卫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和猖獗起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檄文。其实，这是一次保卫苏共20大思想的强有力的行动，不仅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察觉到了，而且拥护斯大林主义的人也察觉到了。戈利科夫马上写了个小报告，政治局进行了审议。因为这篇文章，勃列日涅夫当着我和其他几位同志的面训斥了雅科夫列夫。虽然勃列日涅夫当众说过，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他“原谅”了雅科夫列夫，而且出于自己的宽宏大度大动了感情，甚至还拥抱了他。但是，两天后就公布了关于任命雅科夫列夫为驻加拿大大使的决定。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一直呆到1982年年中。此后，宣传部同其他部也就“步调一致”了。

意识形态战线的情况之所以变得复杂，是因为三个部都由充任苏共中央书记的杰米契夫主管，而此人才疏学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任何一件事也处理不好，却什么事都想插手。

据我记忆，他当过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先是负责国民经济化学化，后来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最后当上了文化部长。安德罗波夫曾告诉我，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去世后，谢列平还曾打算把杰米契夫推上国防部长的宝座，理由是说他具有军事经验（他毕业于防化学院，后来在军队里做了一段时间的政治工作。由此可见，他官运亨通：是全国化学界的头头，全国意识形态的头头和文艺界的总监护人，还妄想充当或者至少有人想让他充当军界头头的角色）。

对于他在任书记期间主管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我所能猜测，他从那里被调任文化部长与其说是因为不称职，不如说又是因为他与谢列平关系密切），我不想作全面的评论。但是，我想不起来他哪怕是做过一件什么好事——保护过某个人，什么时候为真

理挺身而出，等等。然而，在幕后——这一面的勾当他不喜欢干得很显眼——此人不是经常也多次保护坏人，支持种种肮脏的勾当。

接替杰米契夫担任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的是齐米亚宁，对此起初大家都感到高兴。他的声誉原来并不坏，包括在不久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中，特别是在准备党的 23 大期间对特拉佩兹尼科夫和戈利科夫的斗争中，他的声誉都不坏。但是，在中央书记这个岗位上他起了变化，也许是经不起权力的考验，也可能是年龄的缘故。然而，不管怎么说，齐米亚宁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成为反动人物的保护神，而在一些不光彩的事件（尤其是 1982 年企图搞垮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事件）中更是十分卖力，亲自上阵。

就我所记忆，苏共莫斯科市委员会先后在叶戈雷切夫和格里申领导期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总是起着最坏的作用。

最后是“红衣主教”苏斯洛夫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这位意识形态领域的“大祭司”高居九霄云外，偶尔公开露面讲讲话，在幕后则一贯扮演保守派的角色。他在文学界（他对待特瓦尔多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和格罗斯曼等人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史学界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扮演的这种角色一成不变。我认为苏斯洛夫在政治方面扮演的角色比较复杂，这至少在不涉及探索新的道路，而涉及与那些把国家推向冒险主义的极右方针的人争论时是如此。据我耳闻，苏斯洛夫生来谨小慎微，害怕事情变得复杂化，这一点在这里不止一次地使得他的影响具有建设性。即使在意识形态领域，当右倾极端分子嚣张的时候，他也有时阻止他们走向极端。当然，在这个人身上你摸不到进步的脉搏，他的保守主义的影响是一贯的。

总体上说，那时甚至申诉也都几乎无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科学和文化界人士倾向于去找安德罗波夫（他毕竟还是有不

坏的声誉），或者直接去找勃列日涅夫。得到帮助的事情曾经有过（两三次而已，其中包括塔甘卡剧院领导人柳比莫夫因此得以免于被撤职的事）。

全国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工作中这种总体状况同样反映在社会科学、思想和文化等整个精神领域。

我想较详细地谈谈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与我的关系最密切。

在社会科学中，史学是右派进攻的第一个牺牲品。首当其冲的是我国的现代史，具体地说，就是斯大林执政时期。正是在这里，在这个领域，斯大林分子实际上实现了他们当初策划在整个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要达到的意图，即抛弃20大和22大的思想，重新颂扬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当然，就是在70年代定期再版的苏共党史教程（由波诺马廖夫主编）里，关于20大（不提赫鲁晓夫的报告，更不提赫鲁晓夫的名字）和苏共中央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决定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还保留了几个简单的段落或几句话，但是，整个主题思想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实，甚至这些干巴巴的说明之所以幸免于警惕性高的书报检查机关的刀剪，可能仅仅因为这本书的主编毕竟是苏共中央书记罢了。

至于在上述时期公布的历史研究成果自60年代末以来没有前进一步的事，就更不必提了。对此我也未曾去幻想，因为当局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历史科学、历史思想倒退，做出一副好像苏共20大根本就没有举行过的样子。正是为此展开了一场迫害许多诚实的历史学家的运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因为在学术上采取原则性的立场而被撤职。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方面的著作而闻名的历史学家涅克里奇遭受了特别残酷的迫害，终于被迫流亡国外（当局这一手十分有效，因为流亡国外的人实际上好像成为叛徒，不仅他们本人的名声败坏了，而且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著作，甚至支持他们的人的名声也都败坏了）。

罗伊·梅德韦杰夫被开除出党。此外，还有其他许多人都遭受了苦难。

这样有助于解决主要的任务，即在科学、文学乃至艺术上重新开始“大批量地”伪造历史（虽然从总体上看，伪造历史的做法从未真正停下来，只在赫鲁晓夫时期才羞羞答答地迈出头几步来澄清历史真相）。在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及斯大林在其中的作用方面特别下功夫。我想，这是因为斯大林的辩护士十分清楚：这次战争在人民心中留下的是精神上最鼓舞人的历史篇章，因此，在20大上说出的有关历史真相会特别有效地打破关于“伟大领袖”的神话。反之，如果把打败希特勒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作用归功于斯大林，那么，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使各阶层广大人民重新尊重他，则是最简单不过的办法。

我不能不说，在重新干起伪造历史的卑鄙勾当中，意识形态方面的斯大林分子（发号施令是苏斯洛夫，特别卖力的是特拉佩兹尼科夫及其同道）找到了我国相当一批军事领导人作为自己热心的盟友，其中包括一些真正立有战功、著名的、奖赏有加的人物。

我无意揭示这一现象深层次的原因，何况这与本书主题并无直接关系。我只是要说，起初我对此感到奇怪——真的，不正是军人，特别是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在斯大林手下蒙受了更多的劫难吗？1959—1961年期间，我曾有机会同A·И·托多尔斯基中将在一起对他的故乡韦西耶贡斯克进行社会调查工作[①]。1959年12月，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关于战争前夕按照斯大林的意旨

---

① 见A·托多尔斯基、Г·阿尔巴托夫《小中见大》一文，载《共产党人》杂志，1960年第4、5期。——原注

从肉体消灭或关押高级指挥人员的可悲统计数[1]，这些数字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被引用过。

遗憾的是，从私下交谈中我了解到，许多在60—70年代处于武装力量负责岗位的将军对于他们前辈的悲惨命运很少感到不安。为什么呢？我以为，如果说起诚实而正直的人，就是在当时的军事首长中无疑也是占多数，这里军人纪律在他们的行为中起了重要作用。紧接在20大之后，以及后来紧接在22大之后，他们进行了思想转弯，转到了反斯大林主义的轨道上（这也可以从一些回忆录中看得出来）。然而，后来又有了另一道命令，也必须迅速执行。不过，在将军中也还有另一种人，特别是那些恰恰因为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了不仅在职务和军衔方面超过他们，而且在经验、知识和智慧方面也超过他们的军事将领才爬得快的人。在斯大林造成的大放血以后，对指挥人员的要求大大降低了，甚至一个平庸的“三分生”，也许是“两分生”，也可以当作高明的将才（战争爆发时我们在这方面吃尽了苦头）。

我觉得，在军界有许多人担心，一旦开始认真透析战争史，粉碎成堆的神话（每次战争都制造大量神话），那也会严重损害他们的战斗荣誉。如果遵照“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的说法行事，把战争史归结为歌颂伟大的英勇功绩的颂歌，特别是歌颂那

---

① 关于这个事实开始千方百计地避而不提，保持沉默，以及从学术著作中一笔勾销。你看，下面只是一个例子。60年代初出版的6卷集《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写道：“自1937年5月至1938年9月，遭到镇压的有近半数的团长，几乎所有的旅长和师长、所有的军长和军区司令员、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大多数军、师、旅的政工领导干部、近1/3的团政委，以及高等和中等军事学校的许多教员。”（第6卷第124页）。70年代出版的12卷集《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渊竭力避免甚至使用“镇压”这样的词，而代之以一个别的字眼——“责难”。譬如，该书第2卷写道：在“1937——1938年，有相当大数量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由于没有根据的责难而被调离（原文为此！）军队”。（第2卷第206页）。接着又写道，被调离者提出的申诉似乎被审理，而错误则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纠正。——原注

些还活着的将军们的颂歌，那他们要有利得多。无疑，他们中某些人想保持和夸大那些神话，以便舒舒服服地躺在这些神话上，就像躺在柔软的沙发床上睡大觉一样，而不必担心历史学家会认真分析他们在战时采取的真实的行动和所下的决心。

最后，我想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敬仰斯大林主义，把它看作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一套军队秩序的最高体现和最高成就，只不过这一套东西现在被推广到了整个社会而已。这一套东西恰恰就是行政命令体制和这种体制所固有的社会军国主义化的体现，军界和政界丘八作风的体现。

这些军队将领从60年代末直至80年代中期出版的著作，即他们的回忆录（其数量之多，足足可以开办一座图书馆），造成了许多问题——历史的、政治的乃至道德上的问题。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很有名的，他们的观点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可是，这些书大都在内容上不仅不可饶恕地隐瞒了许多事实，而且还极严重地歪曲了战争史的许多真相。按理说，回忆录也是一种文献，尽管他们是个人的文献，而不是分析性的报告。但是，他们却全然不顾，更何况这种体裁的作品由于人本身的弱点而自然形成一种特点，这就是谁也没有读到过真正自我批判的回忆录，而且就我所知，至今也还没有人写过这种回忆录。然而，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成堆的明摆着篡改历史的书，而且其中篡改之处常常是捉刀代笔之作。

我以为，终究必须弄清楚，这是谁搞的，又是怎么搞的。毋庸置疑，除了苏共中央宣传部和科学部（后者在监督其他科学部门的同时也监督史学部门）外，苏军总政治部、军事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当然，还有军事历史研究所，在这当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想，我们必须揭穿这种大规模地、成批地制造谎言、篡改历史和隐瞒真相的手段。

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在那些年代出版的拙劣作品中不存在个

别诚实的、在资料、结论、总结和思想上有价值的著作。此外，还有一些激动人心的、富有同情心的文献。需要注意的还有一点，即在停滞时期出版的伪战史中存在的缺陷问题，也就是有一部分是著名的将领、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所写，同时又有相当大一部分系盗用他们的名义所写。这就需要认真地加以甄别。[①]

有一件事不能不谈一谈。1969 年，新闻通讯社出版社出版了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这在当时确实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设法弄到这本书。记得我费了好大力气通过新闻通讯社领导才弄到 10 本，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阅读。就是在这本书的抢购风中，一次完全偶然的机会，我在电影院休息室里遇见了新闻通讯社出版社当时的社长 B·T·科莫洛夫，他恰恰也是朱可夫元帅回忆录的主编。我和科莫洛夫相知一二，于是我们交谈了起来，回忆录自然成为中心话题。

我的交谈者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他抱怨说，因为忙于改写这本书中一些最重要的章节，所以简直累得筋疲力竭。还说朱可夫老了，不懂得政治；他哪怕对所有修改、删节补充的地方最后表示一下同意也是好的。科莫洛夫说，回忆录毕竟要写得符合路线嘛。我问："你手不发抖吗？这可是历史哟，是我国经历的最大悲剧的重要当事人之一的回忆录呀。而你竟利用他生病的机会，也许还利用他的弱点，拿起笔来就随心所欲地写，用他的名义写。"唉，我的交谈者简直就没有理解我说的意思，开始解释了起来，说一切都由他在中央委员会协调好了，同时一一道出了科学部和宣传部出版局一些不大不小的官僚的名字。现在看了回忆

① 有鉴于此，不能不指出，近年来我国开始出现一些翔实的关于战争的著作，其中有些是出自著名军事作家的手笔。例如，沃尔科戈诺夫著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就在其列。——原注

录的另一位编辑 A·Я·米尔金娜的回忆文章（载于《星火》杂志，1988 年第 17 期）才知道，从书中砍掉的还有关于 1937 年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①]

如果说对待朱可夫的回忆录尚且如此，那么对待其他名望较低、不太固执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其实，问题绝不仅仅在于作者本身和过分热心的编辑。遗憾的是，不少将领一心一意热衷于为斯大林唱颂歌，轻松而心甘情愿地伪造历史。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捷缅科。诚然，他确实有理由歌颂斯大林，因为在战争年代他是斯大林的宠儿，靠这种关系爬得很快（据西蒙诺夫证实，他还享有亲近贝利亚的人的名声）。1981 年出版的什捷缅科回忆录似乎带了个坏头。[②]

出现在这本回忆录中的斯大林好像是一个天赋“军事家崇高品质”的人，“对苏联人民取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的统帅，几乎是所有重大战役企图的提出者。然而，在这同时，对于苏联人民和军队由于斯大林的过错而蒙受的苦难，却避而不谈，保持沉默。按照什捷缅科的说法，斯大林甚至还反对过个人迷信，只不过是不够坚决罢了。

叶廖缅科、罗特米斯特罗夫、科涅夫、戈洛瓦诺夫、巴格拉米扬、华西列夫斯基、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和其他许多人（我重申，我对上述人士中的许多人怀有深深的敬意，并认为他们的名字在许多情况下完全被滥用了）的回忆录也始终贯彻了对斯大林的颂扬精神。这些著作歪曲历史并不仅仅限于夸大斯大林的作用，企图证明他在军事领域也具有“天才的能力”。看来，更重要的是另一点，即不愿意或者拒绝设法弄清楚我们失利的原因，以及我们的胜利为此而付出的代价。

---

① 朱可夫元帅回忆录完整的未经删改的版本现在已经问世。——原注

② 见谢·马·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1981 年莫斯科版。——原注

我无意让人认为，我在号召人们不去理会所有从60年末以来出版的军事回忆录。对这些书要区别对待：甚至在吹捧斯大林的书中大概也有可信的事实和观感。但是，鉴于卫国战争在我国历史上所处的那种地位，我想，对这些回忆录必须分别作出客观评价，并且必须剖析这种伪造战争史行为的整个机制。

因为所提起的话题，我不能不涉及那个时期出版的多卷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我跟苏联科学院其他许多研究所所长一样都是这本著作的总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这本就篇幅而言巨大的著作是那个时期军事领导人对历史采取不负责任的、唯意志论的态度的最明显例证，当然，不单单是他们，但是，他们表现得大概尤为突出。我曾有机会亲自目睹编委会内相互间许多激烈的争吵，其原因只不过是一个——这一个或那一个元帅或将军想要在书中突出他在战时所指挥的部队和兵团的作用和作战行动。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想突出他个人参与的战役的作用，把它描绘成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正像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回忆录《小地》中所做的那样。

然而，最恶劣的是从写书一开始就定下的调子。从1972年开始编第一卷起，就定下了昧着良心、恬不知耻地跟随斯大林主义路线的调子，定下了公开伪造整个战争时期的历史的调子。正因为此事，我就成为众矢之的，成为有组织的围攻的对象，其目的显然是要从一开始就教训总编委中的非军人委员，使他们知道应如何行事。在总编委中对付军人要容易得多，只要下道命令就行了。

牵涉到我的这段插曲是以非常平常的方式开始的。我向委员会提交了对第一卷草稿的意见和建议，顺便说一句，绝对没有过火的东西，因为当时我总的情绪相当好，是想从现实的立场去评价，根本没有打算把无法完成的任务摆到作者和编辑面前，而多半是怀着“妥协”的心情。然而我确信，在这样的著作里不可用

沉默来回避或歪曲完全明确的事情和党代表大会已做出决议的东西以及来源于人民、党和本书未来的读者都知道的大量事实的东西。

例如，我在意见书中指出，在用总编委员会名义写的第一卷（实质上是对整个这一版本）序言里把我们在战争初期失败的规模缩小了，同时还歪曲了失败的原因。序言中只讲了“众所周知的一些错误”，之后就把着重点放在阐述我们的军事战略、作战计划等方面的优势上。接着我在意见书中写道：“如果就整个战争而言，这些论点不会引起怀疑。但是把它们用在我们遭受最严重失利的1941——1942年，那就未必能证明是对的了。我觉得应该如实地说明这一点，即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在战争过程中学习作战艺术。”

我也对本卷草稿中对美国公司战前对德国重新武装的努力所提供的帮助作的评价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美国公司对希特勒分子的援助问题是夸大其辞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根据作者们自己的计算而得出的结论。按照他们的计算，美国人对德国工业（不单是军事工业）投入的资金总额为10亿美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额，但也不能把它夸大。例如，我们曾经公正地反对过西方的那些作者，他们断言，美国根据租借法向苏联提供的援助似乎为取得胜利起到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一援助的总额大约为100亿美元。

在这方面我还发表了如下意见：20年代美国还根本没有像本卷作者所说的那种扩张主义心态，那个时期在美国更多的主要是和平主义情绪。

自我寄出我的评论意见两周之后，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他是总编委员会主席）的助理们开始经常地、几乎每隔一天就给我打一次电话，通知召开委员会会议的日期和时间（这个会议还要过两周才开）并问我是否出席这次会议。我把这种情况看作

是军人的纪律性和工作热忱。其实，这是针对我提出的意见为了在全体编委面前拿我开刀作示范而精心安排的一台戏。正是格列奇科导演了这台戏。

在会上他简要地归纳了关于收到的评论意见的情况后，让两门“大口径火炮式”的和一个较为平庸的严厉批评家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向我发起了令人愕然的“齐射”。

第一个发言的是波斯佩洛夫——一个最令人生厌的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说教者”。他是斯大林的官方传记的主编，过去曾担任过《真理报》的主编，长期担任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我在此引用几段原话，这些话可表明这次会议的性质，也是那个时期斯大林主义进行反攻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对这次会议作了详细记录，几乎像速记一样。

“阿尔巴托夫同志在意见书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令人置疑的，而且也是绝对有争议的。该著作的普遍价值是非常明显的……

“美国和美国的垄断组织对希特勒德国疯狂发展军备提供了物质援助。而作为国际事务行家的阿尔巴托夫同志却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阿尔巴托夫同志提出了关于我们在战争初期的战略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提得不正确。从战略和军事学术的观点来看，我们从战争头几天起就有充分的准备。那么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我们退却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由于德国人掌握了其占领欧洲领土上所有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做了两年多的准备，具有

3倍的技术装备上的优势。[1]但是，当我们在1941年6月开始把最重要的工厂和企业疏散到东部时，我们就作出了奇迹。"

作为第二个"起诉者"发言的是什捷缅科大将。他的发言带有他和他那伙人所惯用的告密者的口气，他说：

"阿尔巴托夫同志怀疑我们战略的优势"，尽管这一战略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法则和原则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关于捍卫社会主义祖国学说的基础上的"。他基本上是引用伪造的关于德国实际在所有种类的军事技术装备上都占有优势的数据来驳斥我。

第三个发言的是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苏韦尼罗夫上校。我领会这是来自军史学家中部分普通的"无产阶级的"个人迷信信徒对我进行的集体批驳。这位上校向与会者们说：

"我们编辑部[2]的某些同仁开玩笑地说，美国研究所非常关心千万别在第一卷里得罪美帝国主义者。"因此，"编辑部认为，阿尔巴托夫同志关于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美国在重新武装德国中的作用的见解是站不住脚的，毫无根据的。"

他也同样批驳了我关于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及20年代是美

---

① 现在这个论点已被我们的研究人员令人信服地揭穿了（参见B·什雷科夫：《装甲非常坚固》，载《国际生活》杂志1988年11期；B·库利什：《从未公布的回忆录中看朱可夫》，载《共产党人》1988年14期）。最先提出这一论点的人是斯大林。他在解释我们在1941年遭到的失败时说，战争开始前德国法西斯军队在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上超过了红军。战争史学家开始也是重复这个论点，没有深入去分析力量对比。然而，库利什写道，苏共20大之后所进行的统计数字表明，敌人的上述优势完全不存在。在60年代我们找到了出路："把敌人所有坦克统统计算在内，而我们只统计最新式的（KB型和T—34型）坦克，只提了一下还有一定数量的旧式坦克。事实上，战争开始时德国法西斯派出进攻苏联的部队组成中有3582辆坦克和强击炮，其中1634辆是最新式的（T—Ⅲ型和T—Ⅳ型），大约1700辆是老式的。而苏联方面与之抗衡的则有1475辆KB型和T—34型的（这两种坦克在整个战争时期被认为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及大量老式的坦克。要知道仅从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22日红军就获得了7000多辆坦克。飞机和火炮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原注

② 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编辑部。——原注

国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兴盛时期的看法。他接着说：

“我们坚决不同意关于 20 年代的这种说法。众所周知，列宁把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称作为愚弄工人阶级的一种方式。1927 年 5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把资产阶级政府的和平主义痛斥为最虚伪的假仁假义和最无耻的东西。”“由此可见，20 年代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只不过是一种伪装，而其实，世界帝国主义仍与从前一样，是掠夺的、侵略的。”

格列奇科元帅亲自作了总结：

“我认为，阿尔巴托夫同志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因而他不应该提什么军事问题方面的意见和建议[①]。”他继续说：“我听了科学院的同志们的发言，感到非常满意，将‘铭记在心’。我们这些在军队里度过一生的人，对如何解决军事领域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时会看得更清楚些。而你们只是接触了一下军事战略、军事学说等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比其他人造诣更深。因而我们认为，本卷中的论述是正确的。”

好吧，这就是说，不是自己的事不要去管。即使是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去评价美国 20 年代的国内政策和意识形态情况，或美国与魏玛德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时也应该是这样。

这是在大约有 100—150 名军人在场的情况下干的，他们大多是当时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其中当然也有很正派的人，例如，像巴格拉米扬元帅这样的人。他们目睹了这出闹剧，感到耻辱，事后给我打来了电话，对发生的一切表示了自己真实的态度）。与会的还有非军人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科学院领导的代表。

对于整个这次举动的目的，我和其他许多与会者都十分清楚，就是从一开始要为多卷集的著作定下一定的政治调门。顺便

---

① 也就是当今我们将军们对非军事专家们来说非常典型的意见。——原注

说一说，这个调门一直保持到乌斯季诺夫接替去世的格列奇科充任总编委主席以后。无论是前者或后者，同样还有那些被他们操纵的撰稿人，都把自己的使命定位在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歌颂当年领导武装力量的一批元帅和将军的功绩，堵住客观研究历史的道路，“封闭”令军事领导感到不快的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1991年进行了一场关于这部多卷集战争史的最近一版的第一卷稿子的辩论。这一卷将在战胜纳粹德国50周年时出版。我又一次出席了总编委会议，这时的主编是当时的国防部长亚佐夫（这一切都是由党中央在1988年决定的，当时作出了有关的决定。中央委员会在那时候还是国内所有重要问题的决策机构)。

当我知道要出版这部书的决定时，我想，我们行将讨论的将是一部消除了前两版[①]中的伪造和错误的真实历史了。头两版中由于当时尚未克服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和评价，所以都有篡改伪造的记号，而且都缺乏可信的事实材料（而且当时档案尚未开放)。另外，这些著作还有吹捧奉承的印记，作者们力图夸大“军事功勋”，夸大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等人对胜利作出的贡献。当时我觉得，由于新的一代领导人物或者没有参加过战争，或者（像亚佐夫和阿赫罗梅耶夫）那时级别较低，不可能声称在战胜希特勒时起过领导作用，因此清除历史中的污垢要容易得多。

但是这些希望都落空了，原因就在于这部新的战争史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写的，而且是在元帅和将军们的指导下写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国防部长亚佐夫在总编委的一次会议上曾建议对他曾亲自参加的旁尼里战役要“加强”说明其“作用”。总的说这不过是一件小事，但它反映了党和军方的领导再次想出版一部

---

① 第一版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出版的。——原注

伪造的战争史。这次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不是我，而是我已在上面提到过的沃尔科戈诺夫将军。

这次秘密会议的记录落到了一名记者的手中，曾由《独立报》加以发表。稍后一些时候（进行那次讨论时我不在莫斯科），我接受了该报的采访，我在访谈中说，相当大一部分军方领导人反对最近几年的整个政策，他们知道，说出有关那个时候的政治领导人和有关斯大林的真相，将是对我们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堡垒的又一个打击。二次大战常被用来为斯大林主义犯的罪行作辩护的主要借口。这种辩护是这样的：是啊，是有过镇压，有过对农民的剥夺，但是后来我们胜利了，并且拯救了欧洲。但是没有人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那种灾难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难道有任何理由不应取得胜利吗？"

我也提到我们的将军们力图把全国的成就据为"私有"的事实，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他们还要维护旧的神话，还需要一部由官方钦定的战争史，以便于他们可把平民百姓干预他们的军事事务和对之进行评论的愿望加以抹杀。你看，只有元帅和将军们才能被允许去做这件事。

在这次采访中，我也正式宣布，我退出总编委会，我也号召我的同事们，至少是非军人的同事们（军人有他们自己的纪律）也退出。在那种条件下要写一部真实的战争史是不可能的。我感到羞愧的是我参与了前两卷战争史的编写，虽然我曾提出过抗议。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结束。我不想再次处于那样一种局面下。

要精确地叙述我们的军队、国家和许多天才指挥员的真正无与伦比的成就，就必须说明许多大家不知道的事实，澄清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两次几乎遭到失败，第一次是在 1941 年，第二次是在 1942 年？为什么我们蒙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比其他国家的损失无可比拟地大得多。

对于那些力求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恢复名誉的人来说，战争题目看来成了他们的突破口，后来则成了他们驰骋的宽阔大道。他们中间不仅有军事史学家，而且还有作家、戏剧家和电影界人物。在众多的书籍里和电影院的屏幕上，用斯大林开头，紧随其后其他人包括莫洛托夫、斯大林的一些亲密战友以及主要的罪行同谋犯的名字和形象都开始出现了。

但是，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努力当然不以军事史为限。对这个时期的整个历史又一次开始进行改写了。镇压问题又一次成了严格的禁区。起初，在不时出现的关于被斯大林无辜杀害的党和国家的活动家的文章中，往往避而不提镇压问题，虽然还提一下这些人的死亡时间（1937、1938、1939 年），人们可以从他们去世的年份中琢摸出这些时间的含意：那些杰出的领导人物不可能是自然死亡的。可是，后来，就连这些年份也不提了。

在 60、70 和 80 年代，恢复斯大林名誉的努力并非只局限于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其意图要深远得多（也正因为如此才那样卖力地替斯大林洗刷名誉），这就是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虽然已不能采用当年那种更加极端、公开和过火的形式。显然，要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就不仅需要在历史学领域中，而且还要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发起保守派的进攻。

在经济学领域中曾有过公开的意见交锋。各种意见一直相当明显地在斗争，不同的观点互相对立。到了 60 年代末，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还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已开始了争论，其中有些思想尽管是不彻底的，不完整的，甚至是变了形的，但在 1965 年的经济改革中仍得到了体现。尽管在几年中总的已存在停滞现象，但在经济研究方面毕竟还是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革。

其中一个变革就是在新西伯利亚成立了新的经济研究所（甚至不妨大胆说是新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学派），出现了一批卓越的

学者，其中首先当推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远离莫斯科当时大概比较容易摆脱政治经济学教条的桎梏。因此，经济学在西伯利亚开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合乎规律的了。但是，如果没有天才而勇敢的人，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我所指的学者就在其列。他们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不止一次地成为围攻的对象，但是，他们挺了过来，而且还能够为发展我国的经济学作出不小的贡献。另一个新的现象是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它由涅姆钦诺夫奠定了基础，然后由费多连科领导（这一切是在杰出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不久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研究所为学术界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安奇什金、沙塔林和彼得拉科夫等。我还想举出几位在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们是博戈莫洛夫、什梅廖夫、利西奇金和伊万诺夫等。

那些保守的、墨守成规的科学研究机构对这些研究中心、这些学者采取对立的态度，拼命地进行抵抗。属于这类机构的有多年来充当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培养教条主义者和本本主义者的温床角色的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库兹明诺夫教研室。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这类机构。

全面转向斯大林主义不能不在经济状况中反映出来。诚然，保守派要实现自己的意图一度遇到了困难，因为从政治上看必须使国家摆脱不断加重的经济困难。而要寻找解决困境的途径，就需要创造性的经济思想。

这里实用主义的政治需要与经济学界的思想家和部分政治经济学家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因此，情况是矛盾的。研究工作和争论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深化经济改革的途径和第二阶段改革的问题上。在70年代上半期，已经不仅在专家学者的层次上，而且还在高级政治层面上（虽然专家学者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试图形成此前一直羞羞答答、拒绝承认的一些重要结论

和总结性意见。这些结论包括：我国经济发展一直是走外延发展道路，而现在外延增长的因素已经枯竭，因此，必须把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问题提上日程，以及必须从依靠行政命令转为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等问题。还包括世界发生科学技术革命的问题，而此前不久科技革命这个概念本身还是禁区。此外，还提出了一系列迫切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如，不能继续保持落后，要根本完善国民经济结构和认真改变结构政策，要真正从根本上改善计划和管理，等等。由于许多经济学家的努力，这些问题被提上了苏共24大的议程。那次代表大会对这些问题议论了一番，但是，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毫无结果。

作为这些事件和伴随而来的争论的见证人和参考者，我可以说，提出新问题的动力不是来自官方制定经济政策的中心和国家经济学术中心。相反，他们竭力阻止变革，向领导提出和转呈的建议和思想都是传统的、毫无生机的。然而，领导上也已不能不看出，这些建议和思想都是空洞无物的和是不可能有前途的。于是，领导开始去找那些了解世界经济的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帮助。被找的人中包括伊诺泽姆采夫院士及其研究所的专家，以及我和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同事。此外，还有一些国际问题学者，他们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们了解世界。这样就渐渐形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工作小组。除了伊诺泽姆采夫和我外，参加这个小组的还有鲍文、西塔良和苏哈列夫斯基。楚卡诺夫是官方的组长，他在困难的情况下充当了小组同勃列日涅夫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主要联络员。这个小组同苏共中央机关和部长会议机关的官员经常发生冲突，包括同柯西金，特别是同吉洪诺夫、基里连科和索洛缅采夫等人。

后者后来成为俄罗斯联邦的部长会议主席。由于我们极力从臆想的经济成就中排除吹嘘的成份，并且试图把注意力集中于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上，那些官员不久就给我们起了一个绰号叫“抹

黑者”。

这个小组依靠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许多正真的经济学家的忠告、建议和支持，终于能够在建立对旧经济思维的一定抗衡力量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推动了一些过去长期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新思想的产生和合法化。

我们进行这些工作不仅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要坚韧不拔，而且有时还要准备冒一定的风险。但这些工作的实际效果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这里等待我们的往往是大失所望：话也讲了，文件也印了，但是，后来却什么也没有，绝对一无所获。尽管我们曾设法通过“上头”，通过最高首长下命令，通过他们去说服和提出建议来打通部门官僚主义厚厚的自卫城墙——后来被称之为行政命令体制的那种东西——也都无济于事。相反，虽然漂亮话说得越来越多，但是，国内的实际状况却不可逆转地越来越恶化。

即使个别的建议在上头成功地取得了“突破”，高级机关也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过后不久就被官僚主义和习惯势力压了下来，束之高阁，最后几乎总是不了了之。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力量对比悬殊。其中一个例子就是1965年经济改革的“偃旗息鼓”。另一个例子是关于科技革命问题的苏共中央全会的失败。

关于这一点我想较详细地谈一谈。从60年代末起，在我所在的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我和伊诺泽姆采夫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多次十分坚决地提出过，世界上开始了新的科技革命，它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所有其他领域都将具有巨大的意义。当时，我们面临落后的危险，有可能被抛到世界发展的后面。因此需要紧急采取措施。

起初，这些信号被置之不理，直到70年代初甚至还不准使用“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概念，不仅想方设法从官方文件中勾掉，而且还从报刊书籍中删掉。然而，后来科学家们所说的许多

事实开始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要忽视它已成为完全不可能了。苏共 24 大后不久，政治局作出了决定，准备专门就科技革命问题召开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会议的准备工作与通常一样委托一个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数名中央书记组成，由基里连科牵头（据我记忆，委员会内还有多尔基赫和索洛缅采夫）。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准备会议材料，其中包括起草总书记的报告。这个小组委托伊诺泽姆采夫和我领导。参加小组工作的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费多连科、阿甘别吉扬和伊万诺夫院士等人）、中央委员会的负责工作人员（马卡罗夫，当时任科学部副部长，现任苏联科学院学术秘书主任；弗罗洛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机器制造部部长）。工作组经请求获准赋予一项“特权”，即可以邀请各部部长（包括国防工业部门的部长）、企业经理和各种各样专业的著名科学家，并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进行“盘问”。经过许多个月紧张的工作，终于拟就了一份篇幅长达 130 页的总结性文件。当时，我们大家对此全都感到十分有意义，说实在的，因为这是一个压缩的经济改革综合纲领，就当时而言是十分先进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革命性的纲领。需要的恰恰就是进行经济改革，因为我们很快得出结论，要加速科技进步而不在经济上进行根本的变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文件于 1973 年 5 月按规定的期限呈交基里连科、索洛缅采夫、多尔基赫等人，然而却从此无声无息地夭折了。谁也没有对文件提出过批评，甚至还有人赞扬过。但是，全会的整个思想却石沉大海了。有几次我向基里连科提起政治局的决定和文件，有一次还问过勃列日涅夫关于全会的事，但是，始终也没有得到过一个明确的回答。不过，我察觉到有人对全会命运问题本身是有一定愤怒情绪的。后来我才明白，全部问题在于领导不准备在经济上进行认真的变革，而且根本就不准备解决严重而复杂的问题。呈报的文件正是在这方面简直使他们恼怒，因为他们期待的

是某种“平稳”得多的、园滑的、宣传性的、满篇好话的东西，甚至是较多“技术官僚主义性的”东西，因而也是领导比较明白的东西，也就是说采取一些发展科技的“组织措施”，但无论如何也不是根本性的经济改革。

顺便提一下，文件原稿仍在，于是我同其他仍健在的文件作者不只一次地试图把它的思想跟我们今天的思想和争论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当时的分析以及各项建议都是正确的，假如当初加以贯彻落实，那么，今天很多很多的东西定会改观了。

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在同经济学家会见时谈起70年代初如何起草了一个有意思的文件的事，老实说，听到这番话我十分高兴，虽然遗憾的是这一文件未被付诸实施。这就是说，这个文件甚至已经存档，但终究不是仅仅供“老鼠牙齿批判”之用。我听说，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打开了他的保险柜，找到了这份文件的第一号文本。此后，显然它又落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手里。其实，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是，还在那个时候，即将近20年前，改革就成熟了，并且已经被提了出来。由于改革没有实现，问题加重了。

我完全同意这种评价。然而看来，中央全会以及我们当时建议采取的措施本来就简直是不可能见之于行动的，因为经济上的需要和反映这种需要的理论思维遇到了当时的政治现实这一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个政治现实就是官僚政治和行政体制无限的权力，以及已形成的种种机制和观念的惰性。这种对抗是无穷无尽的，这就是说，这一方和另一方的共存不可能继续下去。当时的政治现实开始压制思想理论界，从而注定了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其间当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使勃列日涅夫和当时整个领导得以把改革束之高阁。这就是由于1973年中东战争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决定而使石油价格上涨。一笔巨大而又不用费

力就获得的财富意外地落到了我们头上——瞧，秋明“大”油田才刚刚上马。可是，没有任何东西会像不是挣来的钱那样使人败家。

我国的领导——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完全高枕无忧了，开始迅速地大肆挥霍起这笔巨大的、历史上只能开采一次的财富了。从1973年起，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并且对这种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还开始了大量进口设备——基本上都是最普通的设备，这些设备我国工业也是有能力生产的。同时，还越来越多地用石油出口换回的资金去支持钢管、压缩机站、钻探设备和卡车等这类产品的出口。我仿佛觉得，始终谁也没有计算过整个这笔交易的效益——我们花费了多少用石油出口换回的资金去支持进一步的出口能力。至于对一次性不可再生的资源利用得很糟，经营不善，那就更不必说了。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这种天上掉下来的意外之财妨碍了及时进行经济改革。为避免误解起见，我想说明一点，我不反对出口，其中包括天然资源，如果除了它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出卖的话。但是，整个问题在于出口的效益，以及在于我们如何利用换回的钱。就这件事而言，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两者都糟透了。在当时的国民经济状况及其管理水平下，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意外之财帮助领导逃避作出已经成熟的决策，把这项决策推到未来，推到总的情况变得复杂得多的时候。

滞胀，国民经济管理停滞不前，无止境地推迟改革，使得经济学界的困难尖锐化，为保守派的进攻提供了机会。这表现在所谓“商品学派”（即认为必须让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自由发展，学会运用这种关系和机制来加强和发展经济）与“反商品学

派”之间的斗争中。属于后者的是主张坚持传统的、在斯大林时代确立的公式化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否定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权利，他们思想武库中唯一的新发明就是指望国家计委引进计算机乃至超超级计算机，以便在中央进行全部统计，并且不但从中央指挥每一个企业的工作，而且还指挥每一个车间、每一个工段的工作。据我所知，最高领导既不站在这一方，又不站在另一方，这也是很不好的，没有原则的。但是，科学部的领导和苏共中央某些书记死心塌地地站在“反货币学派”一边。

对于有头脑的经济学家而言，困难时光来临了。不愉快的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地落到了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的头上。费多连科经常处于压力之下（他的几位同事移居国外，这件事竟然也被用来作为口实）沙塔林和安奇什金则不时遭到上级的怒斥。

然而，到了这个时期末（我具体指的是1981—1982年），苏共中央科学部又试图转移整个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从本来研究国民经济越来越尖锐的现实问题改为研究科学部领导人郑重其事地称之为“理论”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走回头路，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切实际地去拨弄从马列主义奠基人著作中摘出来的一连串抽象原理，而且主要是用他们最粗俗的、纯粹斯大林式的诠释来研究。当时苏共中央科学部经济学处长沃尔科夫用指导性讲义的形式向各研究所下达指示，顺便说一句，其中露骨地吹捧斯大林的经济文章（大概是他的所有著作中最差的、已特别明显地被实际生活推翻了的作品）。附带提一下，沃尔科夫与契尔年科妻子的妹妹结婚，这就给这个自命不凡、不学无术的人的话增添了不少“学术的”和“政治的”份量。

在70年代初，对刚刚才萌芽的社会学进行报复比对经济学要快得多和容易得多。鲁缅采夫院士被解除了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的职务。特拉佩兹尼科夫和费多谢耶夫任命了鲁特凯维奇担任这项职务。后者是一个有名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反动派，而且对社会学一窍不通。任命他的时候就给了不含糊的指示——解散研究所的干部队伍。那个鲁特凯维奇很快就照办了，从而长期阻碍了这门对于我国社会十分重要的科学的发展。

至于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和世界经济这门当时对我们来说还是新的、刚刚形成的科学，所处的境地则要好得多。我想，一方面，这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我国外交政策在70年代所处的境地比内政要好）有关。因此，领导需要这门科学，需要专家学者，而这有助于击退那些气得越来越发疯的意识形态专家。其次，由于对外政策的特殊性，这些研究所及其所长（从5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和阿尔祖马尼扬开始）有机会直接与最高领导一起工作，因此，要“毒打”并整垮他们比较困难。

但是，到80年代初，乌云也越来越浓密地笼罩在这些研究所的上空。第一个落入斯大林式官僚政治磨盘的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借口是一起人为制造的对研究所两位年轻研究人员的政治审判案件）。随后轮到的是我的研究所。接踵而至的恐怕还有别的研究所。

众所周知，在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文化，特别是文学、电影和艺术——情况还要糟。关于这一点，报刊上已有不少材料（特别是解散《新世界》杂志编委会和流放特瓦尔多夫斯基，以及迫害索尔仁尼琴和其他杰出的作家），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总而言之，可以说，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在内政方面，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不断地加大马力。但是外交方面的状况却有所不同。

后面我将写到我们称之为“停滞”的危机顶峰时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在这之前，还要讲一下我曾积极参与的那些领域，即外交政策和缓和。

八、短命的和不走运的缓和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我们在对外政策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从70年代中期起至改革之初，我们把这些成就丧失掉了，并遭到了一系列的严重挫折。

无论成就还是挫折，都有其国际和国内的原因，其中也有领导人的立场和观点上的原因。同时，成就和挫折都是大有教益的，其教训都是不应忘记的。因此，我想专辟一章来阐述这些问题。

在阐述这些问题时，我不想去叙述我们这些年所推行的对外政策本身的历史和描绘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我认为，另一些东西倒是主要的，即：我们政策的深层动因、内在动机、它的动力和限制因素。从这个视角出发，在某种程度上我还不得不涉及美国的政策。

在原则上，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要实现对外政策的转变，较之实现国内经济和政治上的转变要容易些。之所以如此，至少是因为参与制定乃至实施对外政策的人要少得多，国家领导人要拟定对外政策的方针也更容易些。但我们的对外政策从十月革命后最初的日子起就一直与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与我们的国内事务联系得异常紧密，所以对外政策方针的发展始终是我们

总的政治纲领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革命后时期，在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思维中，有两个极端一直在斗争着。一批人把俄国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第一幕，认为进行革命战争和准备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牺牲自己的革命成果都是合理的。另一批人持不同观点，他们主张把本国的改造作为主要目标，建议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把社会主义的示范作用看作是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和在全世界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最佳途径。

这是那个时代政治思维的两个极端。但大概没有哪一位苏维埃活动家头脑中的一种观点是不以某种形式与另一种观点并存的。而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我们对前一种观点没有加以驳斥。同时我们又一步一步地，艰难地，一面犯着错误，一面又步履蹒跚地朝着第二种观点走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两种观点是从同一条根上长起来的，二者几乎都从未单纯地存在过，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由于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一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中，并且几乎一直处于这种形势之中，再加上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我们从来都没有相当公开地、全面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今天，依我看，不仅有必要这样做，而且也有可能这样做。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但我根本不奢望会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从坚信革命会同时（或几乎同时）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胜利到认为革命有可能在一国胜利、然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之路，并非像普及读物和文章中通常描述的那样笔直，那么简单。列宁起初（1915 年 8 月 23 日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只说出了一种设想，认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获得胜利[①]。

---

① 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26 卷第 367 页。——译注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起初似乎并没有证实这个设想。且不说在早先加入俄罗斯帝国的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中所发生的革命和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匈牙利在一段时间中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德国也爆发过浩大的革命行动，一系列其他国家——无论在我国的国境以西还是以东——都曾掀起过革命运动的高潮。声援苏维埃共和国的运动扩大了。当时看来，不仅是革命，而且是反革命都具有国际性。协约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德国军队镇压芬兰和一系列其他国家的革命，德国军队也像英国和日本一样参与扼杀乌克兰、外高加索和远东的苏维埃政权，还有，资本主义的西方支持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和反革命势力，这一切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一点吗？所有这一切完全可以肯定由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一种信念：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世界性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有机的第一部分。纵然不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部分，那么至少也是整个欧洲革命的第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之后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期间和谈判之后很快就爆发了的列宁同“左派”共产党人、同托洛茨基的拥护者、甚至同担任领导工作的同事们的争论，也就是在我们的历史文献和文艺作品中都做了大量描写的那些争论。这些争论多半都涉及对具体形势的估计问题。在这方面，列宁与当时的许多其他领袖不同，表现出自己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总是或几乎总是比较准确地估计形势，尤其是不过高估计其他国家中革命临近的问题。他也反对那些在特定时刻认为革命的英勇夭折要比与阶级敌人谈判和讲和要好的革命者（他们常常是非常正直的革命者），因为据他们说，革命的夭折会点燃其他国家的革命火焰。

但是，据我看来，列宁本人在很长时间内也相信，如果说世界革命尚未开始，欧洲革命无论如何已经开始。在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中，之所以没有很重视建成社会主义的途径、过渡时期的

任务、尤其是经济任务（当然，最迫切的、最刻不容缓的任务除外），这一事实恐怕与此有关，也与必须不惜牺牲所有其他利益而取得内战的胜利有关。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我们国家开始革命要容易些，而在其他国家把革命继续下去将会要容易些。或许，他曾考虑到，比较发达的国家，即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它们完成革命的时候，将会由它们在选择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方面充当开拓者和先驱者的角色。他认为，革命将会在其他国家，退一步说，至少在其中的一个国家——德国——很快发生，到那时候就可以制定有根据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改造的计划。就列宁及其一些战友所发表的各种言论的总的调子来看，这类希望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直到1921至1922年。

党的领导人、军队领导人以及社会人士在与波兰战争期间、在国内战争最后一次重大战役期间的情绪，就是这方面的相当明显的证明。当时国家为最初的胜利欢欣鼓舞，图哈切夫斯基在“攻克华沙！攻克柏林！”的口号下指挥自己的部队前进。因此党内就有很多人，包括一部分党的领导人，想必真的相信只要我们的红军战士一旦出现在波兰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就会起来完成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没有到达德国，而他的部队在波兰的出现反而使属于不同阶级的波兰人团结起来了，他们使红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结果边界的走向已不是“寇松线”[①]，而是大大地东移了，我们不得不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土地给了波兰。而我们党呢，却受到了一次具体的教训：社会主义是不能用刺刀赠给别的国家的，并且，反对外部威胁的民族团结要显得比

---

① “寇松线”是1919年12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建议的波兰东部边界线的约定名称。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于1920年7月波苏战争期间要求苏联红军在这条线上停止进攻，故称“寇松线”。“寇松线”做了某些有利于波兰的变动。——译注

阶级声援更省力[1]。

这样一来，诸如可以用命令和武力实行共产主义，可以通过“战时共产主义”达到“乐土”、“福地”——建成普遍富裕、丰衣足食和普遍公正的新社会等幻想就被可怕的事态进程埋葬了，同时那种认为整个人类，或者至少是欧洲，或者最不济也是德国会很快、非常快地在革命和建成共产主义的事业中向我们靠拢的幻想也破灭了。

于是，在那些幻想消失之后，无论是在对内政策还是在对外政策上，关于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就异常尖锐地成了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列宁及其志同道合者用新经济政策和“和平共处”、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的方针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新经济政策还是“和平共处”方针，起初都被解释为、也被理解为暂时的退却，暂时的喘息。

不过，从列宁最后的著作来看，他已经开始明白，一种新的、被称为“暂时的”状态已确实和持久地开始了，应该相应地把它作为一种非常长久的状态来对待。遗憾的是，命运只给了列宁本人极短的时间去做这件事。

而后来，开始了漫长的斯大林的领导时期，他追求的是自己的目的，他有他自己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国际关系的概念，昔日的那些原本就没有被领导者们和广大共产党员彻底克服的“革命主义的”和“左的”信念和情绪又经常流露出来了。因而，这种信念和情绪看来被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无论是在权力斗争中，还

---

① 在此，我要认个错儿。就在不太久之前，我在《星火》杂志（1988年第11期）上评论著名的美国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卡尔·萨根的文章时，对他关于图哈切夫斯基向波兰进军是输出革命的尝试的论据避而不谈，而是用一种俏皮的说法来搪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习惯性的保护性反应，而部分原因却是我们，其中也包括我，多年以来习惯于、最终是习惯了把“不适宜”的事实从自己身边推开。拿我来说，认真地研究我国的这段历史还只是在不久之前。——原注

是在确立他的政策方面，都帮了他不少忙。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第一，说的是这种情绪所包含的那种特有的期望：看“那个理想”马上就要最终实现——革命将在其他国家爆发，将成为世界革命。到那时，完全自由和幸福的时刻就会到来。这样的期望很自然地会诱使人们不去注意日常的、平常的国内事务，不去注意挫折、无序和灾难。

第二，说的是把所形成的形势看作是一种“紧急状态”，在某某地方，在同敌人的激烈斗争中，正在解决着世界共产主义的、让全人类得到幸福的无比重要的、真正全球性的、世界性的问题，当然就“顾不上”去关注构成生活的日常琐事，首先是“顾不上”去关注具有没完没了的各种需要和需待解决的问题的人了。要让人们对“紧急状态”的综合症确信不疑比较容易，因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确实是够多的。我们天天在讲自己不久前所迷恋的世界革命的主张，提醒大家红军喊着“攻克华沙！攻克柏林！”的口号到西方去的时代还会回来，这也容易使人们看不到或是不关心正是苏维埃共和国自己由于这种不恰当的政策和气势汹汹的宣传促使这些敌人数量增加并使他们更加毫不妥协。而在莫斯科活动的共产国际也是不断地这样说的，使人们产生一种念头：布尔什维克如果不是靠战争，那么也要用促进其他国家内部冲突激化的办法在全世界取得政权。不消说，在醉心于希望世界革命很快爆发的同时，我们自己也陷入了宗派主义，而我们党的和共产国际的宗派主义政策却加深了工人运动的分裂，客观上给右派势力的胜利帮了忙；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给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帮了忙。

但对于确立个人独裁、镇压政治对手和本来就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来说，对于建立极权制度来说，什么都不如利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紧急状态”形势更为有利。尤其是在这种形势下，本国

的一些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正常问题和任务就被这样或那样地与世界革命有关的一些事情挤到次要地位去了。

第三，说的是，新经济政策当初毕竟还是作为“暂时退却”确定下来的（从何退却？当时所谓的“进攻”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吗?)，这一点使斯大林很容易完成迅速收缩这种政策的任务并开始建立行政命令体制。人们开始把这种体制与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本质等同起来（直到现在许多人也还是把二者混为一谈），尽管它更接近于军事封建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封建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制度。而且，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本身实际上是“紧急状态”下采用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战争、备战和战后恢复的条件下曾经运转得不错，但在稍微正常的条件下就开始无望地空转了。

第四，说的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情绪要求非黑即白地看世界并把世界分成两部分——自己和自己人为一方，不可调和的敌人及其同盟者为另一方。这种看待世界的观点在人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及至战后又从这种观点衍生出一种世界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和两个体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乃是国际生活发展的主要轴心的理论。这种理论有较强的生命力，一直存在到80年代初。非黑即白地看待世界，看待生活，实际上也成了对建立和维护个人独裁、推行镇压办法十分有用的刻板公式。

第五，说的是，由希望善行很快在全世界胜利而产生的、以革命的救世主的坚定信念为支柱的、并且是以崇拜最崇高的、最高尚的和最人道的理想（大概可以与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相比）为前提的“左倾乌托邦”的思维模式必定要夸大暴力和武装力量在国内外事务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坚信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更是如此。这种情况又大大有利于独断专行的人和独裁者。

当然，也不能不了解，所有这些观念和处世态度，除了以往传下来的某些理论原理或对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作的后来并没有

得到证实的评价之外，历来也还有另外一些根源，即人们强烈的感情上的需要，他们经历了社会基础空前的摧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困苦与牺牲，他们在感情上渴望从这里看到超出个人命运、有时还超出他们民族命运的意义。因此，革命十分经常地是和“救世主”说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我国的革命是这样，而且法国大革命乃至美国的革命都是这样。美国革命在许多美国人的头脑里确立了“美国是上帝找到的帝国”、美国是“小丘上闪闪发光的城市”的观念，而后又确立了一种“公开使命”论——所有这一切，至今仍以某种形式存留在许多美国人的意识中，时而还流露在美国的政策中。

但同时，十月革命产生的“救世主”说，不是把一个民族抬高、使之高居其他民族之上的民族主义的“救世主”说。不，它纯粹是国际主义的，情愿献出一切，牺牲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为了给处于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无力的人类开辟一条通往自由和幸福之路。米哈伊尔·斯韦特洛夫的诗《格拉纳达》那样广为流传，闻名数十年，绝非偶然。诗中讲述了一位红军战士，一个昔日的农民，为了把自由送给遥远的西班牙的谁都不知道的“格拉纳达乡”的人们，是如何参加国内战争，如何情愿去赴死的。这首不难理解的诗所反映的不仅是理论，不仅是统治集团的信仰和对这种信仰的宣传，而且还有国内接受并拥护革命的那部分居民的思想状态，人们某种深层的、已经变得极其稳定的感情和情绪。

这种救世主的情绪，对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具有崇高意义所怀有的信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无疑都有助于忍受难以置信的困苦，经受最严重的考验。不仅如此，它们还有助于苏联在西方的左派势力、左派知识分子中获得崇高的威望，不过，很遗憾，我们那时所固有的宗派主义没有使得这一点在应有的程度上得到实现，而同时却增强了西方各国统治集团的

敌对性和这些国家的居民对苏联的不信任。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优点与缺点相互抵销了。但也还有一个真正致命的、用什么都无法补偿的大缺点，就是这种情绪使斯大林更容易操纵、要弄苏联人，使他们无法自卫，把他们变成一个诡谲、残忍的、自私自利的领袖很容易得到的猎获物。原来甚至连国际主义也可以拿来为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意图服务。一个十分明显的表现就是，对我们的曾在阿富汗英勇地服过兵役的士兵和军官使用习以为常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概念，但他们所参加的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应当受到普遍谴责的、也根本未曾体现国际主义的战争。

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这种大国主义得到了十分明显的体现，至少是从 1939 年 8 月 23 日签订苏德条约议定书开始。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关系中一些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证实了斯大林当时在这方面准备堕落到何种地步。在莫洛托夫访问德国的时候，德国人建议苏联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诚然这个条约已被其参加者（德国、意大利、日本）匆忙改名为“三国公约”。很快就向柏林表示了有条件的同意，条件是希特勒将不反对我们向南，向黑海海峡、温暖的阿拉伯海和波斯湾扩张。请看在充满高昂激情的革命时期产生的朴素的、就其天性来说无私的“救世主”说，竟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大国主义情绪和野心比斯大林活得长久，我指的首先是领导集团的情绪和政治思维。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情绪也从上面灌输到了下面，它们毒化了一部分公众的意识。

这些过去的残余和流毒像重锤一样挂在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身上，存在于他们本身意识中和部分苏联人思维中，妨碍他们从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结构（毫无疑问，并非没有我们参与）中摆脱出来，使他们不能有效地同“冷战”、同军备竞赛和实力对抗政策作斗争，甚至在已经开始出现有利于这样做的条件时也是

如此。

因此，国际关系的改造应当从改造意识，首先是从改造自己的意识开始。

赫鲁晓夫多半是没有看清这项任务的深度和真正的广度，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至少应当放弃一些妨碍政策的教条。第一，放弃战争不可避免的教条。第二，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必定是暴力革命的坚定信念。第三，应当反复地同“革命输出”论和“革命战争”思想本身划清界线（我在这里不谈涉及国内政策的教条）。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20大上和20大之后、其中包括在与中国领导人的论战过程中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想谈当时所做的工作的“质量”，当时已尽了所能。但不管当时是否已经把一切都整理成了与马列主义相衔接的严整的思想，苏联人已获得了对人人都关注的迫切的政策问题的没有疑义的、相当清楚的答案。既然在以往的战争中蒙受了如此深重苦难的人民的最大希望就是和平，人民也就倾向于肯定地接受这个答案。而且也明确地让西方知道：新领导运用自己对自己前辈的观点不承担责任的权利，已采取了新的政治纲领。

但“左倾”的魔鬼显得生命力特别强，特别狡猾，又特别机敏。把它赶出了门，它就又从窗户，从通风小窗，从炉子的烟囱，或者还要坏——从锁孔跑回来了。由于我们有过一段漫长的痛苦历史，我们（首先说的是我们这一代）多数人都成了那种很难放弃旧的教条和观念的人，甚至在这些教条和观念已经不符合现实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暴露出了一种现象：有特别多的人，也包括领导人本身，在政策上和理论上勇敢地向前迈出了几步之后，又害了一种我想称之为“革命性不足心理”综合症的病。

这种病症表现在：我们刚开始适应现实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迈出了几步，就立刻去寻找如何在自己的革命“神学”中对之进

行“弥补”(当然尽可能不要使“神学”蒙受大的损伤)。我特别指的是放弃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和武装的、暴力革命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的思想；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争取裁军的最初的现实尝试等等。为求证明自己迈出的步子是正确的，我们就制造了一系列理论上的和政策上的思想和构想，以图使我们一方面继续在政治上采取现实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又保持意识形态的贞洁，证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正统性。

实际上，后来弄明白了：向老教条所做的这些让步、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所加的保留条件（这些保留条件主要还不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而是来自幼稚以及理论和政治上的肤浅）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用过去斯大林时期的死荷重负来妨碍我们制定新的政策的尝试。

比如，我们曾试图证明：虽然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战争，那么，战争将以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普遍胜利而告终。看来，我们并不明白，这种提法会破坏我们在政治上迈出的勇敢的新步子的有效性，并损害世界舆论对我们的信任。

要么就把无休止地重复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取消世界舞台上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一点当成了我们领导上的长期的宣传主题。应当承认，我当时很难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坚持这一点呢？为什么要尽心竭力地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呢？西方可没有想到要停止自己的对外政治宣传，而且把宣传搞得比我们更有效。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多半是为了显示对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性，同时也为了证明我们需要意识形态战线上对国内外真正的和假想的思想敌人保持斗争的态势。

于是，我们就特别强调：我们在拥护和平共处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各种形式的解放斗争（而首先是民族解放斗争）、

包括暴力斗争的全力支持。在那些年的重要的政治文件中（包括已经提到的因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分歧而发表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经常强调这一点。例如，在信中就引用了尼·谢·赫鲁晓夫的如下见解："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只要存在着殖民主义，就会有解放战争。这是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殖民主义者不会自愿地给各国人民以独立。因此，各国人民只有用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公开信》继续谈到："苏联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最广泛的支持。我国曾经向越南、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人民、向古巴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提供的实际援助是众所周知的。"[①]（确实，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写下去，还可以列上印度尼西亚，然后还有安哥拉和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利比亚、阿富汗和其他国家。）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同时也只是国际社会的一员——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之外，对粗暴地践踏、破坏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独立和权利的行为冷眼相观。另一点也很清楚：当我们确立这种观点的时候，殖民帝国正在急剧衰落并时常爆发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争取独立的战争和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战争，就其性质来说，顺便说一下，很像18世纪末的那场从中诞生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争取独立的战争（顺便提一下，除了法国之外，俄国当时也帮助了起义的移民）。人们对这类战争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态度，这是很自然的，而且这种态度不仅仅来自我们这一方面。

但我相信，当时所以要那样提出援助解放运动的问题，还有一个因素，即为我们所摈弃的某些教条作"弥补"的因素。我们

① 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北京，第565页。——译注

摈弃了这些教条，但又不敢百分之百地确信我们并不会因此而走上某种“离经叛道”之路。而这一点恰恰就产生了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革命性不足心理”综合症。尤其是中国人经常敲打这个痛处，竭力指责我们“背叛”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

甚至连措词本身都说明了，我们当时的这个论题是同早先的“马克思主义的”（我所以要加上引号是因为实际上说的是共产国际一斯大林主义的）“神学”有联系的。您只要从“解放战争”一词中拿掉“解放”二字，您就会获得赫鲁晓夫以前的那个时期的经典式的信条：“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会有战争”、战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敌人是不会自愿做出各国人民所要求的那些让步的，而“人民只有用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我在谈到“弥补”，谈到感到需要作出某种补偿，以便不仅在本国和其他国家的老教条的“信徒们”面前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且也为了因犯“革命性不足心理”综合症而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时，我根本不是说当时说的那些话和与之同时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只是一种伪装，是在口头上掩饰其他意图，是连我们的领导人自己也不相信的。不，很可能是相信的，至少是部分地相信，更何况已有了使他们相信的那些客观情况，尤其是戏剧般地出现了殖民帝国的土崩瓦解。但除此之外，无论是当时领导人的思想还是语言，都根本没有摆脱他们意识中“过去的残余”——首先是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最多也只是处在认识新现实的半途中。

但是，不管怎样，这样一些“残余”曾妨碍我们去制定彻底的新的政策方针，使新政策方针有间断，有矛盾，而相当重要的是，帮助我们的敌人播下了对苏联意图的怀疑。特别是这些思维中的残余，很遗憾，还经常被当时实践着的政治行动所加强。正像很快就弄明白的那样，我们的确不是向任何一种解放斗争都提

供援助的，而是给那种在政治上，或者在社会方面，或者甚至在战略方面让我们比较喜欢的解放斗争。而当殖民帝国在一个地方瓦解的时候，当问题已不是纯粹形式的民族解放斗争，而是支持殖民主义者撤离后在那些地区出现的国家之间或国内冲突中双方中的一方的时候，此时此地形势就变得特别复杂了。因为殖民帝国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与殖民主义、战争和政治专横的后果，与部落主义、未解决好的领土问题及政治问题，与内政、宗教和其他冲突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于对争取自由的各国人民或其进步力量的同情而产生的一些舍己利人的考虑，就往往是根据自己对安全的关心，对大国利益的关心，对控制某些在发生大规模冲突——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情况下可能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阵地的关心而表露出来的。看来最危险的是：我们一开始对一些解放运动提供援助，我们就在各处使美国人得以卷入在“第三世界”和争取“第三世界”的角逐。从而就使在那些地方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地区危机和冲突变成了国际问题，变成东西方之间“冷战”、“大”冲突的一部分。自然，这一切既不利于国际关系，也不利于苏联。当然，也不符合“第三世界”各国的真正利益。我们特别明显地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那已是在7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

早在赫鲁晓夫时期，我们就已为向老教条让步，为在这类事情上的半途而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赫鲁晓夫的妥协并没有使教条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附在我们许多人身上、其中包括领导人身上的“左”倾魔鬼感到满足。因此，正像已经提到的，在十月全会以后也就针对“20大”所通过的对外政策方针开始发动攻击。特别是反对当时业已形成的和平共处、战争可以避免、可以搞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平互利合作等等

观点。他们试图把这一切都说成是脱离阶级立场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成是修正主义，是向和平主义让步，是对牢记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的共产党人听来很不顺耳的什么东西。

的确，骑兵式的冲锋没有成功。可是这些进攻却迫使对外政策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地位极高的上层人士，在某个时期由进攻转入了防御。可除此之外，在他们身上，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头脑里，那套“革命性不足心理”综合症却明显地加强了。为此，后来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在那种形势下，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个人立场是至关重要的。

勃列日涅夫总的说来在理论上是很弱的，特别是在对外政策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上，对此，谁都不怀疑。但他总还是有现实感的，特别是在他领导国家的初期，能够很好地理解：对人民来说，压倒一切的是维护和平。并且他清楚地看到：在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取得明显的进展乃是确保自己的政策和自己个人的声望的可靠的办法。我也确信，作为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人，他在这一点上是真诚的。

总的说，很快——早在1967至1968年间，他的立场就已基本形成——他想争取改善国际形势。

据我的推测，当时估计这种可能性可以从同美国的最高层接触开始出现。约翰逊总统曾预定1968年秋访问苏联。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迫使美国人取消了这次访问。总的说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对我国的对外政策事务的消极影响要比对我国的国内事务的影响弱得多，原因之一可能就是由于美国正在激烈地进行越南战争。这一点不仅使西方公众眼里用来评价政治的道德标准的作用变了形，而且也使美国总统不可能像在其他场合下那样摆出一副道德说教者的面孔。

一句话，同美国的接触毕竟还在继续，虽然高层会晤是推迟了。与此同时，我们又准备在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中来一个大的突

破。主要的倡导者是德国方面——即“新东方政策”的建筑师维利·勃兰特总理及其顾问埃贡·巴尔（我认为他是我们时代的最杰出的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之一）。苏联方面当时迅即支持这个倡议并有所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安德罗波夫、当时我国驻波恩大使法林（他有时绕过外交部直接同国家领导人打交道）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都起了重大作用。葛罗米柯起初并不积极支持德国的倡议。我想，这是因为他认为他把对美国的政策置于我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位置，而习惯于把联邦德国看成“天生挨打的孩子”，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显示他的“阶级”信念和“反帝”信念，从而“平衡”我们在对美关系上采取的积极步骤[①]。但后来，外交部也加入进来了。1971 年 9 月 3 日签订了所谓“莫斯科条约”。同时还解决了复杂的西柏林问题，就这个问题也签订了四大国（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协议。

对外政策的其他方面——与法国、加拿大和其他一系列国家的关系——也活跃起来了。1969 年，比原计划稍晚一些，开始了苏美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看来，事情已经动起来了，开辟了重要的时机——应当抓紧利用这种机会。但要鼓足勇气，加强灵活性，开阔思路，以便按新方式认识形势并从观念上形成适合形势的政策，却还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情。我是根据就这个题目同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同安德罗波夫的多次谈话判断的。的确，安德罗波夫在许多问题上（德国问题则是例外）都“迟疑犹豫”，表现出格外的小心翼翼。如今看来，他这样做多半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谨防与同事

---

① 看来，当初事情闹到了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同葛罗米柯相当激烈地交锋的地步。我记得，在巴尔首次访问苏联的时候，甚至有人向我转达了勃列日涅夫的请求，要我接待西德客人一天以便像安德罗波夫所说的找出一天的时间来“说服”葛罗米柯。当时我也就结识了巴尔，后来多年的友好关系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在“帕尔梅委员会”一起工作期间尤其得到了巩固。——原注

们发生冲突。

我看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个困难原因。

一个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勃列日涅夫和一系列其他政治局委员对新的对外政策坦率地表示没有把握、怀疑：新政策能否以那个时代和这些人公认的形式符合我们的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害怕“不够彻底的阶级立场”会把党内的某种力量团结起来或为他们反对领导制造合适的借口（对十月全会和全会后展开的争论记忆犹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作用。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严肃的谈判，后来则是对限制和裁减军备方面的一些严肃事情准备不足（而在某些问题上简直就毫无准备）。而当时不这样做在国际关系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

其实，我们对这些谈判和事情准备得很差，这是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从前，谁也没有给国防部和国防工业部门提出过这样的任务，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在军备上赶上美国人，他们并没有考虑过限制军备的可行方案。况且，国防部和军工综合体的工作人员（老实说，恰恰像外交部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中的大多数专家一样）没有同美国人对话的精神准备，对超出一般性的政治宣言范围的谈判也没有精神准备。缺乏准备的状况竟到了这种程度：开头甚至不能正确领会美国提出的涉及战略和裁军问题的一些概念和术语。根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开始前我同我国代表团成员的交谈，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他们缺乏掌握主动权，提出自己的有根据的、能强有力地引起对方及至世界舆论兴趣的建议的能力，更不用说提出新主张的能力了。

那么，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呢？军事主管部门和军工主管部门本是国中之国。在这里，一切都被作为高度机密包藏着（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依然如此）。这些部门形成的圈子是根本不能侵犯的——很显然，给军队最大支持的要数勃列日涅夫，因为他

本人就最喜欢将军、“战争英雄”之类。此外，多年之中他都曾是国防工业的党的监督人并习惯于实际上不拒绝将军们和总设计师们的任何事情。不仅如此，还千方百计地迎合他们。而军队领导人及其在国防工业中的同事尤其希望不让任何协议捆住他们的手脚。

必须要有某些特殊的情况才能清除这些障碍。那不是在不超出传统外交上习惯了的那些东西的范围、在同某个国家的关系作些改善的情况下悄悄地鼓点儿勇气的问题，而是要动摇“冷战”的基础本身，想办法用另一种不太危险的国际秩序来取代冷战。

早已出现了两个具有这种普遍性质的情况——核战争威胁的完全不能允许和沉重的军费负担。赫鲁晓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从美国方面来说，艾森豪威尔和后来的肯尼迪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几个初步的、尽管是非常小的步骤。

但还出现了发生这些转变的更具体的原因。已经改善了的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说得更具体点，是业已签订但尚未批准的苏德条约。这是我们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但由于波恩围绕条约的批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胜利真正是千钧系于一发。苏联领导人不能明白：这场斗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立场，而美国的立场又取决于苏美关系的状态，苏美关系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限制武器谈判的前景。

“中国因素”曾经是第二个重要的“特殊”情况（美国有人开始称之为“中国牌”）。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这时说的已经不是理论上的分歧和争论，而是两个大国间关系日益紧张的冲突形势。中国制造了核武器，有了导弹（尽管不很完善）。苏联在边境上增了兵。中国人声称有来自北方进攻的威胁，于是开始深挖洞——修了防空洞，挖了堑壕、地道，修建了一系列地下居民点。我们也把这理

解为他们在准备打仗，也曾当真担心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来了。

自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如同做一场噩梦一样面临着“两条战线作战”的威胁，也就是美（北约）中勾结或至少是西方会帮助中国实现军队现代化和增强军事潜力。我们曾为这两件事感到严重不安。

而这种状况却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展开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游戏的机会（当然，也为中国人创造了这样的机会，尽管当时，很显然，要推行一种灵活的、聪明的政策对他们来说还比较困难)。这场游戏终于开始了。

但在转到谈美中关系之前，我想给 70 年代初我们的立场所发生的那些变化归纳出一份对照表。这些变化是相当重要的，足以激发我国甚至相当保守的领袖们的积极性，其中包括迫使他们向自己的军工综合体施加比以往更大的压力。

但是，很自然，问题并不单单在于我们。规模不亚于我方的进展也应在华盛顿发生。这样的进展果然发生了。首先是由于美国在越南的冒险行为在国内引起了反帝国和反军国主义情绪的高涨。实业界也开始反对战争——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支持一个帝国的花销已开始超过帝国带来的收入。当然，美国也担心国内问题的激化，因为当时已经明摆着：即使美国也不可能同时保障“既有大炮又有黄油”。美国及其主要的盟国之间的矛盾也越发严重起来。总而言之，在华盛顿也形成了一种对苏美关系正常化和限制武器谈判相当有利的形势。

自然，对这些变化的分析是美国研究所注意的中心。我们经常把变化的情况报告给领导人，尽管我们这样做曾不止一次地引起中央委员会、苏联外交部、特别是军人中的持保守态度的活动家们的不满。

在这种情势下，美中关系问题也具有了新的迫切性。70 年代初，这个问题有了重大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对苏联来说有着

巨大的意义。

众所周知，亨利·基辛格认为，利用中国这张“牌”是自己最大的成功和功绩之一。确实不能不承认他很巧妙地，并以这位公认的杰出政治家所素有的效率建立了与北京的联系，并进行了预备性谈判。

但“首先发现者”的桂冠大概还不能授予他。使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主张早已显而易见，它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美国的外交日程上的。应当看到这一点，但这并不贬低基辛格的雄才大略，他的惊人的应变能力——他能很快就懂得应当如何与某些对话者交谈。主要的毕竟还是政治现实。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根本就不存在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中保持尖锐的敌意和紧张状态的合理的原因了。相反，实现关系正常化对双方来说却都有许多明显的好处。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西方要广泛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唯一的一点是，当时美国人尚不清楚，中国领导人究竟对关系正常化的主张持何态度。但当时要弄清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但是，老实说，我最终也没有弄明白而且现在也不明白，美国为什么把最初的接触拖了这么久。

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是，不仅我们自己受了那套深刻的“革命性不足心理”综合症的损害，美国人也受到了这种综合症的损害。例如，在50—60年代，美国人形成了几乎是他们第二天性的一种惧怕心理，怕在共产党人面前表现出不可调和的斗争性不够，尤其是对苏联，而在那些年里又特别是对中国。究竟为什么美国恰恰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时间地采取如此不可调和的态度，尽管美国在传统上对这个国家抱有巨大的潜在兴趣，甚至有意强调对它的善意，这些我不想全面地回答。但我认为这种不可调和的斗争性的一些成份是很明显的。

其中的一种成份就是在本国右派面前起码感到恐惧，这种恐

惧是从麦卡锡主义时期继承下来的，当时人们遭到了特别凶狠的迫害，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和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外交家简直就从政治上、道德上被消灭了。从那时起，直到很久以后，任何与中国和解、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尝试都被右派视为几乎是叛国的行为。

另一种成份就是朝鲜战争的心理遗产和政治遗产。当时，中国军队（我们当时称之为“中国志愿军”）在一段很长时间内同美国军队作战（也并非没有胜利）。在那些日子里，反华的激情十分炽热，竟至讨论开了美国要不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诚然，此事以提出这一主张的麦克阿瑟将军被召回美国并随后退役而告终。

第三种成份是，中国在东南亚、太平洋和“第三世界”的其他一系列地区进行的解放战争和内战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而引起了美国的不安。我认为，由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在同苏共激烈争论的过程中指责我们背叛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运动，仿佛声明要领导这些运动，提出了“世界的农村”（即“第三世界”）要对“世界的城市”（即工业化的北方，既有资本主义的北方，也有社会主义的北方）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的理论，因而美国的这种不安更加加深了。中国领导人一再歌颂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了他们的一个口号）。所有这一切都使美国人严重不安——有些人竟至如此担心，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帮助下，核武器会在“第三世界”开始扩散。美国恰恰是以中国的扩张威胁为借口来证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入侵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含义就在这里：如果越南陷落

了，剩下的“骨牌”就都会在中国共产主义的逼攻下倒下[1]。

第四个成份（与前一个成份相联系）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战争中给河内和南方反西贡势力提供援助感到不满。越南从 1966—1967 年已经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问题、主要痛处。许多美国人都曾坚信，美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首先是因为中国，因为它直接援助越南，还因为恰恰是由于苏联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中角逐领袖地位，迫使苏联给予越南如此大规模的援助。

再有，第五种成份是，美中关系中存在的复杂的客观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美国人特别害怕给人造成一种“出卖”老盟友的印象，并且担心这会使美国的其他“朋友”士气沮丧。

所有这些情况既然都拖延了已经酝酿成熟的、甚至是必须要办的事情——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那么，70 年代初，当美国不顾上述的心理和政治障碍而终于决定走这一步的时候，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尼克松和基辛格之所以决定做他们的前任没有足够勇气去做的事情，原因之一便是尼克松政府当局长久以来所享有的他当之无愧的坚定的保守党人的声誉（请注意，正是麦卡锡主义分子的

---

① 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害”之中，美国人当时认为比较重的恰恰是中国这一“害”。有许多证据能证明美国人有这种看法。当越南战争已经在进行的时候，据说，美国人就进行过非官方的谨慎的试探，想弄明白我们会如何对待美国战略空军对中国与核武器生产有关的目标的打击和作为我们能否采取某些使美国人满意的反应步骤。不过，我要附带说明，这种试探可能是故意挑拨离间，而如果我们对这个主张表现出有兴趣，他们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我们，使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更加尖锐化。但我认为，就基辛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内容来谈这个问题是适当的——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似乎勃列日涅夫在 1974 年高级会晤时曾向尼克松建议采取某种反对中国的联合行动。我对这一点怀有最大的疑问，尽管我并不排除勃列日涅夫可能会批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告诉尼克松中华人民共和国会给和平事业、给缓和、给苏联和美国的利益造成损失——这些题目他自己在那些年的谈话中、其中包括与美国人的谈话中都经常触及并可能由此给这种议论提供了口实。——原注

积极支持使尼克松在政治升迁上第一次来了个飞黄腾达)。这种名声使政府对来自右翼的批评有了免疫力。而这一点在美国的条件下却是非常重要的，正像我们长期以来对来自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批评需要有一个护身符或免疫力一样重要。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引用一下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教授的思想。他说，在美国的政治中，长期占优势的有两种惧怕心理：一是惧怕共产主义，主要是保守党人所固有的心理；二是怕对共产主义显得太软弱，这种心理尤其支配着自由党人。尼克松和基辛格既是特别富有经验和熟悉情况的政治家，不会屈服于第一种惧怕心理，同时，又有着无可指摘的保守党人和反共人士的声望，足以不受第二种惧怕心理的威胁。这一点恰好帮助了当时的政府在同中国、稍后在同苏联的关系中较之自己的前任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

尼克松政府所遇到的困难是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活跃起来的另一个原因。事情往往是，人们采取新的决定性的政治步骤，不是因为生活好过，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必须这样做。1970—1971年，美国就恰恰出现了这种形势。正如已经谈到的，越南战争在那些年曾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中的主要问题：这场战争成了美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甚至紧张和群众的不满情绪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尼克松答应找到一条迅速解决越南问题的途径。但事实上他只是使越南问题复杂化了——尤其是由于他决定开始轰炸柬埔寨，在那里制造政变，然后再军事入侵这个国家。所有这一切都使越南本土的军事形势严重地复杂化了，并引起了美国本土反战运动新的高涨。尼克松和基辛格顽强地试图以自己的力量实现和平（首先是借助于军事压力与战争“越南化”。所谓战争“越南化”就是减少美军的数量和美国的介入)，但一定要在能“保持

脸面”[①]的比较体面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可是终未得逞。我认为，直到 1970 年底他们才开始明白这一点。但总统选举临近了(1972 年)，总应当以某种显著的成果、以政治上的成就来迎接选举。

自然，在这种条件下，美国不能不考虑自己同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同这两国关系的改善将成为在越南实现体面的和平的可以接受的替代物，再说也能使在越南实现体面的和平变得更容易。为什么这时决定从中国开始？我想，首先是因为总统、特别是他的主要对外政策顾问得出了一个结论：“头号敌人”已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苏联。于是，遵循昔日基辛格关于恢复“均势”传统政策以取代已成为过去的“两极世界”的主张的精神，美国认为加速与北京接近，以便对莫斯科加压是适宜的。换句话说，根据基辛格的构想，应当首先在另一个天平盘上再加上一个砝码，以使苏联和美国的力量相等。

---

① 亨利·基辛格早些时候，在尚未主政之前曾向我解释，在给美国“保存脸面”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1967 年 12 月，受尼克松政府的委托，而具体说是受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的委托，他来到了莫斯科（并且是作为他很生疏的帕格沃希运动的自由派代表团成员）。他是专门来试探如果按下面的条件解决越南战争问题能否取得莫斯科的支持，即：停火，和平，美国撤出军队，但河内要承担在南越只通过政治途径行事的义务，逐步地，至少在最近两年之内；以后再发生什么事情，华盛顿不感兴趣。由于没有其他的、更高级的接触，基辛格（以麦克纳马拉的名义）向我阐述了这些主张。我答应他将他们的主张转告领导（我于是马上转告了领导，但此事未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就这样，顺便说说，结果我倒成了此后很快成为著名人物的基辛格所相识的事实上的第一位苏联“政治人物”。早在 1969 年 2 月，我就有机会介绍他与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相识，后来基辛格与多勃雷宁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967 年，我仿佛觉得，这个解决越南战争的计划和莫斯科之行的主张，都属于基辛格本人，他把自己推荐给了麦克纳马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基辛格在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后，随后又出任国务卿，在非常合适的条件下参与了和约的缔结，尽管这已是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届满之后（就在 1973 年）。但在签订协议两年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完全控制了越南南方的时候，美国驻西贡大使也腋下夹着美国国旗匆忙地乘直升飞机撤走了。美国政府，包括基辛格，表示愤慨和不满，把这几乎看作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也对我们进行了指责。——原注

大概在这个问题上另一种主张也起了作用——乘苏中关系尖锐化之机来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在苏联开始同美国进行认真的对话之前削弱它在“交易”中（亦即在谈判中）的地位。况且，单单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如果成功的话，然后再同苏联关系正常化）一项就将是一个巨大胜利，仅以这一点就可以指望在1972年的大选中取胜。尤其是在公众的心目中这一点也将会使越南问题更容易解决。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简单些，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限制核武器协议（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未曾充分做好签订限制核武器协议的准备，而不得不等待复杂而又长期的谈判）。

很快就显出来了：从国内政策的角度看，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打算是很精确的。北京高级会晤之后，中国，中国的一切——从中国菜到中国的艺术——在美国马上就成了普遍的时髦。而毫无疑问，这一步骤也提高了政府的声望。更重要的是，就连右翼分子（一小撮十分狂暴的右翼分子除外）也不能反对——因为改善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就加强了在与苏联对抗中的地位。

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美国试图在它与苏联的关系上打“中国牌”，但这样做有多大成效呢？我想避免非此即彼地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苏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美中勾结反对苏联的潜在可能性（我个人一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大可信的，而如果我们不犯大错误，那么，这种潜在的可能性简直就不可信）自然会推动我们同西方改善关系，尤其会推动我们那些用其他论据很难打动的“顽固派”这样做。我是根据自己同苏联领导人就这个题目的多次谈话留下的印象了解这一点的。这确实是政治思考和打算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打“中国牌”对美国人来说是只会赢不会输的。

此外，在对华关系中的困难和对美中勾结的担心，并不是推动我们的政策得到进步的唯一的，依我之见，甚至不是主要的动因。这些进步使我们踏上了改善与西方，而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之路。起了很大作用的是真诚地渴望消除战争危险，关于这一点，我们曾谈过多次，但不知何故，美国人却没有认真领会这一点。

在我们国家，从其历史经验和人民的“遗传基因”来看，把维护和平作为政策目的，根本不是宣传性质的议论，不是对群众情绪的平民党式的迁就，而完全是一种严肃的政治动因，包括对最高领导人来说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的领导人在迁就老的(越来越不符合新现实的要求的）政策的同时，恰恰是为了维护和平而甚至不惜牺牲最迫切的社会需要来毫不吝啬地给军事计划拨款（“国防是神圣的事业”，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勃列日涅夫重复这句话)。而与此同时，领导人也越来越清楚；“冷战”和军备竞赛迟早要导致一场灾难。

希望减轻军备竞赛负担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尽管我相信，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领导人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我们所背负的军事负担是多么力不从心，这个负担又有多么大（我不相信领导人今天对这方面的情况就什么都清楚了)。

当时我们关注欧洲政治形势的彻底改善同样也是现实的（这也是改善苏美关系的一个刺激因素——总的来说，我们懂得了：没有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这个目标将是实现不了的)。此外，还要再加上一种想利用发展经贸关系以及科技联系所能够产生的那些好处的愿望。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暂时的，而是非常重要的利益，它们给自己打通了一条穿过厚厚的意识形态框框和帝国野心所产生的那种情绪的道路。这甚至也不以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为转移。归根结底，是赫鲁晓夫作出了调整我们同美国和同西欧国家

关系的初步尝试，而当时我们与中国还有着正常的关系。而且，正是这种尝试成了苏中争吵的原因之一，或至少是中苏不睦的一个理由。

谈了这些，我不能不承认，“中国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没有能有效地抵制美国想打“中国牌”的企图。而这一点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我确信，如果我们没有上面谈到的那些弱点（尤其是意识形态的障碍，而更准确地说——政治思维方面的教条主义的藩篱和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认真谈判的毫无准备）所造成的摇摆、犹豫不决和迟钝，我们当时或许能够有效地影响国际事件的发展进程，包括美、苏、中的三角关系。

如果我就此画上句号，那么我说的是实情，因为那部分比较稳健的和有远见的领导人和那部分资历较深的对外政策专家恰恰是这样认识问题和对待问题的。但这并不是全部真相。

1971 年夏天，有消息宣布：基辛格到过北京并就 1972 年举行美中高级会晤一事达成了协议，而此举使许多苏联人即使不是陷于休克，起码也是张皇失措。所说的不只是大众，而且也有那些接近政治的人，包括我们的个别领导人。根据交谈，其中包括与负责工作人员的交谈，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而这样的交谈当时在我这里是接连不断的——在此之前我大概还没有见过人们对美国研究所及其作出的评价流露出如此广泛的兴趣。

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引起了我内心的尖锐反感，我头脑中真没有想到：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对美国在政策上迈出的这一步感到完全出乎他们的意外？其实，在这件事上，已经有过明显的征兆：比如“乒乓外交”事件，当时，一个平平常常的中国体育队却在美国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高规格的接待。而除此之外，我们的报刊本身也没完没了地报道过“中国领导人与世界帝国主义勾结”的可能性，既指责中国也指责西方有这种图谋。

是否意味着我们不相信我们所写的报道呢？抑或相反，是否

我们自己反倒成为自己宣传的牺牲品，相信了我们报道中讲的可能隐藏在这种勾结背后的令人不安的意图和计划及这种“勾结”可能会带来的极其危险的后果呢？更不用说或许正是我们自己用这些张皇失措的议论，在某种程度上提醒了美国人，可以在哪儿把我们打得更疼一些。

但后来我就开始得出一个结论：还有另外一个使我们许多同志感到惊慌不安的原因，这就是他们终于开始思考到，能否永远让教条束缚自己的手脚，由于意识形态的（要让我说是神学的）偏见而不接受现实，逃避业已成熟的政治解决办法。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在打“中国牌”的时候倒帮了我们的忙。可能同他们自己的愿望相反——启发了我们许多政治家的政治思维（顺便说一句，也暴露了他们是多么缺乏职业素养）。

但张皇失措和没有根据的惧怕情绪当时令我非常不安——这种情绪会给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利益造成损失。于是我当时就采取了一个并非完全寻常的步骤，要求给《真理报》撰写一篇有关行将到来的美中会晤的文章。

我给基里连科挂电话（这时他正在“看家”，因为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都在休假），提出必须以某种方式对西方报刊掀起的关于预定的美中高级会晤的广泛宣传运动作出反应的问题。发出这种“信号”完全是我这个美国研究所所长职权范围内的事情。“那你就写吧！”我听到了所希望的答复（基里连科当时非常惊慌，虽然不知道对所发生的事情应当作何反应）。“我再给《真理报》下指示”。他确实给《真理报》作了指示，这就缓和了我后来同编辑们的争论，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协商。

文章我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就写成了，题目叫《全力以赴》，并于1971年8月11日登了出来。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当然是苏联的公众，我想向他们阐明：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尤其是悲惨的事情，因此也没有理由担心美国和中国结成反苏联盟、尤其是军

事联盟的威胁。其实，只是发生了早就该料到的事情，因为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的尖锐敌意早已成了不合时代要求的现象。文章还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对美国的这个倡议的动因的最终评价将取决于开始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时的总的政治情况。如果美中关系正常化将伴随着美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我首先指的是苏联）的关系有同样的进展和在限制军备竞赛和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做出努力，那么，我们就将以相应的方式理解美国的倡议。如果不是这样，这就会产生对美国的动机的理所当然的怀疑，就会使人理所当然地怀疑美国是否要通过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来损害第三国。这一点也是向美国人提出的。应当说，美国人把这篇文章理解为如果不是官方的见解，那么就是接近官方见解的观点（在刊登之前，文章确曾寄给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这也是实情）。

当然，我没有那么天真地认为，我能让美国人在什么问题上改变自己的见解——我们对北京会晤的消息作出的张皇失措的反应他们不可能没有察觉。但我和美国研究所在那之前，为了弄清华盛顿究竟如何判断这种形势，已与美国人进行过相当广泛的和秘密的接触（包括高层接触）。我们尤其弄清了，华盛顿十分清楚苏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是多么重要。至于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它所涉及的首先是美国的地区利益，哪怕是重要的地区利益。当然，也存在着用来向我们施加压力的可能性（要看我们自己是否有远见，是否容易作出张皇失措的反应）。至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所涉及的则是美国的全球利益，包括国家安全的中心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让美国人知道，我们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利益的层次，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不会允许华盛顿通过发动这场政治游戏对我们施加过分压力（这也是文章的主旨之一）。

文章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报”上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广泛评论，刊登了文章的详细摘要或详细的转述（比如，《纽约

时报》既发表了摘要又作了转述)。分析美国人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和在那几周之内我同美国人所进行的交谈的性质，我深信这样一种见解是正确的：苏联对美国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一事的反应之所以使美国人感兴趣，首先是因为整个这个举动的构思既是针对中国的，同样也是针对苏联的。也就是作为向苏联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因此，正像上面已经指出的，他们可以找到不少可以证明许多苏联人非常神经质地对待美国对中国的倡议的证据。

顺便说一说，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在报刊的评论中，还是在与外国人的谈话中，作出那种直线式的反应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由于总是相信自己的话在国内的威力，总是相信只要提出某种观点，苏联人马上就会有纪律地加以支持，我们把这种错觉也推广到国际事务上去，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向别国领导人表示自己的意见，他们就会听我们的话，信任我们，一切就都会顺理成章。这种行为曾不止一次地让我们国家蒙受很多损失。我们掀起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以反对美国的某种新式武器就是明显的例证。一般地说，这些运动只是让华盛顿相信，我们害怕这种武器系统，他们应当竭力保持这个系统，或至少也要高价“出售”。“星球大战”计划就是一个明显的、但却不是唯一的例证。在我所听到的所有的对这一系统有利的论据中，最具说服力的就是里根说的：俄国人如此强烈地抗议的武器就不会是不好的武器。

至于业已开始的美中接近，那总的来看甚至对我们的政策有利——我们开始动起来，还稍为加快了与美国的谈判，而到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时候，我们同他已经就 1972 年 5 月他来莫斯科一事达成了协议。

1972 年春，基辛格为进行预备性会谈而来到苏联。当时，我们的领导人，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没有同西方的代表人物、尤

其是美国的代表人物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因此，勃列日涅夫在同总统助理会晤之前，也如同在高级会晤之前一样，感觉自己不是信心十足，对会晤作了精心的准备。因此，美国研究所领受了不少任务，而我，大概也像其他专家们一样，不止一次地被召去作详细的谈话和被问长问短（尤其是在基辛格到来前夕）。后来，勃列日涅夫逐渐变得对自己比较有信心了，再后来又变得过于自信了。

但当时要实现这一点还是相当遥远的。

1972 年，在北京举行了高级会晤，这样的会晤在莫斯科也切近了。

但在会晤前夕，众所周知，突然发生了一些事件，给会晤罩上了可能被破坏的阴影。作为 1972 年 5 月中旬莫斯科发生的事件的目睹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参与者，我想谈谈这些事件，其中也谈谈个人的回忆。

5 月 9 日是胜利日。这一天，我曾在其中作过战的那个团队的一帮老战士首次决定组织那些幸免于难而又还能来的人在莫斯科聚会。从早晨开始人们就在保存团队旗帜的军事博物馆相聚。白天的时候在“俄罗斯”饭店的一个餐厅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聚会的气氛很亲切，延续了很长时间——人们去散步，然后又回来，并且已在各个房间重开酒宴（好在当时人们对过度饮酒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晚上 10 点钟我以同样的心情回到家里，并从妻子那里得知，从中午起高级首长（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秘书处就不断找我。我立即挂电话，有人告诉我，大家都已经走了，告诉我明天早上 9 点必须到中央委员会来。

打开收音机，我明白了为什么要召我去的原因。5 月 8 日，美国恢复对河内的轰炸并在海防港布雷，有苏联人蒙难。而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自 1959 年以来的第一次苏美高级会晤的前夕！

第二天早晨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会议（会议由勃列日涅夫主持，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仿佛还有波诺马廖夫，以及一批专家和顾问出席了会议）。尽管主要的讨论已经在前一天举行过了，但还是进行了认真的议论。中心问题是：要不要取消高级会晤？众所周知，决定不取消，但这却是一个不易作出的决定。有人大声疾呼，发表正相反的意见。许多重要的工作人员，包括中央委员，都要求取消会晤，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同意会晤，我们就会在政治上受屈辱，就会在全世界、尤其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和解放运动中丧失威信，就会鼓励美帝国主义进行新的冒险。多数负责同志都保持沉默，像往常一样，等待领导人的意见趋于明朗。后来在一次秘密交谈中安德罗波夫说，有些人曾向勃列日涅夫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他给尼克松“应有的驳斥”，取消会晤。一些人，包括参加讨论的那些专家们在内，竭尽全力抵制了这种压力，没有接受美国的在轻率举动上一决高低的挑战，表现了克制。

考虑到今天所掌握的信息和经验，用今天的观点看，现在这一切又如何呢？

如果谈美国决定恢复对越南的轰炸，那么，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尤其是现在，都很明显，从军事观点看，这个决定是无谓的冒险，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越南事件的进程变得有利于美国，是一种与其说是清醒的打算，不如说是无谓的仇恨的表现。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甚至没有理由指望在战术上取胜的情况下冒着在外交上失败的严重风险，因为我们可以拒绝高级会晤。而这一点华盛顿是十分了解的。基辛格当时的助手，恰好也是苏联问题专家的威廉·海兰在1986年出版的《全球性的对手》一书中写道：华盛顿的多数人，包括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是从苏联有可能取消高级会晤这一点出发的。

海兰说，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基辛格的“联系”政策上，而首

先是“中国牌”上。但这不是正确的盘算。在莫斯科，关于美中勾结反苏的“威胁”的激情已经平息了。在讨论是否取消会晤的过程中，虽然提到了“中国因素”，但据我的记忆，并未进行认真的讨论。在作出决定时起了无比巨大作用的是对另一件事的关心——即关心与联邦德国缔结的条约的命运，在预定尼克松来访的前几天要批准这一条约。这个问题确实被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讨论过，因为莫斯科十分清楚，如果与美国的关系激化了，就会妨碍这个条约的批准，而条约的批准本来就由于西德右翼分子的大肆阻挠而受到了威胁。

但美国在越南的新的冒险只是增添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引起了美国的盟友的严重不安。一句话，美国进行了一场冒险的游戏，会使局势失去控制。如果说美国玩这场游戏是想让苏联“知道自量”，想表明苏联没有针对美国对它的挑衅作出强烈反应的能力，那么，美国在这一点上也并没有获胜。就在这个事件之后进行的谈判是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西方的舆论，尤其对美国在越南的冒险行为增加了不满情绪的美国的舆论，认为苏联对这次挑衅的反应不是显示了软弱，而是显示了政治上的头脑清醒。

当时我们的决定的明智和正确未必会引起怀疑。破坏会晤将无助于越南人民，很可能会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将会放开手脚，他们可能会进行新的冒险，使越南人遭受新的牺牲。而苏美关系的缓和也要推迟，而且是长期的推迟。在军事角逐的范围内，两个大国很可能会由于破坏了会晤而卷入非常严重的复杂局面，尤其是由于反导弹防御的发展，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关于一些地区性的、尤其是近东的危机与冲突的情况可能也一样。甚至是在缓和出现最高峰之时，即两个大国保证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相互谅解的时候，才勉强得以及时地将经过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近东爆发的战争限制在该地区之内。我想提

醒一下，美国当时仍然宣布做了进行核攻击的准备。在紧张局势下冲突会显得更危险。因而对于欧洲来说，费用会是非常庞大的。或许，与联邦德国缔结的条约也不会被批准。欧洲大陆局势正常化的整个进程可能就要推迟到时间难以确定的将来。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这里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论据，认为，如果我们拒绝高级会晤，据说，就会破坏尼克松参加1972年总统选举的任何获胜机会。这是许多反对会晤的人使用的论据，我和其他美国问题专家不得不辛苦一番，批驳他们的理由。至于这个论据，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从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具体现实的角度看，我认为不仅是靠不住的，而且从原则上说也是不礼貌的。不能让自己的政策取决于他国的内部事件或者为他国的内部事件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之所以不能如此，至少是因为我们无法可靠地预见这些事件，更无法控制这些事件。我们同样也无法预见这些事件的后果：谁能保证我们拒绝1972年的高级会晤之后尼克松就会遭到失败？而如果他真的遭到了失败，这个结局是否就对我们有利？

我当时作了已经提及的考察：作出有节制的决策和让步，比对抗和表现消极的“激进主义”需要有大得多的政治勇气，尤其是当问题涉及到与政治对手的关系的决策时就更是如此。很遗憾，后来生活反复地证实了这一点。

不管怎么说，苏联领导人在决定不取消高级会晤之后，认为必须在会晤之前紧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以便将这个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又显出了我们的“革命性不足心理”综合症。在做出了正确决定之后，勃列日涅夫对这个决定仍然没有充足的信心，而主要的是，他想让中央全会与他分担责任。不仅要对这件对那个时代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决定负责，而且要对这个决定所开始采取的整个对外政策方针负责。我并非要以这些议论来怀疑就对外政策问题召开全会的决定的明

智。决定是正确的，是早已酝酿成熟的，而不是因为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或即将举行高级会晤才做出的。使许多原则问题明朗起来，给新的国际现实下定义已经非常必要。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十月全会之后活跃起来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尽管没有达到取消20大决议及其对外政策思想的目的，但却给社会思想带来不小的混乱，在社会和党的政治思维中遗留下相当浓厚的教条主义积垢。而如果已经下了坚定的决心选择缓和的方针和将对外政策作重大改变的方针，就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净化哪怕是从事对外政策问题研究的这个圈子里的意识形态气氛。而这件事是在很高的权威下做出的——取得了苏共中央全会对政治路线和有关的思想的批准。

因此，一切都应了那句著名的俗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指的是美国对越南的冒险行为。

在我看来，这次全会对当时所实行的政策转变有着巨大的意义。

但我还是要遗憾地说，教条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分子所造成的损失并没有完全恢复，所能做到的多半只是维护近些年中向前迈出的那几小步而已（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戴维营会谈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阶段，回到了1959和1963年）。那时我们尚未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尚未取得对各种新现象的进一步的认识，我们还没有弥补上在思考国际关系的新现实时不可原谅地浪费掉的宝贵时间。

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明朗起来的。在当时来说，苏共中央（1972年）五月全会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它为我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进步开辟了道路，遗憾的是，这种进步所持续的时间是不长的。

全会仿佛成了克服几年来使我们政策受折磨的瞻前顾后和恢复对和平共处原则的信心的信号。我们终于下定决心，重新坚定

地说：我们能够而且将要与西方大国对话，达成协议，改善关系，而不管阶级的区别，尤其不让那些关于“阶级性”的谈论把自己弄糊涂。

这是我不是以客人的身份、而是以苏共24大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席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因此，这次会议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一次有点让人心情紧张的、令人惊慌的会议，还是一次满怀着新的希望的会议。全会毫无疑问是向前迈进的一步——不仅批准了高级会晤，而且也批准了缓和政策[①]。

同时，也应当承认，全会没有向前走得足够远，以便利用正在开创的条件，摈弃对外政策上的旧教条的桎梏。为了能自圆其说，搭一座从旧的、而且不总是被正确理解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通往新的政策的小桥，人们找到了另一条通道：把实行和平的、改善国际关系的政策的新的客观条件的产生解释成是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同时也指的是苏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尤其是同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形势相比。应当承认，这个论据我也经常使用，尤其是在同我们本国的意识形态的贞洁和纯洁性的卫护者们的争论中。虽然从最初我就有一个疑问——我们过去用力量对比的变化证明的只是相反的东西——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越弱，他们就越会更激烈地反抗，而我们就要更坚决地同他们斗争。也就是说，对抗的紧张程度、对抗的危险性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样一来，就为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国际局势和政策方针引用了同一个原因。

---

① 十月全会以后立刻就开始的关于对外政策的讨论之后，勃列日涅夫仍然表现得十分谨慎，希望得到中央委员会的“赞许”。同时，全会客观上成了一种很好的政治教育手段，我们党的高官极需要这种教育。——原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感到，关于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的论据还有另外一些更有根据的可疑之处。第一是因为我们的那些论据加强了美国赞成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军事潜力的人的地位。这种情况在里根当政时变得尤其明显。当时，保守派以我们的文件和声明为借口，把美国所有的真正的和臆造的政治失败都说成是因为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而第二，对发生积极变化的原因的这种以“力量”变化为依据的解释，与时代的新现实怎么也不谐调，况且，这种解释人们通常总是简单化地加以理解，实际上把它只归结为军事领域中的形势。

我们当时仍然没有超越这些有关力量对比的论据。也包括在一些本应已是完全清楚的问题上。比如说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甚至在我们时代不能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样一些问题上（《红星报》一直在严厉地批判对克劳塞维茨的这种提法提出异议的苏联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一直批到了 80 年代初，甚至批到 80 年代中期)。还有一点实际上也并未彻底弄清楚：“两极世界”的时期已经结束，现在在美国和苏联旁边已出现了别的新的力量中心。而这种情况恰好又成了我们的政策过份围绕美国方向转，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最后，过份强调已经变化了的力量对比使一些新的力量因素——非军事因素——的日益增长作用（其中包括对安全的作用）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退居次要地位。所有这一切到很晚的时候才开始被了解和被承认。

但是，让我仍回到 1972 年 5 月事件、回到高级会晤上来。虽然从那时以来，在美国出版的一些回忆录中把美国方面的情况说得非常好，事实上形势根本不是那样单纯的。

根据我同来访的美国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那之前与我个人就已经相当熟悉）的交往，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他们是怀着相当慌乱的感情来到莫斯科的，他们没有信心，我甚至要说，在

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内心充满着担心和恐惧。在抵达莫斯科的第一天，尼克松在克里姆林宫官邸安排住下后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单独会见，也就是说，谈话是在只有翻译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约定晚上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举行官方宴会。赴宴者茕茕孑立：一边是美国人，另一边是苏联人，都等着领导人。等了很久，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显然是“聊得出神”了。许多美国人，而首先是基辛格，看得出是着急了。后来，在入席的时候，基辛格走过来并忧虑地小声地问：“怎么样，会有什么结果？你们打算怎么着？”我作了相当乐观的推测，说，如果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打算，事情就能办成。

第二天我从记者那里得知这些不安的原因。原来，在美国人中正在流传着一种传言，说苏联同意会晤只是为了侮辱尼克松——就越南问题在莫斯科对他进行侮辱性的严厉批评，并让他空手而回。实际上，已经顺利地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尽管苏联方面理所当然地提出了越南问题。而总的来看，会晤发展成了苏美关系的真正突破口，标志着缓和时期的开始。我想，我们大家都不无根据地把巨大的希望同这个时期联系起来了。

我作为一个美国问题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在这里自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苏美关系上。但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我们对欧洲的政策所发生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也未必能实现与美国的关系的正常化。在这方面，我已经谈到了与联邦德国缔结的条约和关于西柏林的协定。但实际上，我们与每个西欧国家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我认为，发展与各社会民主党的接触，根本改变我们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关系以及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也很重要。所谓“欧洲进程”也进行得很顺利——进行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谈判，其结果就是于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条约。

为什么缓和持续时间不长，过了2至3年就停止发展，而到

了70年代末又被新的紧张局势的加剧和第二轮的“冷战”所取代了呢？这是一个有待于苏联和美国的研究工作者们都加以研究的题目。而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都依据文件，而其中的许多文件暂时还是弄不到的。但我还是想把一些想法说出来。

我的第一个想法涉及一个典型的老问题：“究竟是谁之过?”我们的评论员们以及我们的专家们，长期以来把一切过错都推给美国方面。后来，其中的许多人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在各方面指责我们自己，指责停滞时期的政策。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是比较复杂的。这也不仅是从双方对破坏缓和都应分担责任（按什么样的比例，应当由历史学家去确定）这个意义上说的。依我看，对认识过去和认识未来，最本质最重要的却是这一事实，即：关系的转变和政策的转变早已到时候了，而甚至在50年代末赫鲁晓夫[①]和艾森豪威尔对这一点就已开始有所认识。但两国的领导人以及对制定政策来说至少是起重要作用的两国相当一部分社会人士，至少过了20年，直到70年代对这样的转变都没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充分准备。

当然，不能排除，要不是历史的偶然性——比如，尼克松因为水门丑闻离开总统职位和1974年底勃列日涅夫患病，两国政府说不定会把缓和继续下去。他们可能在政治和精神上把本国的有关政策提高到新的现实所要求的水平。这就可能为新的政策打下坚实的基础。我还要说，这种情况是不能排除的。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定式，不容许有以“假如……”开头的前提。

---

① 那已经是在1985年之后，当时又重新开始修复苏美关系，印度的一位从前靠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国际关系专家对我说，四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四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日内瓦会晤之后，为已经展现的前景所鼓舞的赫鲁晓夫对印度总理说：“现在‘冷战’结束了。”据同我谈话的这位人士说，对此，尼赫鲁简短地回答说：“我对此没有信心。”——原注

但我却想说明，我讲两国及其领导人对本国的关系中这种急剧转变都缺乏准备的问题指的是什么。

我从美国谈起。我只扼要地谈，因为我的回忆录的主题毕竟是苏联政策和政治思维的发展。

首先我很怀疑，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否把实现对苏关系深刻转变真的列入了他们的计划，以期让这种转变能导致“冷战”的结束。我觉得是没有列入。这两位政治家——就其思维方式、意识形态方面的爱好和以往的全部阅历来说——毕竟都是“冷战”政策的典型代表，尽管他们此时已经站到了更讲求实际的、实用主义的立场上了。但我认为，他们当时思想中从未想到可把诸如停止“冷战”和军备竞赛、放弃“实力政策”这样的目标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据我看，这样的思想是超出了他们的实际政策的范围的。

我读过和研究过他们所写和所说的东西，并不止一次地同他们政府领导人交谈过，其中许多人长期以来我个人都是了解的，尤其是基辛格（后来我同尼克松也认识了）。我完全相信，当这些人在策划对苏政策的时候，他们从未考虑过该不该进行“冷战”和军备竞赛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如何解决美国政策的迫切问题，而尽先考虑的则是如何尽快地、以最小的政治损失来结束越南战争。也考虑如何在竞选中得分更多。当然也考虑在美国和苏联的各类战略武器的对比中如何确保使美国处在最安全的水平上。最后，但也不是最不重要的，则是考虑如何恢复被越南战争、国内局势加剧和经济竞争者的成就所破坏的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

受这些任务和这样一些须优先解决的问题的局限，与苏联的谈判、与苏联的关系多半都成了控制“冷战”和军备竞赛的一种工具，其使命乃是防止特别危险的转折和尖锐化，而不是结束“冷战”和军备竞赛的手段。

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家中，无论他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根本上反对“冷战”的人，根本上赞成停止军备竞赛的人屈指可数，而反对在尼克松时期实现的与苏联的关系微小改善的人则要多得多。

因此我想，越南战争的痛苦经验只是消灭了美国政治精英和公众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像部分美国公众一样）的帝国野心和美国世纪之梦的某些症状，使之潜伏起来，却并没有医好这些病。在他们中间，还在流行着昔日的怀旧病。想当年，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处于一种特殊地位，他们仿佛已经觉得一个“美国世纪”正在到来。或许，越南战争的痛苦经验和由此形成的屈辱感相反倒加强了这种隐秘的感情——迫使他们希望叫当年的好时光回来。当年，在经济上，西欧和日本尚不能排挤他们；在军事领域，苏联没有达到与之匹敌的水平。因此，里根的呼吁——“让美国挺直腰板！”——就显得同他们的意愿和期望如此接近。

现在谈苏联。总的来说，在我们国内，对缓和和 60 至 70 年代的对外政策方针（与联邦德国缔结的协议，而后就军事和政治问题与美国达成的一些重要协议都标志着这个方针的开端）的评价都众口一词，认为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是在我国战后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但这项成就是不完满的，也是不牢固的。我们应当分析当时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好，是什么阻碍缓和成为不可逆转的东西并把缓和局限于过于狭窄的范围内，从这里可以吸取重要的教训。

应该老实地承认，我认为，身为一个学者和政治家，本人活动的主要缺点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开始得太晚了，做这样的分析太晚了。尽管我不能不说，即使我真的及时地明白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我也不相信，那些制定政策的人就真会倾听我的意见。国家及其领导人当时完全是处在认识现实和准备尊重现实的另一

种水平上。

我已经谈了使我们反对“冷战”、争取实行始终不渝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限制和削减军备的方针的斗争变得困难起来的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就是“革命性不足心理”综合症，它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政策之中。大国追求和帝国野心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不安全感和狂妄的结合总会把政治家引入困境。

另一个因素是我国军事政策和军事建设完全不受政治控制。我指的既有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数量，也有制造新武器的计划，也有军事学说。这不是从军队不再听命于政治领导人的意义上说的。不是，发号施令的仍是政治领导人，但决策和解决办法却是由军事部门和军工部门给政治领导人提示的。因此，在“秘密”的掩盖下，不受民主监督地制订和实施的军事政策不再是对外政策的工具，而具有了独立性，甚至开始从客观上迫使政治家和外交家接受自己的意志。自然，缓和不可能长期容忍这种状况。

我们落入自己给自己设下的这些陷阱是在 70 年代下半期，并且是在对我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因为国际事务发展的进程本身已经把公众对政策的要求引导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已提高到了衡量各国国际行为的道德标尺。结果，人们开始把自古以来实行的并被认为是准则的那些行为看作是对世界舆论的一种挑战，开始对之作出激烈的反应，特别是对别国事务进行军事干涉的行动。

九、停滞年代（1975—1982）

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18年），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而且对赫鲁晓夫处于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光辉十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也可作出同样的评价。

不过，在斯大林专政之后，我们注定要经历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历史时期，这时社会应该一边克服难以置信的困难，一边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如果从这种状况出发，并考虑到历史遗产的重负和斯大林专制年代形成的社会特点，而采用较为具体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这18年就可能不是那么单一，不是那么全然灰暗无光。其中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期，开始在工业中实施某些改革，在农村贯彻某些重要决定，这是国民经济相当顺利发展的时期。而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大概甚至更晚些），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我国实行的对外政策，得以明显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导致了苏美关系明显的正常化和在欧洲的积极进展。

诚然，即使在这些年里，局势的发展也不是平稳的，是在斗争中前进的，而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在社会精

神生活方面，曾经出现倒退，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原地踏步。同样，在国际舞台上不仅发生了积极变化，而且也出现了冲突和危机的尖锐化。

总的说，我认为可以把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赫鲁晓夫时期的直接继续。这时社会在不断的有时是剧烈的斗争中，艰难地、往往是用“试错法”在探索摆脱极权统治在经济、外交和内政上造成的困境的出路。有的地方这种探索获得了成功，但可惜只是短暂的成功。我国并没有得出一个可行的和全面的改革总思路，也不够清楚如何使我们自己从过去的变形中摆脱出来，同样地也没有足够理解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尽管如此，我们在有些方面还是前进了。而在另一些方面这种探索则根本是不成功的，并为此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运动没有止息，探索也没有停止。

真正的停滞时期是在 70 年代中期到来的。

到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在斯大林专制的艰难年代中得以保存下来的向前发展的潜力看来已经耗尽。而苏共 20 大所激发的，而在随后的岁月中被保守主义的灭火队竭力加以扑灭的那股新的热情也已逐渐泯灭。1964 年上台的领导人甚至不想去使国内政策恢复活力。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代替。

我国领导人个人情况的变化就是这种衰退过程最具象征性的写照。1974 年 12 月勃列日涅夫病了，从这时起在 8 年之中我们的国家生活在很不正常的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条件下，勃列日涅夫已经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而这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即保存了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权力结构的一切基本特征，而这种结构规定所有重要一些的问题都必须由最高一级——“一号人物”来决策。现行的机制、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环境

实际上排除了“正常”接班的可能性。况且谁又能代替他呢？如果考察一下可能的继承者，在1982年5月[①]之前可能的人选只有苏斯洛夫、基里连科、格里申和契尔年科。这种无法提出可供选择的人选的状况绝不是偶然的。早在个人迷信时期建立的机制不仅把权力集中在领袖个人手里，而且一贯有目的地把领导人的大多数有竞争潜力的对手在距争当领导人还很远的时候就“打掉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勃列日涅夫的病情本身是很大的国家机密。而在后来不知怎么地，可能甚至只是为了尊重医生应守的秘密，我没有去向医生，特别是向Е·И·恰佐夫医生打听。下面是我所知道的一点情况。1974年12月，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军用机场刚刚送走美国总统福特，便感到自己身体不适。不管怎么说，问题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以致取消了他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访问，而市里人们为了隆重欢迎他已经走上街头。直接在专用列车上对病人进行了紧张的治疗，他是同美国客人乘坐这辆列车来到空军基地的，然后应当乘专列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前往蒙古，出席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从那里回来以后，病了很长时间而且很重。病得如此长久，以致使人们掀起了关于他健康状况恶化传闻的第一个浪潮。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还活了和“统治了”8年，虽然远不是所有时间都在管理。

其后8年中，他的病情不时地有某些好转，但他一直没有能恢复到哪怕是自己正常的工作状态。他有在晚间服用大量安眠药

---

① 我引用这个日期是因为安德罗波夫只是在中央五月全会上才作为中央书记回到了苏共中央。而从克格勃主席岗位直接选为领袖是没有先例的，并且几乎肯定会被阻止在党中央机关外。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党内舆论界并不把他看成是有竞争潜力的人。至于说到戈尔巴乔夫，当时他还不是知名人物，不论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原注

的习惯（他对每个人都谈到他的这个习惯），有时在白天为了午休也服安眠药。这使他的病情更为恶化。他极易疲倦，无兴趣处理手头该解决的问题，说话越来越困难，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在他生命的晚期，就连最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没有这种“小抄”他简直无法应付。

在这段时间中，勃列日涅夫提拔了一批能力很弱的人，如契尔年科、吉洪诺夫等，同时疏远了有些很有才能的助手，如楚卡诺夫。

形成了已经不可能正常领导国家的局面。这里所说的正常领导甚至是就最宽松的标准而言的，这个标准已经考虑到了勃列日涅夫作为领导人过分薄弱的能力。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在政治上出现严重错误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了。

这些错误很快也就发生了。

从缓和到第二次“冷战”

70年代中期同美国进行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只是在空转。当然责任不仅仅在我们一方。1974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高层会谈时，曾就未来协定的基本数据达成共识。但是在1975—1976年间，福特总统可能是为了等待面临的大选，没有贯彻下去，他动摇了，而他的国务卿基辛格一会儿大声疾呼地声明，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将在大选前签订，一会儿又默不作声，对谈判失去了兴趣。一句话，国内政治游戏和盘算重于对外政策。

而当新总统卡特在1977年1月上台后，他和他周围的人作出了匆忙的决定——谈判重新“开局”。有些美国国会议员和新闻媒体积极利用人权记录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处于守势（我要说，我们给了他们很多机会这样做，整个人权问题成了苏美关

系中的一个重大刺激因素)。

所有这些当然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也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的错误和政治上的失算。

其中主要的与那些总的弱点有关系，关于这些弱点我已经说过：即对外政策过分意识形态化，以及在保障安全方面过分注重军事因素，这导致了军事政策和国防计划不再受政治控制。

一个问题是我们对第三世界的政策。问题涉及"革命主义"意识形态残余，输出革命思想的残余，这种残余形成了某种政治主张，认为我们有义务援助解放运动，直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这一政策充满了革命口号，也同帝国野心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这些错误认识和立场在70年代中期在我国政治中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它使形势大大复杂起来。作为开始，是向安哥拉派遣古巴军队，用来支持其中的一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那里燃起的政治军事斗争将决定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撤出后谁来掌握政权。据我所知（诚然我对此事的了解是很一般的），古巴确实是这件事的首倡者，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卷入了这件事情之中，不仅在政治上支持古巴人，向他们提供武器，而且直接参加向安哥拉运送古巴武装力量，后来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府给以广泛的援助，其中包括武器和军事顾问。

当然，安哥拉的形势很复杂，对这个国家进行干涉的有美国(秘密地，通过中央情报局)、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下述事实，即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不正确的，是同我们宣布的对外政策原则相矛盾的，它只能产生（很遗憾，已经产生）不良的政治后果。我不仅是现在才确信这一点，在当时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并且向当时我有机会与之讨论问题的领导人说出了这一点。

那时候是什么特别使我感到不安呢？首先是，我们同古巴人

一起采取这个联合行动，这样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开始在“第三世界”国家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而且同意派正规部队参加的这些军事行动。对于安哥拉来说，事情又是发生在下述条件下（哪怕是为了对比），这时美国国会却拒绝拨款进一步支持夺取政权的亲美党派。我认为，这件事不仅会严重影响我们同美国的关系，而且会影响同整个西方的关系，并且会造成一个不受欢迎的、具有很大潜在危险的先例。

我们仿佛为如下国际行为“开了一个头”，这种行为在“冷战”炽烈进行时可能是适当的，而在缓和时期，在国际关系正常化时期，则是不可取的。看到这一点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清楚地记得，在1975年下半年，这件事在专家们中间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谈论话题。其中许多人都懂得，我们在安哥拉的卷入将会严重破坏缓和。

有好几次我亲自同安德罗波夫谈到这件事。他专心地听着，没有打断我，也没有同我争论，不过也没有表示同意。我也详细地同葛罗米柯谈过，这是两个人单独的谈话。那时我也有机会同勃列日涅夫谈过这个题目，当时有不少同志在场，其中一部分人现在还活着、工作着。这件事发生在1975年秋天（不是11月就是12月），是在扎维多沃。党中央和苏联外交部的一批工作人员以及被吸收起草苏共25大文件的学者正在这里开会。在讨论未来报告的对外政策部分时，问题涉及到刚刚开始的安哥拉事件。我对勃列日涅夫说，在我看来，古巴军队在那里参战以及我们为保证这场战争提供援助，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会打击缓和的基础。

A·M·亚历山德罗夫[1]作为我的主要论敌立刻出来发言，他辩驳说，安哥拉使他想起1935年的西班牙，我们实在不能袖手旁观，不管发生什么后果，也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勃列日涅夫对发生的争论很感兴趣，他说："你们假设自己是政治局委员，争论吧，我听着"（他不只一次采取这种办法——让人家争论，他听着）。在场的有安德罗波夫、伊诺泽姆采夫、鲍文、扎格拉金和其他一些人，我已经记不起全体人员了。他们谁都没有掺和到争论里来，鲍文忽然想说什么，但是他刚刚经历了长时间的"失宠"，因此我和伊诺泽姆采夫都暗示他，最好保持沉默。

我的论点基本上归结为：我们当然有权，甚至在道德上有义务帮助民族解放运动。大概可以同意，在安哥拉这个运动最有资格的代表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但是毕竟有各种援助形式。政治支持是不会有疑问的，经济援助也是可能的。甚至不排除比如说提供武器的帮助。但是让外国正规部队参加军事行动，情况就会发生根本变化。美国人刚刚从越南撤走，而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却企图在全新的形势下，在缓和的条件下重复外国武装干涉这种最愚蠢的作法。

亚历山德罗夫反对我，他的思想观点基本上归结为：这涉及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撂开不管。在争论的某个时候，一直注意倾听着的勃列日涅夫打断了我们，对我说他懂得我的意见，说我指的是：正规部队在国外参加军事行动

---

[1] 我同亚历山德罗夫之间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这个人无疑是知识渊博的，在对外政策上是个内行，他的这一点明显地区别于其他许多人。他积极参加了与缓和有关的工作，在总的方面怀疑他的立场将是不公正的。与此同时，避开某些个人品质（他这个人神经质、暴躁、不易相处）不说，看来亚历山德罗夫是那些犯"革命性不足心理"综合症而心情烦恼的我国政治工作人员中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相当鲜明的代表。这一点不只一次地在他身上表现出来，其中也包括这一次。同时不提及下述情况也是不公正的，亚历山德罗夫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晚年敢于公开地和相当专一地提出不同意见并在重要的具体问题上同他争论的少有的人之一。——原注

是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相矛盾的。不用说，我赶忙同意这种说法(尽管我的脑子里还没有产生这种论断)。而亚历山德罗夫立刻提出我完全没有料到的论据："列昂尼德·伊里奇，您记不记得，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冲突时美国人是怎么做的?"勃列日涅夫很激动地作出反应，对美国的政策说了一些很刻薄的话。然后，正如他病后常常发生的那样，突然一下子窒息了，"中断了"谈话。一分多钟之后，他说："唉，你们争论下去，我要回到自己房里去。"争论就这样结束了。而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可能是没有根据的）是：防止严重错误的现实可能性错过了。

后来事情很快就清楚了。不幸的是，安哥拉启动了一系列类似事件的连锁反应。在政治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如果某个步骤、某种举措未受到惩罚而得以实现，又仿佛带来了成功，那么重复这种政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直到碰到大麻烦的时候为止。我认为，这一次情况就是如此。

当时我们还不认为会碰到大的麻烦。因为美国对于向安哥拉派遣古巴军队的反应是极度否定的，但仍是含蓄的，因为他们正忙于医治越南后遗症和埋头于内部事务——处理水门事件丑闻的后果，并且进入了炽热的大选运动。他们通过外交途径和新闻媒体提出了抗议，讲了一些强硬的话。但是两国关系未受到多大触动。在人们眼中苏联变得越来越可疑和不可信这个事实不久之后被一切照常的表象掩盖起来了。

至于说到安哥拉本身，起初看来，目的达到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政权，国内似乎出现了稳定的政府，打开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同时看来，古巴军队不会在那里久留，当时未必会设想到，军队还将留在安哥拉国内 15 年，在那里进行战斗，损兵折将。这里还没有说到这种战争常有的精神损耗，包括部分指挥官的营私舞弊（我指的是轰动一时的奥乔阿将军案件）。

当时我就担心，我国政府将只记住表面上来得如此容易的这

一运动的成功，记住它没有引起严重的国际争端，把这些当作从中得出的唯一经验。很遗憾，这种担心后来得到了证实。

从这种仿佛是令人信服的经验的角度看来，拒绝诱惑，拒绝过重的义务，拒绝卷入其他国家复杂的内部事务（复杂到这种程度，以致到现在我们简直还不了解它），是很困难的。最终也就避免不了进行武装干涉。在安哥拉之后，我们沿着这条显得已经蹚平的道路大胆前进，实际上是沿着干涉升级的阶梯前进。这些阶梯就是——埃塞俄比亚、也门、一系列非洲国家（我不想涉及近东问题，它十分复杂，应该由专家研究），最后是阿富汗。

没有人怀疑，这些局势中每一种局势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在所有这些局势中，毕竟总还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使它们相类似。我想，这首先是（就按左倾的说法）粗陋理解的国际主义义务，参加反帝斗争的愿望。关于这一点我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提及，是因为这些安慰自己心灵的动机，模糊了我们的警惕性，降低了我们的警觉，使我们忽视这些无可怀疑的事实，即我们是在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而不是援助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已经卷入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夺权斗争，卷入了他们的领土和部族纠纷。

况且高尚的思想动机有助于隐蔽（甚至往往是自己隐蔽）帝国奢望和野心。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有时单纯与自满相联系，你们看，我们也成了“超级大国”，我们甚至可以同美国争论一番。而多数情况是希望把自己在这个地区或那个地区的战略阵地稍许修正一下，加强在那里的政治影响。有时在天真的革命浪漫主义与大国实用主义乃至厚颜无耻之间很难划清界限。

我举一个例子。1978 年我在保加利亚休假。忽然传来了电话铃声，这是作为邻居也在休假的苏联海军司令 С·Г·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邀请我（还邀请伊诺泽姆采夫，他也在该旅馆休假，但前一天已飞回了莫斯科）到他那里去。我接受了邀请，很想在

眼前认识一下这位因海军建设蓬勃发展而驰名全世界的人物，从前只是在中央全会上和礼宾活动中见到过他。晚宴上，在苏联和保加利亚的陆海军将领中间，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军人。当谈话涉及到对外政策时，戈尔什科夫举杯祝酒，在祝词中起初带着玩笑，然后非常严肃地对我国的政策提出了意见，因为这个政策远没有充分考虑到海军的利益，而苏联海军已成为强大的远洋海军，它自然有了新的需要：停泊场、加油站、必需品的补给基地等等。而且是在远离祖国海岸的地方。

我不能沉默，在答词中祝海军取得更大成就后，反驳戈尔什科夫说："直到现在我认为，不是对外政策应该服务于海军，而是相反，海军应该服务于对外政策。"在座的人哑口无言，感到有些不自在。戈尔什科夫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显得有些不安，看来知道自己说得过分了（我想，他担心我会不会把这次晚宴汇报给莫斯科），开始收回前言。他说他指的是另一回事，如果在大洋中为海军创造正常的活动条件，它会更有效地为我国政治服务。

而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索马里。我们在那里出现，表面上是说希望给予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最贫穷国家以无私的援助，难道实际上不是为了在柏培拉建立海军基地或者至少是为了给海军寻找停泊场吗？在这件事上美国人越来越高声地责备我们。只是埃塞俄比亚发生了革命，以及索马里想利用这个国家随后发生的动乱夺取它的一块土地——欧加登省，而把这场牌局给搞乱了。我们赤裸裸地站出来保护埃塞俄比亚的新制度，因此不得不从已经回到了西方势力范围的索马里撤离。

看，我们玩弄的就是这样的游戏……

当然阿富汗是所有事件的顶点。我不想把形势简单化——1978年的革命确实是在我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甚至是从西方通讯社的报道中知道这一点的。我们也确确实实关心

与我国接壤的这个地区的安全问题。阿富汗政府多次请求我们援助，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他们的敌人也已经从其他国家政府那里得到援助。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做了并且为此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我们的人和阿富汗人的生命代价、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更大的政治损失的代价。这一点对我和我的许多同事们来说，在我们于 1979 年 12 月一出兵阿富汗，就是完全清楚的。

对我个人说来，出兵阿富汗是完全出乎预料的，到这一天为止我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一个月，刚开始从心肌梗塞后安定下来。我是从在同一医院治病的多勃雷宁那里得知出兵的，他在清晨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并用电话告诉给我（这个消息对于他也是完全出乎预料的）。

已经是很久之后，1989 年秋天，我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下属的政治问题和谈判委员会主席，有幸参加起草《关于苏联出兵阿富汗决定的政治评价》的报告。通过这项工作，我了解了当时如何做出决定的某些细节。我强调是某些细节，因为那不是一次真正的调查，我们事先就清楚，我们要提出建议谴责那个决定。

许多事情根本没有文件证明。究竟出兵的决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在几个领导人的会议上作出的，甚至这一点也不清楚。掌握党中央所有文件和档案柜钥匙的博尔金曾正式告诉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扎索霍夫，决定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但我对此有怀疑，特别是在 1991 年 8 月事件后，那时博尔金成了政变分子的同伙[1]。即使是已有的文件（包括在作出决定之前，有关部门对形势的估计，以及它们的建议），也很不愿意向我们提供。

---

① 后来找到了一些文件，证明博尔金和扎索霍夫对议会说了谎话。——原注

我记得住的只有当时苏联驻阿富汗大使Φ·M·塔别耶夫和C·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1979年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对该议会委员会领导所作的相当坦率的口头通知。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说，1979年12月13日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从作出出兵决定的会议（元帅说，他不知道是什么会议）回来之后，叫来三个人（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阿赫罗梅耶夫和瓦连尼科夫将军）命令他们在12月28日之前准备好军事行动。阿赫罗梅耶夫告诉我们，他和其他一些将军当时表示反对。我们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们的军队尚未做好准备，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就准备好。

从1979年10月被任命为驻阿富汗大使的塔别耶夫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当时出兵的问题实际上已经预先决定了。他得到的命令是他在收到特殊指示之前，不要向莫斯科通报消息，不要发出有关阿富汗形势的任何看法，不要提出任何建议。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结论不过是履行公事：谴责了出兵的决定，作为对这件事负责的人，除开勃列日涅夫，点到了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

说到勃列日涅夫，他应负责任是不会有疑问的，尽管我还不解确信，他的身体状况是否使他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清楚了解阿富汗的局势和所采取的决定的后果。这多半是不可能的，他是被人说服了，让步了，同意了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这个大“三人帮”的建议，这个“三人帮”在勃列日涅夫得病后决定着（更确切些说，是预先作出决定，然后让勃列日涅夫划圈）全部对外政策事务。

从一切迹象判断，国防部是干涉的主要支持者，这一点克格勃的退役将军卡卢金也可证明。特别是他说，“军事情报首长伊

瓦舒京[1]非常主张军事干涉。”有不少其他资料足以证明国防部特别是乌斯季诺夫采取了这一立场。我不愿意把他描绘成一个坏人，但是他起了关键作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军援升级的相当典型的形势。从供应武器开始。随后来了军事专家和顾问。后者坚持认为阿富汗军队对抗议新秩序的居民使用了武力，从而在1979年春促使把赫拉特事件变成一 场严重的冲突[2]。一个当时听到电话对话的见证人告诉我，乌斯季诺夫命令他在喀布尔的代表去“武装工人阶级”。之后我们就收到了要求出兵的第一次请求。苏联领导人说不，但是事情的发展有其本身的势头。然后自然是应该保卫自己的顾问，维护自己的军事威信，以及保卫我们的利益（这时我们已认为这是我们重要的国防利益），再之后还应该去保卫毗邻国家的“友好”军队。

我觉得葛罗米柯不会是干涉的积极支持者，但是在原则上他并不反对干涉。据所有了解他的人所说，他很惧怕乌斯季诺夫，惧怕军人，此外很可能使自己相信，战役将是短暂的和速胜的。不过葛罗米柯总是他的时代的产物。他在斯大林执政时爬上升官的阶梯，后来在他的西方同行中取得了“不先生”的别名。但是他在上级面前始终是个“是同志”。如果要对搞缓和说“是”，特别是同美国，我想他会表示欢迎。如果要对冷战说“是”，我想他会感到失望，但是他会遵循上面的命令。就阿富汗问题来说，可能他从未想过军事干涉同政府主张的政治理想会有矛盾。

安德罗波夫的立场是相当复杂的。他未必惧怕乌斯季诺夫，甚至同他很友好。在秋天之前（卡卢金在上述谈话中以及其他的来源都证明）他和整个领导层一样，是军事干涉的坚决反对者。

---

① 见《莫斯科新闻》1990年5月24日，第11页。——原注

② 1979年3月，在赫拉特的一次什叶派起义中100多名苏联人被杀害（有些人受酷刑）。政府军队重新占领了赫拉特，在这次行动过程中枪杀了几千人。——原注

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为什么？我想，首先是因为，阿明打死了自己的前任塔拉基之后，掌握了阿富汗的政权，这个人是血腥的刽子手和完全无原则的政客，遭到人们厌恶（总的说这是公正的）。还有消息（可能是美国的专门机构有意散布的）说，他在美国大学读书时曾经被中央情报局雇用。看来这件事以及认识到阿明的国内政策毫无前途（这个政策以极端残忍和假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著称），使安德罗波夫改变了立场。

安德罗波夫改变立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过分相信卡尔迈勒。而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相信在我们这里避难的卡尔迈勒是阿富汗革命的比较温和的领袖之一，他被塔拉基和阿明赶走，经过我们的帮助他可能成为奉行温和政策的领导人，能在阿富汗实现国内和平。也许他认为卡尔迈勒同 1956 年匈牙利的卡达尔有某些相似之处。我认为这可能是安德罗波夫的最大错误。即使他对卡尔迈勒的估计是正确的（根据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我很难相信这一点），他也应考虑到卡尔迈勒只是在外国刺刀的支持下才成为领导人的，而这一点完全排除了国内和平的可能性，特别在阿富汗这样一个国家里。恰恰相反，外国军队侵入之后，国内战争不可避免地只会加剧。但是安德罗波夫仍然长时间地坚持自己的幻想[1]，很可能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责任，无论如何想证明他是正确的（而他如同整个领导层一样，被搞得晕头转向，担保胜利马上会到来）。

后来想到这些事件，我认为，在作出决定的 4 个人中，有两个人没有预见到事件的后果（勃列日涅夫是因为有病，乌斯季诺

---

① 我记得 1980 年 5 月末我在达特茅斯会见了美国人之后，从意大利回国，我和《真理报》观察员尤里·茹科夫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们对他说，我们的行动会破坏缓和，在即将来临的美国大选中会帮极右派的忙。我们劝他哪怕是做出象征性的姿态——把自己的军队撤出 10%。第二天安德罗波夫责备我提出这个倡议。看来，他仍然指望很快胜利。——原注

夫是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性)。至于葛罗米柯，特别是安德罗波夫，且不说作出这一决定的不人道性，仅从政治现实的观点来看，也简直是不可饶恕的。大概下述事实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道路是从安哥拉蹚开、踏出的，在那里产生了幻想利用军事力量解决政治问题的巨大可能性。

总的说来，不论是我还是周围的很多人，我们都感到阿富汗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个人的失望。自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来我们还未曾感受过这样的痛苦。后来，过了几年，我已经能够比较平心静气地对待这些事件，提醒自己，既然我们已经走上了武装干涉的道路、借助军事力量推进事件的道路，我们就注定会把它继续下去（特别是在领导层处于这种状态的条件下），直到遭受巨大的失败，就像美国人在越南所受到的那样。后来我不禁产生一个想法：可能正是我们陷入阿富汗这件事帮助了我们在 1980 年波兰发生政治危机时没有进行干涉。须知干涉波兰会带来更加沉痛的真正灾难性的后果。

归结一下，我想说：在 70 年代下半期我们自己对一系列国家的事务实行军事干涉和“半干涉”的政策，我们国家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的侵略国家，促使大量国家团结起来反对我们自己，并且给缓和带来严重的打击。实际上我们是在给美国极右派伴奏。

不仅如此，我们同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施许多军事计划。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我们这样地卷入这个漩涡，以致我不止一次地提到：我们是否在按照斯大林“赶上和超过”的旧口号行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是在缓和的条件下，这时限制军备的谈判已经取得了第一批成果，况且这些事也是在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条件下完成的。我认为，不可能从逻辑上予以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我只有一个回答：军工综合体已膨胀到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它聚集了力量和影响，巧妙地利用了勃列日涅夫的庇护，利用了他的弱点以及他对问题实质的不甚了解，而当时的军事首领垄断了领导人的视听，仅仅由他们向他说明自己的要求和计划。当然，这种对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领导失去政治控制的状况也是有其原因的。我无意只怪罪陆海军将领和总设计师。造成这种局面的政治根源是很重要的。

从一切迹象判断，勃列日涅夫从掌握领导权伊始就看出军人是他掌权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他也就有一切理由努力去满足军队的所有要求。在我看来，下述情况也起了不小作用，有一个时期他曾经是负责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从那时起他就处在我国军事工业领导人的强烈影响之下。加之还有纯粹感情上的原因，随着年龄增加和病情加重，这个因素愈益突出。勃列日涅夫以特殊态度对待自己的戎马生涯，为此很自豪，几乎认为自己是职业军人，是“军界典型代表人物”。更不要说他特别看重一切可能的外在虚名，我指的是他对于获得军衔、勋章、特别是军功勋章的贪欲，这种贪欲严重地败坏了他的声誉。

乌斯季诺夫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配合勃列日涅夫，特别是在当上国防部长以后。他仿佛企图证明，文职部长甚至可以比职业军人为军事部门获得更多的东西。在此之前乌斯季诺夫在中央工作时还用一只眼睛盯着国防综合体，同格列奇科发生过争论，特别是在同美国的军控谈判问题上。我从我的第一手观察中知道这一点。政治局其他委员根本不想干预军务（包括葛罗米柯，据我所知，还有安德罗波夫）。

勃列日涅夫的疾病在这里同样起了一定作用。生病之前，他曾有好几次不仅提出过反对意见，而且同军人发生过冲突。例如，在讨论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时，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在政治局内，当时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反对已经协商好的

文本，声明说他作为国家安全的负责人不能同意。勃列日涅夫当时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他认为，而且当然有理由认为，对国家安全负责的首先是他。国防部长的那个声明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坚持政治局通过协议文本，批评了格列奇科。过了约一年半，勃列日涅夫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曾讲起这件事。他说，后来格列奇科驱车前来道歉，承认自己错了。勃列日涅夫回忆说，他是这样回答的："你在政治局当着众人的面责备我不重视国家安全利益，而现在私下来到扎维多沃只向我一个人道歉。"

1974 年底福特访问苏联，当讨论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总框架时，勃列日涅夫通过高频通讯设备同军事领导人同样发生了长时间的、很尖锐的大声争论。这件事我不仅是从我国在场的人那里知道的，而且也从美国人那里得知。他们告诉我，在会谈的关键时刻，苏联首领把所有的人都请出办公室，在电话里几乎谈了一个钟头，而且是那样高声那样激动，以致隔着墙，隔着关闭的门都听到了喧嚷声。

但是，勃列日涅夫曾同军方有过的争辩并不能改变军方仍然得到了大量东西的事实。特别是在 70 年代下半期到 80 年代初期。

军事部门是利用各种方式来取得他们要的东西的，首先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这些年里，我国实质上展开了无先例的军国主义宣传运动，积极地试图使社会精神生活军国主义化。利用伟大卫国战争这个对苏联人说来神圣的主题，无耻地进行投机：回忆录，接连不断的文艺作品（往往是同艺术性没有任何共同点，更确切些说是粗糙的手工制品），多集连续的艺术影片，电视转播，宏伟的、造价极高的纪念碑的建设，各种各样仪式引入日常生活（包括纪念碑和烈士墓旁身着军装手持冲锋枪的学生的仪仗队）。所有这些整年地冲进国内精神生活。而且根本不是在国家上空笼罩战争威胁的条件下发生的，恰恰相反，是在缓和时期发

生的。

这就是所发生的不正常现象的所谓心理方面，它很明显是消极的，但远不是最重要的。不论是对于经济说来，还是对于国际关系说来，更为重要的是在武器领域所做的事情。诚然，许多东西对于我们说来直到今天仍然是秘密。但是从部分透露军事预算的最近公布的苏联文件中，以及从西方的首先是美国的资料中可以看出，70年代标志着苏联战后在发展和积累各类武器方面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而这是缓和已开始之时发生的，这时我们已在核武器、常规武器，在陆、海、空军事力量方面取得了军事均势。结果，就许多参数而言，我们在很多方面不仅达到了美国人和他们的军工综合体使其武器数量达到的荒谬的最高限度，而且还超过了他们。这里指的是常规武装力量中这样一些重要成分，如军队人数、坦克、火炮、战术火箭、许多种飞机、潜艇和其他许多武器系统。至于说到核武器，我们在运载工具数量、爆炸力的当量和战略武器的投掷量方面，以及在中程武器方面，都超过了美国。

美国人在其他武器方面同样采取了不负责任的行动。这确实像是一场荒谬绝伦的竞赛。这种狂热的、超过任何需要量的武器积累，不仅使国家经济破产，而且对我们的政治利益造成了极有害的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方对我们的信任。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右翼分子和军方开展有效的运动，以便破坏社会舆论对我们以及对缓和的信任。到70年代末，当美国参议院在批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道路上出现很大（在阿富汗事件后成为不可克服的）困难时，这一点已经看得很清楚。不仅如此，我们这些做法在美国严重助长了要求突击进行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情绪，作为对苏联的这种努力的回答，按西方的估计，这种努力“超过了防御的合理限度”。

第二个后果是：在这个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向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我们要赶上他们的任何新军事计划，有时甚至用两个或三个计划回答他们的一个计划。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 2/3 到 3/4 的情况下，这件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主要的是）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破坏苏联实力的道路，归根到底，通过在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正是在里根时期，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构想，制订了军事建设计划，其目的专门在于“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他们借助自己的计划，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

虽然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却仿佛安于按照美国的游戏规则行事，用保持均势的原始构想作出回答，而这种构想实质上剥夺了我们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军事政策的可能性。它好像是把我国国防计划的钥匙交给了美国人，使美国人得到了我们将沿着他们为我们规定的道路前进的保证。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我们某些重大的政治失策，这涉及到我们在关键地区的防御。

这种失策之一就是不正确地、过高地估计来自中国的威胁。这种估计迫使我们在远东集中很多的兵力，这反过来又给中国造成了来自我方的威胁的印象。这自然促使中国采取对策——增加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以及同西方进行政治军事合作。

另一个失策涉及欧洲。在这里我们巧妙地同时玩弄两种不同的甚至是互相排斥的政策。一个是缓和的方针，建立可靠的安全合作体系。我指的是所谓的赫尔辛基过程。另一个是狂热扩充军备的政策，达到过分的、超过现实合理界限的程度。同时我们不仅对舆论界，而且对维也纳谈判伙伴隐瞒了自己军事力量的真实规模。而这一点自然更严重地破坏了对方对我们的信任。

除此之外，在70年代下半期，我们开始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导弹——著名的SS-20。这个举动不仅使我们花费了几十亿卢布，而且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SS-20导弹也促使西方国家加紧军事准备，开始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导弹。

现在这个问题借助于“零点方案”已经解决，我们相当清楚地表明了，我们这时认为部署SS-20导弹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想说，我国不少专家乃至外交家早在70年代刚一得知（多数人是从西方报刊得知的）开始部署新导弹时，就看出了这一点。这些人之中也包括我。我曾试图向最高层说出自己的怀疑。第一次是同葛罗米柯谈话时说的。他细心地听着，我感觉他很同情，但没有作声。正如后来我所知道的，当领导上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时，他也是默不作声或者随声附和。那时许多人都说，外交部长逃避与军人发生争吵和冲突，因为他惧怕乌斯季诺夫，这首先又是因为他已经在考虑，在勃列日涅夫之后会发生什么，毕竟只有乌斯季诺夫与勃列日涅夫最亲近。

不久之后我有了同安德罗波夫谈话的机会。他听了我的话之后，表示不能理解：“你愤怒什么？我们用新导弹替换旧导弹，这是很自然的事。”我回答说，这是用一个有3个分弹头的导弹替换一个单弹头的导弹，而且属于射程也不同的类型，这会引起西方严重忧虑，即使这种忧虑在某些方面是被人为地煽动起来的。我补充说，这同缓和、同赫尔辛基决议、同削减（包括在欧洲削减）武器的谈判，乃至一般的同我们和西方发展对话的作法，是根本不相符合的。我看出安德罗波夫的明确倾向后，就“投降式地”建议：“好吧，如果非替换旧导弹不可，那么无论如何不应该像从前那样悄悄地去做，默不作声。应该用什么办法向西方说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大体上准备部署多少导弹。（我设法说服安德罗波夫，）我们不能在缓和和谈判的条

件下简单地按旧方法行事，实施新的大规模军事计划，而什么也不说，既不向西方解释，也不向世界舆论界作解释。”

这时我的交谈者发怒了，强烈地反驳说：“你想干什么，让我们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解释我们想干什么，就差没有请求他们允许了？这不行，以后也不行。”谈话给我留下不愉快的感觉，我不能理解安德罗波夫这次为什么发火，后来我得出结论，他所以生气正是因为他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同时他清楚地知道，如向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那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那时和现在都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他出于某种策略考虑，已经表明支持部署这些导弹，有可能也是因为不愿意破坏同乌斯季诺夫的关系。应该说，在那个时期政治局委员之间的个人关系起了很大的、太大的作用，往往给事业造成危害。

总起来说，我确信，无论是葛罗米柯还是安德罗波夫，我都没有能使他们在此问题上有所变化。领导上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西方报刊也开始报道这个问题，在我们同西方接触中也曾争论过这个问题。可是在军事事务上要有所节制、要适度的思想对于我们的领导人大概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可能是由于我们头脑深处存在的落后综合症是使我们在核武器方面竭力追赶美国的。我甚至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引起西方喧嚣的武器系统一出现，我们就开始自鸣得意：对自己说，请看，我们多么强大，多么聪明，我们能够超过美国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甚至把他们震住。在这些年里，看不出有任何政治需要，我们像狂饮者那样贪婪地武装自己。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感到会发生战争，或者担心西方入侵。我记得我在 1977 年同我国一名负责的武器设计师和制造师的一次谈话。我问他，“我们干吗这样做？难道将军们真的认为随时会爆发核战争吗？”他回答说，“不，不管怎么说，军方领导人不相信会有核战争。这恰恰是他们乐于建造新的最危险的武器系统的原因。”总参谋长库利科夫也支持这一看法。在

一次秘密谈话中，他描述了核弹的爆炸情况，他说他相信任何了解核武器是什么武器的人，包括美国人都不会使用它。但是当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要生产如此大量的核武器呢，他不能给我一个前后连贯的回答。

医治这种“狂饮症”是很困难的（现在仍然是如此）。我记得我曾力图劝说契尔年科和阿赫罗梅耶夫放慢速度（那已经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只部署少量的SS－20，因为考虑到荷兰表示如果我们的SS－20不超过某个限度，它将禁止在荷兰领土上部署美国的巡航导弹。

还有一件事在7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期促使破坏了缓和，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的疾病。我这样认识不是因为我对他的外交才能有很高评价，他的这种才能是很平庸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当国家元首长期病重，病到这种程度，以致一次又一次地传出他即将逝世的消息，世界都在猜测他的可能的继承人，这时最高层的官僚们攫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其中包括军权。

我想，如果勃列日涅夫处于正常健康状况，他不会确信需要建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何况把问题向上呈报的国防部也没有隐瞒[①]在国境内选择建站地点是对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直接破坏。顺便说一下，勃列日涅夫因这个条约颇感自豪，认为（也有权这样认为）这是巨大的成就。

我想，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勃列日涅夫生病，由于他不再处理许多事务，特别是由于他不能直接参加谈判，使得同卡特政府的最初接触归于失败，特别是使得当时的国务卿万斯1977年3月在莫斯科的使命落空。

---

① 这件事是我和E·П·维利霍夫院士在1986年从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那里得知的，当时正在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对外事务委员会准备关于我国遵守国际条约的材料。——原注

诚然，在这件事上美国方面也有责任。特别是华盛顿突然拒绝执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美国总统示威性地接见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引起了莫斯科过于神经质的反应，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美国人的错误并不能减轻我们的责任，我们缺乏灵活性，不仅不善于迅速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而且还在卷入一场对我们不利的游戏中时仍然表现咄咄逼人，我们力图避免在同新的美国当局进行最初的谈判时给人留下失败的印象。这是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参加的第一次苏美高层会谈，谈判是由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进行的。据安德罗波夫后来告诉我，当他们向勃列日涅夫汇报谈判结果时，他气冲冲地对他们说："你看，我第一次委托你们亲自进行谈判，而你们却把它搞糟了。"

这次谈判表明了，没有由一个领导人承担充分责任的委员会式的政府可提供讨论问题的可能性，又使作出决策变得十分困难。当问题涉及同另一方的谈判时，情况更是如此。谈判必然要做出妥协。就是说每一方都应做出让步。而让步的决定（这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一个领导人总是比一个委员会要容易作出，因为他大权在握，对整个事情承担个人责任。

一言以蔽之，谈判以失败告终。诚然，后来经过共同努力，形势有所转变。我们研究所中我的同事和我当时同美国国务卿万斯的顾问舒尔曼保持非正式的接触，我们告诉他，莫斯科说的不是最后的话，谈判将继续下去。同时我们努力向我们的决策者进行游说。但是宝贵的时间丢掉了；也许正好是在1979年的那6—7个月中需要批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我们有可能避免出现危险的政治局势，包括出兵阿富汗。

生活的许多领域发生的事件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比如说，狂热地大搞民防，庞大的民防开支，无休止的演习，几乎每一个企业和机关都设了专职的负责民防的官员。仿佛哪一天都会发生战争，就像上次那样的战争，不是现代战争、热核战争，而

对于现代战争说来，所定的措施看来显得多么滑稽可笑。做这些蠢事是既费钱，又危险。它促使美国再一次掀起一阵宣传。起初我认为，美国的宣传是没有根据的。我甚至声嘶力竭地同美国人争论。而到后来，唉，才知道，美国人所讲的和指责我们的许多东西都是对的。

在勃列日涅夫担任领导的最后几年，实质上对于军方作出的决定也已经无处可提意见。这一点把国防部的个别领导人完全毁坏了，惯坏了，他们变得很任性，允许自己作出任何古怪的事情。我想举一个“帕尔梅委员会”工作中的小例子。1982 年批准的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有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建议，即在欧洲中部沿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的分界线建立一条无核走廊。我试图取得我们的军人、特别是奥加尔科夫元师和乌斯季诺夫的同意。他们不作任何解释，斩钉截铁地说“不”。我试图求助于安德罗波夫，可是他向我摆手说：“你想要我干什么，莫非让我为你同乌斯季诺夫吵嘴?”

这个思想被拒绝了，尽管它既符合欧洲安全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主要的是，为什么要让苏联在欧洲社会的舆论面前承担破坏这个思想的责任呢？可是在那时候谁愿意听一下理智的声音和采纳健全的思想呢？但是我还是找到了一条出路，在报告脚注中附上了一条相当无害的说明，意思是说这个建议是没有足够约束力的，一旦发生危机可立刻把武器运回去。正如我以后所知，将军们对此很生气，如果勃列日涅夫不是在几个月后就去世，我会遇到很大麻烦。

在结束这段插曲时，我要说，不久之后我们就完全支持在欧洲建立无核走廊的思想，而且准备走得更远，同意从这一地区撤走一系列其他武器系统。到 1991 年我们也同意撤走所有战术核武器。

整个说来，我在“帕尔梅委员会”的工作尽管遇到很大困难

和麻烦，但它毕竟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理解。因为我在几年过程中经常同一批大政治家、有头脑的人、不按常规思考的人打交道，同他们争论，寻找彼此可以接受的观点。我指的是这样一些人，如帕尔梅①本人、勃兰特②、布伦特兰③、巴尔④、欧文⑤，以及一些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委员会但同委员会密切合作的人，如拉·甘地、克赖斯基⑥、特鲁多、克拉克西⑦、瑞典的现任首相卡尔松及其他许多人。

但是主要的是别的东西。委员会是独特的研究中心，在国际关系重新尖锐化、白热化的环境下，在公开的、诚实的、有时是剧烈的争论的条件下，在集体经验、集体努力的基础上，产生适应核时代的新思想、新思路。与此相联系，我首先要提到“一切人的安全”或“相互安全”的思想（委员会基本报告标题的两种译法)。这个思想的实质如下：不能仰赖或者靠损害别人的安全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安全只能按相互原则共同去争取。对核武器也表现出新的态度——委员会对核武器作为遏制工具和军事稳定性因素的价值提出了怀疑。而所谓战场上的核武器则被确定为破坏稳定性的因素（建议沿着两个军事集团的接触线建立300公里无核走廊的思想就是与此有关的)。

---

① 1969-1976年任瑞典首相，1969年起为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译注

② 1969-1974年任联邦德国总理。——译注

③ 挪威国务和政治活动家，曾任挪威内阁首相，1981-1989年为“帕尔梅委员会”成员。——译注

④ 联邦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曾任联邦德国的经济合作部长、联邦议会议员、社会民主党总书记。1980-1989年为“帕尔梅委员会”成员。——译注

⑤ 曾任英国社会民主党下院议员、社会民主党领袖。1980-1989年为“帕尔梅委员会”成员。——译注

⑥ 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奥地利外交部长、总理、奥地利社会党主席。——译注

⑦ 意大利政治家，曾为意社会党领袖，担任过意五党联合政府首脑，出任过总理。——译注

我国没有经过删节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的译本（这在当时可费了不少劲），这就使得这些思想以及其他一些思想成为苏联舆论界的财富。除此之外，苏联舆论界了解了报告中包含的西方对军事力量对比的估计，这个估计表明，我们在一系列领域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一点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遗憾的是，“帕尔梅委员会”的工作如同其他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一样，未能阻止世界紧张局势的加强。80 年代初，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出现了向右转。由于我们的严重错误，我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未做任何事情去防止，却助长了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国际形势的恶化。我们实质上变成了破坏缓和的参加者，客观上帮助了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国家反对缓和的人发动再一次“冷战”。不仅如此，这些年内我国对外政策以及对内的政策中的不良现象，对美国和其他一系列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配置和政治斗争进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加强了右派和极右派的阵地，同时也加强了军方的阵地。我们帮助在西方普通公民的眼前塑造了一个吓人的“敌人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里根，这位曾以痛恨“罪恶帝国”（这是对苏联的说法）的身份出现的“早期的”里根以及一大批美国的右翼保守分子是在我们的帮助下上台的。也发生了相反方向的影响。由一系列国内国际因素引起的美国保守势力的加强和结合，也影响了苏联的政治形势，促使我们更增加国防费用，更多地倾听军人的意见。

一言以蔽之，到 1982 年（并且到 1985 年，到改革之前，形势仍未好转）我国的对外政策得到的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实质上落得一场空。“冷战”之火重新猛烈燃起，军备竞赛达到空前紧张的程度。这不论是对于美国，对于我们，对于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最沉痛的失败。

虽然如此，我想，70 年代的缓和没有白费努力，不是徒劳无益的。第一，它在战后时期第一次向政治家和舆论界提出了非

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主张的正常国际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苏美之间的正常关系应是怎样的？在“热”战或“冷”战中表现出来的敌对关系是不是不可调和的？或者更文明的关系可不可以成为一种准则，尽管这种关系不排除矛盾、分歧，有时甚至是斗争？这样的关系应基于对共同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解，准备好不仅和睦相处和互相忍让，而且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从最小的意义上说，缓和还是得以动摇了我们同美国注定只能有的恶劣关系，注定要进行“冷战”和军事对抗的思想。它不仅带来了希望，而且使人相信，在两国关系中寻找另一种关系不但不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有现实可能的。甚至在新一轮“冷战”最尖锐的时刻，很多的人也不再把回到“冷战”看作事物的常规。

在西方，人们也表现出这种情绪。首先是 1981—1982 年在西方出现了反战运动、反核运动的高涨。美国政策的急剧向右转，在西方广泛流行的军国主义狂热、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里根和西方其他某些首领的强硬言论，首先吓坏了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1981 年，在纽约发生了最大规模的几乎有上百万人参加的反对核战争的游行示威。它给里根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随后，当苏美关系开始有了积极进展时，美国某些保守分子指责自己的总统，说他自己的口号和自己的政策都是从 80 年代初的反核运动那里借用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 1981 年成立的国际医生防止核战争运动。它的两主席是美国的劳恩大夫和苏联恰卓夫大夫。这个组织的活动对世界公众舆论有巨大影响，它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即使是官方的对外政策也没有完全回复到典型的“冷战”的老阵地上去。在欧洲保留了缓和的明显成果。最重要的是，我们保留了 70 年代在这方面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对话，甚至是同他们在某

种程度上的政治合作。所有这些大大促进了改革年代开始的国际关系方面的重大变化。

我还想说出缓和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遗产，我认为它后来在苏联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就是苏联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这在以前就已开始，但是在形势紧张的年代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认为，在这里可以最清楚地看到20大及其思想与缓和以及后来的政治新思维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

我不能不离开本题简短地讲一些情况。在前面的一章中，我写了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认为它是创造性思想的“绿洲”。后来，在60年代又创建了几个国际专业的研究所：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远东研究所，最后是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不是所有的这些研究所都工作得同样顺利。但是从60年代末起，现代政治学在苏联毕竟开始发展，它第一次不再是死板的、教条式的，而是面向生活、面向政治实践的，把研究领域也扩大到当时尚未研究或禁止研究的对象。其中包括对冲突和国际危机的研究，以及对其他国家军事政治问题、经济、政治等广泛领域的研究。

这里我想同大家分享某些回忆。记忆是一种狡猾的东西，它塞给你的往往是某种完全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把使你感到羞愧因而失去精神平衡的东西塞给你。因而我不能不向自己提出一个严厉的问题：莫非我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提出的都是正确的忠告，从来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

不，我有义务说，事情不是这样。尽管总的说来我没有因我所写的和说的而感到羞愧，但我也有过错误，有过迷惑，我不能不承认这一点。(顺便说说，我所提的建议和提建议的机会比批评我的人想象的要少得多：专制制度不仅极度缩小了参与作出决策的人的范围，而且缩小了只是一般了解决策、了解它的产生情况、了解形势的人的范围。)

我也想把这些错误和迷惑写出来。从纯专业方面开始。

我很晚才发现美国向右转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尽管研究所的某些同事及时提醒我注意这一点。我想，错误的原因之一(尽管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是，我不了解我国军事政策的某些方面，长时间不相信西方关于我国军事实力增长的说法，低估了所有这些特别是在下述方面对美国政治局势的影响，即它给极右分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我还低估了另一件事——我国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本身（经济上日益增多的困难、年老多病的领导、政治继承问题上的完全不明朗）没有能促使西方伙伴同我们去发展关系，削减武器和进行合作。

当然，对美国国内发展前景的估计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不论是苏联的研究人员，甚至也包括是美国的研究人员，在这里都不能指望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我想，我本人和整个研究所在这方面的表现还算不错。当然，如果不是用今天的政治和思想要求去衡量当时情况的话。在多年的过程中，我们也习惯于（往往是很严格地）采用一定的思想程式。它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无条件地、无保留地为自己国家的政策和自己的制度辩护，而不管它们的好坏。并且以最不客观的（我们把它叫做“阶级的”或“党性的”）态度对待另一方，特别是对待“美帝国主义”。顺便说说，就是现在我仍然认为，在美国政策中，在它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制度中，无疑存在着危险的帝国主义倾向和帝国倾向，但即使那时我也很少在总体上把美国和它的全部政策都叫做帝国主义，从当时我的著作中人们也很容易确信这一点，我一般避免使用这一类政治行话。

要知道，长期来我们被教育成习惯于使用一定的思想程式和一定的语言（德国共产党人把它戏称为“党八股语言”)，对外行人说来这是些吓人的语言，当他们听到苏联文章和政治文件的外语译文时，特别能够感觉到这一点。

此外，我们以及同我地位差不多的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被吸收完成领导交办任务的人）对于许多事情根本不知道。这指的是涉及内政和外交的事情。我已经写过，在同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辩论时，我（我怀疑也包括比我地位高得多的人）简直既不知道军事预算状况，也不知道核武器状况，也不知道世界和欧洲力量对比状况。任何一次讨论这类问题的高级领导会议，不论是我还是其他政治学专家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过。我们在裁军谈判中的立场也是保密的，尽管要求我们在会见国会议员时，以及在公开发表意见时捍卫这种立场。以致不得不主要是根据西方报刊去想象，而我们又习惯于不相信西方报刊，但是后来我们得知，西方报刊往往是正确的。

所以除了有错误和不善于从刻板概念乃至刻板语言的束缚中相当迅速地解脱出来之外，还因为缺乏起码的情报，这会把事情搞糊涂，甚至把最有远见卓识的研究者变成软弱无力的人。现在有人责备我和我的许多同事：为什么你们原先写的是，比如说，在欧洲出现了均势，而现在又愤懑地说苏联的武器比欧洲多得多？你们哪一次说的是真话？这种指责简直是可笑的。我倒是想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向我们说过真话？而且后来说的全是真话吗？"

不过我应该再一次十分坚定十分果断地说出一点：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我也没有提出过有害的会给国家带来损失的建议。当我提出建议和作介绍时，并没有曲意逢迎领导的情绪，作出迁就的结论。我想以此结束我的简短的"忏悔"。

国内的衰退

在斯大林之后的我国社会历史上，很难确定哪些是进步的高峰和胜利时刻。出现过经济高潮和有成就的时期，可惜这种时间

不长，而且政治和精神上的前进周期并不总是与之同步。但是我们都能说出在所有这些领域同时出现明显衰退的时期。这就是70年代下半期到80年代初期。

我从经济开始谈起。到这个时期之初，十年前起步谨小慎微的经济改革的潜力已经耗尽。尽管这次改革很不彻底，它毕竟带来了一定的结果。但是它不可能以开始时那种状态长时间存在下去，改革需要发展，需要向前推进。这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保守分子利用一些卑鄙的手段，例如利用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的妒嫉（后者的名字是同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利用一切机会损害改革的声誉。

经济发展动态中向坏的方面的转折，甚至可用确切的日期加以指明。第八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下降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分界线是1972年。

这是不是没有预料到的呢？总的说来，不是。不论是对专家来说，还是对部分领导人来说，都不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正如已经指出的，是从60年代初期开始的。从争论中产生了改革。尽管第八个五年计划获得了成功，但是在24大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的原则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向集约化增长因素过渡的必要性、关于提高经济杠杆作用的必要性、关于改善经济计划管理的迫切任务等等），而在代表大会之后，正如我所说的，很快开始着手准备关于科学技术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这次中央全会如果我们不是由于害怕而把它取消，它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显著作用。

这次中央全会就像1965年的改革一样，是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又一个机会，即在相对正常甚至有利的形势下，从可称为具有实力的地位出发，来开始进行认真的根本的改革。但是这个机会没有被利用。我不想判断事情是否必然如此，但情况很可能会是这样。有些人认为，我们只有通过深刻的危机才能被迫进行真正

的根本性变革，也许他们是正确的。但是这当然永远是一条更痛苦、更困难、而在某些方面更危险的道路。

不管怎么说，根本性的经济改革被拖延到很晚时期，这时我们已经不是从具有实力的地位出发，而只能从孱弱的地位出发来进行经济改革了，处于日益严重的许多问题的高压之下。自然，所留下的寻找改革战略和说服怀疑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里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完全合适的：为什么我们错过了这些机会和宝贵的时间？为什么我们如此不可饶恕地把整顿好我们自己的经济大厦这件事给耽误了？

如果说到领导（我把我国经济的整个中央管理层都包括在内），那么问题首先在于，斯大林体制既产生了自己品牌的经济和管理思想，也产生了自己类型的经济管理人员。因为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尽管当时很少有人明确了解这一点）必须抛弃从“战时共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整个经济模式。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济模式，即市场经济。它具有多种经济成分和机制，这些因素过去长时间被看作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是纯粹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必须停止把由官僚们管理的国有财产说成是属于每个公民的公有财产。我们必须让私有财产具有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原来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痛苦的过程，因为它遭遇到了许多党内的官僚和思想狂热分子的拼命反对。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简直不理解，怎么可以一笔勾销许多老经验，而开始按新方法办事。

至于说到较广大的社会阶层，那么在这里改革的经验也雄辩地证明，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和阻力也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说实在的，我国宣传工作几十年灌输的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所有制和社会公正的肤浅的、有时是歪曲的理解——回过头来都打到了改革者头上。因此最先进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的那些思想长期以来在社会公众那里简直得不到支持，而往往被曲解。此外，平均主义思想，人们饱尝了几十年的考验之苦后愿

意过较为俭朴然而有保障的、不担风险的生活的思想，也起了消极的作用。

然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可以说都是经常性的因素。不论是在上边还是在下边，这种情绪早已产生。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已经发现了现行经济机制、整个国民经济模式的缺点乃至毛病，这种态度、观点、情绪还不及时改正呢?

我认为，第一是因为，不仅是群众，还有领导都没有看出、没有彻底了解经济的真实情况。极权主义的传统，热衷于宣传我们的成就，制止不住的向上报喜不报忧的欲望，这些都残酷地进行了报复。

当然，报喜不报忧的事对领导讲的要比对广大群众讲的多得多。然而一个人即使愿意向领导人说真话，那也是很难做到的。不仅是因为编造事实是从底层开始的，就是从工作面的虚报开始的，而且更是从企业、农场和农庄的虚报开始的。统计本身、搜集统计资料的体系、指标的选择、特别是对材料的分析，都要迎合当时的体制、当时的经济管理模式。我不想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统计是为管理者的主要需要——报告成就而建立的。问题还在于，统计只包括数量指标，而不是按应有的程度考虑到质量、损耗、费用，没有扣除重复计算等等。最有趣的是，领导人之中很多人知道这一点，或者无论如何猜到了这一点，但是并没有表现出要把事情追问到底的决心。他们感觉到了有些事情不是这回事儿，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但却经常能够把注意力调整到另外的事物上去，生活在人为想象的和其他假设的环境中。例如，大家最喜欢的衡量成就的一个标准就是百分之百的完成计划。但是实际上这个百分之百又能说明什么呢？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不过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花招，同社会的实际需要完全不相干。这种方法也从不说明这个百分之百是用什么代价获得的。

所以领导人感觉不到正在逼近的危机。我和我的许多同事多

年来参加一年一度作为例行召开的讨论计划和预算的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从送到我们手里的文件中，以及从政治局对计划的讨论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政治局很少提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话题基本上只涉及相当细小的下属部门之间的相互抱怨，主要是使收支平衡不要出赤字，即商品周转计划应当与货币收入相适应。如果什么地方出现80—100亿甚至50亿卢布的缺口，那么这对于巴伊巴科夫（当时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个聪明的人，与其说他是经济师，不如说是工程师）、柯西金、后来是吉洪诺夫说来，将是最大的真正灾难性的问题，对勃列日涅夫本人说来同样是如此。那时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提出紧急措施计划，包括提高某些商品的价格，为的是使计划和预算“保持平衡”。但是却很少有人对下述情况感到不安：成百亿甚至成千亿卢布由于可怕的损失或由于“世纪工程”而年复一年地白白丢掉了，冻结在“长期建设项目”上，耗费在无用产品的生产上（更不必说用在严格保密的、吸干了经济的血的、连多数领导人都不知道其确切数字的军费开支上）。把问题缩小为一个财政纪律问题永远不能够医好严重的经济疾病。

另一个不论是领导上还是广大群众直到危机到来时未能察觉日益临近的经济灾难的规模及其迫近的速度的原因是，国民经济中日益扩大的空洞是依靠野蛮地和掠夺性地开采国内巨大的然而不是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依靠节省环境保护费用和社会开支来填补的。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就是大量出口石油（然后是出口天然气），特别是在1973年秋发生了中东战争，成立了石油输出国国际组织（欧佩克）之后。

1973年以后，许多发达国家，其中也包括美国，因石油价格太高，有时也因为石油本身不足和供应中断而发生困难。限制石油产量和使价格暴涨的“欧佩克”这个名称本身在西方引起了

一定的恐惧和厌恶。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现在回想起这些事件，并加以分析，我不可改变地得出结论：欧佩克的主要牺牲者是我们，是苏联。这一点是完全确实的。石油高价格时期正好是同我们开发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多半不会再有的巨大宝库——秋明石油和天然气的时期相一致的。那时我们便把载能体出口无限度地增长，从这里找到了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那时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懂得不是挣来的财富最容易使人腐败这句古老的谚语，不但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家。

如果能够以交钥匙的方式在国外订购整个整个的工厂，还用得着发展自己的科学和技术吗？如果能够轻易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购买到几千万吨谷物，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小数量的肉类、奶类和其他产品，还用得着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食品问题的办法吗？

如果能够邀请芬兰的、南斯拉夫的或瑞典的建筑师帮助我们建筑或安装重要的工程项目，难道还用得着把我国的建筑业从可怕的落后状态中迅速拯救出来吗？而最稀缺的材料和卫生设备不也可以从西德进口吗？壁纸、家具不也可以从其他西方国家进口吗？

我希望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我并不赞成下述这些人的立场，他们从原则上反对出口石油或其他贵重的、不能再生的自然资源。我们应该是现实主义者。当然，最好是出口磁带录像机、客运飞机，至少也应出口小轿车、机床和仪器，而不是石油。但是如果你没有竞争力强的高科技商品，甚至没有加工工业产品，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第一，我们不应该因为暂时情况比较好而无所作为。无限地继续大规模出口天然原料是不可能的，并且应把这种赚取自由外汇的可能性看作是一个喘息时机，以便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这个机会使自己的国民经济走上正轨，包括消除目前依靠进口来

弥补经常性的短缺（例如谷物和食品以及普通平常的工业设备），同时要在我们自己的加工工业中发展出口部门。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主要是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并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 。

而第二，这些无价宝藏本身应该得到更合理的开发，不能过于匆忙，要切实地把各方面都考虑到。不能使数十亿立方米附产的天然气（这种最贵重的原料）白白地在油田烧掉，去污染空气。要有条不紊地开发秋明这个地区，搞好基础设施，使人们能在那里正常地生活。同时随着石油产量的增长，要发展起能够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石油加工能力。要使输油管、输气管和成品输送管的建设扎实可靠、安全，同时也要带来最大的经济效果。我们要学习西方在1973年以后成功地采用的那种政策——从根本上节约能源。我们在这方面大概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

我国的石油产量在世界上占第一位，但是由于燃料不足，在航空运输中每年都发生严重混乱，对于我国拥有的数量不算大的汽车说来，汽油也不够。不仅如此，由于拖拉机和卡车缺少燃料，我们十分需要的谷物收成的很大一部分白白地丢掉了，迫使我们在国外出售更多的石油，为的是进口谷物。仅举一个例子说明这方面隐藏的潜力。据日本东洋化纤研究所的计算，如果苏联的冶金工业按照日本冶金业（顺便说一下，日本冶金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苏联的专利和特许证建立的）的工艺进行生产，那么所节约的能源大体上相当于苏联全部原子能的产量。我们（其中也包括我）把这一点向领导上作了汇报，但冶金部巧妙地把问题遮掩过去。这已经不是在停滞时期，而是在1988年。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论是我还是我的许多同事都不只一次地想到，西西伯利亚的石油挽救了我国经济。而后来开始得出结论，这个财富同时又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经济，它使我

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许多时间，长久地推迟了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改革。有鉴于历史向我们提供的这个痛苦的教训，我开始考虑另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取得真正的进步和繁荣的。也有很少的例外，例如人口稀少、盛产石油而又善于经营这种财富的波斯湾国家。但是这些都是例外，如果拿也是盛产石油，但是没有获得如此成就的墨西哥、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和其他许多国家来说，上述规则就得到了证实。反之，不论是日本，也不论是西德还是韩国，如同其他许多国家或迅速发展的国家一样，实际上并不拥有自然资源。而在我们这里恰恰出现了理想的结合——丰富的自然资源、杰出的科学和文化、劳动资源、人口，如果为此创造必要的条件，如果使物质和精神刺激机制、创业精神和竞争机制充分运用起来，我相信，人民愿意并且能够很好地工作。当然，必须创立正确的物质和精神刺激，充分发挥创业精神、竞争的作用和搞好市场改革。

现在回到我国经济日益衰退（其实其他所有的生活领域均如此）的难堪岁月，我还想请大家注意到这一时期一个有代表性的特征。这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国家的部委数量急剧增多。而部长和部机关人员的“质量”大约也以同等程度下降。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最上层作出的，与此同时，“上边”却不能真正采取任何一个决定——其中每一个决定都需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此外，领导上任何一项决定作出后，在贯彻时又受到机关的专横的阻挠。无论何时都有大量的官吏，他们能够败坏任何事情，很少有人能够和愿意帮助别人，几乎没有人对某件事真正承担责任。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仅在农业中管理机关的人数就达到 300 万人（比美国农民总数还多）。一言以蔽之，经济不是像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的人处处预言的那样，按

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发展，而是按照“帕金森定律”[1]发展——与部门和官僚的切身利益相适应。

政治、国家、党

我认为，在斯大林之后，在政治中，在整个政治上层建筑中，也在经济中，一个基本矛盾看得越来越明显。如果说不是在战争状态下，那么也是在所谓紧急状态下，在非常条件时期（“敌人的包围”长期以来一直是领导人的宣传口号和喜欢的思想），建立起来的那套经营模式、政治权力结构和国家管理模式突然被移植到多少是正常的条件中来。这时已经没有战争，它也不大可能发生，至少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这时战争恢复工作已经结束。这时已经不存在最高统治者和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可按他的意志、愿望乃至他的任性把一切都翻个底朝天。

当时就变得清楚了，在正常条件下这种业已形成的政治体制和结构不可能多少正常地进行工作。不仅如此，这个体制模式本身，连同它的许多变成不需要的属性一样，在事物的自然进程中，发生了变态，有时蜕化成不论从社会主义原则看来还是从起码的健康思维看来都是十分放荡的政治怪胎。

在正常的、“非非常的”条件下，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即我们建立的政治机制越来越适应于夺取和掌握权力——不管用什么方法去加以掩饰，也不管怎样去辩护这是一小组的人的权力——而并不适应于为共同利益而管理国家事务并解决出现的问

---

① 帕金森（1909. 7. 30——），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帕金森定律”的提出人。他基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英国陆军参谋时所得到的经验，对官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评论。他说政府官员总是无事生非，彼此为对方找事干，这样他们就可以成倍地增添下属人员，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这个帕金森定律 1955 年发表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上。——译注

题。政治机制的“两面性”也显得越来越明显，它分成两种机构，一种机构是真正掌权的机关（党组织、主管部门、惩罚机关），另一种是提供人民政权的“民主门面”的机构（苏维埃、工会、社会组织）。

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把政治生活局限于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这个政治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它也不适合于动员社会智能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决策者的主要任务和压倒一切的愿望不是努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压倒了一切。领导人要求国家机关、党组织、科学文化界、大众传媒做的就是这些，特别是在70年代中期。这些机关、团体和媒体应该帮助掩盖日益加剧的困难和问题，用稳定、进步的假象偷换日益复杂化的现实。在作出这种努力后，最后一批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孤岛消失了，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当发生一次领导上所不喜欢的争论之后，就出现了新的“禁区”。例如发表了有关贝加尔湖的文章之后，生态问题就是如此，它简直就成为保密问题了。书刊检查加强了。不仅如此，编辑人员自己和编辑部、创作者协会、部委和其他行政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自己担负起了书刊检查员的角色。

这种政策规定了庞大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机构（国家的和党的）的职能就是要服务于防止变动，维持现状，保护停滞。结果在这个时期造就了完全固定的政治风格——极端谨慎的、慢吞吞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不破坏原有的平衡的风格。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生态威胁、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状态——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而用来代替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则是类似关于“新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这类肤浅的宣传八股。

对于国家权力机关说来，维持原状的保守政策首先就意味着使本来应该代表人民的各级选举出来的代表机关软弱无力，实际上纯粹只完成一些装饰性和礼仪性的职能。它们很少能够对社会现实生活有什么影响，但它们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在社会生活的“正常”时期，而不是在“非常”时期（战时、革命时期），合法化、合法性的问题具有新的意义。公众想知道，为什么正是这些特殊的人在管理国家，为什么是他们在决定大家的命运，是谁把这些人安排在那里，又是谁在确定由他们驾驶着的国家大船的航向。

在解决继承权问题上的所有各种方法（按天赋权、观念权、人民给予权力等等方式）中，对经历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很快转化为领袖专政）的我们来说，只有一个选择：由人民作为自由意志的表现选举出来的人来行使权力。可是不论是领导，还是公众，对此都还没有准备好，而且也不存在真正民主的机制。这里现成可用的就是早在斯大林时期纯粹为了装饰目的而建立的代表机关和选举制度。虽然这些机制是很难能令人信服的，但至少人们已习惯于这些机制，它们已使人民感到平静。

我曾担任三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我从内中了解苏维埃的工作和选举制度。其实留在“外边”的人也相当清楚地了解它。我只想谈谈某些感觉。推选 进入（实际上是指定）最高苏维埃被看做是一种荣誉，领导上承认是你的功勋（类似勋章、荣誉称号）。我和其他不多的人得到这种荣誉还有另一个原因。在缓和年代，我国开始通过议会的渠道发展接触和交流。为此需要有一些或多或少专门了解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问题的人。就这样从中提出了几个人，其中包括我。伊诺泽姆采夫、雅科夫列夫、普里马科夫和我一样，开始了自己的议会生涯，而当裁军问题提到首位的时候，又有 Е·П·维利霍夫和 Р·Э·沙格杰耶夫加入此列。

当然，在这个议会里除了会见外国代表团之外，它还给议会代表提供了某些可以表现自己的余地，如果这位代表自己愿意和准备投入某些力量的话。比如说，帮助选民解决当地的一些问题，帮助被不公正地逮捕和定罪的人、受上司欺压的人或遭遇不幸的人。我对这种事给予很大的注意，不知怎么，在这种事情中虽然照例要付出巨大努力的代价，但我感到覆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①]。（顺便说一下，每顺利地解决了一件事，立刻会引来更多的上诉和请求——看来受欺侮的人之中也存在自己的交际关系网。）当然，我也是为自己选区的社会经济问题而认真地进行院外活动的人。我会努力去促进一所学校、医院、一座桥梁或一条公路或铁路的建设。

代表机关，包括最高苏维埃是不能（更确切些说，是不允许）制定，甚至讨论真正的政策问题的。有时在会议之前，党中央机关的某个人会给你打电话，并且说："有人认为你必须发言"。我所参加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开会之前也是这样做。马上就会递给你一份发言草稿（诚然不一定非照着它说不可）。顺便说一下，对于苏共中央全会的参加者，程序是相同的：全会召开之前有人向你打电话，只是不会递给你发言稿，如果一旦允许你发言，你可以自由发言；但是如果你讲话出了"格"，就得考虑一下后果。因作了不受欢迎的发言而丢掉前程的先例是存在的。

然而议会的程序、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代表机关的普遍选举、表达"人民意志"的仪式等这些不失体面的东西毕竟还是有的。就是说遵守了礼仪，而主要的是具备了合法性的表象。这个独特的议会迟早会以选民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把大权授予国

---

① 当然这种事务和这种问题很多，这是我们的特点、国家的特点，这里长期地固执地轻视人权，人们为恢复起码的公正不得不到处奔走呼号，求助于任何人，也包括议会代表。——原注

家的真正领袖——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也就是授权给由党委任到这个最高职位的人。为此，最高苏维埃把党的领导人或者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如斯大林、赫鲁晓夫），或者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就像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那样，再后来是戈尔巴乔夫。

代表机关的可怜巴巴的孱弱无力（我亲眼看到自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最高苏维埃历届会议的会期越来越短，而所属委员会的会议越来越少）同行政机关的加速发展和加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部和主管部门的数量及其编制在不断扩大。这一点用肉眼——按照各个部占用房屋迅速增长的数量和规模便可看出。加里宁大街的一侧被它们占满了。在70—80年代，对部所属的几十座革命前的旧建筑、住宅和办公楼都进行了改建。当然还盖了新房。我所指的不仅是国防部和克格勃的几幢庞大建筑。所有的部都尽其所能建造大楼，谁也不吝惜金钱。

苏共中央的建筑群得到特别迅速的、大规模的、十分阔气的发展。记得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中央机关在老广场只占用3幢楼房（一幢的侧面对着古比雪夫大街）。现在已经有几十座楼房，有的是由其他的部和主管部门腾出来的，有的是改建的，有的是建筑在空旷的庭院里的——一句话，俨然成了一座小城市。而这只不过是停滞年代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极度膨胀这种本质表现的外在的明证。总之，不论是它们的数量还是它们的作用都难以置信地大大膨胀了。

这种现象本来不是新的。斯大林已经把党从社会政治先锋队（根据党章，而以后，在1990年3月以前是根据宪法，党理应成为先锋队）变成了主要权力工具，它渗透到了所有地区、所有社会生活环节、所有单位和企业，渗透到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毛孔中。斯大林为了保险，其中也为了防备党，还建立了平行的几乎是同样星罗棋布的国家安全机构，但这并没有使事情有所改变。

他总是把党的机关看做是一个总体权力工具。

但是在70—80年代我们这里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一方面，权力和权力实现方法毕竟大大降低了残酷性。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已经不单单把权力理解为政治权力，而且也理解为直接管理一切的工具，包括经济、文化、科学。党的机关开始替代其他机关。这样做不仅不可避免地引起重叠，而且会降低管理的熟练程度，以及加剧普遍的无人负责现象。曾经作出过各地党组织有权对本地各种机构的行政工作实行监督的荒唐决定。看来这是从最困难的、无政府状态的革命年代借用来的，但是就其实质而言，这个决定不仅违背法律，而且也违背起码的健全思维。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进一步降低了行政管理工作的素质和水平。因为爬上党的阶梯的顶端的人早就忘记了他们过去的专业技能。至于对一些新的专业，他们只限于进行领导，下命令，处于领导岗位的头头能做的反正就是领导。

这个制度从群众中挑选出一些人，这些人并不能干，但是听话，有虚荣心，办事马虎（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他们不会因一些思想和道德的空道理而有所约束。请具体地想一想，这些年里究竟是哪些人进到基层政治组织（多数情况下是共青团组织）中去工作的？未必是优秀的大学生，或优秀的年轻农学家、设计师、新闻记者或科学工作者。但是正是在这里，在这个起始的一级，他登上了一条传送带，把他带到越来越高的地方，从一个台阶到另一个台阶，起初是沿着共青团的阶梯，而后是沿着党的职位等级攀升。

而且可以攀升到很高的地位。可以到中央书记、到部长、到科学文化界的领导人，更不必说行政机关和克格勃、警察、司法等护法机关了。

党开始越来越不管自己的事务，而越来越多地去管其他政府机构的工作。随着时间推移，党的工作者甚至开始对什么仍然是

党的事务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了。实际上所有问题都成了党的事务。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每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中都列出了数十个问题。大多数是经济问题、行政问题、对外政策问题、军事问题，但很少是党的问题，如果是党的问题，那不过是官员的任命问题。在各个问题上，从农业到公共卫生等等，都通过很长的决议，但通过后很快就忘掉，很少检查，更少执行。这种管理机制的一个主要毛病就是完全的无人负责现象。从最上层开始，除了两三个官员外，谁还知道这个或那个决议的首倡者的姓名？谁在会上对这个或那个决议具体地和怎样地表示了“赞成”和“反对”？这将永远是个谜（甚至对于允许接触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厚厚记录的苏共中央委员说来，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那不是真正的记录，只是装进档案的由机关起草的建议。）。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次，没有任何人因作出错误决定，而被追究责任①。

什么是导致行政机关不断膨胀的原因呢？当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的发展动力开始衰退的时候，为什么管理机构、官僚主义却在不可遏制地增长呢？这意味着什么，它的原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提及），“帕金森定律”可以提供接近真理的解释。按照这个定律，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没有社会目标和社会利益的地位，它们在工作中越来越只顾自己，只顾自身的发展和扩大。官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产物，获得了独立性。

---

① 我不想隐瞒，这一事实，即长期以来，我和其他人一样已不大在意这种骇人听闻的怪事和这种不合适地作出决定的方法。它是一种搞“连环套”的方法。我已经习惯于生活中的这一现象，就像冬天下雪和秋天下雨一样。只是在改革到来之时，我们才开始考虑这些并提出了问题。而每次总要涉及一个绝不是多余和无益的问题：“是谁的错？”有了这个问题，才能开始追究个人的责任。但对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也包括在改革岁月中犯的错误。但是最主要的不仅仅在于要弄清全体人民随后为之付出非常昂贵代价的党的错误决定的责任者。比这重要得多的是，最终要弄清整个制度的缺陷，即党的几个高级领导人可以做出决定，而又不必对任何人负责。须知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最上边作出的决议。——原注

换句话说，开始为自己工作，获得了与外部世界和政府的主人翁没有联系的使自身增长的动力和动机。在停滞时期这一点暴露得最为明显。

这个停滞时期对于机关和官僚制度说来，可以说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斯大林偶尔用残酷的镇压“整肃”过机关，赫鲁晓夫也折磨过它，不断地在上层调换人们的岗位，进行无穷无尽的改组。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成为稳定的化身和形象，如果我们把稳定理解为静止不动的话。

事实上，负责的岗位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代替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自己的职务达15—20年之久。想出了一套很高超的保护十分无能的官员的办法，使他们不为自己的行动承担任何责任。例如，如果发现州委书记在本州应届选举中有可能落选，就把他调回到苏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视察员职务，两三年之后又推荐他（实际上是任命他）到另一个州去担任州委书记。不称职的部长从一个部调到另一个部，或者“为他”建立某个新的部。为完全垮掉的干部寻找或建立清闲但待遇优厚的职务，往往派到某个国家当大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谁如遭失宠，往往派去担任此种工作)。

在停滞年代，就这样使负责干部和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最终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共和国、州、区的干部则形成自己的“小阶层")。这有点类似某种贵族制度。与荣誉相联系的终身制，享受高生活水平（至少按照苏联标准来看是如此）和各种特权（用品的供应、住宅的保证、医疗和休假，甚至丧葬……）。这个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的鸿沟不断扩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不仅如此，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

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领导人作出了榜样：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难道勃列日涅夫是这方面仅有的一个人吗？当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像后来齐奥塞斯库家族丑态百出地在罗马尼亚所做到的那种地步。但是，已经形成特权阶层这件事是不会引起怀疑的。但是，如果把这些事以及根本不该有的特权同勃列日涅夫、同他领导国家的时期联系在一起是不正确的，因为所有这一切很早以前——还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获得了很大的规模。

当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禁欲主义和党员最高工资上限（直到30年代初一直存在的全体党员低收入限额，不管他们的职务有多高）不是神话，而是革命胜利后最初年月的现实。但这是革命理想主义者的热情突发，而不是制度。社会的贫困本身实际上使特权不可避免。对负责干部的特殊食品配额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和动人的故事，用来为克里姆林宫的特殊食品供应辩护。据说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此之后，据说根据列宁的指示建立了“疗养食堂”，这个名称掩盖了食品的“特殊配给”，它一直存在到1988年。在一些其他的掩盖下甚至现在还存在，只是规模小得多了。）。起初在克里姆林宫和在所谓苏维埃大厦为高级干部提供住宅，在莫斯科这种住宅有好几处：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一处，共产国际大街（现改为加里宁大街）一处，还有一系列其他地方，更不必说政府大楼了，特里丰诺夫在中篇小说《滨河街公寓》中有所描写。这里的住宅并不特别豪华，但无可比拟地优于其他住宅。那时已经有了政府别墅（配有招待员），对级别低一点的长官则有别墅村。已有特殊的门诊部、医院、休养所和疗养院，当然还有配备司机的个人专用汽车。

早在30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整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特别是同人民生活相比更是如此。至于最高层领导人，他们的特权简直会让你感到吃惊。我记得一件事情：在30年代我的一个同学经常跟随他的双亲到鲁祖塔克的别墅去，鲁祖塔克是他父亲很要好的朋友；这个同学讲述了那里的吃喝玩乐情况，我听了之后简直发呆了。

战争时期上层领导人物同其他居民的经济社会差别以及他们享受优待的绝对量无限地增加了，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之前，当有了“战利品”和来了美国援助的时候（援助的不小份额——不知租借法案的创办者是否了解这一点——用来供养苏联社会的上层领导人）。而配给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国的民粹主义者差一点没有把配给制说成是社会公正的顶峰。有各种各样的配给制，有供家属用的，供职工用的，供人们在工作单位用的，还有几类专门供首长使用的，即所谓的字母卡。作为补充，还有各种商品的购货证和票券。例如购酒证在当时起了最稳定的货币的作用。同样的有工业品的购货证。按购货证得到的酒类、衣料、鞋套、鞋类及其他各种杂物用来进行投机倒把，几乎成了高中级负责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这方面越来越起带头作用。有些将军大胆妄为到这种地步，以致向来对这种腐化行为眼开眼闭的斯大林不得不出来纠正，命令把某些人逮捕。这是真正的“瘟疫盛行时的盛宴”，因为人民在贫困化，实际上生活在贫穷线上，不能糊口。我认为这个时期标志着大规模的道德标准的崩溃。说来可笑的是，配给制的废除降低了花名册上的相当大一部分高级干部的生活标准，减少了他们的特权。这初看起来是荒谬的，但这是事实。

但是，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有各种形式：几乎是免费占用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往返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休假时月薪照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装在信封里（“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在交纳党费时也不包括它。例如，部长那时除工资外得到2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的2000多卢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不纳税，这个数目相当于不久前为苏联总统规定的工资的两倍。级别低的官员们也得到相应比例的款额。除了这些以外，还要加上“非现金的”特殊待遇。

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

我们的国家在革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二次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时间中存在的各级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至于关于这种特权说得很少，因而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另一个问题。部分地是因为，其中很多东西是真正的秘密，泄露出去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钱袋”就属于这种秘密）。部分地还因为，享受特权的官吏人数毕竟比后来要少，正如当时跨越过“有”特权和“无”特权之间这条线的人也较少。当时，失宠的人经常遭到逮捕。如果没有被逮捕，那他一定是默不作声。要进入上层是非常困难的。而已经进入上层的人照例过着封闭的生活，同样也不作声。

所以，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

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但是不少东西仍保留下来。

当然，我所指的是正式得到的东西，而不包括用隐蔽的形式或利用职权非法得到的东西（阔气的狩猎、单独的私人住宅、礼品等等），更不包括贪污所得。当然，除此之外，在赫鲁晓夫时期，以及后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得到各种福利补贴的人数不断增加，因为机关数量和人员增多了，人们厚颜无耻地经常利用这种特权建立单独的住宅、会客厅、“办公用”旅馆、疗养院、休养所，造成惊人的浪费，追求荒唐的并且乏味的富丽堂皇。

现在我想转而谈谈构成政治上层建筑，首先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现在所谓的护法机关，我要说的是它在法制社会中的真正职能。

这个机关是在革命、“战时共产主义”和国内战争年代诞生的，那时苏维埃政府公开地采用专政的方法，包括有时采取“红色恐怖”。也是在这些年代开始建立正常的刑事法、正常的司法制度、正常的护法职务（民警）。后来经济转入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并实行大量削减军队——从几百万人减少到50万人。而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的目的是保证和平喘息机会（领导人没有指望更多的东西），保证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的关系。

但是在护法领域没有前进很远。很快地开始了相反的过程——建立庞大的政治警察机关，实行不经过法院的惩罚手段和方法（尽管法院实质上也是行政权力和专制权力的驯服工具）。20年代末——30年代初公开导演的政治审判案（后来证明是伪造的）、凶险的1937—1938年、没收富农财产、整个整个民族被迫

迁徙以及在斯大林逝世之前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违法行为和镇压浪潮，都是这个相反过程的组成部分。也包括为了经济目的利用惩罚机关、法院、刑事判罪、监狱、劳改营、集中营（纪律是靠强迫劳动和刑事惩罚来保持的。这包括对饥饿的农民因“偷拿”一小把麦穗或一小桶土豆，对工人因上工迟到21分钟以上，因生产质量差的产品、因在工厂中超过定额储备某些材料，等等，而施加严厉的惩罚）。

在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在苏共20大以后，政治镇压机器如果说还没有完全停止运转，那么也是明显地减速了。同时惩罚行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宽。但是机器本身以及它在法制、规范和实践方面的组成部分并没有被打碎。不论是在赫鲁晓夫领导党和国家时期，也不论是在勃列日涅夫成为政治领袖时期，虽然规模较前缩小了，而且也不大肆声张了（有时甚至是秘密的），但是在惩罚刑事犯罪的名义下进行的政治镇压行动、违法行为和专横的表现并未停止。只是在改革的年代才开始谈论彻底的法制改革（在我写这些章节的时候，很遗憾，事情仍只是谈论而已）。

我不准备，而且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来叙述我国革命胜利后惩罚政策和护法（我理解在这里使用这个词多么不合适）实践的全部历史。我需要做这个所谓的概述，仅仅是为了说明我们称之为停滞时期中在这个领域里发生了什么。

自然，旨在防止变革的保守政治，要求更积极地利用惩罚机关、镇压机关。事情也这样发生了。这种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以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由于各种反苏活动（常常是由于宣传和诽谤）而受到审判，被判刑，监禁，关进劳改营，或者被流放。当然，在苏共20大和22大以后，在揭露了斯大林和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罪行之后，领导上不愿意再大规模地实行政治镇压。勃列日涅夫知道历史针对这些罪行是怎样回报斯大林的，也不愿意这样做。安德罗波夫更是如此。他在这些年内领导了克格勃，他不

想让人们把他与贝利亚和叶若夫相提并论。他不止一次地向我抱怨过，一些铁杆斯大林分子，包括政治局委员常常施加过这样的压力——“应该把那些人关起来”，“我们要忍耐到何时!”等等，然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曾屈服于这种压力，但没有允许自己进行大规模镇压。

后来我想，在这里问题甚至不仅在于这些或那些领袖的个人品质，或领导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只是在广大社会人士、广大群众的一定思想状态下和情绪下，当他们对某个人或某种事感到强烈的憎恨，或对某个人和某种事又盲目相信的时候，大规模的镇压才会是可能的。在我看来，在勃列日涅夫领导国家的年代这些情况都不存在，虽然曾有几次企图人为地煽起人民的公愤——如反对现代派艺术家，反对索尔仁尼琴，反对萨哈罗夫。但这些运动背后的气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大规模的政治镇压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但是镇压政策及其执行机关的生命得到了新的延续。时而继续进行逮捕，进行惩罚或者威吓。广大社会人士或者是根本不知道，或者是从这里没有看出任何可怕的东西，甚至往往认为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和正常的。

但是，要阻挡时机已经成熟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就需要采取足够有效的强制和威吓措施，也需要对越来越多的人采取这些措施。众所周知，这时对共产党员给以党内处分和开除党籍的威胁，对非党群众开除公职和剥夺生活来源的威胁，已经不太管用了。需要有某种处于这些行政措施与斯大林时期大规模镇压之间的东西。应该说，为了发明出这种新的强制措施，是费了不少脑筋的。

产生了持不同政见者这种新的社会政治现象，也产生了用来对付他们的一整套手段：社会隔离、由这方面的专家精心组织的诬蔑、旨在完全毁坏一个人名誉的密集的指责、打入“精神病院”、驱赶出国和剥夺公民权，等等。不消说同样使用了逮捕和

审判，但毕竟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我不想讲述是如何具体地运用这一整套迫害和恐吓手段的。这既是因为我知道的不很多，也是因为我国近期历史上这些不光彩的篇章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和目击者加以充分地描写。

同直接的刑事迫害相比，经受到"新的"精细的镇压措施的人要多得多。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会取得暂时的效果，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要为它付出很高的代价，特别是从我国的国际声望来看，从世界舆论界对苏联和对它的政策的态度来看。这一点成了我们同西方国家"冷战"关系中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人们只能具备了一个条件才能开始一场冷战，并在几十年时间中持续地把它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调，这个条件就是要使人民相信存在着一个可怕的敌人，而且是令人厌恶的敌人。要使人民对敌人的恐惧达到很大的程度，他们才会愿意大把大把地花钱，去搞军备竞赛，愿意冒战争的危险，甚至不惜牺牲他们国家的独立政策和主权。当时在西方广为传播一句话——"宁肯死，也不要被赤化"，就表达了这种盛行的恐惧情绪。

当然，我不想抹杀对我们进行的敌对宣传的效果。在增加对我们的不信任、恐惧乃至仇恨方面，这种宣传的贡献向来是很大的，而我们照例是不善于对这种宣传攻势进行反击。我们并不赞同西方围绕基本人权问题搞的政治游戏。这个运动有很多负面效应。这个运动使我们的保守派更易于把持不同政见者同敌视苏联的外国势力联系起来。西方的这种立场使他们同我国的关系更加紧张，同时也败坏了持不同政者在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中的声誉。但是我们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外国宣传之过，须知如果没有原因，或者是没有多少理由，任何宣传都是不会奏效的。而我们却提供了这种原因和理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确是密切联系着的。

当然，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直接涉及到很少一部分人。但是它不仅间接地在国外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而且在国内毒化了政治气氛，使文艺界、社会舆论界、一般知识界，并且使一切善于思考的人本来已经很难堪的状况继续恶化。他们不能不把这些看成是斯大林的政治侦查、恐吓、镇压实践的复活，尽管是以较缓和的形式出现，并且是在较为有限的范围内。

对于许多人说来，甚至对于不是迫害的直接牺牲者说来，同持不同政见者作斗争意味着严重的人身伤害。通常的作法是迫使著名的科学家和文艺活动家签署公开信，尖锐批评引起不满的科学活动家、作家和艺术家。拒绝签字的将遭到不幸——有时这等于是罢黜他们的第一步。同意签字的，则会遭到同事和朋友的蔑视。许多人垮下来了，意志消沉。我不想替任何人辩护，也不想谴责任何人——每一种情况都是具体的。但是所有这些作法更严重地毒化了社会空气，毒化了人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精神折磨和精神损耗。尽管反对持不同政见者政策的直接对象只有几百人，可能是几千人，但是为了查清他们和迫害他们，就需要动用全部“秘密警察”机关。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监视人，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这些事不可能完全隐蔽地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都害怕偷听、监视、告密。在这种场合事情是不是完全有根有据已经不怎么重要。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员，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作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看来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恐惧，是有它的根据的。据传说，有几位我国相当著名的记者讲了几句“出格”的话（多半是关于勃列日涅夫本人的——这曾是最可怕的），并且被“技术器材”记录在案，因而立刻被解雇。有几个克格勃的负责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在一个餐馆里聊天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警惕，他们坐

的那张桌子恰恰安了窃听器。一所重要的高级党校的校长雷任科（凡是了解他的人无不尊敬他）也因为被告密，说他讲了“非正统的”话，而被迫退休。

但是问题甚至不在于个别情况——这些事只是证实一点，人们已经警觉：情况复杂化了，需要沉默，对周围的人都要小心。这里也不能仅仅怪罪于安全机关。在我们研究所所在的那个区的苏共区委会里，人们已经准备把我所领导的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И·科卡廖夫开除出党（按照莫斯科市委会的指示）。他的唯一罪状就是他在做关于艺术的报告时赞扬了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并且为他儿子就读的学校组织的业余演出写了个简单的小剧本，在剧本里提到了或者引用了这位卓越的演员、诗人和歌唱家的话。我们作了多方面的努力，进行了一些非常不愉快的、强硬的谈话，才打掉了这次迫害（而且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多半只是因为莫斯科市委会担心我把这个问题告到“最上边”，而他们到那里有可能被认为是错的）。

党内高级领导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关于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的判谈正紧张进行时，我所的两个研究人员有一次向美国报纸发表谈话，讲到存在着妥协的可能性。这不过是一个随口而出的评论，但这个猜测比较接近于我们的底牌。因为我们的同事是专家，他们能够猜想到什么是可能的。可是这件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反应，说什么发生了“泄露”情报事件，并且组成了一个由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苏共中央书记齐米亚宁参加的调查委员会。虽然没有发现任何“泄露”，只不过是简单地说了“多余的”话，尽管我全力反对，还是解除了他们的工作（唯一我能做到的是把这件事推迟了一年）。

同样是在这些年里，《共青团真理报》驻美国的记者A·蓬皮扬斯基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美国有10万个百万富翁，这件事引起了齐米亚宁发狂式的愤怒，紧急地把他召回国内，并解除了他

的职务。

在停滞年代，除了加强政治压制之外，在我国的实践中还利用惩罚机关来处理不合地方长官（首先是州委书记、市委书记等）心意的人，这也成了司空见惯的事。那些人或者批评过他们，或是同他们有矛盾，或者希望改变现状和提出了非正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被长官们认为是向现存的秩序提出了挑战。因为这种人如果取得成功，他们周围的人就会显得无能，无所事事，不适合工作。因此头头们就企图制服这种人，让他们守规矩，或者把他们踩下去。当一个社会和政府不以法制为基础，当侦查、追查和审判都得听从党的头头的时候，长官和他们的意见就超过了法律效力。胡金科、斯尼姆希科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别洛孔等农庄主席案件，切尔卡瑟州企业经理切巴诺夫、高尔基州企业经理切巴年科的案件，卓越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例如爱沙尼亚人欣特案件，都是这样发生的。当然，这些捏造的案件基本上是作为刑事案件而不是作为政治案件审理的。在我国自相矛盾的立法、唯命是从的侦查和审判的条件下，制造这些案件是用不着费很大气力的。但是其动机却几乎总是政治性的，那就是保持现状，维护现有体制。

总的说来，经济的衰退是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的状况相适应的。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社会事务的管理是如何变糟的。我们不得不羞辱地承认，不论是在对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都向世界展现了我们智力上的无能。领导人的水平直线下降，因为现有的政治机制没有保证真正良性的自然淘汰。实行的是某种“反向的自然淘汰”，提拔了一些平庸的、无能的、往往不正直的人。重要的决定是由缺乏熟练程度的人在狭小的范围内常常根据没有经过验证的、不确切的和不充分的情报作出的。除了上述一切之外，还要加上领导人眼看着越来越老龄化这一事实。

文化、意识形态、社会思想

就政治和思想迫害而言，当然，在我国多灾多难的历史上，我们还见过更坏的时期。但是对知识界的迫害是尤其令人反感的。斯大林逝世后的这些年中，我们已经变得聪明一些，人们已不再被吓到不敢去看一看所发生的事情的地步。这时生活已经比斯大林时期，某种程度上也比赫鲁晓夫时期安全多了，因此人们在内心对难以容忍的宣传特别感到讨厌。譬如说，谁会相信那时主管思想工作的领导人充分支持的И·斯塔德纽克[1]或M·阿列克谢耶夫[2]会比索尔仁尼琴更高明，而特拉佩兹尼科夫[3]或费多谢耶夫[4]比萨哈罗夫更聪明呢？从前的那种信仰已经没有了，那时人们都相信，领导人总是正确的，即使有些事没有看到，那也只是由于他们一时受了蒙蔽。许多人开始对领导人失去了希望。

在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同玩世不恭态度混在一起的辛酸情绪。两种情绪中哪种情绪更大些，则因人而异——取决于个人的性格、境遇（走运还是不走运）、思想信仰程度，而有时也取决于是否天真。但与此同时有不少人坚持要为美好理想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斗，即使没有取胜的希望也罢。

但是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停止了斗争，或者改变了战线，他们得出结论，无法改善这个制度，只能把它破坏。我过去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今天不想在这里批评他们。那时，在第一种人

---

① 俄罗斯作家，作品多反映军队生活。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人非天使》以及《带枪的人》等中短篇小说集。——译注

②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过一系列研究俄罗斯、西欧和斯拉夫文学史的著作。——译注

③ 当时的苏共中央科学部部长。——译注

④ 当时的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译注

（为改善制度而战斗的人）和第二种人（为反对它而战斗的人）之间看来隔着很深的鸿沟。另一方面，最近几年中我也开始问自己，我们是否能有绝对把握说这个制度是可以改善的。现在，我们似乎开始发现，尽管不总是能够，但也是可以架设通过这条鸿沟的桥梁。

在社会科学方面，停滞不是意味着原地踏步，而是明显地向后倒退。与此相联系，我已经说了历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状况。80 年代初保守主义者在经济学方面也加强了进攻。

但是在社会学方面还保留了创造性思想的一些“绿洲”，然而越来越多的绿洲处在被包围之中。在这方面我已经想到阿甘别吉扬在新西伯利亚的研究所，也想到了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经历的困难。

关于后者我想较详细地作些叙述。对这个研究所，有人早就怀恨在心。这不仅是因为有不少有创见的进步学者在这里工作。研究所和当时的所长伊诺泽姆采夫院士比其他许多人更接近政治，更接近制定政策的人。因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最危险的，是对领导人传播“有害影响”的源泉。

然而真正的巨大不幸是在 1982 年在停滞“收场”时突然发生的。

这一年刚一开始就发生了第一桩不幸——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分管总务的副所长被逮捕。一个检查委员会开始在研究所进行检查。这个委员会没有查出任何政治问题，只查到一个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很快就查清，问题就在于一些旧家具在研究所从旧大楼向新大楼搬家时的下落问题。因为法律（应该说是奇怪的法律）禁止把旧家具卖掉，或者送掉，根据规定，这些家具只能销毁。于是就产生了怀疑，研究所领导人之中有没有谁把它据为己有。

总的说来，这不过是一件在日常生活中应按成规处理的事

情，如果不是由检查机关（不知是联盟一级的还是共和国一级的）把它作为特别重大案件派来专门的侦查员来追查的话。但是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损害研究所领导人声誉的材料，案件停止了，副所长被释放，恢复了他的职务。

但是很快弄清楚了，这不过是一个序幕。春天克格勃逮捕了该所的两名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法金和库久金。说是他们曾参加过一个小组，散发过传单，在传单中批评了我国关于波兰事件的官方说法，以同情的态度评价"团结工会"的活动，如此等等。一句话，按照当时的理解，属于持不同政见者。同时指责他们未经批准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个共产党的书记，在会见中他们"从持不同政见者的立场"出发，评论了苏联的形势和苏联领导人的政策。

在那些年代，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科学院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事件。这一类案件对于研究所及其领导人说来，通常不会招致多么严重的后果。而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的案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引起了空前的反响。为了调查这个研究所的活动，成立了由政治局委员格里申领导的一个党中央的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中央书记齐米亚宁、苏共中央和莫斯科市委的一系列负责人。委员会的工作明显地追求一个目的，就是使研究所及其所长蒙受耻辱。委员会"调查了"一切——研究所的人事档案，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同所的行政和党委成员及各科室负责人进行了谈话。向所有这些人提出问题：能够把发生的事看成是偶然的吗？怎样评价研究所的思想状况？

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文件，并同研究所的少数领导成员开了一次会，在会上宣读了那份文件，但未留下书面材料。文件中指责研究所思想工作不力，干部队伍复杂（包括混进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即犹太人），还说研究所利用自己的材料在世界发展进程问题上对国家领导人进行误导。在开会时，上面提到的苏共

中央科学部经济科学处处长 M·И·沃尔科夫宣布，“我们的敌人正在夸奖”研究所（他指的是外国某报纸表示应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篇论文给予重视）。在私下里谈话时，党的官员们（特别是苏共塞瓦斯托波尔区委书记波诺马廖夫）建议研究所党委领导人承认错误，“以保住自己”。

伊诺泽姆采夫艰难地承受了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越来越依靠治疗心脏病的药物维持生命。我认为，疾病和心情不好也影响了他的行为——他相当消沉，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尽管领导人之中许多代表人物，包括勃列日涅夫都很了解他，信任他。在该委员会于苏共中央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会议主席是格里申，读者很快可以看出，我为什么再一次强调这一点），据参加会议的人讲，伊诺泽姆采夫根本没有发言，而发言的党委书记 B·H·舍纳耶夫否认了对研究所的许多指责。在这次会议上齐米亚宁插话说：“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坏。你们什么都不懂。”

总而言之，案件是按照经典式的旧规律展开的，应该说这一点使许多人感到吃惊，其中也包括我（我曾劝说伊诺泽姆采夫去找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甚至苏斯洛夫，我自己曾不管他愿意与否，同安德罗波夫说了这件事）。夏天研究所周围的形势有了某种缓和；可能是由于安德罗波夫回到苏共中央工作（1982年5月），起了某些作用。没有对所行政和党委会作出任何组织结论。伊诺泽姆采夫甚至被接纳参加访问巴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稍后由于代表团团长生病，曾经委托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代表团工作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做得很好，那时连伊诺泽姆采夫也认为整个这件事已经结束。

但是对研究所说来，损失是很大的，它的政治威信被大大破坏了，研究所团队的精神也受到很大打击。被逮捕的工作人员曾工作过的处、室、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受到处罚——根据居心叵

测的政治罪责（又是旧戏“重演”）给予他们党内处分，而著名的拉丁美洲问题专家 K·Л·迈达尼克组长（法金，他也是参加组织同外国共产党书记会见的人，就在这个小组工作）则被苏共塞瓦斯托波尔区委常委会开除出党（诚然，苏共莫斯科市委嗣后没有批准这个决定）。除了这些人之外，其他工作人员也遭了殃，对他们组织了追查，直到开除出研究所。

1982 年 8 月伊诺泽姆采夫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逝世（我，还有我同其谈过话的医生都看出，在研究所遭陷害和所长的死亡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此之后，又曾经企图重新组织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进攻。在苏共莫斯科市委会内已经计划解散研究所党委会，更换党委书记，对所领导和集体开始新一轮的批判。这个计划已经接近于实施。

记得是在 10 月的下半月，在一个星期日，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的我的一位亲密朋友把电话打到我家里，他说，在下星期四根据市委的要求，预定召开党员大会，苏共中央科学部的工作人员和来自莫斯科市委会的人员想把这个党员大会搞成一场精心策划的闹剧，想在政治上把研究所搞臭。这时我在城外的一个写作小组工作（只有星期日才回家），该小组正在为讨论下一年计划和预算的苏共中央全会例行会议准备材料。在伊诺泽姆采夫逝世前，这个小组经常邀请他参加工作。在星期一我把上述一切向同志们讲了，我同鲍文想好一个计划：当第二天预定在勃列日涅夫那里第一次讨论经济计划问题时，试图向他说出整个事件的情况，当然要看总书记的健康状况是否适合于郑重地同他进行谈话（这种情况不是常有的，勃列日涅夫的健康已恶化了，这件事距离他的逝世只有 3 个星期）。

在星期二（确切日期已经记不清，只记得两天之后，在星期四，即将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召开党员大会）同勃列日涅夫见面了，他自我感觉还不坏，在工作性谈话快结束时，我和

鲍文请求留给我们几分钟时间，“说点个人问题”。这时，参加谈话的Г·Э·楚卡诺夫和Н·В·希什林出去了（他们也了解这件事，但是已经这样约定），我们向勃列日涅夫讲了伊诺泽姆采夫的不幸，看来这加速了他的死亡，并说了后天拟定召开党员大会，在会上将尽力破坏对他的缅怀，同时计划摧毁研究所。

从勃列日涅夫的反应来判断，这件事对于他是新闻，他问道：“该给谁打电话?”我们略微商量之后说——大概最好是给格里申打电话，他是追查这个案件的党委员会的主席，不仅如此，召开党员大会的指示也是来自莫斯科市委。勃列日涅夫示意我们不要作声，他按了一下“多莫风”（这是对一种话机的叫法，这种话机可以把他同二、三十位领导人连结起来，同时不用拿起耳机，话机的扬声器和传声器便可进入工作）的按钮。立刻传来了格里申的声音：“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好，我听着。”

勃列日涅夫对他说，听说（他没有说出消息来源）有件案子牵涉到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伊诺泽姆采夫，甚至成立了以他、格里申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而现在根据莫斯科市委的指示，计划在该研究所召开党员大会，批判死后的伊诺泽姆采夫，审查党组织和工作集体。他问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和鲍文事先设想了各种可能的谈话内容，但是应该承认，随之而来的答复是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格里申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真的第一次听说在伊诺泽姆采夫的研究所有调查什么案件的委员会。关于党员大会我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由于过分的愤怒，差一点没有跳起来。我张开口刚要反驳，但勃列日涅夫用手指按了按嘴唇。他对格里申说：“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你把一切都检查一下，如果有谁下达了批判已经死去的伊诺泽姆采夫的指示，你把它取消，然后向我汇报。”并

说了几句赞美伊诺泽姆采夫的话[①]。

当他关上了“多莫风”，我因听到这种解释已经控制不住自己，我说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政治局委员竟然如此厚颜无耻地向总书记撒谎，而且戳穿谎言后实际情况会很容易弄清楚。作为回答，勃列日涅夫只是得意地微微一笑。这种得意的微笑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他认为这种局面是正常的。这次会见后，我和鲍文是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去的，一方面，我们很高兴，因为得以制止坏事的发生。而在另一方面，对上边的情况，对掌握大权的某些领导人的精神面貌，感到困惑。

至于法金和库久金，在1983年结束审查之后，他们因“协助审查”有功，不经审判便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赦免。

为什么保守主义分子如此凶恶、如此狠毒地攻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研究所力图使领导上注意现实，注意现实要求对我国经济、对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对我们对待社会精神生活和对待周围世界的态度进行重大的变革。保守派在这种时候就要迫使那些老是强调现实、强调变革必要性的人住嘴。这就是为什么要压制新西伯利亚的经济学家和

---

① 不久之前，关于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发生的事件，我听到了另一种说法。伊诺泽姆采夫所以没有去找领导，是因为反对他的运动如果不是由勃列日涅夫发起的，无论如何也是由他批准的。据说，问题在于，由于国际形势恶化，由于缓和政策失败（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是积极反对使缓和政策失败的），勃列日涅夫对该研究所感到气愤。这种解释是经不起批评的。勃列日涅夫根本不可能不知道缓和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除了美国本身的政治变化之外，还有我们以出兵阿富汗为结局的对外政策的冒险，失去控制的军备增长，尤其是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西方社会舆论对苏联国内保守主义的威逼和迫害加剧的反应。同样地他也非常了解，不论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不论是伊诺泽姆采夫，以及他们的专家的判断与建议，同所有这些没有任何关系（如同我和我所领导的研究所的判断和建议与此没有关系一样）。况且领导上也没有就这种问题同专家商量，一切都是在小圈子里密定的，是严格保守秘密的。而专家们关于保持缓和的途径以及关于使它不可逆转的建议，根本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上面这种说法多半是下面这种人放出来的，他们关心的是使这种坏事的真正罪魁祸首逃避批判。——原注

莫斯科的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压制刚刚站稳脚跟的苏联年轻的社会学，用各种形式批判和迫害许多愿意说真话的苏联专家、学者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企图剥夺如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这样巨大的研究中心的威望和影响，败坏它的威信，尽可能地毁掉它的原因。

到这时，如同20年前一样，创造性的社会思想只能在个别“绿洲”中发展。我们又回到了这种状态。而更确切些说，自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离开过这种状态。而它们，这些“绿洲”几乎成了社会科学界的保守主义者最喜欢攻击的靶子，如同文艺界的保守主义者把《新世界》杂志作为攻击对象一样。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都未曾怀疑，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伊诺泽姆采夫之后，下一个攻击对象将是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和我本人。其实攻击已经开始。而在1982年1月我已经得知，苏斯洛夫在中央书记处非常愤怒地批评了我（因我的文章）和我们研究所。看来，在中央机关里正在寻找合适的机会。

我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把从创建之日起我就担任领导的研究所归入创造性思想“绿洲”之列，而说我不够谦虚。后来推动改革的新的政治思维、新的社会和经济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从改革以前我国生活内部诞生的，是从问题和灾难、失望和错误之中诞生的，是从这种生活经验唤起的思考之中诞生的。其中也包括我所提及的创造性集体的思考与探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就属于这种集体之列。

在这一部分的末尾，想说几句纯粹关于个人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毕竟担任相当显要职务的人，领悟到了这种全面的衰退没有？在这种形势下他们表现得如何？那时是否感觉到了，而现在是否正在感觉到对于国内发生的事情应承担的责任？

这是很难回答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时，我只想说说我自己。

是的，我清楚地看到了，感觉到了，经历了这种衰退。但同时我要说我并不对什么事情都了解或者都知道。直到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地平线上以政治继承人的身份出现之前（而这仅仅是1982年5月的事），我当时对国家的前景很悲观。我担心，勃列日涅夫死后会发生斯大林式的向右转。

然而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曾经努力同这种衰退作斗争（上面我已经列举了几件事实）。这使我的心灵得到一些安慰，但并没有增加对未来的信心。不论是我，不论是其他人，也不论是像我一样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够指望的，不过是减少损失，无论如何不可能指望矫正事情的是非曲直，使病入膏肓的社会恢复健康。

当然，在停滞年代积极工作的任何人都不能推卸对发生的事情承担总的责任。但是在这里许多事决定于在各种不同的具体场合每个人是怎样表现的。这里差别是很大的。我不只一次地在思想上反躬自问，在这些年里都作了些什么——不论是在研究所里，还是以政治专家面貌出现时，也不论是在同领导人的谈话和争论中。当然，有许多事在今天会有另一种做法。但是我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也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

我要说，所有拥护苏共20大立场的人们应更坚决些更果断些。我们不应该畏惧，不应该怕找麻烦（何况其后果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可怕）。我们应该更清楚地看到国家正逐渐滑进深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可能是所有的人都受到对往事记忆的压抑），包括那些按当时的标准看并不胆怯的人。

但与此同时如果由于谁没有走上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格里戈连科将军，以及其他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就谴责谁，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这不仅是因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作出同

样的自我牺牲。

人们的信仰和世界观是各不相同的。但毕竟为反对一种你认为基本上是不好的社会制度和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儿；而努力变革你对之尚未丧失信心的一种制度和世界观，则是另一回事儿。

在随后的事件中（这里我再重复一遍）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起了自己的作用。须知改革不是从海水的泡沫中诞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些事和某些人把它准备好了。

最后，发动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事们来自体制内部，而不是外部，这也不是偶然的。这些人也带着过去的错误和局限性的包袱，是在那个体制中产生出来的。

我对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的勇气和无畏精神表示钦佩，他冒着危险坚持不妥协的立场。这些人是英雄人物。但是如果没有成千成万的人在体制内进行工作，进行一些日常的细小的战斗，去纠正斯大林保守派的压力，去维护和推进民主以及和平的经济改革思想，那么改革和复兴的进程将完全是不可能的。

关于那个时期的几位领袖人物

任何一种专制制度或极权专政的最可怕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民智力资源的贫乏和枯竭。对于延续时间如此之长、影响范围又如此之广的斯大林专制制度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枯竭现象越是上溯到领导层就越来得明显。独裁者当然害怕强有力的卓越人物出现在他的周围，因为他们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或者至少不能指望他们顺从地和毫无异议地执行他的命令。于是，他总是把这些人贬降 3 至 5 级使用。极权社会生活的各种条件及其晋升制度很不利于人才辈出，特别不利于政治人才的成长。想利用政治等级制度的阶梯让人才脱颖而出更是困难重重。极权专政制度也使领导人不负责任的现象成为不可避免。最高领导人统治一切，迫使

人们服从其意志，因而对什么都不负责任；而其他领导人不负责任是因为他们只是别人命令的执行者。他们都很有权，但都可以不负责任。呜呼，这就是制度。

因而，在领导层中极其缺乏有才能的和机敏活跃的人，这是斯大林现象的自然后果，而且具有长期的影响。如同大规模战争造成毁灭性伤亡之后的人口状况一样，在这种条件下高级领导人才匮乏的现象在很长时期都可感觉到。由于极权主义、大规模的迫害，为从下到上（下自基层、区委、州委、上到政治局）规定的选拔“优秀分子”标准和对各级领导的不断清洗，伤害各级领导干部的浪潮一个接着一个。某些有才能和天赋的人得以越过布满各级的陷阱，那就要算是奇迹，只是有了卓越才能再加上好运才有可能。

这一点可以解释赫鲁晓夫提拔到政治局的人，他们的智力水平和管理才能为何如此之低。科兹洛夫、基里钦科、伊格纳托夫和穆希金诺夫之辈几乎都已被人们遗忘了。他们占据的职位，要比他们凭实际水平所能享有的威信高出好几个台阶。勃列日涅夫周围的领导人也是同样情况（诚然他们中的相当部分是从其前任那里“继承”下来的）。首先这批人的个人条件除极个别者外都是绝对的平庸。这样说既指他们的天赋和才能，也指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他们通常是高校函授班的毕业生，上大学时已经当上了大首长（可以想象他们是怎样应付考试的）；或者是读完没有名气的学院，在那儿他们担负的社会工作比起学习来要多得多；再不就是修完高级党校——面授或函授——的课程。至于实际文化水平，怎么可以对那样的人们寄予厚望呢？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这里责怪他们是不公正的——他们不可能在家庭和学校中获取更多的东西，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是在各级官僚机关中渡过的。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并得到升迁，是因为并非出类拔萃（除了听话和遵守纪律以外）；他们熬过来了，从复杂坎坷岁月的众多弯道

中走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本人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因为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

在这样的背景下，柯西金在1964年就显出是个杰出的人物了。他是一个有文化、有经验，但总的来说如果按领导国家的高水平的标准来要求，仍属中等素质的人。属于这号人物的还可以举出谢列平——除大学年代（当时学习也很勉强）外，毕生在机关中渡过：先在共青团机关，尔后在党的机关，那时已充当“领导人”的角色；一个短时期内还曾任克格勃主席。要知道此人也曾是“御座”的竞争者！

其他一些人如基里连科、契尔年科、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索罗缅采夫、格里申、杰米切夫等等，虽然性格、观点、履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特征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平庸。这些平凡琐碎之辈之所以能够爬到如此之高，在一个伟大强国中占据如此要职，只是由于斯大林专制制度造成的特定历史条件罢了。这里的事情完全不在于社会出身（今日大部分院士和文化工作者的出身也并非贵族或资产阶级，甚至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来自工农家庭）。

比社会出身来得重要的是社会地位和处世方法。依我所见，斯大林以后年代我国“政治精英”们在这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属性。我想如果在这里沿用旧俄时期的一个概念，那么他们基本上属于小市民，他们都具有小市民的眼界、小市民的思想和心理、以及小市民的理想，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竭力表现为“伟大的革命家”、“为工农事业而奋斗的战士”。

以上说的是一般观察。我想比较详细地说一说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

勃列日涅夫

评价一位活动家，要避免感情用事，要注意尊重事实、褒贬适度。把勃列日涅夫作为党和国家领袖来看，对他作出负面的评价那是完全有根据的。但是未必可以同意把他描述为几乎是我国历史上如同斯大林一样的恶人（在讲话和文章中已经有人使用“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现象”的提法）。我认为，感情用事的原委是我们为自己当时对一些事情保持沉默感到羞耻：尽管我们对他了解甚多，但当对那个已临生命最后时刻的委琐小人掀起一股颂扬、赞美和授奖之风，把他捧上天时，我们仍然顺从地给予鼓掌。这一时期的主要灾难，亦即现在所谓的“勃列日涅夫现象”，就在于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人会被我国历史的进程，会被当时实行的政治机制推上他很不称职的职位上去这一事实。他企图（总的来说其他领导成员也同意）扮演一个对他来说绝对是力不从心的角色——一个伟大强国（世界上两大最有势力的强国之一）领袖的角色，而且是在非常复杂的关键时刻。

尽管勃列日涅夫具有明显的缺点和毛病，可是在他风烛残年的日益衰竭的一个长时期中，他竟没有一名竞争对手；国家、党和领导上竟未能提出更佳的人选。

我已经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即勃列日涅夫在患病之前甚至比其他同僚还要好些，更恰当地说，他并不比其他人坏。这不是对他个人品质作肯定的评价，而是对斯大林现象的沉重后果的一种评论。

我们从斯大林之后 40 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教训就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能否解决这一任务，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我们强国的未来，甚至关

系到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有没有未来——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这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已使其基础变形了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

勃列日涅夫是当时上层政治精英的典型。先说他形式上具有高校毕业文凭，实际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识。其人能力平平，文化不高。如果说他喜爱阅读什么东西，通常就是那本《马戏》杂志。影片愿意看些自然风光、动物世界以及《电影游纪》之类的题材；严肃影片很少有看完的时候，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白俄罗斯车站》，他十分喜爱此片，深深地为之感动；至于剧院，据我所知许多年来他根本未曾去过。作为国家领导人，他的最大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识；他思想保守、墨守传统；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他缺乏果断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固然这也许使他免犯不少错误，但同时促成了停滞。

但这并不是说勃列日涅夫就没有强项了。在机关斗争方面他特别老成练达，甚至狡黠机智。总的来说他善于虽然缓慢但又不冒冲突和决裂风险地把所有自己的对手和无好感的人从领导层中“挤出”或撵走。他既不像斯大林那样采取血腥镇压的办法，甚至也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对对手进行公开奚落以败坏他们的名声；但是他却牢靠地做到了使战友们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甚至对他还有几分害怕（人们真的怕他；在怕他的人中有安德罗波夫、格罗米柯这样一些人；我认为苏斯洛夫也怕他；其他人就自不待言了）。

勃列日涅夫操纵权力可谓得心应手。他有办法将每个对他方便的人留在合适的位置上。就拿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来说，这一设制几乎从来都没有明文规定，但却又不可或缺。这是由于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庞大，同样也是由于在党机关握有全权的条件下，书记处所管辖的事务范围非常广泛所致。对于总书记（或第一书记）来说，这却相当不便，因为“第二”书记对于中央机

关、中央委员以及州委书记等等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原因十分简单，即此人主持书记处的工作，要不断处理大小日常事务。既然“第二书纪”吸引众多领导干部，他必须成为潜在的竞争根子，至少他是个分享权力的人。

赫鲁晓夫曾试验让基里钦科[①]、科兹洛夫[②]当第二把手，但遭到明显失败。后来确定了一种做法，即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轮流主持书记处。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后，波德戈尔内在十月全会上提出正式设立中央第二书记职务。我看，勃列日涅夫对此是有警觉的，所以很快就把他调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并立即实行自己的一套做法，那就是经常由两人主持书记处，或至少是共同追逐这一工作。这样，这两人就并非与总书记争夺权力，而是相互之间展开竞赛，看谁“更像第二号人物”（提醒大家：最初是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后来基里连科患病，实际上已不能工作，就把契尔年科提拔到这一岗位。苏斯洛夫去世后立即将安德罗波夫调到中央担任第二书记之一的角色）。一句话，勃列日涅夫在机关游戏中，在机关斗争中，也就是在那些年代权力和政治的实际场合中决不是一个缺乏心眼的人。相反，在他于其中成长、成熟的事务和环境中间，在那些政治棋局中，他是一名真正的大师。并不是所有人很快明白这一点，后来他们都为自己缺乏眼光而付出了代价。

还有一点，在权力问题上他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能根

---

① A·基里钦科1955年作为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进入党中央主席团，1957年在与“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曾支持、追随赫鲁晓夫，年底进入党中央书记处。1959年由于对赫鲁晓夫农业计划支持不力等原因开始失宠，1960年被撵出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译注

② Ф·科兹洛夫在赫鲁晓夫时期由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不断晋升，1960年进入党中央书记处和主席团，在1961年22大上曾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但此后几次中风，1963年4月起因重病长期疗养不能工作。赫鲁晓夫倒台后被免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主席团委员职务。——译注

据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参数去传统地理解现实主义。那就是：领袖的权力并不取决于在其治下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领导上的政策赢得民心的程度以及良好的舆论反应，而是首先取决于他的实力——真正的、无情的、有形的强制力。

因而他十分关心如何才能保住对军队和克格勃的控制。他成功了。这不仅是因为从 1967 年起担任克格勃首脑的是忠实于他的安德罗波夫，而国防部长一职自从不十分可靠的格列奇科死后也换上了“自己”人乌斯季诺夫。重要的还在于那两个单位的各个层次都有他另外的“心腹”。两个部门的领导人心里都明白这一点，他们每日无不感到自己处于勃列日涅夫的监视之下，因而都表现出加倍的忠诚。

勃列日涅夫也懂得传媒对于保持权力的意义。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和《真理报》。那两处的领导岗位上都有完全由他直接指挥的人。

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强项，对他本人有重要意义。可是对于社会来说，他是否也有具有重要意义的正面优点呢？我认为有过，至少在当政初期有过，当然是在他患病之前。我想首先指出的优点是，他并不乐于作出极端的和冒险的决策。在他的外交政策活动中，这一优点很快表现为真诚支持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同其他国家关系以及限制军备的各项政策。

勃列日涅夫在国内事务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温和姿态，他并不倾向于采取僵硬的政治立场，即便他由于犹豫不决和胆小怕事而采取这种姿态也罢。而当时领导层中许多人则趋向强硬，要求恢复老一套的做法。对这一倾向他当然并未作出坚决的反击，在某些场合作出了让步，在许多方面还同意同僚们的思维方式。但无论如何，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害怕完全顺从这些人的主意会玷污自己的名声。根据我的判断，他在许多场合缓冲了这一来自右翼的压力。

勃列日涅夫活动中的这些正面的东西当然未能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甚至未能中止正在发展中的负面进程。但是这些正面的东西毕竟在许多年内制止了当时领导人水平和他们的政治情绪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多余的风波。

然而全部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一个“走过场”的、短期治理国家的领袖，他在国家第一号人物的高位上任职长达18年之久！而且那个时期的任务并不限于使国家舰只“不摇晃”只是有必要继续贯彻苏共20大的方针，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现彻底的变革。而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根本无能为力。一些因1965年改革而抱某些希望的人们也很快确认了这一点。

为什么？因为他有上面已经提到的弱项和缺点。他既没有国家所需的深刻变革的概念，即便有人为他拟订了一个变革计划，他也没有能力去理解它，正确地评价它并付诸实施。这是一个向后看的领袖，他无法摆脱旧的框架。

现在简单说一说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品性。我有必要再次指出，在患病以前，勃列日涅夫是一个不乏吸引力甚至某种魅力的人。他并不粗暴（虽然我认为是个相当爱记仇的人），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现朴实，善于（我看是乐于）表现对周围的关注，至少是关心自己想争取的人。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与战争以及战争回忆有关的事情）甚至还多愁善感。对那些没有背叛他的老朋友他是记得的，还不时给点支援（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有他过去同团的战友，他对他们曾表示关注）。他不喜欢在冲突的氛围中与人们说理，或者说根本就不想进行不愉快的谈话。但这样做有时也会变成坏事。那些不公正地遭到诽谤和诋毁的人甚至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有时简直搞不清楚，因为什么失掉对自己的信任和宠爱。

有时他也能使人惊奇。例如在情绪好的时候，特别是在餐桌旁（身体健康时他不回避杯中之物，虽然据我看是适量的。顺便

指出，那时他已将近 60 岁。至于年轻时的情形无可置评），他会突然朗诵起诗篇来。使我惊奇的是他能熟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诗《释迦牟尼》以及不少叶赛宁的诗篇。后来我知道了谜底。勃列日涅夫年轻时曾经想当演员（他本人有次对我说及），曾在“蓝衫”演出过。“蓝衫”是当时业余剧团的称呼，在 20 年代，也可能是 30 年代初在俱乐部、工厂以及红角演出革命题材剧目，为了吸引观众也演些抒情题材剧。在他身上具有对表演和演技（如果说是表演艺术大概过份了吧）的某种爱好。我有时注意到，他在会见外宾时是怎样“表演”（应该说干得不错）角色的。

如同政治领域一样，在勃列日涅夫个人品性方面也有缺点，有些甚至很不体面。许多缺点是同以下这一事实联系在一起的。他本人、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周围的人们强烈地表现和反映出小市民的气质、小市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甚至小市民的某些“天性本能”。也就是 M·M·左琴科以及后来的 И·伊利夫和 E·彼得罗夫在他们的作品中曾俏皮尖刻地嘲弄过的存在于那些不断涌现到第一线的“苏维埃职员”以及还想往上爬的中小领导人和行政官员身上的那种小市民习气。

他的疑心病很重。也许这并非天生，而是因多年机关工作而得，但可明显察觉出来。我想，他锐意并善于利用别人来为自己目的服务，包括为最不体面的事情服务，盖源出于此。

在勃列日涅夫身体健康的那段时期，他的缺点，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个人品性方面的，都还不太明显。

事情发生根本变化是在他患病以后，我已经说过，我所知的勃列日涅夫有两个：病前的和病后的。这不是说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病前的勃列日涅夫总的来说也是一个擢升到领袖职位的行政工作者，他具有当时机关工作人员，而且是内行的机关工作人员固有的一切通病。然而他也具有超出大多数人之上的若干才能：他善于倾听意见；就任之初对自己能力有清醒而不夸大

的估计；政治上的谨慎和持重；以及刻意回避冲突、尽可能通过协商谋求和解——对外政策方面如此，对内政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疾病使身上的优点逐渐枯萎，接着是大部分消失，而缺点则迅速发展起来。当然这是一个过程。第一次病后他恢复了健康，有时甚至给人以印象，似乎事情一切都已正常了。然而后来病情不断恶化，而好转越发成为短期现象。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部分地可能是由于他对自己失去了控制，已无法克制以往专制年代在他身上培育出来的坏习气。他的疑心过重和爱听流言的毛病已充分暴露，他的虚荣心（最初显然是精心掩盖起来），即酷爱美化自己的心理，经阿谀奉承者巧言令色之后得到膨胀直至变得不可收拾。再加上深深植根于他本人、他的家庭成员以及周围人物身上的小市民习气和贪婪，而主要是对自己（同样也对周围的人）十分缺乏道德上起码的要求。这一切所表现的形式使我不只一次产生一种想法：也许，疾病加速了这一人物的某种人格崩溃进程；也许，这正是一种毁灭人们品性的疾病（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我读完了详尽介绍阿耳茨海默氏病以及别的老年病的文字材料）。[①]

不幸的是，勃列日涅夫还有一些负面的个人品性造成了社会后果。流传着许多关于勃列日涅夫物质挥霍的闲话和流言。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在他死后去审查这些传闻，更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然而勃列日涅夫本人，特别是其家庭成员，无疑为闲话流言提供了把柄。

例如，他爱好驾驶轿车本来并不是应该受到指责的“癖好”

① 事情到了十分荒唐可笑的地步。这位昨日还是慷慨好客的主人（由于“伙食费”是公家开支，因而更加如此），现在活像果戈理的《死灵魂》中的贪婪人物普留什金，警觉地亲自视察并向窘迫的管理员发出指示：为从事例行公事的专家班子准备的菜谱必须是极其斯巴达式的，即：汤、一道主菜和酸奶。——原注

（顺便说明一点，他是有职业驾驶执照的），假如他不专门选中最豪华的“罗尔斯—罗伊斯”、“梅塞德斯”等国外名牌的话。后来很快形成系列的那些轿车也不应该有如此不确定的地位问题——它们究竟属于他或他家人所有，还是这些汽车本是公家的，他只是偶尔驾驶一会罢了。同样，勃列日涅夫本来可以不给外国报刊以把柄，使后者用来广泛议论苏联领袖酷爱豪华轿车，说他在高峰会晤时总是一辆接一辆地接受当作礼品送给他的轿车。

贪婪很可能深深埋在勃列日涅夫（且不说其家庭成员）身上的某个地方，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期以特别丑陋的形式显露出来了，而且常常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枚有名的金刚钻石戒指是Γ·阿里耶夫在巴库送给他的，他堂而皇之、忘乎所以地在百万苏联电视观众面前爱不释手。莫斯科人，接着是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居民都获悉他为儿子和女儿建造别墅的事。当然啦，还有引发许多闲话的“皇家狩猎”活动以及“狩猎小屋”（其实是一些大屋，是一座座带有冬季花园、游泳池及其他设施的真正宫殿。直到今天，还在为扎维多沃的巨大的综合设施花费着成百万卢布，这里是由国防部管理的）。

许多都是事实，当然也添加了为数更多的臆造和猜测。所有这些都足以破坏政权的威信，领导的威信，党的威信。何况流言和猜测都不乏来由。而尤为恶劣的是，这些都为各级领导人树立了坏的榜样，实际上为恣意妄为亮起了绿灯。

这种风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独断专行总是和恣意妄为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以为只要“领导严厉”就可把两者分开，那就太天真了。即使以斯大林时期的情况为例也不能说明问题。当然那个时期所有官员确实都怕领袖怕得要命，他可以仅仅出于任性或者是出于对某些人的某种离奇的怀疑，再不就是由于他们明显的偷窃和贪污就把他们消灭和干掉。在赫鲁晓夫时期上层统治人物根本还来不及放肆，他们很快就被更替掉了。

恣意妄为及其为大小官员贪赃枉法提供的极其有利的机会，都直接植根于任何一种专制制度的遗传基因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停滞本身，还是伴随而来的种种现象，都是斯大林极权制度符合逻辑的结局，是它的不光彩的终场戏。勃列日涅夫为这一终场戏亲自添加的唯一内容就是：他在这方面亲自树立了已为大家熟知的可耻的"个人榜样"，并对其亲信谢沃科夫、梅杜诺夫、拉希多夫、阿里耶夫和库纳耶夫等人表现出极端的自由放任和纵容姑息。

当不仅仅是主要领导人自己，而且其圈内的一批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当那些造成物资匮乏的人都可以合法地享用奢侈的招待所和"狩猎小屋"、珍贵的礼品和名目繁多的种种服务，这样一种体制就会在广度和深度上迅速得到蔓延。先是各共和国及其领导人，接着是州和市，某些方面是区，甚至是工厂和农庄都纷纷仿效。只许我干不许你干的界限逐渐消失了。

重要的职位被一些不老实的人变成了捞取各种好处的场所。在莫斯科的所有丑事都被地方上立即照搬照抄（例如专门医院、专门住房和食堂等等，直至臭名昭著的国家百货商店内的"第一百号分部"，即国内外紧缺商品专卖部等)。

请允许在此说些离题的话。我认为不能将如同病魔一样折磨我们的贪污、挥霍、侵吞和受贿等等都归因于政治上的专制、独裁以及领导不受监督等。在我看来，这些毛病也确确实实植根于在斯大林时期牢固地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的"遗传基因"上，而这一体制最早起源于"战时共产主义"。

甚至现在，在改革的年代，当我们讨论经济改革途径和市场问题时，还是有人企图将种种贪污现象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或说是它的残余，或说是它的地下形式，隐藏于"影子经济"之下，要不就与市场关系本身挂上钩。事实并非如此。当然资本主义无法保证不出现贪污和"白领犯罪"现象，无力避免无数的纠

纷，但它毕竟与贪污没有那种有机的联系，如同行政命令体制那样。在后一种体制中，一方面一切都是“公有的”，即“谁的也不是”，自下至上都垂涎三尺，总想从“公有的”那里攫取些什么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建立了庞大的（在许多方面是寄生性质的）机关，它指挥一切，或“给”或“收”，或“允许”或“不准”，它可以将人从岗位上撵走、贬降、甚至时不时投入大牢或者相反，将其擢升。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不管护法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反贪斗争加强到何种程度，只要不取消从战时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产生的旧的经济模式，这一斗争永远也不会带来真正的成果。贪污腐化在盖达尔改革中令人惊奇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它在某些方面同资本主义的强取豪夺时期联姻了。

我不准备估算在停滞年代不断强化而目前远未结束的种种做法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这大概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批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同时作为一种自然反应，右的和左的平民主义都冒出头来了。

给群众的不满土壤不断施肥的所有坏事当中，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勃列日涅夫家属起的作用不小。当然要反驳这样一个论点是困难的：即不能推卸勃列日涅夫本人应负的责任。要知道他不仅容忍，而且很可能助长了家人的恶习，首先是对孩子的姑息。情况确是如此。我不想揪出有过错的人，只想敲定一个事实：他的家人、众多亲戚以及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其他他先前工作过的地方那些抓住勃列日涅夫衣襟不放的亲信们都做了种种蠢事，毒化并深化了他本人的许多弱点和缺点。

有些事情他看不见是不可能的。据说他不止一次痛心地责怪

女儿的行为，斥责酩酊大醉的儿子（他根本就不愿意在家中多留）。而这并不妨碍他包庇女儿的丑行。显然没有他的允许和同意，女儿的最后一个丈夫丘尔巴诺夫根本不可能在宦途上如此令人头晕目眩地青云直上。在屈指可数的几年之内他当上了中将；从一名平平常常的民警政治工作者一跃而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他被入选党的高层机关；获得了奖赏、汽车和别墅。他的儿子也是如此，被提拔为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为了不致被人看出酒后浮肿的双眼，他的儿子常常戴上墨镜，不止一次在酒态中进行责任重大的商务谈判（当然正如人们所说，常常由一位女性同事主持，此人据传多少懂点业务）。

当然也不能抹掉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过错：他在帮助子女飞黄腾达中所暴露的弱点，即那种损害国家的“舔犊之爱”被钻营家谢洛科夫巧妙地利用了。唉，利用这一点的还有 H·B·帕托利切夫。这是一个无疑作出过贡献的人，曾是著名的党务工作者。他大概是想以此多当几年部长，虽然已是个年老多病、虚弱不堪、简直“无法支撑”的人。

事情不仅仅限于子女。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而且与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有同样的恶习。甚至远房亲戚，亲戚的亲戚，他们的朋友也都没有被遗忘。

这种任人唯亲的作风，也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家属。对同志表现友善并乐于相助，本来是一种优点，却常常变成为缺点，而且是相当危险的缺点——对老朋友的庇护。在某种程度上这当然是我上面提及的勃列日涅夫的灵活的干部政策的组成部分。他乐于也善于把“自己人”安插到关键岗位，即便是些完全没有才干的人，只要对他忠心耿耿就是。后来据判断，除此之外在一批沾亲带故的人们争相当官的压力面前他简直已无招架之力。勃列日涅夫有意识地或者说本能地惧怕年轻有为的卓越人物，他宁愿要一些平庸而没有能力的人，而且常常还是一些从道德品质来说也是

极为可疑的人。

此种人物之一是谢洛科夫。勃列日涅夫对权力杠杆的位置了如指掌，赶紧任命这位“自己人”担任内务部长。他与谢洛科夫相知甚深，对其忠诚程度深信不疑。今天大概已无必要再来叙述谢洛科夫的人品，他不仅是个委琐无能的小人，而且还是个道德败坏甚至蓄意犯罪的人。也没有必要叙述在他手下的主要护法机关之一的内务部中的贪污现象的泛滥程度。关于内务部一些清白的工作人员遭到迫害和他们的自杀，以及这个部门中发生的霸占和侵吞珍贵财物等事件已经报道很多了，我在这里不再多说了。我只简单说一说这个人的勃勃野心。那是从几位中央书记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安德罗波夫那里听来的。

事情是：谢洛科夫显然已经感到做得过了头，他意识到他像一个在薄冰上行走的人，只有飞速往前冲刺才有救，现在他只有继续往高处爬才得以保全自己，即不仅在勃列日涅夫治下，也在他之后尽可能长的岁月中不受侵犯。他梦寐以求的是当上克格勃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我不能肯定当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到某种程度时，他是否会对老朋友的疯狂压力作出让步。但是这样的前景使当时大部分领导成员感到惊慌。我好几次听人说，也曾听安德罗波夫说过，他已与佩尔谢和苏斯洛夫说定，要一起或分别单独地向勃列日涅夫毫不含糊地提出谢洛科夫的问题，要求管住此人，停止他的升迁，最好是撤职查办。据我所知这个问题确实几次在勃列日涅夫面前提出来了（但我不敢肯定是否坚决），但每次事情都不了了之。唯一的成就也许就是阻止了谢洛科夫继续往前冲刺（事实上他得逞的已经太多：大将、中央委员、社会主义

劳动英雄、甚至还是经济学博士)。[1]

谢洛科夫当然是个惹人厌恶的家伙，未必有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但勃列日涅夫有不少坏的“心腹”，他总是力求把他们安插到许多关键岗位上。例如勃列日涅夫认为有必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几名对其本人忠诚的、真正可信的人。于是他就把这样的人安插到克格勃副主席的重要岗位上（他虽然信任安德罗波夫，然而认为有必要对之有所防范，因为终究不是百分之百的“自己人”，不是像茨维贡[2]和齐涅夫[3]那样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那种人)。这两人都被慷慨地授予奖赏和称号，但正直的人都不喜欢他们，而是害怕他们。他们中的一个还在勃列日涅夫生前就自杀身亡。当时流传的说法和西方报刊散布的一样，认为这一自杀事件与总书记女儿所发生的事有某种牵连。对此不想置评。至于齐涅夫，他在勃列日涅夫死后若干年中还留在原来的岗位，后来作为一名大将在国防部退休。

然而对国家危害最大（对此我深信不疑)、简直到了令人咋舌地步的是任命不学无术缺乏天赋的 H·A·吉洪诺夫（他也是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之一）担任国家部长会议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此人为我国经济衰退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勃列日涅夫的许多心腹还被安插在别的一些高级岗位上——部长会议副主席、武装力量的负责人、部长（其中之一是名声不佳的水利和土壤改良部部长瓦西里耶夫)。

---

①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谢洛科夫被撤职降级，“大将”军衔也被剥夺，其妻不久自杀。后来他也自杀——有一天军方打来电话，通知他将派人来收缴一枚专门的大将奖章（带钻石的金星奖章)。但他显然以为他们是前来逮捕他的，于是开枪自尽。——原注

② 茨维贡于 1967 年 11 月由摩尔达维亚克格勃首脑擢升为苏联克格勃副主席。1971 年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译注

③ 齐涅夫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1970 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71 年选入党中央检查委员会。——译注

不能不简单说一说勃列日涅夫在其患病期间表露出的虚荣心所达到的骇人听闻的程度。看来虚荣心的源头还是他天生的性格。其最荒诞的表现是获奖欲。使我为之惊讶不已的是，此人明明知道炮制奖赏的“作坊”的全部内情，他曾亲自为许多人颁过奖，然而也竟如此着迷于这些勋章和奖章。使人不禁忆起当时青年军官渴望得到奖赏以求“胸挂十字勋章，昂首阔步飒爽”地荣归故里的情景。也许，勃列日涅夫身上还留着这样的激情。但是这已近乎神经错乱。他忘乎所以，不再明白这是自己给自己颁奖，而那些阿谀奉承者不断为他出新的点子无非是顺着往上爬。他不仅喜爱得奖，而且总要把勋章奖章统统佩在胸前。我认为除了虚荣心之外，已经表现出某种病态的症状以及人格的堕落。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表露得越来越明显。

同属于此类范畴的还有勃列日涅夫写作“成就”的“光辉篇章”。我未能确切获悉谁是始作俑者，但在这一事件中曾经卖很大力气并捞到不少好处的有契尔年科，据说还有乌斯季诺夫、扎米亚京和伊格纳坚科。

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他在患病以前记性很好。他总喜欢不时跟人们说些过去的经历——年轻时代、战争岁月、查波罗什的书记工作以及在哈萨克斯坦和摩尔达维亚等地的工作等等。他的叙述往往机智诙谐，颇能抓住历史事件的内容和场面，但他常常唠唠叨叨地重复来重复去，听者总是有礼貌地洗耳恭听，赞赏地发出笑声。一些阿谀奉承之徒则不止一次地出主意，怂恿他把这些都写下来（当然不是由他来写——他从来就不曾写过文章——而是口述，然后由人整理成“御书”）。在一段时间中这些主意被认为是开玩笑罢了，但是最终却成了丑恶的现实。为此召集了为数不多有文学才华的笔杆子，专门为他们提供各种文件以及由女速记员根据勃列日涅夫本人口述录下的“童话”和故事。当然，这个写作班子的成员有权跟这些或那些事件

的目击者进行详尽的谈话，把他们的回忆穿插到故事的叙述中去。整个工作是极为保密的，我只是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之前的几个星期才偶尔知晓的。

于是《小地》、《垦荒地》、《复兴》三部后来声名狼藉的作品问世了。

说实在的，替领袖人物代笔写书这件事本身在当年并非新鲜事。但是写成文艺体裁，在此之前任何领袖人物都还未尝试过。

然而最荒唐的甚至不是这些，而是在中篇小说发表之后开始的场面。作品受到了震耳欲聋的精心组织的捧场和叫好。刊登作品的几期《新世界》杂志，接着是单行本，几乎成为党的教育系统的必读书。作家协会立马将中篇小说提名候选列宁奖金，这笔奖金后来匆匆地授予了。不少有名气的作家发表书评，颂扬这几本由别人（虽然不乏能手）代劳的赝品，而且正是作为文学作品加以评论的。对这些作家我既不想批评，也不想为之辩护。因为有人不断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不敢拒绝，对由于违抗而失宠靠边的事例还记忆犹新。虽然在我们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内，无一例外地都深信，这几部“文艺杰作”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这一文学事件本身，比起其他为了满足领导古怪要求而破费的大笔款项来，大概不算昂贵。但是我认为公众意识和社会道德所蒙受的精神损失是巨大的。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可耻的戏，不论演员（演“主角”的人——“作者”除外）还是观众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为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

在结束有关勃列日涅夫的回忆时，我想作出某些平衡。

第一，在党的20大、22大民主进步浪潮的总回潮时期，在当时可能出现的领袖人物中，勃列日涅夫绝非是最坏的一个。至少在疾病和衰老将其击倒之前是如此。

第二，勃列日涅夫比起几百名政治学家和政论作者来能够以其本人的作为、以其治下国家发生的一切、甚至以其形象，特别是最后几年的形象更明确无误地表明，由斯大林现象在我国所培育起来的整个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是何等颓萎不济。这样说并非出自评论者的政治口味，而是因为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机制根本没有力量能使社会摆脱诸如领导人患病不起、完全丧失领导国家的能力、对正常治理社会束手无策等不愉快的现象。

第三，我，大概还有许多别的人，至少在1982年年中之前不曾设想在停滞年代已经明显可见的国家和党的滑坡是可以被制止的。诚然不能不看到，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社会需求终究要破土而出并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愿我这种说法不致被理解为“宿命论的乐观主义”。

安德罗波夫

有关他的品性已经在上面说过许多了：他有超群的智慧和政治才干，有对于当时领导人来说是颇不寻常的知识分子气质。虽然这一气质并不构筑于像样的教育程度之上（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学识是通过自学取得的，因而不能保证在知识层面上没有空白）。安德罗波夫是当时领导人包括那些具有大学文凭甚至学术头衔的领导人中一位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人物。但我注意到，这一优势并不总是对他以及他的宦途有利。也许是他明白这一点，也许是由于他特有的谦虚本性，他对所有这些持比较谨慎和含蓄的态度。安德罗波夫之所以在当时领导人中出类拔萃还在于道德品行方面。他的无私奉献精神是著名的，甚至到了禁欲主义的程度。

而这些个人生活上的品质当涉及政治时确实又与以下实践结合得很好：他能够极其灵活地理解道德允许的范围，以调和的态度对待长期在社会上特别是上层所确立的不体面甚至令人十分厌恶的“游戏规则”和人际关系准则。

一句话，这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人物。我简直没有这样的写作才能给他描绘一幅够格的文学画像。我只能说些通过多年交往以及某段时期共事所获得的有关他个性和活动的些许印象，作为上面已经说过的补充。

我想先说明一点，我的评述将尽可能客观，但是毕竟避免不了会流露出我们有过的良好关系，有时可能接近颂扬，有时也会变成遗憾、甚至痛心：他怎么会这样，怎么在这一重要时刻“放松”自己、临事而惧、出了差错！但与此同时我对他的缺点和不正确的行为从不盲从。我觉察到了这些，有时也告诉了他本人，于是也就导致我们关系中暂时的冷淡、赌气甚至争吵。

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很好，一定程度上可说是相互信任的关系。纵然，可能是由于地位的不同，当然也常常是由于观点的相左，因而也就并非彻底的相互信任，无疑保持了应有的距离。我从一些表面的现象说起。他跟我谈话时以“你”相称，虽然称呼时用的是名字和父名，只有在少数特别亲密场合才单叫名字。我一般回避亲昵，与此人交往中也不追求亲昵。但我常常忘了形式，对他说话直截了当，虽然说不上激动，但语气也相当有力。他很懂得这一点，当想要得到我完全真实的看法时就故意逗怒，而他通常取得成功。有时我对他也采取这一招，但说实在的，效果较差。他在世俗经验、处事艺术和人际交往方式方面都要比我强得多了。

我们相识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50年代末经库西宁介绍认识的。60年代初我被吸收参加他领导的写作班子。从1964年至1967年我在他手下供职于苏共中央机关，开始当咨议员，之

后是咨议组组长（相当于他的副职）。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后，他曾努力保持与我以及党中央联络部的另外几个工作人员的同志关系。他常打来电话，还时不时碰个面（跟我大概每隔一个半月或两月碰面一次），一般总是在鲁比扬卡他的办公室里。应该承认，我开始到那儿去时总怀着某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我明白这座高墙是一些什么事件的见证人。当安德罗波夫回到苏共中央（1982 年 5 月）之后我与他见面的次数大大增加了——有时是他找我，有时是我要求接见。关于他当上总书记后和我的关系放在下面再讲。

这种终究是悠久的、长达 20 多年而未曾丧失信任感的相互关系的基础是什么？从我这方面讲，是出于真诚的尊重。这种感情并未因为看出安德罗波夫的弱点、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就一些问题包括重大问题发生争执而有所改变。再就是出于责任感。我认为向他书面或口头反映情况，就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能够哪怕是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促成我认为是正确的政治决策，阻挠（又是我认为的）不正确的危险的决策。最后，也是为了帮助掉入灾难泥潭的人们，保护某些人免遭不公正的迫害，尽可能恢复正气。我曾通过安德罗波夫取消了某些人的徒刑，例如被无理判刑的卫国战争残疾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奥德萨州著名的集体农庄主席别洛孔。我也曾帮助过一些由于在某些文件上签过名或发表过“异端思想”而受到镇压威胁的人。我也曾想方设法——有时是徒劳无效的——营救乌云压顶的若干文化人。至于我自己，我从没有向他提过任何请求，虽然他也曾掩护过我，使我免受诽谤和告密的陷害。大概是为了指点我，要我今后提高警

惕，他甚至把有些材料交给我看了。[1]

我当时不知怎么未曾想过，他与我保持友好关系是为了图什么？后来我得出了某些结论，现在讲出来，希望不致被认为是不谦虚。首先，安德罗波夫知道（甚至也曾说过）我从不说假话，更不会为了讨好他或不惹他生气和发怒而说假话（虽然他当然明白我并非在所有场合都对他完全说真话）。当时在那些与领导打交道的人中，这种态度是不寻常的，从我所知道的他同其他同事的一些亲近的接触来看，安德罗波夫是珍视这种待人态度的。第二，他对我的观点，首先是对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终究很感兴趣并且给予信任，虽然也常常对其验证。第三，他根据我的意见（也根据其他与之交往的人的意见）作为第一手材料，而不是根据转述的材料形成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情绪的看法。第四，像任何一个正常人一样，他有时也会有跟别人促膝谈心的欲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确信我从没有骗过他，而又善于对一些微妙问题保持沉默。

我再重复一遍，就个人的品行而言，此人几乎是无瑕可击的。他在当时领导人中是以其对世俗功名富贵的冷漠以及在物质享受方面“苛待”家庭成员著称的。他的儿子在美国和加拿大研

[1] 有一次他来电话要我前去见他。他给我读了一封没有署名的长信（后来我知道此信作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苏联记者，也是我的一个老相识。我不想在此指名道姓，因为他已经死了。但据许多了解他的人推测，他是个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信中他引用了与某个美国人的谈话，说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人员”，甚至很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信的内容给我的印象是似曾相识。我于是明白这不过是故事新编罢了。它的原作曾刊登在林敦·拉胡斯出版的小报上，此人是一个极右派，在我看来甚至是法西斯分子。我读完告密信之后问安德罗波夫，是否应该写个材料予以澄清。“当然用不着”，他回答道。“我给你看信只是让你知道此事。”我说：“我可以告诉您真相以及告密者的真面目，”接着将诬告的来由向他作了说明。他听罢稍有点不安。第二天我给他送去那篇文章的复印件，并附上了译文。我注明，林敦·拉胡斯的组织曾把我作为骚扰的对象，他们不仅往美国而且往西欧派出自己的人员，破坏我的讲课，组织反对我的示威。——原注

究所工作了数年，是个月薪120卢布的最普通的工作人员。但当谈及儿子时，他总是要求“多给他一点活干”。有一次他气愤地说儿子太不自量，竟要求把二居室换成三居室。其实他的儿子已是三口之家——他儿子、儿媳妇和孩子（我想指出的是，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子女有这样家庭的早就有了三居室或四居室了）。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我告诉他有个拍马屁者订购了一批“梅塞德斯”牌和“沃尔沃”牌轿车，以廉价卖给了领导人的子女，后者以此招摇过市；我说这只能越加引发人们的震惊和愤怒。安德罗波夫听了满脸通红，激动地说：“你若话中有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全家有一部国产的‘伏尔加’，是8年以前用现金买的。”几分钟之后当我们道别时，他又说这真是胡作非为，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失足。“但你该明白，对此我无法申诉，为几乎跟所有领导人闹翻而再次提供导火线很难说是明智的。”

安德罗波夫极少谈及家庭和个人的私事（记得有一次说及妻子的病，看得出他内心充满痛苦。那是1956年秋在布达佩斯得的病，当时她在起义者包围的苏联使馆内。疾病与当时所经受的恐惧和打击有关）。他本人在生活作风上也是找不出什么毛病的，至少没有人能察觉出有什么问题。他彬彬有礼、举止大方，几乎从不贪杯，也不抽烟。但他这样做并非是为了显示其高雅，也不是装腔作势，他也从不用这些（或其他一些）生活上的小节去责怪别人。有时也开玩笑地应付一下说：我的“罪孽指标”早在年轻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安德罗波夫有办法赢得谈话者的好感。这大概不是简单的演技，而是折射出他天性中吸引人的一面。未曾听说他故意坑人的事。

但是，安德罗波夫也能置人于灾难而不管，甚至对相处很好的人也不留情。这里我想说一说他的缺点。缺点之一（上面已提到）：优柔寡断甚至是恐惧心理不仅在政治事务中时有表现，当

有必要站出来保护人，特别是保护某种思想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并不认为这是“天生的”、源于遗传天性上的缺点。我认为，也如同大多数不仅在斯大林治下生活过，而且还步入了政界的他的同龄人一样，他也是个深受创伤的人。其实这正是斯大林肉体恐怖和精神恐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打断人们的心理道德脊梁骨，使他们丧失坚毅勇敢的性格、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安德罗波夫身上的创伤比起他同辈政治家来可能不那么深重和不可救药。何况他聪明，也颇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但是我认为这一弱点使他过于轻易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妥协。

我感到，安德罗波夫本人在灵魂深处是意识到这一点的。因而很想作出某些自我辩解。对于这样一些妥协、让步、放弃斗争的做法，他首先辩解说是出于“策略需要”。他乐于大声地表白自己的这种见解。有几次甚至教训我说：你的目标是正确的，你的战略也不坏，但策略却是狗屎不如（他甚至用更难听的字眼）。对这样的批评我有时同意，有时不。有一次我终于忍耐不住就对他说，只要你老是这样愿意提供方便（指国内事务），那么在无止境的策略中也会发生“短路”，即完全丢掉战略。安德罗波夫听罢很生气。我们的关系在一段时期甚至冷却。但过些时候又言归于好。

安德罗波夫的另一弱项是看人方面的严重错误。这方面他是个内心极其矛盾的人物。有一部分纯粹是错误，但也有些是过分讲究策略所致，有的则是他政治观点中存在矛盾的结果。

在我能够作为见证人的他的生命中的那段时期，他在干部工作上有过成就，发现过人才，但也有严重的失算。例如，他在苏

共中央工作时，一方面成立了强有力的咨议组[1]——对此我已经写过，另一方面却又把迟钝而不讲原则的小人鲁萨科夫[2]作为自己的接任人。他不止一次地选择能力不强只能坏事的工作人员充当自己的副职。他不但容忍一批无业绩、无才能的人，甚至对政治上造成不小危害（他不会不知情）的人网开一面。

对于他在克格勃系统中的干部工作不便贸然置评，这毕竟是个太神秘的领域。

但是说及他作为党和国家政治领导成员在选拔、推荐人才方面的作为，又会遇到难以解释的矛盾。

一方面，他是对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政治活动家首先作出好评的人，或者是首先作出好评的人之一。我确切记得头一回听到戈尔巴乔夫姓名正是1977年春出自安德罗波夫之口。我对这个日子记忆犹新是因为那天开始谈的是万斯来访的小结，然后话题转到勃列日涅夫病情。那时我相当尖刻地谈及我们正面临很不愉快的事，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一批能力很差、政治观点又很令人怀疑的干部很快就要上台了。我的话惹怒了安德罗波夫（也许正因为他思想深处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尖锐地反驳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对人们并不了解，而总是热衷于批倒世上的一切，“譬如你曾听说过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吗?”我说，“没有。”他就说：“你瞧。事实上一代完全新型的人已经成长，对未

---

① 顺便说一件事。当苏联杂志发表我的回忆录的摘录之后，有人问我安德罗波夫为何需要如此强大的咨议组？我就一个方面的原因谈了自己的看法。面对中国领导人发动的论战，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复杂化了的形势，而当时我们的政治实体称之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因而无论在理论或政策方面确实都有必要加强深层次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可能多半出自安德罗波夫本人的需要。安德罗波夫是个富有创新意识并坚持20大方针的人，他很想在其周围有一批智能和教育水平都较高的人以便共同解决困惑他的一些问题。只是在最近我才意会到，他之所以要成立一个智囊团，也可能是从他今后的政治前程考虑，虽然我难以想象他自己在那样早的时候就会考虑担任国家的领导人。——原注

② 鲁萨科夫后来接任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译注

来的希望确实可以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不记得这次谈话是怎样结束的，但第二次我从安德罗波夫口中听到戈尔巴乔夫的称呼是在 1978 年夏天，即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去世之后不久。

那是一次有关美国形势以及美国、欧洲对我国布署 SS－20 型导弹的反应（我已在上面述及）的纯业务性质的交谈。在谈完我的看法之后，话锋转向了国内问题。安德罗波夫忽然抛开刚刚还在谈论的内容，好像是要把内心思考的东西公诸于众地大声说：“你看那些无用之辈（有时他用些更为刻薄的字眼）不让把戈尔巴乔夫调到莫斯科来。”在回答我那疑惑不解的问题时他解释道，这里说的是任命戈尔巴乔夫接替库拉科夫的职位。后来又谈起了别的什么。这一年的秋天戈尔巴乔夫当上了苏共中央书记，主管农业。此后事情是怎样发展的我就不太清楚了[①]（不久之后，在筹备例行的中央全会的过程中我头一回遇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书记在莫斯科的出现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凡大事。如果说安德罗波夫如同人们可以猜测的那样，在这里起到了某种作用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他最重大的功绩之一（但也不排除戈尔巴乔夫这一不寻常的卓越人物有可能通过其他渠道提升到领导岗位上来）。

但是伴随这一成功之举的是安德罗波夫的几个失误。显然，

---

① 许多年之后，已经是 1986 年，《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杜什科·多德尔，这位曾经撰写驻苏年代回忆录（其中也曾提到安德罗波夫）的作者有一天来到了我们的研究所。他情绪饱满，手上晃动着某些纸片。原来是 1978 年秋塔斯社新闻稿的复印件。这篇稿件提到勃列日涅夫在契尔年科陪同下在去巴库的路上于“矿泉水”火车站作了停留。迎候他们的是正在基斯洛沃茨克休息的安德罗波夫以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你们想一想，”这位美国记者喊道，“在这座已被上帝忘掉的铁路小站（我更正说，就我所知，那里有一座很不错的车站）上，苏共中央的四位总书记——我要重复强调是四位——走到一起来了。”根据多德尔的猜测（他为此跟我打听），正是在那里安德罗波夫说服了勃列日涅夫邀请斯塔夫罗波尔党组织领导人来到莫斯科。我老老实实回答他：“不知道。”——原注

上面提到的情况起了作用。例如，他把罗曼诺夫这一十分令人厌恶的人物，从列宁格勒请到了莫斯科。他也曾袒护过阿里耶夫，诚然我绝对相信他不仅没有卷入，而且根本不知道后来指控阿里耶夫的那些丑闻。他对阿里耶夫的能力和性格知之并不多。在安德罗波夫的印象中，阿里耶夫还是60年代末的那个反贪战士。最后，正是安德罗波夫把利加乔夫从托姆斯克请来莫斯科领导党中央的干部工作。显然也是利加乔夫反贪坚决博得了他的好感（记得在安德罗波夫出殡日的追悼会上我和利加乔夫的一次谈话，他说不管付出何种代价也不会停止反贪斗争。我相信他说这些话出自真诚）。

关于安德罗波夫本人优缺点已经说得够多的了。虽说这些优缺点对政治领导人来说都具有意义，但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他们从事的政治事务，即他们在政治上是否符合我们这样的党，我们这样的国家向领导提出的要求。在转到这一问题之前，我想首先说一说，根据我的观察和我的印象，安德罗波夫出众之处还在于：他不追求权力，并不渴望当“总”字号人物。不排除他也已经考虑自己作为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人，那只是因为他见不到有另外合适的人选（至少在可能成为候选人的一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够格的）。[①]

我认为，安德罗波夫本人甚至直到1982年初还并不打算担任这一新的政治角色。例如，我记得在70年代下半期，有几次我企图引起他对经济问题的兴趣，但都被支开了。他说不想充当这方面的行家，本职工作已经够多的了。我劝他总得费些力气充实经济知识以便在政治局讨论经济问题时更好地把握方向；我还

---

① 安德罗波夫也曾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忧——1981—1982年间我曾经察觉，他袖口里边两腕关节上扎有绷带。我很快就猜到，这里绑的是一种能简便接通“人工肾脏”机的装置。——原注

建议请专家为其选一些有关读物；但这些都被拒绝了。他回答说（甚至带着几分恼怒）：没有时间。我想，假若那时他已意识到自己将是未来的国家领袖，就不会不理解应该补充经济知识的不足。他在这一领域确实是较弱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上层形势。我想，人才的严重“匮乏”，领袖岗位没有像样的候选人等等，都不能不使他在某些时刻也开始思考：自己有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政治首脑，这甚至是不以主观愿望为转移的。除此之外，在我国僵硬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氛围下，每个领导人对下一届领袖不可能没有恐惧感——新的领袖是否会加害于他？于是，若有可能，自己占据最高位置就不失为安全良策。

我认为，这样一种前景对他来说真正成为某种现实可能（当然，作为抽象的可能，也许出现得更早）大约是在 1982 年初，即苏斯洛夫于 1 月份去世之后。还在 2 月份就盛传要让安德罗波夫接替他的位置。不久我有了一次机会问及安德罗波夫：这些传闻有无根据。记得我还曾开玩笑说，随着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间的增长，原则上并不轻信有关干部变动的传闻。而当上院士之后则更作出了科学论证：传闻虽植根于健全思维，而中央的干部政策所遵循的是某种不同的、“更为高级”的思维方式。安德罗波夫听罢大笑，说这次传闻是真的。苏斯洛夫逝世才几天，勃列日涅夫就建议安德罗波夫回到中央担任书记，说：“下次政治局会上作出决定；下星期就开始上班担任新职吧！”“我对这一信任表示感谢，”安德罗波夫说。“但提醒勃列日涅夫，中央书记按规定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政治局任命。勃列日涅夫于是建议下个星期召开中央全会。我说单为这件事不值得专门召开一次全会，所有这一切可以在已经宣布于 5 月份举行的例行全会上作出。勃列日涅夫咕噜了一阵，也就同意了。”

从谈话中我得出印象，对于这一建议安德罗波夫的内心反应

是矛盾的，对此可以作些猜测。一方面，安德罗波夫确实愿意回到中央，他肯定明白，每当领导更迭之际（而勃列日涅夫的病情正日益加重）克格勃主席将处于极其脆弱的地位。上面已经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若被推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将有悖于全部传统。这样，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将是别的什么人。而不管是谁当上了继任者，将首先更换克格勃首脑，因为后者知情过多。更不用说新的领袖总希望有“自己人”占据这一岗位。因此，安德罗波夫是很赞同调回中央的建议的。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对这样一个问题嘀咕（他后来亲口谈及此事）：勃列日涅夫的这一建议与什么相联系着？其用意究竟何在？到目前为止勃列日涅夫好像并未想到死亡和继任者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是真的要他来领导中央工作吗？还是仅仅利用这一借口，把他调离开克格勃？

假若我曾获悉另外一些细节的话，我也许会对安德罗波夫对这一建议的态度产生更多的疑虑。例如，勃列日涅夫并未听从安德罗波夫关于谁来接任克格勃主席职务的意见。安德罗波夫推荐切勃里科夫，但最后决定任命此前领导乌克兰克格勃的费多尔丘克接任。再如某些克格勃侦查中的刑事案件似乎涉及一些与勃列日涅夫家庭成员十分亲近的人（有人将此与安德罗波夫副职茨维贡的自杀联系起来，茨维贡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关系密切）。

不管怎样，5月份安德罗波夫开始了新的工作，驻足于5层从前苏斯洛夫的办公室（1982年后契尔年科坐到他这个办公桌上，后来接替他的是戈尔巴乔夫，之后又成了利加乔夫的办公室。这也已成为固定传统：第二把手和第一把手一样，早就有他固定的办公室）。我相信这时候安德罗波夫已经十分清楚，他所处的位置表明他是最有可能继任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人。事实上现在事态发展本身已迫使他去占据第二号领导人的位置，这也就成了斗争的焦点。诚然当时的情况是，安德罗波夫

好像不会有像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对手。

这是一段十分独特的时期。勃列日涅夫以及毋庸讳言还有他们若干名老战友们，有的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有的对当年曾与勃列日涅夫竞争过的人感到恐惧，他们圈定了为数很少的领袖人物掌握权力。在这个小圈子里，总书记本人虽然年老多病，终究一直无条件地处于领导地位，直到其生命的最后日子。然而圈中人物实际上是终身任职的，只要能勉强站立起来就行。但他们毕竟都已老态龙钟。因而生理学就成了政治的最重要因素。有时候全部取决于谁活得时间更长。

例如，假若契尔年科感觉较好，或者勃列日涅夫活的时间比苏斯洛夫短，苏斯洛夫那怕再活上一年，安德罗波夫完全有可能不会在 1982 年 11 月当上总书记。是的，实际生活的形势变得很不寻常。1982 年夏季和初秋我相当频繁地与安德罗波夫打交道，虽然他和往常一样对于领导层发生的事不露声色，更不说及那里的内部斗争，但有时也忍不住冒出几句。

安德罗波夫当上中央书记之后，先是契尔年科，接着是勃列日涅夫立即相继休假。安德罗波夫在某些事情上利用了这一点。例如他“打掉”了中央关于调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书记梅杜诺夫到莫斯科（好像担任副部长职）的决定。此人与谢洛科夫一样，是无所顾忌公然贪污的象征人物，这件事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梅杜诺夫坐镇克拉斯诺达尔，在自己的边疆区不费力气地抵制了对其舞弊行为的审查。而安德罗波夫一直很想揭开这一脓包，希望通过这一案件的查处给整个政治局势“吹吹清风”，以推动其他各地的反舞弊的斗争。诚然从南方领导人休息的地方传来了不满的信号——不仅有契尔年科的，也有勃列日涅夫的。虽然据安德罗波夫说，关于调动梅杜诺夫的问题已在电话中与勃列日涅夫商量过了。

根据我的判断，安德罗波夫终究在这时期明显地失去了与勃

列日涅夫的原有联系，他没有把握：是否有敌对人物在背后编织阴谋。例如，任命为克格勃主席的费多尔丘克开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进行改组，这使安德罗波夫很生气也很不安（为何缘由我说不清楚，但他明显地生过气，有一次还说了出来）。还有其他一些使安德罗波夫颇费脑筋的事。1982 年夏天和初秋他的情绪常常很坏。

后来，好像是 10 月 20 日，安德罗波夫休假结束才几天，他从接待室给我打来了电话请我前去会晤（我曾在前夕要求接见以便讨论不久前去世的伊诺泽姆采夫的继任者问题）。我见到的安德罗波夫正处在亢奋状态，情绪之好是很久以来所未见的。原来，几小时之前他与勃列日涅夫作了一次严肃的“摊牌”的谈话。他说“我鼓作勇气对他说，简直弄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很想知道领导以及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实质性意图，即为何将我调任新职。是让我远离克格勃呢，还是委托我在中央履行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勃列日涅夫听完之后告诉安德罗波夫，要他“全面抓”：“你现在是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有鉴于此，你必须运用全部权力，”同时许诺全力予以支持。这就放开了安德罗波夫的双手——他可以既在政治局和书记处，又在契尔年科地位巩固的中央机关大显身手。看来，这一局面对他来说是颇不简单的。

这次谈话之后不到 3 个星期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成了他的继任者。也许勃列日涅夫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结局，也许这纯属偶然。我不得而知。

然而，从政治上评价安德罗波夫在领导任期内所起的作用要比叙述事件经过更为重要。我在这里讲一点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但要说明一点，许多细节我根本不知，特别是有关他在克格勃的工作，他几乎从不跟我谈及这一领域的事。当然有些情况不难自己“推算”，再跟从旁截获的材料对比核实。

由于事件演变的逻辑，安德罗波夫所担任的能够对政治施加

影响的第一个职务是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一职。他于1954—1957年间担任此职，那时匈牙利发生了悲剧性事件，在国际关系上，也同样在我国国内事务上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

我无法对他在这一岗位上的工作作出评价。我注意的仅仅是影响安德罗波夫以后年代政治观点的一些大事。这方面的资料也十分有限。我的依据是那些曾在匈牙利供职的我国人士的一些谈话以及若干匈牙利同志包括亚诺什·卡达尔（1983—1988年间我曾跟他作过几次长时间的倾心的攀谈）在内的一些谈话。

我国人士谈的共同内容首先是，1956年秋匈牙利爆发反对拉科西制度的武装起义前的几个月中，安德罗波夫发回莫斯科的材料以其当时很不平常的直率甚至尖锐著称（很可能这在匈牙利事件之后保住了他的政治宦途。他本人曾经说过，这些材料都被仔细地、几乎是用放大镜审阅过）。安德罗波夫在报回的材料中批评了拉科西和其他匈牙利领导人，并作出警告，假若我们一味下赌注于这号人物，则会以严重的动乱告终。这里我并不排除他的材料也可能建议加强我国在匈牙利的军事存在以巩固那里的“法制和秩序”。

这些并不使我惊奇，原因很简单，它符合我国当时的帝国政治思维，而它首先是针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国家在我国的积极参与下，甚至是按照我们的意旨，在40年代末期被迫接受符合我国（要加上：当时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国内秩序。这是我国政策最重大的失误之一。我们宁愿舍弃相互尊重的良好的睦邻关系，热中于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并对邻国内部事务进行粗暴干涉。当时就付出了诸如柏林、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等的代价。然而真正受惩罚时刻的到来则是在80年代末。

不能说在40年代末强加给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化”所形成的局面中就看不出不正常和危险的迹象。早在斯大林逝世后的

最初几年中我们的概念已经有了若干变化。我们虽然举步维艰，但毕竟开始懂得：应该考虑我们邻国的经济政治需求。

安德罗波夫显然未能从这样那样一些概念的相互矛盾的框架中摆脱出来。但是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他在驻人民民主国家（当时是这样称呼的）的大使中表现不俗。他比别人开放，易于接受新的思想，在同行中率先不再像一名州委书纪对待本州那样去对待他所驻在的国家。

1956年10月底至11月初的匈牙利悲剧性事件在安德罗波夫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处于这一政治地震的震中。他把这一事件看成是一场应该予以镇压的真正的武装反革命（我从他本人那里知悉），这影响他政治思维的形成。与此同时我相信他要比别人看得清楚：匈牙利原有政权之所以垮台，群众不满情绪之所以具有如此规模和激化程度，其原因与其说是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和外国的挑唆，如同正式宣布的那样，不如说是匈牙利本身现实状况所致。例如，我国遭遇过的斯大林的反常行为被全部移植到匈牙利的土壤之上，并在那里竭尽可能地具备了更为丑陋的形式。他也看到了由于匈牙利在与苏联的经贸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所造成的经济问题也在那里作祟。

他本人的感受以及纯激情的印象大概也影响安德罗波夫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放在他面前的是一大摞有关起义者所作所为的报告，叙述他们如何残酷地杀害共产党人、党的工作者和国家职员。他本人渡过了痛苦的时刻。我已经说过，他身处其中心的那个事件是他妻子得终生大病的成因。大使馆周围枪声四起，安德罗波夫本人也遭到枪击，有一次是当他到机场去迎接米高扬的时候发生的。

此外，也不能把1956年安德罗波夫的智力水平和政治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他不过是一名斯大林年代成长的44岁的地方的党的官员，缺乏国际政治交往方面的经验，长期培育他的是僵硬

的思想教条。给我的印象是，由于安德罗波夫智能和政治修养方面的特点，也由于他曾卷入其中心的那个政治事件，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综合心理。后来，一些熟悉安德罗波夫的人们就把它称之为“匈牙利综合症”，指的就是；他非常警觉地注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困难的增长，以及——以下已是我的评语——过于迅速地采取最果断的措施以制止困难因素转化为尖锐的危机。当然应该指出，他与我国许多活动家不同，他并不肤浅地理解危机的原委，而是看到了较深层次的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因。他不排除使用武力，然而也并不把反危机措施仅仅归结为武力。

还有一件事也与此相关，终究可以说明安德罗波夫与许多同僚的做法并不相同。当匈牙利政权反叛者的武装抵抗遭到武力镇压之后，安德罗波夫立即开始考虑的不是如何复仇，不是要与反叛者算帐，而是尽快建立公民和睦。因而他力所能及地支持提名亚诺什·卡达尔出任党的领导人职务，即出任匈牙利实际上的新的领袖。卡达尔曾被拉科西投入大牢，受尽折磨和拷打，并遭到枪决的威胁。据我所知，在莫斯科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一建议。许多人的意见是：正因为卡达尔曾在狱中受辱，这一情况有可能影响他对待苏联的态度。卡达尔当然明白拉科西在逮捕他之前不可能不与苏联领导打招呼。这样，卡达尔会因此成为不可靠的同盟者吗？他会率领匈牙利走上敌视苏联的道路吗？

这样的怀疑情绪笼罩着莫斯科的一些人物。曾几何时，苏联领导对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命运与卡达尔相仿的人——也曾有过类似的怀疑。我已经提及，我们算是幸运的：波兰人终究在1956年10月坚定不移地顶住了赫鲁晓夫死保奥哈布、不让哥穆尔卡上台执政的无理要求（这肯定将在波兰引发动乱，而这一动乱刚好与匈牙利事件巧合，不排除它会扩及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这将对我们以及整个我国政策造成悲

剧性的后果)。然而安德罗波夫还是说服了莫斯科由卡达尔出任领袖。由于他的上台，匈牙利得以相当迅速地摆脱深重危机和民族沮丧的困境。

我有机会比较近距离地观察安德罗波夫的工作，那已经是在苏共中央联络部里了。我认为，总的来说，他在这一重要岗位上任职期间的工作及其对我国政策的影响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然这些评价是依据当时的标准，而且考虑到他是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整个对外政策的不容争议的概念的框架之中活动的。安德罗波夫尽可能坚持的是：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性和它们的利益，力求以政治经济手段制止形势向着有可能导致我们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即努力避免以武力挫败这些国家独立处理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企图。他主张对待这些国家的探索应该抱有更为宽容的态度，即使他们的尝试意味着放弃苏联经验的某些方面。他坚决主张在新的基础上，即真正照顾双方利益、放弃苏联传统的排他性路线的基础上达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一体化。诚然，如上所述，安德罗波夫缺乏渊博的经济知识，他只是笼统地从政治上提出了这些问题。据我观察，安德罗波夫作为苏共中央一名书记，并不顾忌超越自己直接管辖的范围，开始提出有关东西方关系、我国全球政策以及国际事务中新的动向等诸多问题。

在紧接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之后的非常复杂时期里，安德罗波夫经受住了短期的“失宠”和疾病的困扰。他积极工作，支持20大路线以及和平共处方针，并努力以这样的精神影响勃列日涅夫。我想在当时的领导层中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在如此高层的人物当中，我找不到第二个刻意贯彻这一路线的人。当然安德罗波夫干得十分谨慎，遵循了全部策略规则（我常常认为他简直滥用了这些规则）。

至于他在克格勃主席岗位上的工作，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

（主要是信息极其有限，不连贯，常常是偶然得到的），我不敢贸然作出任何肯定的评价。就我所知，在这领域正面和负面效应是特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首先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有一种越来越清楚的现象，那就是大部分领导人倾向于倒退，虽然是部分地而并非极端地倒退到斯大林主义，也包括倒退到强硬的惩罚政策。我曾几次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听说，更多的则是从别人那里听说，政治局内部曾有人公开要求将持不同政见者，即对现行制度持批评态度并坚持己见的人“投入大牢”。一些负责这方面事务的人常常表现出对“自由主义”的不满。就我所知，也曾有人提出要逮捕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这样一些著名的文化人和科学工作者。

安德罗波夫不赞成此类做法，看来曾尽其所能地予以抵制。部分地是出于他的信念：从品性上讲，他并不是由当年雅哥达、叶若夫和贝利亚之辈那样的材料造成的那种人；部分地是出于处事谨慎。我揣测他大概是从20大揭发安全机构滥用权力中吸取了教训，想努力保全自己的名声和荣誉。

然而这一期间克格勃不仅曾经逮捕过、指控过完全无罪的人——他们后来都得到了平反，而且在对付不同政见者方面采取了更大规模、形式各异的极其可憎的手段。除了通常的跟踪和施加政治压力外，还设法在政治上、道义上败坏他们的名声，有时不惜采用挑衅、恐吓或非法投入精神病院等手段。也采用了诸如放逐国外、吊销苏联国籍等做法。

对此安德罗波夫是难辞其咎的。假若说他采用或批准这些做法为的是避免对无罪的人采用其同僚们所要求的更为残酷的手段——直接镇压、逮捕和判刑等等，那么这样的辩解是很难说出口的，甚至对他怀有敬意的人也很难做到。当然此类残暴要求无疑有人提出过，他本人心目中兴许也想以此作为解脱。我决不想充当清白人或卫道士的角色。我同样毫不怀疑他在1967年同意领

导克格勃的正确性。将这一战略性的要害职位让给别的什么人简直是危险之举。也可以理解，这样的抉择将要付出代价。安德罗波夫既然领导克格勃，当上了它的主席，就当然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对付间谍、叛徒，对付那些企图以武力推翻制度的残暴敌人。

然而，安德罗波夫被迫或主动卷入到极为不体面的事情中去了，这毕竟也是事实。总的说来，他与上面引述的四行诗中所希冀的不同，并没有成为例外，而是如同许多人一样，向来自权力、来自所处要职的“恶习”屈服了。

因此不能不说及他十分重视的一桩事情，即有关成立所谓第五局的主张（我想这一主张大概还是老克格勃人员向他提出的，当然这并不能推卸安德罗波夫的责任）。

我第一次听说此事是安德罗波夫调到克格勃之后不久。有一天他不无骄傲地对我说，“知识分子工作”已从反谍机关中分离出来了。他说，对待作家、科学家总不能像对待潜伏的间谍那样，由职业反谍人员来做他们的工作。现在，——他继续说道，——将有完全不同的做法。知识分子工作将由另外一些人来做，重点将首先放在防不愉快事件于未然。

我当时鼓作勇气表示反对（一开始，我跟安德罗波夫争论问题还相当随便：他不久之前才离开中央机关，他还未感觉到自己已是“领导人”，我们之间的关系由于惯性作用仍然是相互信任的）。我说，第一，不明白克格勃为什么应该“做”知识分子“工作”。譬如说，它并没有“做”工人或农民的“工作”。不言而喻，假若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如同社会任何其他阶层的代表人物一样）走上犯罪道路，走上从事反革命阴谋、反苏活动的道路，那么这当然是克格勃应该管的事，除此以外，我认为，知识分子就压根儿应该由别的一些组织如苏共中央、创作协会等等来加以关注，而决不能由惩罚机关插手，不管是它的反谍机关或

是别的什么新的局都不行。第二，我对克格勃同仁的知识分子工作“专业化”，即他们的某一伙同仁将专门“从事”知识分子“工作”不感兴趣。他们难道不会走上高尔基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曾经描写过的沙皇制度“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宪兵军官们的道路？走上“本肯多夫分子”[①]的道路？我的比喻使安德罗波夫很为恼火，他反对我的说法，斥责我不了解现实，不懂得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的全部真相，说他的主张意味着向前进了一大步，是对坏的旧习的摒弃而决不是回到“宪兵”的工作方法中去。

我还对他提了一条疑问——专门局成立后，知识分子各种事件和问题将不是减少，而只会增加。其道理很简单：反谍机构管辖知识分子问题时，这终究不是它基本的、更不是它唯一的工作。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间谍。假若成立了专门局，这个局当然会想尽方法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当没有真正工作可干时，就会想出一些工作来干，这样就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

安德罗波夫对这些意见不屑一顾，说我对此一窍不通，说过些时候我会亲眼看到这一变革所带来的好处。

据我后来听说，也包括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听说，我得出了这么一种印象：他对这一新设立的局的工作十分投入。作为克格勃的一名“新门徒”，他对这个局的若干工作甚至着了迷。他过分相信这个局的以及其他局的同僚。而这个局的工作实际上绝非不伤人，它在克格勃的工作史上又增添了可耻的一页。发生了不少个人悲剧，国家的道德政治气氛恶化了。我国的形象在世界公众的心目中再次遭到了损失。

因而——我说及这一点是很痛心的——安德罗波夫对70年

---

① 本肯多夫是沙皇秘密警察头子，普希金和其他一些作家均曾受其欺压。——译注

代至80年代初发生的许多不公正事件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是应该负责的，这包括那些年代发生的非法政治逮捕，放逐国外或送进“精神病院”等等。其中不乏臭名昭著的事件，如迫害萨哈罗夫院士等。这些罪责无论如何是洗脱不掉的。虽然他也曾将个别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从灾难中救出，掩护他们免遭打击。

在安德罗波夫手下，特别是随着他政治威望的上升，他所领导的克格勃也令人瞩目地膨胀起来——这不仅从数量上表现出来，甚至也在莫斯科和外地所占的楼房以及在权力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中表现出来。当然据我所知，在那里工作的人们基本上已经与1937年或斯大林迫害的其他时期的工作人员不同了。然而不管怎么说，惩罚机关实力的这种增长速度是不正常的，对社会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我认为，安德罗波夫在扩张自己“帝国”之时，倒不是追求坏的目的，他并不想把我们的国家越发变成“警察国家”。这里更多是为了部门利益。对此，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也不保险不受沾染。但是客观上这不会有好的结果。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总想寻觅工作，找不到活干时就臆造出一些。如果说的是惩罚机关，那么后果就特别危险。

不是出于为他辩护，而是想客观地作些评述，我还想指出一点。尽管安德罗波夫在领导层或是在他领导的部门中享有威信，在勃列日涅夫患病期间，他也能够行使相当大的自主权，可以在“自己家中”即在克格勃内当家作主，但是他仍然并不感到自由自在。我已经写过，勃列日涅夫总是想方设法在克格勃的高级职位中安插与他关系密切的“自己人”，他们越过安德罗波夫直接向他报告工作，这就使安德罗波夫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有一个典型的事例。有一次安德罗波夫要我马上前去会面。他请我坐下后说道，他要给我看一张“纸条”，要我不对任何人提及，但想跟我交换看法。“纸条”乃是一封被暗中检查的信件的复印件。写信的人是我的一个熟悉的同志，安德罗波夫本人也

认识他，而且关系很好。信是在一种真诚的心态下写就的，它涉及的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还是作者的政治感受。例如信中写道，他不得不在委琐小人的手下工作，简直是白白浪费精力和时间。

安德罗波夫说，由于领导熟知此人，他应该将信呈报勃列日涅夫过目，勃列日涅夫肯定会认为信中指的就是自己。因而，他准备等待最坏的反应（后来果真应验了）。怎么办？

我试图劝阻：何必呈报此信，作者并未将“委琐小人”指名道姓，可以认为指的不是勃列日涅夫，而是别人。我们中间，包括信的作者不得不与之共事的人们中间，难道委琐小人和庸碌之辈还少吗？安德罗波夫说，你这种把戏骗不了谁。他指出：“我无法确信，此信复印件是否已经转给了勃列日涅夫。要知道克格勃是一个复杂的机关，它的主席也是处在别人监视之下。何况确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乐于在领导面前把我抹黑，说我有事隐瞒勃列日涅夫，而且是与其本人有关的事。”

谈话结束后我就告退，感受到内心的压抑——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哈哈镜般的世界中生活！笼罩我国最高层的政治道德风尚已被扭曲到什么程度！他们检查私人信件，并向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汇报这些信件！而这样做有时还不够，还精心地去监视那个听命领导人的对所有人实行监视的人！而这则小故事不过是真实情况外露出来的一小角罢了。安德罗波夫既然领导克格勃，当然不能摆脱这一机关中的最不体面的勾当，我感到，那些整日与政治、公务和个人关系的暗地内幕打交道，身不由己地要在肮脏的社会内衣中翻挖些什么的人，想要保全自身的干净谈何容易！

然而我也认为，假若在这一复杂时期（甚至可说是全面萧条的年代）把克格勃主席的职务交给另外一个人——当年政治地平线上的任何一个人的话，事情将朝着灾难更为深重的方向发展。

安德罗波夫在多年的克格勃任职期内也同时擢升到了国家的

最高政治领导层——他先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接着是政治局正式委员，而且是握有最大实力的政治局委员之一。这样，他当然不能不对国家的形势，即不断滑坡的形势负责。但我十分清楚这一时期的政治机制和社会氛围，因而不想对他的责任随便作一般性的评估。当时领导层中的风气是各人只管自己分管的事，切勿过问非你直接主管之事，与总书记发生争吵更属不识时务之举，因此作出评价时还是应该从具体情况出发。安德罗波夫在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确实作孽的大事就是阿富汗事件。

我曾不止一次地跟他讨论过阿富汗战争（很遗憾只是在开战之后），我有机会观察到他对战局变化所作的不同评估。但他从未对其积极参与错误决策作过评述，也并不认为有罪。期待他作此类反思是不现实的。但是，安德罗波夫对于战争进程及其可能的结局的看法却在发生变化。

我记得第一次跟他讨论这场战争是在 1980 年，当时他已意识到取得速胜已没有希望，但仍然坚信一年左右问题即可得到解决。一年半过去了，他对军方的批评越来越频繁——当时唱主角的有乌斯季诺夫手下门徒阿赫罗梅耶夫（因在阿富汗表现卓著，荣获元帅衔和苏联英雄勋章），瓦连尼科夫（1991 年 8 月政变的“英雄”），后来还有索科洛夫（1984 年曾短期任国防部长）。安德罗波夫批评他们指挥战争不力并卷入了政治。他认为他们以统治者的身份自居因而激怒了老百姓，使阿富汗的政治氛围越发地动荡不定。

又过去了一年，他开始提出政治解决阿富汗的问题，并愿意听取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利用最高当局的这一默许，尽我可能地帮助结束战争。我定期和巴基斯坦大使接触，有时也与巴基斯坦外长取得联系。我还跟伊朗的萨德鲁金·阿格哈·汗亲王建立了联系，他是 1925 年政变前统治伊朗的那个皇室的成员，与阿富汗的一些关键人物，包括亡命国外的反对派的若干领袖相交甚

深。

安德罗波夫从 1982 年 5 月回到苏共中央至勃列日涅夫去世这一短短时期中的工作，大概应该得到肯定的评价。

在安德罗波夫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之后，而且又是在第一把手重病的情况下，我想（当然他本人未曾对我谈过）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他不仅要对他为自己确定的狭义的任务，而且还要对党和国家的整个形势负责。何况在领导克格勃的许多年中他有机会不断接触有关情报，因而对国家面临的积重难返、问题成堆的负面形势，他大概要比别人清楚得多。

安德罗波夫一回到中央立即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我感到，当时他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是贪污腐化现象，它已深深地侵蚀我们社会的整个肌体。首先是各级领导人的贪污。有关勃列日涅夫家庭成员的事我从未从他那儿听说过什么，虽然西方对此已有报道。也许，他认为不该在当时对我讲及这些。但我记得他在当时的谈话中对梅杜诺夫和谢洛科夫一类人物特别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是领导层腐化堕落、怙恶不悛、恣意妄为的明显的象征，除此之外他们又与勃列日涅夫关系密切，使后者蒙受阴影。

在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安德罗波夫同样力图使情况恢复正常，显出生气，那几个月中我们曾频繁见面，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当时他并未策划任何戏剧性的变革，但是很明显，他立意制止日益活跃的新斯大林主义保守势力的进攻。

安德罗波夫调任新的工作后，对外政策方面的形势几乎没有变化。他在这一领域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实权。如同先前一样，他是对外交问题进行谋划直至决策的“三套马车”的成员之一，除他之外还有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

安德罗波夫在这一段时期中当然不可能做太多的事——从其调任新职到勃列日涅夫去世还不到半年。但党中央的局面终究开始有了变化。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感觉到了这一点。

那些见到了变化的人们开始对未来抱有较大的憧憬。这首先是因为第一次出现了除了契尔年科、格里申、吉洪诺夫之辈以外的现实的可供选择的人。

实质上这正是关键所在。安德罗波夫显然成了继任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名主要候选人。显然他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所有问题。这大概有助于他作好准备去担任一个强大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角色。①

1982 年 11 月，安德罗波夫生命中的最后时期开始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有可能对这位活动家为我国政治生活以至国家命运所作的贡献作出评估。

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忘却，在我们有理由称之为停滞的时期之后，决非立即开始改革，这中间有将近两年半的间隔时间，这段重要时间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安德罗波夫充当中央总书记的时期。我认为，这一时期对于后来发生的事件，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本身，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家知道，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总书记岗位上的时间很短，总共才 14 个月，假如扣除重病时间，则大概还不到半年。虽然实际做成的事为数并不多，这 14 个月终究是重要的时刻，它标志一潭死水的沉闷局面以及简直使人感到无止境的滑坡现象毕竟暂时停顿下来了。

全国人民都已经看到：第一，这个国家是可以由一个正常

---

① 1982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安德罗波夫已经是最有可能成为其继任者的人。但他终究还无法肯定这一切已有了保证。从以下事例我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我在奥地利得悉勃列日涅夫的死讯时，我于当夜立即被召回莫斯科，搭乘的是一架从布拉格飞往莫斯科半途返回布拉迪斯拉发的国防部的飞机。安德罗波夫把我召回是想在中央全会上能有更多他可信赖的人（我当时是中央委员，必要时可站出来发言）。——原注

的、值得信赖的、甚至不乏魅力的人来领导的；领导国家的已不再是一个残疾人，此人即使在最好岁月也无法显示出才华而是拙口笨舌，在其患病期间给人的印象简直是个对周围事物丧失分辨能力的人（他和他周围人物的个人品质更不用说了）。这一反差本身鼓舞了国家和人民，使他们萌发出不小的希望。

第二，安德罗波夫在他最初几次讲话中已经许诺要作出变革，要与贪污腐化、纪律松散以及全面混乱的状态进行斗争，已经提出目标要振兴国家、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他开始开诚布公地谈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这种做法人们已相当陌生了）。

第三，人们看到了可以当作更大规模变革先兆的某些实际事例。一些民愤较大的败类已被撤职（如梅杜诺夫、谢洛科夫），反对索贿受贿、侵吞公款的斗争方兴未艾；在反腐肃贪、整顿秩序和加强纪律方面都已开始行动起来（虽然有时发生了一些荒诞的做法，诸如像大肆"搜捕"那样去检查在上班时间到餐厅用餐或到影院看电影的人的证件。这些多半是地方当局出的点子）。

所有这一切在开头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就使安德罗波夫的名声大振。社会各阶层对他寄于厚望，这中间有工人、庄员、也有知识分子（安德罗波夫在这一阶层的声望很高，虽然知识分子在传统上对克格勃是存有戒意的）。人们普遍萌发了希望甚至信念：我们并非注定要在贫瘠的政治生活中无止境地苟且度日，我们可以获得更加美好的东西。

今天，8年之后，能否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希望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根有据的，假若安德罗波夫活得更久些，他的纲领将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把国家引向何方？这是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甚至经验丰富、老成练达的政治家，一旦当上了国家领袖之后也常常会有所变化，他有可能往这个或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取得成功并到达昨天还认为是高不可攀的顶峰；或者相反，使人们的希望落空，以碌碌无为告终。

但我还是想冒险地说一说与此有关的若干见解，即使不能回答这一问题的本身。例如，根据我的印象谈一谈安德罗波夫当时竭力想做些什么，他在党和国家最高位置上的最初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曾计划做些什么。

我已经说过，对于我国已经成熟或过于成熟的一些问题、毛病和症结，安德罗波夫要比别的领导人看得清楚（这并不是说对所有问题及其真相他已完全明察秋毫）。他在就任之初已经有了还在勃列日涅夫生前就考虑成熟的若干计划，它们当然远不限于整顿起码的秩序和纪律、惩罚最厚颜无耻的盗窃国库者。

根据某些谈话判断，他很理解社会还未从斯大林主义中恢复过来，在我们称之为停滞年代的岁月中又饱经失望和屈辱，社会渴求认真的改革和革新。但是安德罗波夫是个谨慎的政治家（这是生活教会他的），在我看来，他对迅速彻底的变革过于审慎。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干部问题：本应使党和国家及早从那些一无所长、而且常常是冥顽不化、愚昧无知同时又年老体衰、奄昏无力的人们的治理下摆脱出来。

在安德罗波夫当选总书记之初，有一天我和他就这一题目发生了争执。我说，除非彻底更换干部，否则将一事无成。而他只同意确有许多担任要职的工作人员是不称其职的，但又说暂时不能更换他们，因为不想有一个对自己敌视的中央委员会。而违反党章规定提前3年召开代表大会，或者在中央全会上将这号人物成批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如同勃列日涅夫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也认为要不得。我相信安德罗波夫不愿违反苏共党章，但我仍然不能肯定，这里的问题仅仅是由于他的一丝不苟的作风。我有一种印象，安德罗波夫不知道或看不见可用谁来替代他继承下来的旧人。他认为那些旧人中，许多人尽管弱，但他不仅了解他们，而且有亲切之感。我认为跟过去一样，干部政策仍然是安德罗波夫的主要弱点之一。安德罗波夫本人虽然跟这些人不一样，但他毕

竟是几十年来在当时典型的特权阶层中生活和成长的，我想他根本就无法设想必须大批地撤换他们。也如同以往一样，他更倾向于提拔几个接近自己的人，企图以此来补偿其余人的弱点并解决眼下的问题。可是现在他已不是在抓哪个部门，而是在抓全国的工作了，如果还想实行真正的改革的话，这样一条路线是决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除此之外，也还犯了一些具体错误，例如任用罗曼诺夫和阿里耶夫。当然这里我也不排除：过了一段时期之后，生活将迫使他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另外一种立场。

但是干部终究是工具，哪怕是十分重要的、决定能否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那么安德罗波夫究竟为自己提出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我相信，他看到国家的状况不仅在斯大林治下，而且在勃列日涅夫治下都不是正常的，应该进行认真的变革，应该从经济开始。然而这里埋伏了他的另一个弱项，我想只要他再活长一些时间，就会暴露出来。安德罗波夫对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感兴趣，他在这一领域的思维方式相当传统，他不敢过于超越诸如有必要整顿秩序、巩固纪律以及提高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作用等概念的范围。当然，假若命运和生命给予他更长的时间，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也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十分遗憾——我的惋惜之情不仅针对他的健康，而且也针对国家形势——历史并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来为我国的领袖们进行启蒙。

新的总书记在对外政策方面肯定有过自己的纲领。这方面他是个行家（诚然懂行有时也会成为接受新事物的障碍）。他并不怀疑国家的切身利益需要争取和平、缓和紧张局势、发展互利关系，这一点我很了解，虽然他并不完全清楚通往这些目标的道路何在。原因之一是他并没有彻底弄明白，我国自己的政策该对国际形势的紧张承担多大的责任。

他最理解甚至有亲身体验的是我国与社会主义大家庭（我沿

用了当时的名称）国家的关系问题。据我所见，他的思想在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已经成熟。也许，波兰事件和我国在阿富汗的失利（对此他、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负有特殊责任）对他产生了影响。我国在 1983 年 1 月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华约组织与北约签署不使用武力条约。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条约专门商定双方都承担以下义务：第一（我在此强调是第一），对属于本集团的任何国家不使用武力；第二，对对立集团国家不使用武力；第三，对任何第三国不使用武力。我认为这一建议反映出安德罗波夫思想上已经成熟的新概念，标志他与长期困扰他的“匈牙利综合症”（对此我已作过叙述）的决裂，同样，当然也是与全世界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实践的决裂。

不幸的是，无论美国或整个西方对此建议都未给予充分注意，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宣传罢了。但是，当里根政府已在掀起狂暴的反苏情绪之际，你又能期待美国作些什么呢？

中国发生的变化为我国与这一国家的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契机，这一点安德罗波夫也看到了。他以总书记身份发表的最早的讲话中声明了这层意思（坦率地说，这是我建议他这样做的，如同我曾向勃列日涅夫建议过的那样。因为我认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已落后于时代，是荒唐和滑稽的）。

至于与美国和整个西方的关系，他当然赞成缓和并主张同这些国家改善关系。但他对里根当政时期能否在这一方面达成什么心存疑虑。美国当局借南韩 007 班机悲剧掀起强烈的反苏浪潮之后，这点疑虑就凝固成某种肯定的判断了。

我并不认为安德罗波夫能背离所有旧的教条沿着通向健全思维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如同后来新政治思维所达到的那样。然而有必要对我国僵化了的政治立场（对此安德罗波夫本人也曾作过贡献）作某些变更，迈出向前走的步伐，这一点安德罗波夫已经

意识到了。安德罗波夫尽管与乌斯季诺夫的个人关系很好，但对我国的军事纲领以及国防部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心存疑问。我想只要他活得再长些，我国在裁军谈判上的立场就会有所改变，虽然也许不会像后来改革时期那般彻底。对某些军事活动家他也怀有某种政治上的不信任感（或者是对其缺乏把握）。属于这号人物的有奥加尔科夫。有一次他与别人电话交谈时我正好在场，他称奥加尔科夫为“拿破仑主义者”（我要向读者提醒，安德罗波夫逝世后不久此人的总参谋长职务被撤）。①

至于内政方面，就我看来，安德罗波夫还是很想在社会政治领域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在这一领域他的自我感觉较之在经济领域更有信心。根据谈话以及后来获悉的其他有关材料，他认为有必要发扬民主（他表述的思想虽然现在看来非常肤浅，但在当时应该算是勇敢的）。国内的民族关系状况也很使他不安。看来他在克格勃工作时期已经比别人更清楚地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安德罗波夫也把改善领导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恢复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合作当成是重要任务。然而这些计划尚处在酝酿阶段，而且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进程。因为党政机关中的内部事务总是转移安德罗波夫的注意力，而来自各方面（首先是来自右翼）的压力也不断向他袭来，他并不总能顶住这些压力，也许，有时也并不想要顶住。

我比较明白这一切是在后来，当我和安德罗波夫发生一场冲突之后。这场冲突是在 1982 年 12 月底发生的，其原因，准确一

---

① 后来我想，也许是乌斯季诺夫挑拨安德罗波夫来反对奥加尔科夫。乌斯季诺夫对奥加尔科夫的自行其是和自命不凡明显表示不满。因而他置我国军事建设的传统于不顾，坚持给担任代理总参谋长的阿赫罗梅耶夫授予元帅衔。据我所知，当时许多将军对此都甚为不满。然而这却使乌斯季诺夫得以在 1984 年让阿赫罗梅耶夫接替奥加尔科夫。奥加尔科夫的观点在我看来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害的，在他的怂恿下我国的军队编制和国防开支不断增长。——原注

点说是其借口，是我报给安德罗波夫的一个书面材料。他当天没有事先通知我家就由一名内部通讯员把材料给退了回来（我感到庆幸的是妻子正好外出，否则一名克格勃军官突然出现会把她吓一跳。有关冲突的事我是在几年之后才告诉她的）。安德罗波夫附上了气势汹汹的回复，它实际上破坏了我们之间多年的同志关系。有鉴于此，我认为有权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一经过。

我在材料中给安德罗波夫写了些什么？

我首先写道，在他过问下对苏共中央机关文化部以及一些出版社和编辑部作出的任命使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大为失望。“与此同时，”我写道，“在剧院刮起一股禁演之风，其中有不少剧本是过去已经批准了的（此风波及到讽刺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剧院、自不用说还有塔甘卡剧院）。人们据此已在使用一个谚语：你看，又是一个尤里节！（意即真是失望已极！）”接着我劝说安德罗波夫“在您还未来得及干预这一领域之前制止某些同志蛮干下去。”

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人企图把我国经济科学推向斯大

林经典式的教条主义老路上去。[①]

安德罗波夫在回复中责骂我使用"惊人无礼和不客观"的语调，"蓄意训人"而不顾客观事实，总之，不是"您我可以用来交谈的那种语调"（使我奇怪和警惕的是，大概从1964年以来他第一次对我以"您"相称）。至于我所提出的那些实质性问题，他否定在文化领域将采取压制手段的一切说法，[②]他也不准备抽出时间去核实我国经济学界的状况。

"我不清楚沃尔科夫同志能在那儿'教诲'些什么"，他给我写道。"但即便相信你所写的是事实，也不必大惊小怪。应该在

---

① 我在材料中介绍了近期以来苏共中央科学部经济科学组组长M、И沃尔科夫在一些规模较大的研究所所作的"指示性"讲座。我写道："沃尔科夫在讲座中教诲人们的主旨乃是，一切灾难在于过于投入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对经营机制和管理等问题过于重视。应该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其对象和方法，总的规律，所有制形式等等。沃尔科夫在其所到之处无不称颂1951年的经济学讨论及其相关的斯大林著作术创作和社会效益的范例（真正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斯大林的这一著作是其作品中最不成功、最脱离生活实际的一部）。沃尔科夫同志还说了许多别的废话。许多听众反映，整个精神充塞教条主义和繁琐哲学。人们对这一讲座的理解是，与经济科学应该接近实际、科学应该帮助解决最尖端复杂的经济问题的指示唱反调。这一讲座的记录稿保存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博戈莫洛夫那里，可以让您的助理索要。由此引发的不满之音噪声很大，人们又一次疑惑不解，究竟又要转向何方。这一次表示不解的不只是文艺工作者，而且还有一批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人们也在揣测预定召开的经济学会议是否要对许多学者打棍子以加强教条主义的阵地。一句话，形成一种印象，一桩很糟糕也很不诚实的事正在策划之中。"——原注

② 安德罗波夫针对我所说的最近以来莫斯科三家剧院停止上演几个剧本从而引发公众不满一事写道："我已查清这一问题的实情，因此可以告知，普卢切克打算在讽刺剧院上演的那出戏（指И·埃德曼的《自杀》，目前已顺当地成为我国剧院公演的剧目之——作者）早在1932年就被认定为反苏性质，其内容原封未动至今。原则上我与柳比莫夫同志相处甚好，但我从未给他或者给您开过有关支持他的任何剧本的支票。剧本《看，谁来了》在马雅可夫斯基剧院并未禁演，只是暂停演出进行加工，而且，剧院的总导演冈察洛夫完全同意人们提出的修改意见。这大概就是一些早先批准的剧本现在又遭禁演。讽刺剧院那出戏是今年夏天禁演的，这跟'又是一个尤里节'根本无缘。《鲍里斯·戈杜诺夫》一剧并未在莫斯科大剧院遭禁，它正在排练之中（呜呼，《鲍里斯·戈杜诺夫》是在1989年才首演的！——作者）。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管理局提出了一些意见，这本是它职权范围之内的事"。——原注

他犯错误的地方帮助他改正，仅此而已”（给我写这些意见的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明明知道党中央机关与知识分子的隶属关系！——作者）。“你在材料中指出，”他继续写道，“由此引发的不满之音噪声很大，人们又一次疑惑不解，究意又要转向何方……预定召开的经济学会议是否要……打棍子……这样的说法有何根据？难道最近中央打了谁的棍子？当然那些闲着无事可做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胡乱揣测。”我认为这种说法也很不公正。别人且不说，安德罗波夫应该知道，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员是可以毁掉人们命运，甚至是整个学派的命运的。

但对我来说最关键的还是写在末尾的一段话：“我之所以写这些，为的是让您明白，您的诸如此类的材料对我毫无用处。因为它们缺乏事实根据，多半是无中生有。最重要的是它们无助于形成正确的实际的结论。”我懂得，这封信的用意不是试图帮我改正错误（要是这样，我在任何场合都愿意接受），而是发表某种“宣言”，宣布结束我们之间过去的那种关系。而且他不是采用口头的方式（即使打个电话也好），而是采用文字的方式“记录在案”。

这是决裂，是一场严重的冲突。它使我十分气愤，也很惊愕。事情在于，我在材料中所用的语气以及提出的那些问题本身，丝毫也无异于我们平常谈话以及我不时给他报送的材料。20多年的交往使我习惯于不拘礼俗，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太在乎采用什么形式。而这从未引起过愤怒。我反复研究材料，当天晚上得出的结论是，可以有两点责怪自己的地方。第一，材料中引用了一句谚语“你看，又是一个尤里节”可能过于刺耳，何况这里提及剧本《鲍里斯·戈杜诺夫》，安德罗波夫可以认为，我是故意在作某些历史对比，虽即我本意并非如此。第二，也许我不该忽视：从前的安德罗波夫既然已经成了党和国家的第一号领袖，因而也就成了另外一个不同于从前的安德罗波夫，他起码要求别

人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对待他。虽然我很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认为他是一位聪明的伟大人物，不可能被权力冲昏头脑，以至突然向我公开泄愤。

我立即打电话给鲍文——这是我唯一能够向其展示这两个材料并与之商量的人。我们在克鲁泡特金无轨电车站见了面，当时正下着雨，我用手掩挡材料，在街灯下把信念给他听。鲍文对安德罗波夫也相知甚深，他同意我的看法，即问题不是出在我的材料本身，至少不单单在于我的材料。安德罗波夫多半是利用这份报告作为借口，以便实现其某种预谋——“拉开距离”，把我推开。鲍文也同意：我既不必表示歉意，也不必前去解释，不必企求化解误会，只有一件事可做——接受并理解捎来的信息：“请别碍事!”真的才过了几天，安德罗波夫与鲍文之间由于某件事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这更使我确信：材料只是借口而已。

真正的原因何在？我当然不止一次思考此事。我越来越倾向于这么一种判断：领导层中的若干代表人物诸如齐米亚宁、乌斯季诺夫，也许还有契尔年科（不排除还有安德罗波夫周围的人物）企图切断新的领导人藉以得到独立的、有别于官方立场的各种意见和评价的渠道和联系。我被告知：已经有人放出空气，当然也已经有人将其殷勤地报呈了安德罗波夫：一些从前与他共事的人（其中也有我）正在散布说与总书记有老交情，企图以此积攒政治资本。

当然，问题仍然没有解答清楚。作为多年至交挚友的安德罗波夫本人，怎么能够相信这样的胡说？我认为答案首先应该是，安德罗波夫本来就有爱听流言的毛病，有时甚至信以为真。他不愿损害与搬弄是非者的关系，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者。答案之二是疾病。安德罗波夫已经病得很厉害，这常常影响他的判断能力。疾病的作用使安德罗波夫无法完全控制自己。下面一些事情使我确信这一点。

1月份的一次招待会上，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一个与我很要好的同志、有名的翻译B·苏霍德列夫把我叫到一旁。据他说，齐米亚宁的儿子与他一个办公室，曾经告诉大家，安德罗波夫“剥了阿尔巴托夫的皮”，因为此人干预文艺界事务，安德罗波夫还跟他吵了起来。除了疾病原因之外，我无法解释他对齐米亚宁的这种坦诚态度，他对后者有许多不赞成的意见，并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我也无法解释这一坦诚态度所折射出来的背叛。稍后，安德罗波夫竟然又相信一个人的告发，说我对前来莫斯科访问的美国人说了些不该说的有关领导层的话。于是竟委托他克格勃的继任者向我转达了意见。这种做法，除了疾病原因外，我无法找到别的什么缘由可以解释，因为毕竟我们的关系已有很长历史，而且建立了相互的信任感。至少他得悉告发后完全可以问我发生了什么——他可以通过任何一位助理问我，不必非要惊动克格勃主席。

又过了几个月，1983年5月间，安德罗波夫忽然给我打电话祝贺我的60岁生日。虽然话语不多，近乎客套，但我却感到他毕竟也是心绪很乱，如同我一样。我不能不想：也许现在这个时刻此人正是非常需要正常的工作关系，然而我们却彼此反目和争吵。

过了不久，大约7月份或8月初，我们终于又重归于好了。一天戈尔巴乔夫给我打来了电话（他知道我们吵架的事），他用愉快的声调说：“快给安德罗波夫去个电话，他想见你。然后请来我这里一下。”我照办了，当天就与安德罗波夫会见。这是一次充满温情的、使我深深感动的会见，虽然我们彼此也使用了一些尖刻的字眼。此外我们也谈及了业务上的事情。当时安德罗波夫病情稍有好转，他开始认真思考内政外交的今后一些步骤。

在谈论这些问题的一次会晤中，他委托我为撰写一个关于我们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和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谈话准备一份材料。

也就在那几天，鲍文也得到了有关民族问题的类似任务。不排除其他一些人也得到了类似任务。总的来说此人的思维又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方向正确。给人的印象是，他终于摆脱最初“具体而微”的构想，准备提出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不久我给他寄去了一个材料。过些时候他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他说读了之后对其中不少地方颇感兴趣，希望很快就能与我讨论，并将就我的建议采取行动。但是，这终究成了一个未竟的心愿，不久安德罗波夫又病倒了，而且再也没有回到工作中来……

他去世之后，一位保管其个人工作文件的助理将那份材料退还了我。我注意到他在材料上划了记号的一些地方。看来那是引起了他的兴趣、是他认为应该抓的一些问题。

更恰当地说，那是一些使他也为之所动的想法，他想要这样或者那样地在政策中予以体现。例如，他把以下一段评述划出来了：时至今日，即革命 66 年之后，“已经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候，”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和道义方面“仍然被当作是社会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中排名最后、最缺乏固有性质和重要意义的那个部分。”

“当然，”我在材料中继续写道，“通常在讲到工人阶级和农民之后也从正面提一下知识分子。然而在提到知识分子的时候总是带有某种从宽处理或甚至有所保留的味道，有时是拍拍肩膀予以鼓励；有时则还要数落几句。而当官员们‘在自己圈内’交谈时，他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几乎仍然是个贬义词。”下面一段也被划出来了：“现在，对于问题的这种教条主义表述做出若干改动不知有无必要、有无意义。例如，也许可以不放弃承认工人阶级的特殊作用，但要写明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都享有全权，他们同样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写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多半带有历史的和哲学的性质，而今天则更带有职业的性质，这

些并不影响他们在社会上的政治社会地位……”我在材料中指出人们也许以为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而且跟生活实际相距甚远，同时又写道：“我也并不认为由于把工人和农民排名在先，大声地说些关于他们的好话，强调苏维埃中有许多他们的代表等等，他们就会得到很大满足……”

接着被划出的一段涉及把什么人吸收到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所谓的“新措施”，据我所知其倡议者是利加乔夫。此人在安德罗波夫治下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党务组织和干部工作。我写道，“不久前曾通过了一个决议，规定不得吸收过去未曾脱产从事过党务工作的人到党中央机关工作。这样就自动地把国际问题专家、学者、科学家、记者、文艺工作者、经济领导人、医师和教师等都排除在党中央机关之外了。这实际上是要形成一种官僚宗派主义。一旦共和国和州委都遵循这一决议作出自己的安排，党的各级机关很快将完全由以下一些人组成：他们有的从小就选择官宦之途并渴望成为‘领导’，当上首长，有的大学毕业之后或在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中就进入机关（通常最先进入共青团的区委机关），在机关中成长并逐级升迁。我认为，把在党的机关从事工作看成是达到某种‘贵族生活’的途径，那是十分危险的……这是一个比知识分子问题更为广泛的问题，但它与知识分子有联系。我认为，我们在60年代把一些科学工作者、学者、记者和外交工作者调到党中央国际部和其他一些部工作，这一做法没有造成任何坏处。也许，请他们到其他领域中去试试，看看他们表现如何，例如去试一试州委书记或者州委某部部长的工作，或去负责某项经济工作等，不是同样会有意义吗？”

根据他在页边划出的记号判断，安德罗波夫对于有关“创作知识分子与领导的关系”的一些段落也很感兴趣。

我从已经确立的所谓传统的文艺领导原则和方法说起，指出我们在这方面的遗产应该说并不轻松，但我们对此还未认真研

究。我指的也包括理论。例如可以从文学党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自由等等一些重要原则说起。毋庸争辩，有关这些原则以及其他类似问题写了不少，但通常都是赞扬形形色色的现实政策，其中有的是极其错误的，后来遭到了批判……

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实际问题，其一是，有必要明确：在文化艺术方面，除了实行政治思想领导之外不应该采取更多的手段，而政治监督的准则本身，看来也不能规定过死。

其二是领导方法。这里必须使用说服的方法，而且应该是有礼貌地使用这些方法（接着被划出的还有附注，内容如下："负面例子之一——今夏在《接班人》杂志上发表历史学家 H·H、雅科夫列夫撰写的一篇涉及萨哈罗夫院士个人生活以至邦纳[1]个人的隐私的放肆的文章"），要求领导者通晓业务而且对讨论的内容相当熟悉。与此有关的是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问题。这个机关无权参与党对文艺的领导。它的本职工作是杜绝反革命和色情的出版物，禁止泄漏国家机密，就此而已。

一些有关领导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更加具体的观点也被划出来了。其中如：有必要"进行对话、安排正常的有系统的交流（但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为了对知识分子狠狠批评，也不要像斯大林那样只是为了做做样子，装点门面）。这种交流不应该是半导体式的即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的。领导可以向知识分子的精华通报他们需要知道的问题，同时也要十分关注地倾听他们的意见。还有一点：我们国家的天才为数众多，但无疑有几名是伟大的文化泰斗，那就是 И·艾特马托夫、С·里希特、Г·托夫斯托诺戈夫、Е·穆拉文斯基。他们应该受到特殊的保护和照顾，并免受侮辱。甚至斯大林也有这样一个圈子，他同圈子里的人保持联系，装作看不见他们的过错，更不用说对上报给他的有关这些人

---

① 萨哈罗夫的夫人。——译注

的告密材料持不理会的态度。”

有关教师和医师等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所遭遇的巨大生活困难问题也引起了安德罗波夫的注意。我写道，把他们的工资提高10—15%于事无补，应该采取某种更为广泛更为彻底的办法。他在这段话旁边也做了记号。

我还写道：“看来在这两个领域（即教育和保健）进行深入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需要某种‘工业化’，也许还是某种科技革命。例如，借助现代电子学和通讯设备，请国家优秀教师去从事定点的示范教学，甚至培训别的教师（在医学界可更广泛地推广这一培训方法）。再加上教学大纲的彻底完善，教师的劳动及其工作负担将减轻（也许，这将使他们有可能在工资尚未提高到像样的水平之前去理直气壮地多挣些钱）。在保健方面（这一段落又被安德罗波夫划出来了），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那么不妨允许那些工资收入较富裕的病人根据条件支付部分合法的医疗劳务费以取代目前实际上通行的那种送钱送礼的丑陋做法。”

安德罗波夫也注意到了以下一点：“可以归拢到教师和医师这支大军的还有为数众多的工程师队伍。当然工程师们有自己的特点，但有一点是相通的：无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还是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都有许多地方不符合工程师这一崇高称号。看来给他们的报酬太少，作为回报，他们也不愿多干，而且情况比较严重。也许，也值得与专家们讨论一下这一题目。”[①]

我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安德罗波夫假如活得长些，他会设法拓展这些思想的某些方面并作出若干政治决定。当然我也无法肯定，当遇到严重抵抗之际，他会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性而毫不

---

① 我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材料，首先是因为，就我所知，它是为数不多的，即便是间接的，关于安德罗波夫在任职党和国家领袖的短短时期中经过考虑的政治计划的物证之一。——原注

动摇。

我感到，对于这位卓尔不群，甚至悟性超众、不乏政治才干的人物来说，是命运捉弄了他，使他“事业无成”。其中也包括“因循坐误”在第二号位置之上。他也许为时已晚，是在“受尽煎熬”之后才成为政治领袖的。长期笼罩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风尚又使他在走上领袖岗位之际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

留给安德罗波夫的时间显然不多了。1984 年 1 月初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们一组人按照他的委托，起草一份预定在 2 月份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时用的传统的讲演稿。当时设想这份讲稿或由别人在选举人集会上宣读，或由他本人在电视摄像机前面宣读，假若他的健康状况允许的话。

安德罗波夫的一名助理有一天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由于讲演稿的某些问题，安德罗波夫要我到医院与他会见。

在病房中他不知为什么坐在带有头托的牙科专用椅上，样子看起来十分可怕。我终于明白，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说的不多，而我则窘迫万分，有点不知所措。为了不出现令人痛苦的冷场，我于是不断地跟他说些什么。临别的时候他向我探过身来，我们拥抱了。从病房出来之后我就明白，他之所以要我前去是为了诀别。事后我得知，这些天来他还同某些熟悉的、长期共事过的人们进行了会见。

几个星期之后，安德罗波夫与世长辞。

对于安德罗波夫的逝世，我们大部分人，据我所见，都出自内心地感到悲痛。他的上台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希望，而他的过早去世则给人们留下疑惑和失望。当契尔年科成为他的继承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了。

在简短说及契尔年科之前，还是想对安德罗波夫的政治活动作某些小结。

我已经说及他的正面和负面、好的和坏的、白的和黑的诸多

方面。但能否有一个总的结论？我想，他终究还是个正面人物。这是改革到来之前的序幕和序曲。安德罗波夫走上岗位后，国家开始觉醒，开始从停滞年代所处的政治休眠状态中走了出来。

濒死状态

改革的进程本应该在安德罗波夫去世之后立即开始。我听说在他逝世之前不久，曾与乌斯季诺夫作过一次长时间的会晤。乌斯季诺夫在当时是个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人物，无论按其脾性（对待下属说一不二甚至蛮横无礼是大多数“斯大林部长”的特征，来自国防工业部门的部长更是如此）还是根据他手下有许多个师来说都是如此。葛罗米柯本人性格刚强，但在他面前几乎总是怯生生的，当时政治局其他成员也是如此。因而关于继任人问题的最后发言权大概非乌斯季诺夫莫属。我认为安德罗波夫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一问题（虽然我没有证实此事的材料），而且我敢肯定安德罗波夫不可能推荐契尔年科，他很可能是提名戈尔巴乔夫。

为什么乌斯季诺夫不肯听从这一劝告，甚至也不愿听从医生的意见呢？（当我在从红场契尔年科葬礼结束后回来的路上，时任卫生部“第四局”局长、负责为领导人治病的恰佐夫曾向我发誓说，他一年前就曾给政治局委员们发出警告，契尔年科病入膏肓，已丧失工作能力，将不久于人世，因而不能让他担任领袖之职）。我想他是出于非常自私的动机：他自己已是个年老多病的人（乌斯季诺夫半年之后去世），大概害怕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

夫，他感到与奄奄一息的契尔年科共事会舒服一些。[①]别的某些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这再次暴露在我国形成的政治机制以及整个斯大林极权主义遗产已可谓黔驴技穷，是它们为多种意外和荒诞事件的产生大开绿灯。

契尔年科何许人也？总的来说要回答这一问题大可不必去详尽考察他本人的工作情况，或是对其活动进行认真仔细的研究。有关契尔年科的一切都已历历在目，是完全透明的。

当上领袖的是一名职业办公人员，一名中等水平的官僚，而不是一位政治家。他的真正最高能耐就是当苏共中央总务部副部长，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办公厅主任。虽然他作为个人甚至还是个正人君子，但作为领导人则不可能期望他有所作为。而他却能带来许多灾祸，如果他活的时间更长、身体稍稍健康一些的话。健康因素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在于他本人亲自可以做得更多，而首先在于他四周的幕僚们将会认真对待他，害怕他，听从他，努力投其所好，在日益逼近的变革面前无动于衷。

事实上谁都明白，他的统治将为期很短，带有过渡的性质。

---

① 刚刚不久之前这一猜测得到了证实。时任安德罗波夫助理的A·И·沃尔斯基1990年7月4日在答《文学报》记者问时说："记得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有一天政治局开会，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在我们面前往大厅走去。国防部长把手放在总理的肩膀上说：'柯斯嘉（指契尔年科——作者）要比此人来得随和……'""此人"指的就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伟大强国的领袖问题就这样决定了。

然而安德罗波夫心中的继任人是戈尔巴乔夫。可以举出一事说明这一点。沃尔斯基在《星期》周刊（1990年30期第7页）访谈录中曾有一段描述，内容如下：安德罗波夫去世前不久，在其分发给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备妄录中曾有下面一段话："同志们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由于你们知道的原因，我不能在此时此刻积极参予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工作……我认为有必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这可能是持续已久的时期的最后时刻。有鉴于此，我想请求中央全会审议此事并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工作交付给戈尔巴乔夫同志。"这实际上就是他就继任人选所作的建议。然而根据沃尔斯基的说法，这一段话被契尔年科、吉洪诺夫、乌斯季诺夫三人集团从分发给中央委员的备忘录中删除了。据沃尔斯基说，这一行径使安德罗波夫十分生气。——原注

一批人由此得出结论，应该在这一时期内以最小的损失，尽可能多地为已经在国内成熟甚至过于成熟的重大变革作好准备。戈尔巴乔夫无疑是这批人当中的一个。他实际上已成为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这一点很容易识别，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由他主持的，当总书记缺席时，政治局会议（契尔年科因病几乎未曾出席过）也由他主持。他工作认真负责，尽其所能地使已经生锈的国家管理机器转动起来。在对待患病的总书记方面，他也表现出顺从和忠诚。

然而他在这一年当中，据我判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常常跟不同知识领域的专家们会见，听取他们的意见，不时与之辩论，就内政外交的基本问题发表或订正自己的观点。只是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戈尔巴乔夫才表示有可能对外交政策问题公开表示兴趣。我想他的考虑是，一个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若有此种兴趣，就会被周围的人们当作是觊觎领导权。在安德罗波夫治下他已不再有这种顾忌，而在契尔年科治下出于需要已积极投身于国际事务。他率领议会代表团对加拿大的访问（1983 年），特别是对英国的访问（1984 年）成了他这些年代最令人瞩目的外交活动。

事实上，在上述的出访加拿大的准备过程中，我已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对外交政策很感兴趣。我们研究所奉命为议会代表团准备了材料，并将材料送至代表团团长那里。几天后戈尔巴乔夫让我前去见他。我问戈尔巴乔夫对材料是否满意时，他回答说，“很好。但尽是些农业问题，而我对那个领域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介绍外交政策，请提供些这方面的有关材料。”我把这一要求当作是一个信号。从此不再忘记戈尔巴乔夫对这一课题的不断增长的兴趣。1984 年 12 月访问英国之前，

我也按他的要求提供了若干材料。[1]这次访问后，全世界不仅把他当作是最有可能成为下届领袖的人，而且也把他看成是有希望就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与之打交道的苏联国务活动家。

在契尔年科当政的停滞和濒死的日子里，戈尔巴乔夫的周围逐渐集合了一批人，他们支持革新思想和后来称之为改革的许多政策。

领导的基本组成部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们，依我所见，在这一时期都一声不响地处于等待状态。它的尽头就是日益临近的契尔年科生命的终止。这一点已不引起怀疑。然而他们中间还是有许多人宁愿“过老日子”，在日常事务中磨蹭，有时还搞点诡谲把戏，然而这些把戏在即将来临的急剧变革面前已显得分文不值。

根据听到的传闻，有些人虽没有任何底子可言，却也玩弄名堂企求当上病危的领导人的继任人，正如人们说的忙着为自己量裁“银鼠皮的斗篷”[2]。然而难道有理由去严厉地责怪他们吗？实际上每个人——格里申、罗曼诺夫、葛罗米柯——都可以对自己说，我有哪些不如契尔年科？这样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于是

---

① 在出访前一个星期光景，他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前去见他。我抵达后他交给我准备在英国散发的讲稿的打字稿，让我提意见。我说我本愿效劳，但我将在三日之内动身去美国。他很失望地说道：“真糟糕。”言下之意是希望我能推迟出发日期。我说我不能推迟出发，但我会想办法无论如何在第二天就完成任务。我就戈尔巴乔夫给我的稿子写下了我的意见。我当时读了非常反感：讲稿的作者们想要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最近的访英和里根把他的反苏讲话在议会散发作出“报复”。我写道，里根此举不够检点，但这不能成为理由以同样不够检点和不够得体的做法去加以还击。试想，假若美国一名政治家访问我们的一个盟国并在那里散发了反苏讲演，戈尔巴乔夫将如何反应呢？为何要将撒切尔夫人推向尴尬的境地呢？因而我建议：停止任何反美出击，以面向未来的观点进行建设性的接触。同时我也为他提供了几页文字，作为在英国讲演的备用材料。很明显，所有这些成功地纠正了戈尔巴乔夫的某些认识。后来他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了下去。当我回到莫斯科后，他邀我前去看他，特地向我致谢。——原注

② 俄国沙皇穿的斗篷。——译注

也就成了街头巷议的话题，它对社会气氛起到了很坏影响。

忆及当时局势，我认为可以将其称之为极度萧条衰退时期。其象征是1985年3月初两度在电视屏幕上播出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契尔年科在别人搀扶下踉踉跄跄来到电视摄像机前面的情景。据我所知，此举的倡议者是格里申本人，或者是莫斯科市委，而决不是苏共中央书记处，至少戈尔巴乔夫不知此事。第一次播出后，我向戈尔巴乔夫说了自己的厌恶感觉，而他什么也不知道，前一天晚上他没有看电视节目。这些镜头反复多次向全世界作了电视转播。显然，对我国不友好的人士是很乐于看到我们国家处于衰退甚至濒死状态的这一类证明的。

好像所有人都目睹了不可救药的局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一时刻竟还有人在契尔年科身上押宝，我敢说是在他病骨支离的身上寄托自己沽名钓誉或者是平步青云的愿望。但确实有这样的人。其中我首先想指出Р·И·科索拉波夫——时任《共产党人》杂志主编，此前曾长期在苏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不知为什么契尔年科无限信任此人，把他当作是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直与他保持密切联系。与契尔年科一些助理和亲信们一起，他现在成了最接近领导的“理论家”和“思想家”。

他们干得很大胆，甚至带有挑战的味道。就其观点而言，科索拉波夫应该属于教条主义的（在引经据典方面他可谓满腹文章的读书人）斯大林主义者，而且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散布自己的这些观点。他利用苏共中央理论和政治刊物主编这一职务竭力这样做。我对这些毫不感到奇怪，因为这在当年甚至是很自然的事。匪夷所思的是他竟希望利用与契尔年科的接近来达到升迁，成为党的“主要”思想家并跻身于领导层。

这里，科索拉波夫和他的朋友们拼命赛跑。他们把主要赌注押在苏共27大上——根据党章，应在1986年初（2—3月份）

召开。但在1984年底至1985年初事情已经明朗化，即契尔年科肯定活不到这个时候了。于是在青年官迷们的压力下通过了将大会提前在1985年秋天举行的决议。1985年3月，以科索拉波夫为首的班子按规定应该到城外起草大会文件。但还未等到他们出城，死讯赶在前面来到了。只差两个星期光景……

为了结束这一话题，应该说明一下，科索拉波夫在改革年代已成了一名右翼保守反对派的思想家，这个派别美其名曰劳动人民联合阵线，由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工会领导层中的保守分子组成，企图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和右翼平民主义的口号吸引工人参加。这些口号并非仅仅是斯大林主义的，就其含义来看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

当我的回忆录的摘要在苏联刊物发表后，科索拉波夫和彼契涅夫（前契尔年科助理，在戈尔巴乔夫治下被解除政职）立即起来反击。科索拉波夫在一份小报上发表了3篇文章。这份小报以其放纵的文体和反动的、反犹太主义的倾向著称，它的旧名叫《莫斯科建筑工人报》，现名《治家格言》报（《治家格言》的刊名取自古代俄罗斯一本家长制治家规范汇编，在俄文中与《房屋建筑》一词同源）。科索拉波夫在文章中把我“狠批”了一通，从我的政治观点直到我的为人品行。与此同时他们还企图斥责我的“亲西方主义”。科索拉波夫指责我有“趋同倾向”，说我主张苏联与西方趋同。科索拉波夫还竟敢放肆地对我的半犹太血统进行暗讽。他断言勃列日涅夫出于温情常常叫我“西伯拉沙”——俄语中“亚伯拉罕”的爱称，通常作为“犹太”的同义词（附带说一句，就我记忆所及，勃列日涅夫从未这样叫过我。显然，科索拉波夫找不到更合适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反犹恶骂。）

彼契涅夫在他的回忆录（科索拉波夫文章发表后不久出版）中详细地反驳了我提及的事实，声明并不是他和科索拉波夫，而是党的领导改变了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彼契涅夫与科索拉波夫

大不一样，他并不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尽管他对我怀恨在心，仍然企图表示要力求客观。除了其他一些议论之外，他还提到阿尔巴托夫“起到了积极的，在我看来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良好的作用”。[1]

对我来说，契尔年科时期很不轻松。我认识他，总的来说并不感到他对我有什么恶意。然而契尔年科的那位亲戚沃尔科夫却把这种恶意向我表露得淋漓尽致。沃尔科夫仍是苏共中央科学部经济科学组组长。我在上面已经提及他曾积极参与向苏联科学院一些从事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研究所发起进攻（显然是在格里申和齐米亚宁的指挥下）。下一个迫害的目标之一根据判断将要轮到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

我个人也遭到袭击。有一天扎米亚京请我前去见他。他让我看一封我不认识的人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告发我崇拜里根(告发信所依据的事实是，我在一个苏联电视节目中曾半开玩笑地说：里根以其叫嚣战争、崇扬武力的演说吓唬了美国人民，从而支援了反核运动的发展，他应该荣获和平奖金——虽然不一定是诺贝尔奖)。齐米亚宁（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和扎米亚京得到领导指示，要求我说明自己的意思。

我当时十分气愤。难道他，还有领导，真的不懂幽默吗？怎么能够把一个完全不懂幽默的人所写的一封愚蠢信件拿来当真？扎米亚京听了我的话明显有点窘迫，但还是反复说明他只是按指示办事。

1984年春，目标对准我的挑衅及时来到。西德《明星》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契尔年科的文章，文章报道我曾经说过契尔年科是个文化不高的农民，无论如何也不适合他所身居的要职。事

---

① B·彼契涅夫：《戈尔巴乔夫——走向权力的顶峰》，莫斯科 1991 年版第 42 页。——原注

实上我压根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以“非贵族出身”来贬低人的做法根本与我的习惯无缘。我知道西德这本杂志在莫斯科的关系网，于是得出结论，这是某个对我不怀好意的苏联人士故意“喂给”德国人的假情报。而很快我就获悉，这一条假新闻早已有人向领导作了汇报，一时成了“政权走廊”上的热门话题。

此后不久我有机会拜访了戈尔巴乔夫并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戈尔巴乔夫说他已听说这件事，并说不必说服他相信这是谎言。“谁都能在阿尔巴托夫身上找些茬子，”他指出道。“因为他等于白痴，向外国记者说这么一些东西。”他答允跟契尔年科当面说一说，并建议我请求契尔年科接见。我这样做了（在 5 月份上半个月），而且很快就被接见。我在接待室等候了大约 20 分钟（看来这也不无好处，在那里来去走动的数十名机关人员看到了我然后又很快告诉了别人）。接着与契尔年科交谈了约 20—25 分钟。谈的是关于对美关系以及有必要制定更积极的太平洋地区的政策等工作问题。契尔年科一边听一边咳嗽，往医院用的“痰瓶”（记得在战时结核病院见过）吐痰。他十分友好，说他原则上同意我的建议，要我给中央报个材料。我照办了。然而在契尔年科生前没有听到有关这个材料的下文。说实在的我压根儿就没有等待结果。我的“个人问题”这时就算解决了，我在相当时期内得到了安宁。但是，整个政治形势却仍旧不仅沉闷，而且令人堪忧。

然而就在这时，一种观点开始成熟：国家不能再有一个契尔年科，不能再容忍一个有他同样思想和同样低下的智力和政治水平的人。虽然讨论哪位政治活动家可以担任下届领袖并不是我国的传统，但是我们国家已对领导人的缺乏鲜明形象、平庸而低微的人品感到如此厌倦，所以总书记继任人的问题已经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开始考虑。契尔年科寿终之际，占上风的意见是，唯一有资格候选领袖职务的是戈尔巴乔夫。

契尔年科死讯我是在美国旧金山听到的。我是随谢尔比茨基率领的议会代表团于早晨抵达那里的。当天晚上我们就打道回府了。当时大家脑海里只有一个问题，谁是继任人？代表团的组成及其随行人员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的政治倾向各不相同。例如有作家 В·В·卡尔波夫，也有老资格的机关工作者、当时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В·И·斯图加林，有乌克兰科学院院长 Б·Е·帕通、上将 Н·Я·契尔沃夫、国家银行行长 В·С·阿尔希莫夫、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观察员 В·С·佐林，以及最高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克格勃警卫人员等。但那天晚上（由西到东飞达纽约长达 5 个半小时之久）谁也没有在类似场合一般所表现的小心谨慎，也没有几十年来养成的恐惧心理。人们都大声说话，而且大家都一致同意：担任领袖一职的应该是戈尔巴乔夫，而且非他莫属。代表团中的 5 名中央委员甚至威胁道，如果不是这样，就要求在中央全会上发言。

在纽约（我们应该在那里下美国飞机然后搭乘我国飞机）迎候代表团的有美国国会代表，我国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以及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我们一走下舷梯，他们就附着我们耳朵说："中央全会已经召开了，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当时代表团立即欢欣雀跃起来。我跟同伴们半开玩笑地说："上机之前且别高兴，我们正处在国丧之中呢！"

怎样来评价契尔年科时期呢？这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大概在史册中不可能占据很多篇幅，一开始我的回答十分简单：在国家如此困难的时期中白白浪费了 13 个多月。后来我较为细心地对形势作了评估。也许，这 13 个月并非完全白白浪费，也许在停滞和在安德罗波夫治下进行的小小的抖动之后这 13 个月还正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日子终于使人们懂得，国家是多么需要变革和改革，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契尔年科现象"恰恰也是为改革准备了土壤。

十、研究所：我们如何“发现了”美国

苏联科学院决定建立美国研究所。当时的科学院副院长阿列克赛·鲁缅采夫找我去，要我担任研究所所长。我表示有兴趣。首先，我将有机会回到我年青时选择的领域美国研究中去。其次我也很想搞一项我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因为那年我已44岁了，对我来说开始这项工作已是相当晚了，不过那时我在自己的生涯中已为自己赢得了是一个有潜力的美国专家的声誉。我的专业是研究美国，撰写过有关美国的文章，我已完成有关题材的两篇论文：一篇是法学硕士论文，一篇是美国史博士论文。我也已开始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人权法案的，另一本是关于托马斯·佩恩的，虽然我还没有完成这些课题，因为我得花很多时间去完成其他任务，也许最重要的是，那时安德罗波夫离开了党中央。最可能接他班的是康斯坦丁·鲁萨科夫。我绝对肯定，我将无法同他一起工作。

我立即告诉鲁缅采夫我同意干，并问他建立研究所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他告诉我，已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是起因于领导上了解到美国有几十个研究苏联的研究所，而我们却没有一个研究美国的研究所。最后，由外交部和科学院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

告。正像当时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一样，此事也是由党的高层领导讨论决定的。①

几天后，科学院呈请党中央把我调到这个新研究所。但是，这项任命的决定却被拖了6个月之久。

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告诉我，他尚在犹豫，他简直无法决定。最后，在扎维多沃的一次通常的会议休息时，我问勃列日涅夫能不能单独同他谈一谈。他立刻猜想到我要谈什么，他咕哝着说："是不是又要调离党中央?"但是他没有拒绝和我谈，把我请进了他的套间。

在回答是否会放我走的问题时，勃列日涅夫说，"我认为，建立一个研究美国的研究所十分重要。要知道，美国有许多研究苏联的研究所。"可见这一论据对他也产生了印象。这像搞军备竞赛：如果美国有什么，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但是，这时安德罗波夫刚调离联络部，他的前任副部长托尔库诺夫最近调任《消息报》主编，布尔拉茨基甚至在这之前就走了，现在阿尔巴托夫也想走。这会不会削弱党中央的这个重要的处呢?"他接着说。我无法动摇他这一立场，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这一招看来对他很有说服力。我最后提出的理由是：无论如何我得走，因为我同新部长鲁萨科夫的关系不好。现在勃列日涅夫可以采用高抬贵手的方式让我走了。不然，我就得不愉快地，甚至闹着别扭离开。最后，他同意让我走，唯一条件是我必须先为他写完十月革命50周年的报告。

---

① 许多美国人曾问我建立我们研究所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领导上是计划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呢，还是预见到了同美国关系的恶化（美国在冷战时期开始给苏联研究提供大量资助）。

我能肯定地说，研究所的建立同任何政治计划都没有联系。毋宁说，这是对苏共20大早就引起的对外部世界的和对发展关于社会政治的学术研究的日益增长的兴趣的迟到的反应。——原注

1967年12月20日，我成了美国研究所的所长，而且在两周时间中是该所的唯一成员。美国研究终于成了我的专职工作。

我是否有条件做这项工作呢？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要是我受过的教育，我对严肃的政治和经济书籍的兴趣，以及我长期向往研究这个国家和它的政治。在准备当所长（我考虑了半年）的同时，我尽可能把有关从事政治研究的国际研究中心的所有资料都读了。此外，60年代初我还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了两年。我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几年，至少也了解制定政策的过程和机关工作的起码的原则。而且我还认识许多负责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尽管交往的密切程度各不相同。这一点也显得相当重要。同时我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之处。在此之前，美国研究还不是我的主要专业，我对美国的知识的深度和系统性都不够。我从未去过美国，我同美国没有接触，也不认识什么人，我的美国同行也不知道我这样一个专家，这一切开始时在美国同行中引起了好奇、疑惑，他们私下问我是不是克格勃的人。所以，我最初同美国人接触时，我得告诉他们我不是克格勃的人。

我同美国人缺乏接触和在美国缺乏熟人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克服。很快就开始了各种会见。我会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是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奈。他当时被认为是1968年总统选举中可能的候选人之一。1967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帕格沃希会议上我遇见了一组知名的美国学者，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他当时是哈佛大学的教授。1968年1月，我在我的十分简陋的公寓里接待了我认识的第一位著名的美国实业家、百万富翁伊顿。我夫人觉得十分尴尬：我们用什么招待他？我们的客人却表现得很和善和好心，他吃得津津有味，对饭菜很欣赏，询问菜是怎么做的，接着客人们接踵而来。

当然，我也认识了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汤姆森·桑普逊和他

的夫人，我觉得他们和蔼可亲，我对他们印象甚佳。我很感谢桑普逊大使，我觉得是他向他的美国同胞介绍了我是谁和我的研究所是干什么的。他的努力使我们同美国同行的联系和接触开始得到发展。[1]

比熟人和接触更难得到的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感觉，部分是理性的，部分是直觉的，这种感觉只有通过同美国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同政府与实业界代表的经常的专业性的接触才能获得。这种接触确实是我们开始了解美国很多问题的唯一途径。例如美国的政治机制是如何运作的，美国的权力中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美国公众是如何对种种发展变化作出反应的，所有这些又是如何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决策的，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逐渐懂得了不同的人的思维方法是不同的，于是我们就不再把我们的思维框框套用于别的社会。

同美国不同的是，我国的基础研究不是集中在大学里，而是集中在科学院里进行的。这个传统从 18 世纪初就存在，当时彼得大帝建立了俄国科学院。那时对各门学科都一视同仁——从数学和物理到哲学和语言学，包括对远东、非洲和美洲的经济、政治研究。

苏联科学院是一个知名学者的组织。不是很久以前，它只有数十名院士。当我是院士时，全院有 200 名院士，现在有 350 名院士。科学院设有 150 个研究所。

科学院主要从事研究工作，虽然它也培养研究生，评定博士学位和职称。研究成果通过著作、学术期刊、政策建议、经济建议等形式表现出来。各所的编制差别很大，小的仅几十人，大的有几千人。

---

① 我于 1969 年 1 月第一次访问美国，随即扩大了我在美国学术界、政界、实业界中结交的朋友的圈子。——原注

当我离开党中央的时候，许多机关干部无法理解我的做法，他们问：你干嘛要抛弃一个重要岗位而去做一项不熟悉的工作？但是我没有任何犹豫。首先，我看到这件工作是个机遇。一个人难得有机会去创建和发展一个新的研究所。而研究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国家（1975 年我加上了加拿大）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不仅要从事研究，而且要参与制定政策，甚至起草经济决定。

1991 年秋天，一位美国来访者问我："你作为一位成功的所长已工作了 24 年，你是非常知名的，这期间有没有人曾提议给你一个更高的职务，如驻美大使，或者到外交部去？"我坦白地告诉他：当多勃雷宁从驻美大使岗位上下来时，曾有人建议我去当大使，但是我拒绝了。我也不想去当外交部副部长，甚至部长，假如要我去当的话。

我会拒绝，不是因为我没有这种欲望，我的欲望是在另一个方面。它反映在我的研究所及其成就上。我不仅仅是为了做一阵所长，然后去谋一个更高职位的。我要建立一个我所梦想的那种研究所。我觉得这一点是达到了，因此我认为我是个幸福的人。

发展美国研究所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不仅仅是因为过去从未需要大量的这方面的专家，因此这方面的人才很少。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缺乏知识丰富和训练有素的人才的问题。我们的绝大多数专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我在内）和社会科学家被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和宣传，被已成为我们民族心理的组成部分的胆小怕事，被缺乏思想勇气和容易顺从所摧残、制服和变形。那时，我对我们社会意识的这些方面很反感，我认为真正的研究工作同这些障碍是不能相容的，我要尽可能去克服这些障碍。这样说也许显得很放肆，但这就是我要做的。但我不是去反对我们的制度和政策。我坦诚地讲，我甚至没有想过这样的策略。我只是对我国写的关于外交政策和别国的材料感到不满。我要表明，外交政策是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去执行的。我一直相信对制度进行改

革是可能的。

同时，我得一个一个地物色人员。我得说服他们到我这里来，启发他来进研究所。可选的人员少得真是可怜，所以我是直接由大学本科生中挑来的年青人中培养研究所的主要骨干的。

我们最早的科研项目是编写一些分析性材料和一本书：《美国政治人物志》。作为所长，我得建立和培训这个工作小组，同时指导研究工作。我要使新老人员团结起来，开创一种共同合作、自由讨论和刻苦思考的气氛，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繁荣的创造性工作。

我为取得这些初步的成果花了好多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我每夜都辗转思考，能不能把研究所办好。后来有人告诉我，勃列日涅夫曾说（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如果阿尔巴托夫办研究所办不出成绩，我们就调他回党中央。”我想，我果真将不光彩地回去吗？

若干年后，当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已办得较好的时候（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它），我常问自己，这样一批有独立研究精神的学者是如何能在刻着过去的极权主义伤疤的体制内部成长起来的呢？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不平常的。这样一个研究所在存在许多限制条件的情况下为何能够工作下去、取得发展并经常保持庄重的、有时是进步的政治立场的呢？

我完全没有担任一大批重要人员和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当然不是独立于社会条件和政治限度之外，而是独立于直接的政治控制）的管理者和领导人的经验。但是我曾在报刊、科学院和国家的主要政治司令部——党中央工作过。我也有一些国际经验，这些背景为我提供了弥补我的管理经验不足的可能。

我在研究和写作班子中的工作经验，从库西宁的写作班子开始，教会我懂得必须千方百计使人员发挥他们的潜力。

我们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是我真诚地懂得我们需要政治思维

中的新思想、新精神，我很希望我们的研究所成为一个自由思想的中心。再者，我很了解我们的政治游戏规则，可使研究所的工作同政策的形成过程保持一致，而不受现行权力机制的阻挠。同时我又不是这些规则的囚徒（部分地是因为我只在机关中工作了一个短时间，部分地也因为我本能抑制它)。是否变成一个囚徒，这是一条界限。如果越过了这条界限，变成了囚徒，那么政治策略就会变成无原则的政治，政治游戏将会变成目的本身。这样做研究所虽然也有可能取得成功，但不能持久。特别是如果政策和政治领导发生突然变化的话。

这就是说，我从 60 年代开始在为国家领导人工作时，我未曾向他们隐瞒我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有时导致我同他们的争论或者关系的冷淡，但是却使我保持了对自己的忠诚。研究所在所有政治变动时期都在它的活动中稳定地保持了这个方针。但即使如此，研究所有时仍成为恶毒攻击的一个目标，虽然幸运的是，这些攻击并没有给它造成太大的损伤。

我最初面临的两项主要任务就是：找钱，找地方，找办公设备。创造迅速培训合格人才的条件，同时提出把研究所办成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中心的新概念。我应承认，为了实现第一项任务，我使用了我同领导人的全部关系。我直接去找领导人，向他们提出问题和请求，甚至要求。在我为领导人工作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涉及研究所的问题上，我不怕向他们提出请求，特别是向葛罗米柯（后来我对他更了解了)、柯西金和他的副手马祖罗夫，也向苏斯洛夫和其他人。

我很坚持，因而收获不少。研究所人员的工资比一般人要高，我们得到了相当大的财政支持（包括拨给适当数量的外汇供出国和订购外国报刊图书之用)。还有，把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个一等秘书的职位也给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派人到纽约和华盛顿实习进修（后来其他研究所也这样做，得到了同

样的照顾)。

一个研究所的活动计划逐渐发展起来了。我也开始明确了研究所的概念和任务。

它将把纯理论的研究，把撰写书籍和文章同提出实际的政策建议和经济建议结合起来。这些工作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由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军事问题专家等共同进行的。这些活动是研究所的主要任务的一部分。我要求研究所在这方面要有发展。

第一，我要研究所打下就当前的对外政策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不仅仅是像我国常做的那样去搞些历史研究或搞些配合苏联外交的宣传性东西，而是要研究活生生的政策，并且要考虑政策的经济、军事、甚至心理等各个方面。也要让研究所为创建本国的政治学作出贡献。我认为，这一点还是做到了，在研究所的推动下，政治学这门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了，尽管在 70 年代只是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只是在改革年代，政治学才被承认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第二，我想让研究所开创真正的军事政策研究以帮助消除军队方面对军事政策、战略的政治方面和裁军问题研究的垄断。在这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于美国、落后于整个西方，竟致在进行越来越频繁的接触、讨论和对话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理解对方的立场，或者甚至不能向对方说明自己的立场。我们的专家们除只知道坚持一般宣传口径外，对我们在一些最重要的军事政策问题上的真正的立场却并不清楚，我为此感到害臊。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苏联专家们更不了解决策过程背后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制度下，这一切都是绝对保密的。因此，在我们的专家们开始研究这些问题时，在我们不仅要去掌握一些概念和术语，而且还要掌握一些问题的实质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得不依靠美国和西方的数据。顺便说说，这些资料常

常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可信，如果不是只依靠一个来源，而是了解每个来源的价值并加以比较的话。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困难，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不能增加对我们所作的结论的信任。但人们在学习，到了改革的年代，随着公开性的发展，当领导上缩小保密范围后，在很多问题上我们自己的数据也逐渐出现了。当我们有了自己的资料时，我们已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专家队伍。在这方面，美国研究所是一个先驱者，其后还有别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研究所，如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研究所也这样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帮代表着精密科学又很关心政治和裁军的学者也在这项研究工作中开始发挥非常显著的作用，比如，我可以举出 Е·И·韦利霍夫、Р·Э·萨格杰耶夫、В·И·戈利丹斯基、Б·В·劳申巴赫等院士的名字。

在改革年代，在我们这里涌现出来的非军事专家中，有些人就以非军事专家的身份参加了苏美高级会晤，另一些人则成了我国参加裁军谈判的代表团的顾问或成员。

第三，我还要研究所在某种程度上在我国经济观念领域、在如何认识科技进步作用方面成为“扰乱安宁者”。我要它对我们传统的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方法和对一些社会、政治、文化问题提出挑战。我要它成为建立在研究美国经验（也不仅是美国的经验）的基础上的专家知识的源泉。因此我认为，在所内建立应用研究组是重要的，以研究科技革命对社会的影响问题、农业和食品生产问题、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问题。

特别重要的是，研究所及其工作人员于 1968 年秋就提出报告，让当时的领导人、后来又让公众了解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世界规模和意义，了解苏联为新的科技革命的展开创造有利的条件、开辟广阔的天地的必要性。很遗憾，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由于那些年在我们社会中所形成的形势，这些努力没有像我们所

希望的那样得到实现。

第四，我想让研究所把科学与宣传分开，不是通过教条的棱镜、而是按照美国的现实去研究美国。我们努力在当时的限度内做到这一点，尽管也常常得作出妥协。但即使作了这些妥协，研究所的学术成果——在此期间出版的数十本书籍，研究所出版的月刊《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本所的同事在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就其内容和形式来说，同当时其他书刊相比也有明显的不同。我们这种态度不时地引起我们各级意识形态官员和新闻检查机关的不愉快的反应。今天看来，这些成就显得微不足道。但在停滞的极盛时期，这仍然是向前迈出的一步。

第五，我想让研究所学会以西方能够理解的方式同美国人以及整个西方公众开展交流。向他们讲苏联，讲苏联的政策，讲苏美关系，也讲我们喜欢美国及其政策中的什么东西和不喜欢哪些东西。当时我们得考虑到我们国内那些狂热地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的“守门神”，所以这样做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为了向西方听众讲话，我们必须摆脱许多教条，刻板的公式和司空见惯的陈词滥调。我和我的许多同事都冒过这样的风险，总要时不时地遭遇一些不愉快的事，作为为此付出的代价。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方法都与众不同，这一点不仅很快就被苏联公众，而且也被美国人注意到了。

1972年，在莫斯科第一次高级会晤过程的一次礼仪性活动中，在回答我的某个说法的时候，基辛格俏皮地说，阿尔巴托夫很理解美国精神的“受虐狂”本质并熟练地利用了这一点，令美国人非常满意，同时又把美国的缺点和罪过告诉了美国人（他在

自己的第一卷回忆录[①]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原话)。我体会到他这句笑话后面有些不高兴的意思，但我应承认，我对他作出这一评价感到高兴。总的说，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同我们进行辩论并不困难。我们越是采取笨拙的、教条的形式向西方介绍苏联，美国同我们进行辩论就越容易，所以，我们听我们的对手说，同我和我的同事们进行辩论时遇到了更多的困难，我们为此感到高兴。

后来，这一点促使美国人企图把我们研究所说成是一个“宣传组织”，好像是专门为了欺骗和“愚弄”美国人而建立的。当然，这是无稽之谈。这是他们制造的关于我们研究所的最荒谬的错误概念。一些相当严肃的作家也时不时地重复着这一概念。其实领导上根本没给我们提出过这类任务。我们研究所在美国新闻媒体上的露面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首创精神”，并无政府的指示，而且带有一定的个人风险。但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当有了机会时利用这个机会是重要的。其实，我们是非常严肃地对待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的社会舆论的，我们知道他们对美国政策会有重要影响。

再有，第六（按顺序排是最后一点，而不是按意义排的），我想让研究所成为苏联一所新型的培养现代美国问题专家和政治学家的学校。我想让它汇聚创造性人才并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培养出能给自己的人民带来利益的专家。我要研究所帮助他们尽自己微薄之力去改善苏美关系，成为真正的和平使

---

① 基辛格写道：“阿尔巴托夫对美国很了解，善于使他的论据适应于风行的时尚。他特别精于利用美国知识分子的没完没了的变态心理，这些知识分子的信条是，苏美关系中的每一困难都必然归因于美国的愚蠢和不妥协。阿尔巴托夫非常机敏伶俐，他尽力说明美国的拒绝行动正在挫伤克里姆林宫爱好和平的、敏感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正由于我们的僵化固执而被硬拖进同他们固有的文质彬彬本性格格不入的冲突之中。”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波士顿、纽约 1979 年版第 112 页。）——原注

者。所有这一切做得是否成功，这不能由我来判断，但我想说，我为研究所形成的那个集体而自豪。

在这方面，我想举出自己一些同志的名字，我同他们一道创建了研究所。他们是：著名的苏联学者、法学家、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Б·С·尼基福罗夫教授；教育问题方面的独一无二的专家 Л·Д·菲利波娃；天才的、年轻的国际问题专家 И·Л·舍伊金娜，等等。

我的五位副所长中有四位来所时都是大学毕业生，其中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В·В·茹尔金于 1987 年成了新的欧洲研究所的所长；另一位前副所长安德列·科科申最近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国防部副部长。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成了几个大的重要研究机构的副所长；一名研究人员当了政府的部长，一名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另一名成了苏联人民代表（除我之外）。另一名研究人员 П·卢金，现在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他当过苏联驻美大使。

再简短地谈谈我们做过的研究工作。

第一篇分析报告是我们研究所在 1968 年 4 月，即美国国内形势紧张的政治动荡时期撰写的，尼克松总统说这个时期的政治动荡是美国内战以来的一场最尖锐的危机。1968 年曾经是总统选举年，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在美国出现的极端复杂的局势并试图就这种形势将给苏美关系造成怎样的后果作出预测。

过了多年以后，出于好奇，我又重读这篇报告，由于报告的主要结论和预测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故而我有一种满足感，但同时我又为我和我的同事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不顾死活、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感到惊奇。

报告的主要结论是：无论谁在大选中获胜，美国对外政策发生变化的前提条件都在日趋成熟，这些变化会在客观上符合苏联的利益。

在这份上报给领导人的文件中我们写道："第一次形成了这样的形势：美国政府在推行自己的'全球'政治的时候，不仅在国际舞台上遭到了严重的抵抗，而且在自己国内也遭到了严重的抵抗。美国第一次面临严重的国内动荡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问题（税收增加，通货膨胀，少数人处境危难，城市危机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美国政府特别加以重视并予以解决，要求政府把资源集中用于国内事务上）的激化所造成的。而这一点，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将会促进美国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建设性的原则。"

我们还得出一个结论：苏联可以对这些过程施加一定的影响。在业已形成的局势下，活跃我国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通过提出反对战争危险、争取巩固和平的建设性纲领的途径使我国的对外政策活跃起来，将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

当时，在1968年年初，这样的结论和建议还不是很寻常的。在把结论和建议呈送苏共中央和苏联外交部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它们会引起不满和忿恨，因为这份文件具有要求停止"冷战"的意向，它是难以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的。斯大林式的思维惯性还很强大，尤其是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有人企图复活斯大林式的思维之后更是如此。在对美国的政策、对我国与美国的关系的发展前景的估量上，占优势的提法就是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苏美两家不共戴天"，尽管这些提法通常也伴有对和平共处的闪烁其辞的呼吁。

我们在刚一起步时就想同时与在意识形态方面妨碍我们正确地估价自己本民族的利益的旧框框作斗争，尤其是经常地提醒人们：抑制军备竞赛将给苏联带来（比给美国）更多的好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军费开支的负担更沉重。

从开始严肃认真的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以后，很快就产生了一个令苏联专家十分苦恼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什么都保密，尤其

是在军事政策问题上。其实，在20年代，我们未曾把这些问题保密，那时这样做不仅没有妨碍，相反还帮助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自己可靠的防御盾牌并建立了崭新的、健康的社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在30年代，这种民主性的模式遭到了破坏，这是造成1941年那场惨祸的原因之一。在“冷战”年代，严格保密被社会认为是对待国防问题的自然的、唯一可靠的处理方法。但这给我们带来了庞大的不必要的开支和危险的危机形势。

从70年代初起，我们研究所就反复地向领导提出这个课题。但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才开始树立必须以另外一种态度对待国家安全保障的概念。

1969年，苏中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这就迫使我们对美中关系进行更仔细的分析研究。在1970年初我们得出的一些初步结论中，有一个结论就是：苏—美—中的“三角”关系已经作为一个统一的综合体而存在。这就不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要么是保持同美国的关系，要么是保持同中国的关系。我们的结论是这样的：必须推行一条同时与两国都确立符合苏联利益的关系的方针，当然，要在各个特定的时刻在两个国家的政策允许这样做的范围内去建立这样的关系。

1970年秋天我们写道：对美中接触的每一个进展都作出神经过敏的、过度强烈的反应是不明智的。1971年8月，当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北京，我们又重新谈到中美关系问题，并且证明，我们要反对中美关系的一定程度的正常化是困难的、冒险的和不明智的，因为任何这样的企图都只能在全世界引起不良的反应。

在勃列日涅夫患病期间，对外政策领导人的精神更加颓废的时候，对我们研究所来说，困难的日子就来了。我明白，试图提示领导采取正确步骤变得越来越没有效果了。但我同时又不敢承认这一点，尤其害怕在研究人员集体面前吐露这个丑恶的事实。

这种情况会扼杀人们的创造精神。对科学“无人问津”这是令学者感到苦恼的事。因此，即使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仍力图使集体对我们的工作和对政策仍然是必需的这一点保持深信不疑。

我们也进行了区域性问题，尤其是欧洲问题、近东问题的研究，后来研究的问题更多了——又开展了远东、太平洋问题的研究。B·П·卢金是这些研究的首倡者，并且热衷于这些研究工作。我们开始同这些地区的研究中心接触，所内培养了一批颇有造诣的专家，尤其是，我可以相当满意地说，我们研究所曾跻身于国内首批这样的科研集体之列。它们曾使苏联领导人的注意力发生转移，让他们注意到，一系列问题的轻重缓急次序正在改变，太平洋地区对我们来说正在变得极端重要。

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初的非正式报告（报告也包含政策方面的建议），还在80年代初就已呈交勃列日涅夫，后来又呈交安德罗波夫，再后又呈交契尔年科。

这时，如果说我要为实际政策做点什么的话，我只能把报告（或报告副本）呈送戈尔巴乔夫，他实际上已经成了当时的第二书记。戈尔巴乔夫当时已经表现出对对外政策有浓厚的兴趣。他尽力办成自己能办的事，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的机会也是有限的。

1985年3月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过去已经开始但尚需继续下去的工作，包括我们所里业已开创的这类工作又都有用了。

但这种情况是稍后才出现的。在消沉的停滞年代，有头脑的人的精神力量都用于要创造性地对待工作、继续工作和继续期待上。

可我们（处于与美国、全面地同欧洲交往和接触之际）还有一项任务，也可以说还有一项职能，就是要尽可能适当地进行防御战。西方的向右转和保守主义的进攻，同我国在对外政策上和

国内事务上的日益严重的困难相结合，将我国置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其中包括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的国家机构乐意把这条战线提供给我们，尤其是，如果我们——学者、个别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准备由本人担风险去工作的话。

除了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外，研究所还有其他重要的工作方面。

70年代初，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停滞趋势的症候变得越来越明显。1965年的改革给予经济的推动因素，由于改革的倡导者未能贯彻始终和官僚们的暗中抵抗而很快就自我耗尽。一切又都恢复原状，并且是在全世界展开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形势下。日益明显的是，国家不仅将会放弃某些领域的阵地——全面落后的威胁已经成为现实。

早在1968年9月，研究所就曾向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呈报了第一份信息分析报告，题为《关于科学技术革命对美国对外政策战略影响的报告》。实际上，尽管我们故意把问题的一个方面收缩在标题中，我们是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警报信号”，使领导者们对这种明显显现出来的国家落后的状况能够有所警觉。报告分别呈送所有领导人，得到了讨论，在唤起对这个问题注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报告并未取得应有的实际结果。

那件事情本身也与1969年4月呈送给领导人的《关于将军事领域的科学技术发明与成果转让给民用经济部门的报告》有关。就这个报告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还作出了一个什么决议，但并未产生更有份量的实际结果。

从80年代初开始，我们研究所（据我所知，我们所是苏联科学院的下属部门中第一个这样做的）开始让政治领导人注意日益加剧的苏联远东地区经济落后状况和对我们来说亚太地区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从本质上说，亚太地区的发展和相互联系均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们曾提出涉及经济、政治和科学

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建议。这些建议一方面是要求加速发展我国东部地区，另一方面就是要积极加入尚在形成中的“太平洋共同体”。

我们还向领导机关呈报了许多信息报告和有关其他经济问题的报告，其中有：关于个别部门营业情况和重要的国家纲要的报告；关于美国对苏联经济的现状和前景评价的报告；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些迫切问题的报告。

自然，很大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美国在农业和粮食生产方面的经验上面。1973年，为了研究这方面的经验，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研究室，1977年又改建为一个处。研究所简直就是用有关蛋白质问题的报告、关于发展肉用雏鸡工业的报告、关于建立新的食品工业部门的报告、关于改进粮食和蔬菜储存与运输的报告、关于在发展农业技术基地方面的新趋势的报告等等一系列的报告轰炸了上级机关。政治局曾两次——一次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后来又在安德罗波夫在位时——审议了我们写的关于压缩粮食采购量的报告。很遗憾，在“粮食院外活动集团”的压力下，报告两次都没有被采纳。

我所是最早参与制定各种条例的研究所之一。我们着手制定了同西方公司联合生产的原则。1976年，我们拟订了关于与美国“本迪克斯公司”联合生产汽车火花塞的建议，根据这个实例我们又制订了开展新型经济合作构想和经济合作新形式的典型模式。建议曾两次被苏联部长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曾就这个问题两次作出赞同决议。可惜，如像对待那些年的许多其他的好主张一样，这项建议也未曾得到实际体现。

研究美国和国外的全部管理经验，尝试着使之适合我国的实际，也是我们的实用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不太高的层次上（在企业、联合公司）这往往能够办到，工作也有实际效果。在较高的层次上（例如我们拟订了管理开发俄罗斯联邦非黑土区

的计划的方案，甚至还顺利地呈报给了联邦部长会议，但是方案也没有被采纳）则一事无成。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行政命令体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的恶习，给管理合理化留下的余地十分狭窄。

我们所的人是如何对待本所活动的呢？如果说领导，那是认真的，尤其是在最初几年，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政策还处在探索之中。我们写的内部报告有人看，也转发各有关单位，往往还指定作为工作参考，总之，我们领受了不少任务。有的带来了实际的好处，有的就没有，主要是由于共同的原因——都与国内形成的形势有关。但我确切了解的是，我们的建议没有造成损失，没有造成、也没有鼓励政策上的不良倾向。我提到这一点，是要回答某些批评家，他们别有用心地宣称，在停滞时期我向领导提了一些不好的建议并且要对这些建议负责。我对自己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推托不管，我准备为每一项建议负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所和我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犯过错误。不，我们也像别人一样，犯过错误，有过起伏。

社会各界也对我所的工作很感兴趣。我是根据我所办的杂志发行量大、我们出版的大量书籍没有积压在书架上以及我所的科研人员收到许多讲课的邀请来判断这一点的。当然，对我们工作的反应不单是肯定的，也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有时是我们的过错，而更多的时候还是错在过分警觉的新闻检查员们和思想家们。此外，研究所的工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肯定引起保守分子的不信任和攻击。有一次（在 1973 年）杰米契夫和基里连科暗中对我和研究所进行捣鬼（他们的借口是常用的一个借口——犹太复国主义。研究所中犹太人太多，而且所长不是纯血统的“亚利安”人）。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我想，我们研究所之所以会引起我们的保守分子们的恶感和

怀疑，不仅是因为自己著作的内容，而且还有在研究所的集体中已经形成的氛围本身。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即使不是全体的话，都把全副精神寄托在这样一种希望上：保守与停滞时期不会很长，进步的变化过程必将再次出现。这一点就决定了科研人员的情绪：像所有的有文化修养的人一样，他们也极力追求精神的自由，因为一定程度的精神自由是研究所有效地进行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研究所成了他们的一座避风港。多数人都是怀着满意的心情上班的，工作热情奋发，富有创造性。

有一个因素对于开创这样的局面起了不小的作用，那就是我所的科研人员的平均年龄很长时间都没有超过 30 岁。所里的青年人被赋予广泛的权利和机会，青年们也表现很积极，尤其是在 70 年代下半期至 80 年代初，不管乍看起来这是多么地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莫斯科的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明星”们之所以乐于来我们所做客，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一种对于那种年代来说不太寻常的氛围。我们的常客有：诗人 A·沃兹涅先斯基和 E·叶夫图申科，作家 B·阿克肖诺夫，Ю·特里丰诺夫，讽刺作家 M·日瓦涅茨基，M·扎多尔诺夫，等等。我想，他们之所以很高兴到我们所来，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人们理解他们，而这些会见也给了我们新的动力，促使我们去搞好创造性的工作。

当然，研究所的建立和研究所的工作，美国是有所察觉的。1968 年 1 月，美国实业界杂志《商业周刊》对我进行了第一次采访，采访记大约是在一个月之后付印的。不知为什么，答记者问引起了苏共中央科学部主管我们所的工作人员的恐惧和不满。于是当时我就决定恪守自己关于国家利益的观念，而不以机关官僚们的意见为指导方针。很快，人们就开始明显夸大其辞地把美国人发现苏联报刊在写美国时腔调有所变化这一点归功于研究所的影响。例如，《时代周刊》就把苏联报纸现在认为必须把“头

脑清醒的帝国主义者”和“从现实出发思考问题的帝国主义者”与比较一般的和凶恶的帝国主义者区别开来这一事实与“美国问题新观察家”的工作联系起来了①。

后来美国又专门发表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些书是专门阐述苏联的美国问题专家和对外政策的研究者的工作的。我想引用一下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学术著作《苏联外交与1979—1988年谈判中的所作所为：对美国外交的新考验》的摘录。书中特别强调：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与其他研究中心一道在苏联对外政策“理智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有缺点”，仍不失为“使苏联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的认识”发生变化的“主力”。另一段则说：“那些认真观察美国研究所活动的人认为，这个单位的职业技能和影响对外政策机关的能力使之与众不同，另一些人则强调这个所的宣传作用。”②

A·布朗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周刊上正是这样概括尼尔·马尔科姆于1984年发表的《苏联的政策研究者与美国的政策》一书的主要结论的：“尽管近20年来超级大国间的关系有涨落起伏，苏联对美国政策了解的水平还是在不断提高的……如果苏联领导人和那部分最有教养的居民开始更好地了解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的社会，那么，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应把这一点归功于苏联的美国问题专家们的工作。”A. 布朗还指出，在精英们，尤其是美国问题专家们的态度上有一种新东西，这就是“可喜地更加强调健全的理性，而不是强调意识形态和采用唯理论作为政治方针”。

研究所也成了对外政策领域的专家们相互接触和会晤的主要渠道。

---

① 《时代周刊》1969年2月7日，第23页。——原注

② 《苏联外交与1979—1988年谈判中的所作所为：对美国外交的新考验》，美国政府出版局，1988年版第563—564页。——原注。

研究所也不单单与他们有来往。在来研究所讲课、参加研讨会和大型座谈会的客人中，还有数十位美国的参议员和国会议员，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实业界的著名代表人物。例如：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和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还有赛勒斯·万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亨利·基辛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查尔斯·布朗、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那样的在美国政府中身居要职的政治家；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亨利·贝克，著名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Э·休伊特、P·莱格沃尔德、C·亨廷顿；来自商界的有T·特纳、A·哈默，等等。

当然，在美国，各界人士对我们研究所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研究所曾不止一次地成了被极右分子选中的攻击目标。80年代初曾经展开了一场集中反对我们研究所的运动，这场运动显然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旨在损害我所的威信，破坏他们认为我们研究所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社会舆论的所谓“有害”影响。

在这场运动中，除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算是平常的造谣中伤的题目（研究所是克格勃的工具，阿尔巴托夫是苏联情报机关的领导人之一）外，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有几个新的因素，尤其是他们企图破坏研究所及其科研人员的科研声誉，试图把他们描绘成企图把美国人弄糊涂、使他们不知所措的“工作人员”。我们还被指责（我们感到荣幸，尽管这不是我们的功劳）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创造了”反战运动，在美国的土壤上播下冻结核武库的主张（尽管这种主张是由美国传到我们这儿来的）等。80年代初，美国当局开始给我们所的工作人员和我本人设置种种障碍，主要目的是阻止我们在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发表意见。比如，1982年，为了中断我对事关威信的电视节目的参与，缩短了签证允许的我在美国的逗留时间；1983年，在给我签证时附加一

个条件，那就是我将不与大众传播媒介作任何接触。

我不想让人把我所说的理解为盲目乐观和自我满足。不，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在改革的年代里都对自己的工作、自己出现的缺点作了重新的认识，以期把我们的研究工作提高到新条件所要求的那种高水平。这种新条件就是：人们已经开始倾听学术界的意见，在政策中开始考虑科学分析的结果。学术界应该为形成和发展新的政治思维作出自己的贡献，而新的政治思维也应该急剧地提高评价政治研究、政治科学的标准，也要提高政治科学的责任。

为了保证研究所具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我做了些什么呢？我根据知识、智力、个人品质和政治信仰对人员进行了仔细的挑选。我们创造了有利于展开讨论的合适条件，即民主、宽容和竞争的气氛，我们也培养忠诚的感情，在困难时候，我曾保护过一些人，使他们免受迫害。结果，他们对研究所也表现了同样的忠诚。最后，我还创造了使研究人员，特别是年青人迅速成长的合适条件，如交付重要任务，派他们出国，给予提升等。

我们也有不成功的地方。几个政治上不诚实的人也在研究所工作过，有一个人志愿充当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被逮捕并判刑，给我们带来了麻烦。但这些是例外。

研究所的最大成就是对政治知识和政治实践发生了影响。我们的工作对我们外交政策的“非神秘化”，消除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作出了不少贡献。苏联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深深地沉浸于许多神话和意识形态之中（公正地说，在不小程度上美国对外政策也是如此）。不要认为，这些神话和意识形态只是用来喂老百姓的，而“高级神父”吃的完全是另一种食品，以为他们是在只有他看得到的一些更高利益的基础上冷静和理性地估量政策的。也许斯大林是这样的。但是我所认识的那些领导人不是这样的。

当然，他们并不相信他们说的一切，也远未把他们相信的和

思考的都说出来。他们对健康的玩世不恭态度，有时也对不那么健康的玩世不恭态度并不陌生。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思维充斥着意识形态和由意识形态产生的神话，他们长期相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西方是生来不可调和地敌视我们的，这种敌视是对我们的主要军事威胁。

我曾不止一次地向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其他领导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文化、智力和对世界的了解是不同的。他们的思想也有差异。但是对西方的不信任，对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的恐惧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诚然，我曾更深入一步提出过一个问题，西方从什么合理的利益考虑要对苏联发动战争，采取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对此他们也有过一些新的说法：是的，时代改变了，没有人要战争，等等。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必须有准备，西方帝国主义是一个现实，只有用我们的力量才能加以制约之类的论据。

这些考虑对美国人来说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美国社会也是很意识形态化的，也受到一些神话的影响。我是通过许多会议、交谈和各种场合的讲话得出这个结论的。过去许多年中，在我们研究所同美国人的交往中，我有时曾遇到过公开的、差不多是狂热的敌视，但更多的是警觉、怀疑和不信任。（我不想说我们没有给美国人提供对我们的政策表示不信任的理由，正像他们也为我们对美国政策的不信任提供了一份理由一样。）

最大的和最有害的神话是相信我们可用军事力量保证安全并解决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几乎是所有的政治问题。这里起作用的是巨大的惯性力量，这种惯性是多少年来、甚至多少世纪以来就有的，而且双方还都有共同的心理包袱。问题出在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思维和美国“征服西部”的历史上，双方经常把战争看作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事业而进行的救世之举。

我的同事们和我既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能

看清新的政治现实的先知。如果我们看到缺点和威胁，我们力图消除它们；只要改革有可能进行，我们把改革当作实现这个目标之路。今天我们有时为此受到责备，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责备是有道理的。

归根结底，我国的所有改革和变化都来自极权主义的铁板一块。人们似乎认为它就是共产主义的铁板一块。但是，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公正的思想从最初开始就是沙皇统治和专制统治的替代物。革命之后，苏联领导人力图把这一思想同强国和帝国思想结合起来，后两种思想掩盖了前者，结果成了极权主义政权。

但是，公正的思想和民主的思想仍然存在于我们意识的深处。绝大多数苏联改革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是从对共产主义的古老的允诺——公正、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下获得解放和个人的尊严出发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类个人发展的充分自由”）。当他们认识到极权主义已代而登上了宝座，他们最初的目标是要促使这个制度实现它的理想和允诺。我相信我们在研究所分担了我国绝大多数同胞对制度表示忠诚的责任。

同时，我认为，为了使制度实现其理想，使它把政策转向现实并对事物采取务实的态度，需要从法制内外共同进行斗争。缓和年代中取得一些明显的、但并不持久的进步就是这样得来的。

我们采取的反斯大林立场和对政策的务实态度使研究所在这些问题上发挥了它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我们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政治家和社会人士保持的广泛联系和我们愿意倾听和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能力。

当然，我们并不是同意每一个人的意见。但是，充分了解别人的观点、各种意见的交流和讨论可活跃我们的思想，许多外国同行提出的思想和对待问题的态度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研究所还参加了三个十分重要的经常性的论坛。

第一个是帕格沃希运动。这是由苏联和美国的学者创设的，

后来也包括了其他国家的学者。它在60和70年代对我们是特别重要的，当时我们同外国人开会讨论的其他机会很少。对我和我的同事们来说，帕格沃希运动是我们了解西方的安全和裁军问题思想的第一所学校。我们的讨论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技术和政治思想。其中之一就是转向防御性国防政策的思想。

第二个论坛是达特茅斯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了美苏两国社会知名人士举行会见的思想。第一次会见在达特茅斯大学举行，会见因而得名。会见的第一个组织者是诺曼·库辛斯，凯特林基金会提供了经费，它的主席马修斯为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会见在苏美关系最困难的时期也未停止，它们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它们对我的研究所和我个人很有帮助，使我们熟悉了美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政策等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它们成为我们在这些领域的知识源泉。

第三是苏美联合国协会会议。我于1986年成为苏联联合国协会主席。这些会见类似达特茅斯会见。

我还要提到对我的观点的发展和我们的政治思维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的另一个论坛。那就是帕尔梅委员会，它的正式名称是裁军和安全独立委员会。在它存在期间，我从头到尾参与了它的工作。它是于1980年按勃兰特委员会（其宗旨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模式创设的，那正是第二次冷战开始之时。

我参与帕尔梅委员会的工作成了我的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我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理解发生了重要影响，在那几年中我经常同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保持接触，他们都是不寻常的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

这个委员会成了一所独特的研究机构。在再次变得紧张的国际形势中，通过集体的经验和公开、真诚和热烈的交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共同安全”思想，其实质就是我们不能靠牺牲或损害别人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也提出了

对核武器的新态度。委员会对可把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和军事安全因素的价值提出质疑，并把战术核武器看作不稳定因素。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提出了在欧洲沿两个军事集团的边界线建立一个300公里的无核区的建议。

在25年时间中，我们研究所既有昌盛时候，也有困难时刻。我想从头一年8个月开始到70年代中我们的工作是相当成功的。当我们学会了如何把我们的思想反映上去和传播出去的时候，让人们开始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曾得益于70年代中出现的有利条件，虽然我们得到的机会之窗仍然是很小的。那时保守派尚未积聚足够的力量来完全阻挡自由思想的发展。

从70年代中开始，停滞时期的到来使我们越来越难于把思想变成实际，研究所越来越经常地遇到来自党的机关、部队和政府的保守官员的敌视。由于他们所起的作用，研究所得到了"亲美"和在政治思想上不可靠的名声。

80年代上半期，除了在安德罗波夫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一个短时期内我们的希望开始上升外，总的说这段时间对我们是困难的。我们曾以为会对我们研究所进行某种整顿，除非整个形势发生变化，我们将难于逃过这一关。对伊诺泽姆采夫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整顿表明，即使同领导人有良好关系也未必会有用。而当契尔年科成为总书记之时，那种良好关系已不复存在。

1985年3月开始了我们的一个最出成果、也是最复杂的时期。随着民主的诞生和政治力量的两极化，研究所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痛苦的政治斗争。

说研究所在发展我国的政治、军事政策和应用经济研究中写下了新的篇章，那是一种夸张。但它培育了一些重要的、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光辉的思想。国家领导注意到我们研究所，特别是在积极开展对美工作时期。他们阅读和考虑我们的报告，也给我

们下达不少任务。

几 点 结 论

我的同事们和朋友们是否曾经估计到在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严寒之后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有可能到来？坦诚地讲：是估计到了，也没有估计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估计到了。极权主义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包含着自己毁灭的种子。但从短期来看，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我得承认，我们常觉得，勃列日涅夫时代，甚至在它终结之时，也许也代表着我们社会的最后的觉醒。我们曾担心一个新的无情的专制黑暗年代的到来。

对我来说，我是处在极大的矛盾之中。在美国我被说成是苏联极权主义的奴仆，说成是对美国的“颠覆分子”，可是我和其他人在国内都生活在遭牺牲和挨整的担心之中。这种担心由于俄国政治的一个传统的重要因素而更加强：那些直接为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工作过的人或被认为接近他的人，在新领导人到来之时不得不成为随葬品。

但是谁能预见到历史的奇特和新颖的发展呢？苏斯洛夫死了，安德罗波夫取代了他，突然成为明显的接班人。仅此一点就引起了希望。当安德罗波夫去世时，这个希望似乎又泯灭了。然而事情已不像过去那样阴暗了。人们不知怎么都懂得了改变是可能的，而且变化总会到来。因为，人们并不认为契尔年科反映了保守主义的持久的胜利。当他去世时，阴暗的预感和预测也随之而去。

我们在改革的最初几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工作，而为了这一点，吸取过去的教训是很重要的。

后斯大林年代的第一个教训教导我们，缺乏决心，过多的审慎和拖延会导致改革的迅速衰退。不把社会建制和机构作巨大翻修，要取得巨大进步是不可能的。不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高级领导的不断推动，以开始和促进根本性的变化，基层的改革不能生根和存活。

时间在改革的速度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改革被拖延了，它有倒下来的危险。正像一个停止旋转的陀螺一样。某些社会学的规律也许在这里起着作用。当社会拒绝早已成熟的改革时，具有各种破坏性后果的革命将成为不可避免。但是改革也意味着进行急剧的变革，而不是缓慢的进化；因此当改革的势头一旦丧失，旧的保守分子就会很快适应形势并找出有效地抵制变革的方法。

第二个教训是，不向世界开放，不成为国际分工的积极参加者，不利用经济和科技合作的一切好处，不充分运用世界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经验，就不可能成功地得到进步和发展。50年代初，斯大林的逝世是我们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今天以他们的成就使世界感到震惊和处在进步前沿的许多国家，在1953年的时候，它们的社会经济要比苏联落后很多。例如，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才达到战前水平，日本当时才开始恢复战前擅长生产二等消费品的声誉。很少人能在50年代初预见到西德、台湾，更不用说南韩会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我完全不能设想，二战后这些国家和地区如果不积极参加世界市场如何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恐惧依然是阻挠我们下决心进入难于对付的世界经济市场的障碍。有些人因担心背叛植根于斯大林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和“原则”而感到害怕。其他人则因对事物的无知而感到害怕。

那些害怕不知之物的人必须认识到，任何寻找新的途径的尝试都要冒险，因为老路必然会导致更大的衰退和灾难。在这个意义上，罗斯福的话是正确的：“你唯一害怕的就是本身”。

第三个教训是：在我们的外交和内政中不克服军国主义，就永不可能使我们的社会走上正常的轨道。我们对这种非常的形势已习以为常，如果不是由于经济的现实，也许我们会一直容忍这种形势，直到受到审判的末日和发生全球的灾难。巨大的军事开支的重负不仅对于把25—30%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的国家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对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美国来说也是不堪承受的。

从后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中需要吸取的第四个教训是，竞争的国际关系的相互效应。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你不论采取涉及你的对手在世界上某个地区的利益，或他的新的防御计划，或他的军事学说，或其他别的什么行动，他都必然会作出反应。如果你不事先考虑到这种反应，你的行动就会打到你自己头上。在全球政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会永远是个明显的赢家。如果有一个明显的赢家，那么事情就更复杂了。账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算的。

这种相互依存性过去主要存在于军备竞赛和冷战中。近年来，我们看到有可能进行和平的敌对，甚至裁军竞赛。这个过程正在取代敌对的军备竞赛。这个过程尽管尚处在初级阶段，却使人对未来抱有希望。

最后，我们已开始懂得了，外交政策的真正任务不是去征服别人或建立帝国，而是去创造永恒的条件，以使得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能不仅集中力量和资源，也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它的实际问题，去关心经济和社会问题，去发展文化、科学、教育、卫生健康和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活福利。

现在冷战已经结束，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来改变我们的优先次序。历史给我们再次提供了一个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的难得的机会。我们能不能用好这个机会呢？

改革及其以后

关于前所未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垮台，将会写出大量的书。如果我不对改革这个历史时期作出我的评论，我对苏维埃制度的叙述将是很不完整的，尤其是因为我在那几年中比过去起了更积极的政治作用。我曾说过，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我已同他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当我还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手下工作时，他常邀请我去参加一些会议或进行一对一的谈话，以听取我的意见，有时就聊聊天。

当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时，我认为我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帮助他熟悉外交政策的现实情况和外交政策思想。（我已经多次叙述过，我曾给他提供过帮助，包括帮他准备率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去访问加拿大和英国。）我应该说，他显然利用了勃列日涅夫逝世和契尔年科逝世之间这段时间来学习外交政策，并已在了解外交政策上取得相当大的进步。

可是他现在是领导人了，他已可制定并推行他自己的外交政策日程了。我要在这一关键时刻给他提供帮助，于是花了好几个昼夜就一些主要的国际问题写了一个长达 40 页的详细备忘录。戈尔巴乔夫于 1985 年 4 月初收到了这个文件，他显然认为这个文件是有价值的，因为他要我继续为他提出建议。

今天看来，我觉得这份备忘录并不那么高明或勇敢，但如用1985年的标准来看，它是不寻常的。首先，它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框框，在当时的气氛下，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它是从对国际形势的一系列一般考察开始的。我写道，如果新上任的领导不受旧政策惯性的束缚的话，新领导人往往可指望在政治事务中获得新的机遇。但是假如新的倡议不能很快开始实行，那么也有使人失望的危险。我写道："如果我们面对现实，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的政策问题上，最近几年是一个失误很多而成就很少的时期。"我把我们的失误同经济问题和"领导上丧失活力"联系起来，我警告说"我们正在跨越这样一条界线，一旦跨过了这条界线就会开始出现严重的困难"。

在作了这些一般性考察后，我又对军备控制谈判作了批判性的分析，还建议改变我们的谈判方式并采取一些单方面的行动，包括声明冻结核试验和裁减我们在欧洲的武装力量，我用这些分析和建议来加强我的一般性观察。我过去和现在都确信，单方面的行动此时是走向裁军的最有效的行动——通过煞费苦心的谈判以求得精确平衡的图谋已使谈判走进了死胡同。然后，我谈到我们同美国和西方关系中的危机（我过去拒绝，现在仍然拒绝认为危机的责任只在苏联一方，虽然它应该承担它的一部分责任）和我们同一些地区冲突的地区问题的关系。我专门写了一节，论述大大改变我们同东欧和中欧国家关系的必要性。这一节的主要结论是，"仅仅通过在盟国驻扎军队或拥有向这些国家派遣军队的可能性的办法来维持盟国的国内稳定"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我想摘引这个文件中谈到阿富汗的一段话。"战争已进行了五年半（比我们参加的二次大战还长），但形势并未改善。它使我们大量流血和付出大量的物质资源，它在政治上使我们受到伤害，在军事威信上使我们受到打击。如果目前的形势再拖它几

年，其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从一场你无法赢得的战争中撤军总是困难和不愉快的，但如撤得太迟，将更糟。”我讲到了阿富汗政府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并提醒戈尔巴乔夫，“当阿富汗由国王和资产阶级政府领导时，我们同阿富汗打交道的问题和困难，比同塔拉基、阿明或卡尔迈勒这些革命家打交道时要少得多。”我按照同样的思路谈到了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与埃塞俄比亚的存在和我们在东南亚对越南的无条件支持。

写了这份备忘录之后，我就经常给戈尔巴乔夫写材料，既讨论外交政策，也讨论国内事务。当我们会见时，我们常常就一些问题进行争论，有时争论得很热烈。我并不以为我总是正确的。但是我总是把我的真实思想写出来和讲出来。我的感觉是戈尔巴乔夫是了解我的思想的。在那几年中，戈尔巴乔夫、稍后一些时候（从1986年起）还有谢瓦尔德纳泽，是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包括由那些因自己的新观点而受到尊敬的人提出的，和诸如帕尔梅委员会以及医生和科学家组织一类国际组织提出的思想。这意味着苏联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改革的最初几年是令人难忘的。那时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充满了希望，戈尔巴乔夫的威望大大上升。我们这些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会了在评价我们的领导人时采取谨慎态度和不过早地给他们打高分的人，此时不但信任他，而且还喜欢他，尽管我们当时看到了他的某些错误和弱点。后者只是在若干年以后才得到充分的暴露，并给大家带来了痛苦和严重的失望。

在我写到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做几点总的评论。苏联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的过去这个问题上，曾有三次大的获救机会。第一次机会是在苏共20大上到来的，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他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著名报告。这次代表大会可以成为苏联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由于几个原因没有成为这样的转折点，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领导、政治精英和公众都没有做好进行认真的变

革的准备。

第二次大机会就是80年代的改革。仅在短短几年中，领导上使得我们社会的很大（虽然实际上也许不如我们当初估计的那么大）一部分人都动了起来。它也朝着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跨出了几大步，并且走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但是我们跨出的步子还远不够。不久改革的步伐就慢了下来，在不少重大问题上领导后退了，于是一股右倾势力乘机而起，在1991年8月政变中达到最高点。

制服政变的胜利给我们提供了第三次机会。它导致了民主情绪的空前高涨，掀起了一股乐观、甚至满怀热情的浪潮，并在我们社会的很大一部分精英层中形成了一种团结感。这种欣慰感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没有武装的公民挫败了（或者看来是）世界上最大的武装力量和秘密警察。极权主义的支持者瘫痪了，名誉扫地了，瓦解了，退却了。出现了实现巨大改革的真正的机会。大山都可被移动。但是在描绘当时发生的事情之前，我想先讲一下戈尔巴乔夫政策的衰败是重要的，因为改革的失败给我们上了一堂不应忘记的历史课。

正如我们历史上过去的革命变革时期那样，这次改革也以它的浪漫阶段开始。然后，遵循通常的模式，这个阶段让位于政治两极化。到1990年强硬路线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迅速地发展成为一场置改革的前景于巨大疑问之中的危机。今天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们丧失了这一十分难得的第二次机遇。

当然，早些时候已经有一些信号表明危机正在来临。暴风雨到来之前的第一声雷响是1988年3月《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尼娜·安德列耶娃写的文章《我不能用原则作妥协》。这是一篇真正的新斯大林主义的宣言，是在政治局中的强硬路线派的领导人叶戈尔·利加乔夫的授权下发表的。

另外，苏联和国外的许多观察家也没有注意到早些时候发生

的另一件事情的意义。那就是鲍里斯·叶利钦在1987年10月全会上戏剧性地辞去他在政治局中的有影响的职务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叶利钦的行动是对改革的缓慢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的保守作风的抗议。这次全会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它把戈尔巴乔夫的新的、并不令人很满意的一面给曝了光，他在全会上组织了对叶利钦的强大攻击①。这是第一个证明，说明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为了权力斗争准备在原则问题上作妥协的那种政治家。

当然，在开始时，大家包括我在内，都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这一举动是一种策略，大家都相信，为了维护改革并保证它的成功，他被迫在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右派和左派之间回旋。戈尔巴乔夫起初真的具有实现深远变革的意图，并为此采用各种策略，这是相当可能的。我愿意相信他在80年代下半期开始讲的一句话，当时他说，他对权力不感兴趣，如果他对权力感兴趣的话，他就不会去搞改革——因为在苏联谁比党的总书记还有更大的权力呢？但是这句话他重复得越多，它的可信性就越少。戈尔巴乔夫的欲望也许不能只以权力，只以成为总书记，特别是成为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之后的总书记为满足。他想以一个伟大改革家

---

① 我那时是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全会，我很清楚地记得，戈尔巴乔夫发出的攻击叶利钦的暗示是如何被大家心领神会的。党的头头们一个接着一个跑上讲坛，他们按照最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大肆抨击叶利钦，用尽了各种谩骂诬蔑之辞。我忍不住了，要求发言，倒不是出于我对我个人与之并不相识的叶利钦的同情，而只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保持沉默，我将来会感到内疚。我讲了几句不太勇敢的为叶利钦辩护的话，但是对党的头头们来说我的话不仅是离题的，而且也是叛逆性的。我说："说实在的，一个领导成员对另一个领导成员的工作提些批评意见这一事实并不违反党章。我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改革的一种成果，是对工作的务实态度。"我还说："把叶利钦的所说所为一概认为都是错的，那样是不对的。我们习惯于这种作风，我们都记得过去这种作风是如何实行的，我们不应该恢复这种作风。再说，你得给叶利钦一点公民的勇气。他走出的一步是不那么容易的。"我的发言是会上唯一同党的路线背道而驰的发言，因此显得很突出，立即受到了雷日科夫的攻击。我的一些朋友们认为，从此之后我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就开始冷下去了。——原注

留名于史。而且他这种愿望并不是孤芳自赏，整个国家，甚至党都需要改革，因为到 1985 年全国全党已对只知道巩固自己个人权力而无所作为的领导人感到厌倦和恶心。这就是戈尔巴乔夫能够得到如此巨大支持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问题要比仅仅是策略性的考虑大得多。这位新的苏联领导人的战略方针越来越变得犹豫不决，这种状况使他十分明显地转向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统治。坦白地说，我对戈尔巴乔夫是如此地倾倒，甚至是爱慕，以致于我很晚才注意到他在战略上的模棱两可和缺乏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当我注意到这些问题之后，我就不能也不愿隐瞒我的意见，而这后来导致了我们关系的破裂。

促使戈尔巴乔夫从他提出的政策中作出战略转移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要背叛他自己的最佳原则呢？

过去三年中，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接近政治决策圈的知识分子，曾经争论过这些问题。一种看法对戈尔巴乔夫持最强烈的批评态度，这种看法认为，我们全都受骗了，我们看错了他这个人。按照这一看法，戈尔巴乔夫没有深刻的改革思想，他的野心是追求大胆改革家的名声，他的主要目标是权力。

另一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要进行深刻改革的，但只改到一定限度，不让改革打乱他所心爱的一套机制，也就是要保存社会主义，虽然使之具有人道主义面目；保存苏联，使之不像过去那样专制和集中，但仍由一个中心控制其各个部分；保存作为苏联社会领导力量的苏共的权力。

第三种看法则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追求激进改革的，但不得不在党、军队、克格勃和其他国家机器中的保守势力的压力下屈服，而背弃他原来的计划。更重要的是，即使他决定要进行深远的改革，他也没有变动主要的官僚阶层的能耐。他作过一些变动，那不过是用同一类人中的更年轻的、有时甚至是更难对付的

人来替代老的官僚而已。

这三种假设中每一种看来都是有道理的，但是真理或许存在于三种假设的某种结合上。不管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的原因是什么，他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前后不一贯变得越来越明显。我常常问自己：戈尔巴乔夫最终所要的究竟是什么？他真正想的究竟是什么？他想实现的究竟是什么？

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他经常采用的双重标准。例如，早在1986年戈尔巴乔夫就开始对《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和《论据与事实》周刊这些激进的民主媒介进行尖锐的批评。但是我不记得他哪怕有过一次认为有必要把哪一份右翼倾向的期刊，诸如《苏维埃俄罗斯报》、《青年近卫军》杂志和《我们的当代人》杂志，甚至肯定地具有新法西斯色彩的小报，提出来进行批评，尽管这些报刊不断地对他的人民、对改革、也常常对他本人作各种诽谤和诬蔑。同样的是，他喜欢对民主阵营中的政治领导人进行严厉的、常常是不公正的抨击，而对超保守的、甚至极右翼的集团和领导人从不说一句令人扫兴的话，有时造成他是在同他们调情的印象。我不知道他是害怕得罪右翼，或者他更顾忌民主派，因而他企图保持右翼对他的支持，或者，也许像广为谣传的那样，他在行动上受到他夫人的影响。但是他的行为常使我困惑不解。我曾就此问题同他谈过几次，但他没有给我一个回答。

1990年春天，在戈尔巴乔夫的同意下公布了《中央委员会给全国党员的公开信》，这时就产生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诚实性的更严重的怀疑。这是对党内所有持不同意见和自由派观点的人发动迫害运动的公开信号。作为一名中央委员，我事先就收到了公开信的草稿，我立刻给书记处和戈尔巴乔夫发了一封措辞很严厉的抗议信。但是无济于事。其结果是，准备党的28大的工作受到了保守官僚的控制，自由派和进步人士都遭清洗，党不可逆转地被置于右翼的控制之下，我认为这就决定了以后政治事件

的发展发生不利于改革的转变。这个危险变得明显起来。在代表大会期间我又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劝他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我没有得到回答。看来好像党的领导的向右转是早就定好的。

不久之后，在1990年9月前后，事情变得明显了，即戈尔巴乔夫也向右转了。他拒绝了由经济学家沙塔林和亚夫林斯基起草的“500天”经济方案，这是第一个信号。在民主派计划举行一次群众游行的前夕在莫斯科附近调动军队，这是特别不祥的征兆。之后戈尔巴乔夫任命保守分子列昂尼德·克拉夫钦科为全联盟广播公司的头头。克拉夫钦科宣布“他是来贯彻总统的意志的”，他立即加紧了对广播和电视的控制，导致了一些优秀的新闻记者的辞退和一些最有群众性的公共事务栏目的停办。在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统要求获得并被授予他立即加以使用的特殊权力。

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辞去外交部长，并提出了专制的危险正在来临的戏剧性警告。

我记得1990年12月代表大会上另一个具有特色的插曲。在一次休息时，总统“走到人群中去”，在大厅中溜达，不时停下来同代表们谈话。他走近我的一排停下来，代表们围住了他问他发生政策转变的原因。他回答说，因为社会向右转了，所以政府的政策也得跟着转。他的回答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我完全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不久就找到一个机会给他写信表达我的看法。我在信中说他误解了公众意见的变化。是的，人民对混乱、无能和犯罪的增加已感到厌倦，他们确实要求某种秩序。但是他们当然不是要以牺牲萌芽中的民主为代价来建立秩序。此外，政策不应老是顺从地尾随群众情绪的变化；相反，它往往要不顾这些变化。

与此同时，严厉的言辞越来越多地变为压制的行动。总统开

始发布各种命令，行使他的特殊权力，如命令在城市的街道上实行军警联合巡逻，警察和克格勃有权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一些办公室进行搜查并没收他们认为需要没收的文件。在和平的城市中部署军队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情。

1991年1月把苏联军队和苏联内务部的部队派往波罗的海国家，占领了那里的政府建筑、电视台和其他重要机构。公众和军队之间发生了暴力对抗。人们流了血，先是在维尔纽斯，后在里加。

不久情况就清楚了：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感情的冲动，而是一个周密计划的实施。在这些共和国里建立了许多匿名的“救国委员会”，他们普遍期待中央政府为他们进行干预，把他们扶起来当政，并解散合法的议会和政府。

公民的抗议阻碍了这些行动的得逞。群众示威开始了，在议会周围筑起了街垒，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守卫。成万的莫斯科人上街游行，对波罗的海人表示支持。在列宁格勒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鲍里斯·叶利钦飞到塔林，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后来又同立陶宛签定了重要的政治协议。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没有发生。接近救国委员会的强硬派很快就指责戈尔巴乔夫背叛了他们。他们中的一个人——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中校公开声称，戈尔巴乔夫起初同意波罗的海政变者的行动，后来把他们甩开而不予支持。

但是戈尔巴乔夫继续保持沉默。大约10天之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波罗的海国家中发生的流血事件表示遗憾（虽然有的人也在声明中看到了某些谴责之意）。但是没有进行真正的调查。新闻记者尤里·谢科什金于6月公布了证明文件，说明在维尔纽斯制造流血事件的军队中有克格勃的名叫阿尔法小组的特种部队，这个小组直属于克格勃主席，并通过他直属于总统，在此之后也未进行任何调查。谢科什金的文章没有引起任何官方的反

应，尽管有一些苏维埃代表，包括我在内，公开呼吁进行一次调查。这个呼吁报纸和电视上都作了报道。毫不奇怪，谣传开始不胫而走，说戈尔巴乔夫自己在波罗的海事件中起了作用：比如说，情况会不会是，他使在波罗的海国家中（和在其他地方）策划政变的人以为如果他们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就会站在他们一边？[①]

制造总统实施“紧急状态”的行动在全速进行。戈尔巴乔夫显然参与了这个进程。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回答。但我认为，很可能戈尔巴乔夫是被他无法控制的旧权力机构的瘫痪和民主趋势的壮大吓坏了，这种情况把他推向右转了。

他不把政治形势的这些发展看作社会民主化的自然表现，而是看作他的政治对手民主派搞阴谋的结果。他越来越把叶利钦个人当作焦点，认为叶利钦不断增长的力量是对他的权力的威胁。很可能，正是把国内正在展开的复杂政治过程的人格化导致了戈尔巴乔夫的许多错误。总统反对叶利钦的斗争使他迷住了心窍，他顽固地企图把俄罗斯的领导人“开除”出政治生活。自然，改革的反对者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心态，他们盘算着，如果两个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两败俱伤的话，对强硬派来说进攻的道路就会打开。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尤其是在 1990 年冬和 1991 年春变得特别严重。

政治斗争促使叶利钦发表了几个考虑欠周的声明，一个是呼吁戈尔巴乔夫辞职，一个是向中央公开“宣战”，虽然更正确地说当时是中央对俄罗斯的领导人和民主派宣了战。戈尔巴乔夫给了我们足够的理由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更不要去说他的同伙了。他 1991 年 3 月在明斯克发表的讲演在提到民主派时几乎都是诬蔑，背后暗示民主派是敌对的外国阴谋的工具。

---

① 后来，许多人把波罗的海国家中的一月事件看作八月政变的预演。——原注

保守派立刻利用叶利钦的声明对他发起又一次进攻。他们在俄罗斯议会中凑集了足够的票数召开一次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特别会议，要叶利钦向大会报告他的政策的执行情况。他们的计划是要搞掉叶利钦的俄罗斯议会主席的职位。要知道，叶利钦是以微弱多数当选的，当时议会中的保守派俄罗斯共产党人力量很强大。

叶利钦和民主派识穿了这个计划，号召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3 月 28 日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一些城市举行群众大会。戈尔巴乔夫政府宣布禁止在首都举行游行，并派军队进入莫斯科（对军队人数的估计在 5 万到 7 万之间）。大量军车，包括装甲运兵车封锁了市中心[①]。莫斯科面临着一场摊牌。但当摊牌时，输掉这场牌局的却是戈尔巴乔夫。

他的失败的后果之一是，示威游行还是举行了，虽然不是在莫斯科市中心，但在其他大广场上举行了。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说明他的失败。在搞政治中如此狂妄地使用军事力量使迄今为止仍保持中立的人也感到震惊和愤怒了。戈尔巴乔夫寄予很大希望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取消了政府对游行的禁令，并宣布休会以抗议政府的禁令，直到军队撤出后再复会。

第二天早晨，军队撤走了，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复会。这时叶利钦取得了足够的可靠的多数票，以赢取建立俄罗斯总统制的关键性的表决。俄罗斯议会于是决定在 7 月 12 日举行总统选举。

之后，煤矿工人的罢工在全国蔓延开了，此时矿工们提出了要戈尔巴乔夫总统辞职的要求。群众性罢工甚至冲击到白俄罗

---

① 事后较久，在 1991 年秋天，我了解到这些事件的一些细节。原来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戈尔巴乔夫报告，示威者计划冲进克里姆林宫，用专门的钩子和绳子登上克里姆林城墙（城墙如此之高，不可能把石子扔过墙）。戈尔巴乔夫显然相信了这种取自对中世纪的战役描绘的荒谬的谎报！或者可能是他只是装作相信它，以图说服苏联领导中的同事们调军队到莫斯科是有道理的？——原注

斯，这个共和国历来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堡垒。

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这种形势，并改变了自己的路线，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

我在同戈尔巴乔夫打交道中感觉到了他政治上的摇摆不定。早在 1990 年夏天，叶利钦邀请我参加他的最高协商协调委员会。我同意了，我不认为这是对戈尔巴乔夫的背叛，特别是因为此事发生在两位领导人的合作时期。但是到了秋天当戈尔巴乔夫向右转时，我同叶利钦的联系显然成了我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急剧恶化的一个原因。[①]在 1991 年年初，我开始感觉到我个人的敌人对我的露骨的敌意。报刊上对我的攻击变得特别恶毒，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来得更多了。

1991 年 3 月 22 日，我得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一个电话。他当时还是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但即将辞职。雅科夫列夫邀请我去他那里聊聊。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他同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上有过一次长谈，除其他问题外也谈论到我。总统说，他对

---

① 事情是这样的。1990 年 10 月戈尔巴乔夫邀请我参加他同泰德·顿纳和简·芳达的会见（我于 1988 年把顿纳介绍给戈尔巴乔夫并组织了他们的第一次会见），这时我得到了第一次同戈尔巴乔夫说清问题的机会。在走向会见厅的路上，戈尔巴乔夫讲了几句生气的话："格奥尔吉，我希望你不要保持疏远，""不要倒过去，""你将来会后悔的。"他不想解释他指的是什么。在同顿纳谈话时，戈尔巴乔夫抱怨说有些人预言我们注定要失败，他还瞧着我说，"格奥尔吉也在讲这样的话。"我打断他，再次问，"你是指什么？你在讲什么？"但仍得不到回答。简·芳达感到了这种紧张气氛，试图使它缓和下来。当她向戈尔巴乔夫告别和祝愿他成功时，她说，"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受到鼓舞的。阿尔巴托夫博士曾对我说改革是注定会成功的。"（确实，我同她在过去的交谈中，曾谈到国内的困难形势，但强调我们必须前进，我说，"我们注定会成功，只是迟早而已。"）戈尔巴乔夫似乎觉得有些奇怪，向她问道，"他真的这样讲过吗？"在美国人离去后，我向戈尔巴乔夫建议，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的分歧。他回答说他要去参加一个最高苏维埃会议，但他许诺给我打电话。自然他没有打电话，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在发生这一插曲以后，我开始相信，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一些人经常给他提供假情报，使他抛开他们认为对他有"坏影响"的那些人。后来在政变之后我发现，假情报的主要来源是搞窃听和侦察的克格勃。——原注

阿尔巴托夫这样一个老朋友到处讲他坏话，说他“彻底腐朽了”，感到震惊和忧虑。根据雅科夫列夫的叙述，他对总统说，他承认阿尔巴托夫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的许多方面有不同意见，甚至公开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他不相信阿尔巴托夫会讲任何有损于总统声誉的话。然后雅科夫列夫对戈尔巴乔夫说，“再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为什么不同阿尔巴托夫亲自好好谈谈？不管怎么说，你认识他很久了。”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并要雅科夫列夫给我提供一个机会，让我写一封信，把我不同意总统的意见和对主要政治问题的观点列出来，然后见面谈一次。他请我去，就是为了把这个信息转告我。

4月2日，我给戈尔巴乔夫发了一封18页的长信。我并不知道他当时由于未能搞掉叶利钦而正在揣摩他下一步的行动。我在信中提到雅科夫列夫同我的谈话，我驳斥了说什么我发表了对总统的攻击性评论的谣传，我表示担心我们又一次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一个政治领导人不仅逐渐脱离独立思考的人士，而且逐渐脱离现实的生活。在说到我刚写完我的回忆录之后，我接着写道，我“在回忆你的前任们的命运时对这些事情已思考了好久了。我应该说我发现在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和赫鲁晓夫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之间有不少雷同之处。我想很可能有人早已在策划一个反对你的阴谋，而在这些阴谋家中可能有你近来依靠的一些人。”

我提请戈尔巴乔夫注意这样一种危险，即在他的要求下他已被授予了真正独裁的权力。我写道：“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戈尔巴乔夫在道义上不可能变成一个暴君或独裁者……但是如果对他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他被废黜了，情况又会怎样呢？人们能够信任正在明显地爬向第一把交椅的卢基扬诺夫，或帕夫洛

夫[1]和亚纳耶夫吗?”

我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还写到，不管他可能有什么理由来改变他的政策，“继续同右派保持紧密联盟的方针是极其危险的，这种方针很像同军方和反动派玩让牌游戏[2]。我认为坦白地说出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深信，如果继续推行最近几个月的政策，将会对改革、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害。”

我在结束这封信时说：“今天还有时间摆脱危机……这可以通过返回改革政策，返回诚实的民主化政策来达到。这要求戈尔巴乔夫同他的天然盟友——民主派重新联合起来。你同公众中的民主派的重新联合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向对方投降。这将是在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些原则基础上的妥协。

“首先，把经济改革置于首要地位。第二，为了保存苏联，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根本的改革，要跨出许多步子去满足各共和国的要求，要同意进行认真的分权，要在善意而不是命令的基础上同他们开始对话。

“第三，我们必须抛弃把使用暴力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当然，目前在苏联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之间（也就是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进行的战争必须停止。谁在这条路上走出第一步，谁表现出更大的容忍和灵活性，谁就会在政治上取胜。而更重要的是，这将是国家的胜利。第四，民主化的进程不应该冻结。”

---

① 1990 年 9 月我最后一次被邀请参加一个由戈尔巴乔夫主持的讨论政策的会议。约有 30 人出席，包括当时的财政部长瓦连京·帕夫洛夫。我们讨论的是经济问题，戈尔巴乔夫要我发言。我在发言的结尾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存在着来自财政部和帕夫洛夫部长的特殊的危险。如果让他们按他们的办法去干，他们会使社会爆炸。”——原注

② 在俄罗斯常玩的一种纸牌游戏，玩这种游戏时，为了赢牌，先得让掉所有的牌。——原注

我觉得今天摘引这些话也许会被认为是为了表白我自己，但是我必须把事情说清楚。

我怀着内心的某些不安发出了这封信，但是我也有履行了我的责任的一种感觉。

大约 3 小时以后，我的政府专线电话铃响了，有一个声音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要同你说话。”于是我就听到戈尔巴乔夫说：“喂，格奥尔吉，我收到了你的信和书（回忆录）。我还没有读你的信。那本书，我看了一下目录，看来是有意思的，谢谢你，我一定会看这本书。”我十分怀疑戈尔巴乔夫在给我打电话前会不看我的信，但是我仍请他看一下这封信。“是的，是的，当然。但是，格奥尔吉，你不要走。”戈尔巴乔夫说。我表示希望我们能很快见一次面，把事情都说清楚。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告诉你，我永远不会从我的改革政策后退，我无处可退。现在所发生的是一种谋略。”

那次谈话使我感到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是模棱两可的。他认为他的向右转只是一种策略，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他是否知道即便是策略也走得太远了？

我们的会面从未实现，但是我们的关系有了一点缓解。后来我还给总统写过两封信。在 4 月 12 日写的第一封信里，我要求他“迅速表明愿意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坐下来参加圆桌会议，并同各共和国和它们的领导人包括叶利钦合作，愿意恢复同民主派的关系。否则将太晚了。”

戈尔巴乔夫在他接到这封信的当天给我家里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收到了信，读了信，我理解你的关心。这是对正在发生的发展进程的反映，我也关心这些发展。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你不会想象到，现在在共产党内正在发生什么。”由于我们用的是条普通的电话线，所以我没有要他明确说明。我重申了我的意见，说形势很烦人，他必须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他说，

“是的，我已经给各共和国领导人，包括叶利钦写了信。我从日本回来后将坐下来同大家谈。”

我在4月22日写了我的第三封信。我写这封信的动机是出于对右翼分子将在两天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对改革发动攻击的关切①。我引用了一些支持这一预测的事实，我论证他对右翼作的妥协太多了，我再次呼吁他回到他的天然盟友民主派这边来，至少同叶利钦建立某种合作。

同时，我作为叶利钦下面的协商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认为我也有权利和义务向他呼吁，建议他为了拯救国家表示愿同戈尔巴乔夫以及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合作。

我相信，其他人也向国家的领导人们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这些领导人自己也不会不看到形势要求的是什么，国家期望他们做什么。最后，在4月底，9个共和国领导人和苏联总统在莫斯科附近的新奥加廖沃国家宾馆（1959年赫鲁晓夫在那里接待过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开始了会谈，这就是大家知道的“9+1方案”或“新奥加廖沃进程”。这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新奥加廖沃进程”鼓舞我们中许多人希望苏联总统已返回到他的改革政策，同各共和国可以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对领导我们走出危机将有决定性意义。

戈尔巴乔夫第一个说，我们过去有的是单一制国家，而不是联盟，我们必须向一个真正革新了的联盟制国家前进。但是正如像在其他很多场合一样，他发表一个声明，把它重复好多遍，而

---

① 这次攻击并未发生。戈尔巴乔夫最后提出了辞去党的总书记问题。他的反对者立刻不言语了。同一些苏联学家的意见相反，在当时以及在政变时，戈尔巴乔夫对他的右翼反对者来说是非常需要的。没有他，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合法性。我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说他向右翼作出妥协是一种策略这句话是真实的话，那他就是并不懂得他的力量和不会运用他的力量，正如他在改革的最初几年中不会运用他的巨大权力（作为党的总书记历来所拥有的权力）来更坚决地推进改革政策一样。——原注

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毫无行动。可是事件的发展已开始超越制定政策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想同各共和国达成协议的要求遇到了来自怀有帝国传统和野心的势力的有力抵制，这就是党的领导层、军事工业集团、一大批高级官员、克格勃和“工业将军们”（管理苏联经济的政府部门的上层管理人员）。他们又得到了非俄罗斯共和国中一部分俄罗斯族人和讲俄语居民的政治运动的支持。这些人害怕，一旦苏联解体，他们将变成在外国的少数民族。这些恐惧被地方上的党组织和莫斯科的军界领导人和沙文主义者很有效地煽动起来，他们企图造成一个由居住在俄罗斯共和国以外的俄罗斯人组成的“俄罗斯党”的群众基础，很像60年代早期由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组成的对戴高乐的危险的反对派那样。1991年4月给莫斯科带来了一个政治上的春天。“新奥加廖沃进程”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大家认为现在我们即使没有波罗的海国家，但在邦联而不是联盟的基础上可以解决我们国家未来的急迫问题了。

在关键的经济政策方面，也有一些理由使人产生希望。我们的经济学家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和美国哈佛大学的一批教授（“格拉汉姆·艾利森小组”）制定了一个新的经济计划，这个计划试图把苏联国内的分阶段的经济改革同大规模的西方援助连接起来。但是戈尔巴乔夫显然受到了他不知为什么对之偏爱的“雷日科夫—帕夫洛夫帮”的影响，很快就拒绝了这个计划。其结果是，在6月，举行的伦敦7大国会议上几乎未取得任何结果。

总统在政治领域中也同样犹豫不决（这是否又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策略呢?）。6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时发生了政变的第三次预演。帕夫洛夫总理在会上讲话时要求给予紧急权力，包括某些总统的特权。议会中具有帝国倾向的联盟派对他表示支持。到此会议宣布结束，代表们听到了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

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的发言。有的人把他们的发言录了音，并予以公布。这真是进行政变的一个号召。这一切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是第二天戈尔巴乔夫来到最高苏维埃宣布没有必要感到担心，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他和帕夫洛夫完全一致。帕夫洛夫接着发言，说他的讲话被误解了，他对大家对他的讲话表示的大惊小怪感到惊奇。

我仍然不能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对这场闹剧轻描淡写，为什么他不同那些即将领导一场阴谋的人决裂。我所听到的唯一解释是，他在出访伦敦出席7大国会议前夕并不希望出现一场能证明苏联国内局势不稳的传说的闹剧。我认为这个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首先，很难想象可用这种把早已公开的闹剧包起来的办法来消除7大国的关注。其次，这种说法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从伦敦回来以后仍然保持那种现状。

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明确的立场，拒绝听取众多的警告，其中有些警告，正如最近所报道的，来自美国总统布什和美国国务卿贝克。在苏联，新闻媒介突出地报道了关于可能发生政变的言论和指出包括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和国防部的领导人在内的许多高级官员不可靠的评论。我个人也不止一次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警告。

我不能不记起布什总统在政变前不到三周的时候对莫斯科的访问。乔治·布什在莫斯科的第二个工作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帕夫洛夫总理的座位被安排在最边上的一张桌子上。已辞职的雅科夫列夫、在莫斯科具有铁杆“持不同政见者”之称的作家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和我同戈尔巴乔夫及布什夫人同桌而坐。在谈话中戈尔巴乔夫说，他看了我的回忆录，很喜欢这本书。之后，他又直望着我的眼睛补充说，“我读了你的信，总的说你是对的。”由于桌上所有人都听着他这番谈话，所以我感到不便再问他更多的问题，但是他的话表明他是知道那种危险

的。可是，几天以后，他就离开莫斯科去休假了。[①]

在1991年8月19日政变那天，我正在赫尔辛基做一个讲演，完成叶利钦委托的一项任务。我不想详细叙述那三个神经紧张的戏剧性日子。我只想说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同莫斯科建立联系，但这很困难。在19日早晨我通过爱沙尼亚外交部长雷纳特·梅里才得以打通了第一次电话。他到芬兰来领导一个流亡政府以备爱沙尼亚被占领。爱沙尼亚人聪明地预先就采取措施建立独立的联络路线（1992年梅里被选为爱沙尼亚总统）。在那以后，我就能同我的研究所和家里保持经常的联系。我也得以同俄罗斯议会议长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建立了联系。大家严厉警告我不要回莫斯科（政变那天早晨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回莫斯科），而要“在外面提供帮助”。意思就是我应该促使西方领导人对莫斯科发生的事件能有更好的了解（最初他们中有些人似乎倾向于在政治上承认阴谋者，认为他们的成功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动员西方

① 1991年12月我看到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部纪录片《第二次俄国革命》，从中知道在7月间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曾警告过戈尔巴乔夫，说卢基扬诺夫、帕夫洛夫、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是不可靠的。戈尔巴乔夫答应在8月20日签定联盟条约后将撤换其中几个人。在片子中纳扎尔巴耶夫说，叶利钦在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曾表示担心有人会对他们进行窃听。后来的情况表明，他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克留奇科夫在那间房间里安了窃听器并录下了那次谈话。我想这个插曲可能加强了阴谋家们加快发动政变、在条约签定前就进行政变的决心。——原注

支持我们反对政变。我尽了最大的可能去做这件事。[①]

对我个人来说，那些日子使我感到十分焦急。坦白说，当我听到领导政变的委员会的组成（军队、克格勃、内务部等）时，我几乎肯定他们已赢得了这场权力斗争。有什么力量能够挫败这个指挥国家的强大武装暴力机器的集团呢？当然，即使积聚了巨大的力量，阴谋家们也是不可能长期把持政权的。但是我们的人民将由于他们把持政权而蒙受多少苦难，流多少血啊！对我个人来说这也将是一场悲剧。我将不能回国，那些将军们、克格勃的头头、那个总理都把我看作最凶恶的敌人。这场政变将给我的家庭、我的儿子、我的兄弟、我的研究所的许多人和我的许多朋友带来悲剧性的后果。同样的命运将等待着成千成万，甚至成百万的公民，对进行反抗的共和国也将采取军事和警察行动。国家将陷入黑暗之中。

但是几小时后，当 CNN（美国新闻电视台）广播叶利钦在白宫公开谴责政变领导人是“一伙罪人”，我感到了某些宽慰。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政变分子在记者招待会上发抖的手和不知所云的辩解时我更觉放心了。

政变为什么失败？除了平常讲的政变分子愚蠢无能和改革已使人们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等原因外，我还想补充两条原因。

一是纯粹的运气。我的同胞们精彩地躲过了一场可怕的灾

---

① 同时，在莫斯科，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是第一个和几乎是唯一的通过正式决议谴责政变，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和宣布政治罢工的学术研究机构。决议（实际上是一个宣言）称政变是“推翻国家合法政府，使国家返回到专制和无法制可言的时代的罪恶企图”，号召人们“支持合法政府，阻止罪恶集团建立专制统治”。8 月 23 日，我收到了哈斯布拉托夫签署的一封表扬信。信中说：“我代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对你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成员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在 8 月 19—21 日政变期间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研究所进行的帮助发展国家民主进程、推进俄罗斯的根本经济改革的这项巨大工作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我向研究所的成员祝贺民主的胜利，并祝你们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信中特别提到了研究所成员中 8 月 20 日参加保卫白宫的那些人。——原注

难。他们运气好，因为他们有无所畏惧的鲍里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他们运气好，因为政变分子在刚发动政变时没有逮捕叶利钦，或者没有敢这样做。他们运气好，因为街上没有挑衅者或惊慌失措的公民向军队开火，此时军队的战士们也正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这个单子还可列上好多。我要强调这一点，以便使国内和国外的人不要有欣慰感。运气是好的，但是你不能把这点说得过分。

二是政变分子不具有合法性。他们需要合法性，才能得到自己的国家和国际上的承认。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政变前夕派代表去见戈尔巴乔夫以图说服他或向他们交出权力，或以某种身份参与其事。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拒绝他们以后，他们仍然希望在他们夺取政权后再“征服”戈尔巴乔夫。可以设想，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下令进行大规模射击的原因。[①]

政变的失败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事件的进化状态的结束，并导致了一场革命，使国家向着同政变分子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声称，他们决心维护苏联，所以要迅速行动，以图促使大家在新奥加廖沃签署联盟条约。然而政变实际上却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一种制度解体了。一个积极的后果是它的许多极权的机构停

---

① 政变当然是对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考验。他值得称赞的是，在政变前夕拒绝了阴谋者们的要求，从而否认了他们的合法性。但是他对国家处于灾难的边缘也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那是他不听众多的警告，任命一些政治骗子、改革的反对者、反动分子和不道德的人担任高官，处于高位。他还通过发布总统令或立法手续准备和规定了一整套紧急措施，这些措施显然是他自己打算在情况变得最坏的时候加以采用的（但实际上却被政变分子所用）。他甚至指挥了使用这些措施的几次“预演”，例如在波罗的海共和国中的一月事件和 3 月 18 日在莫斯科的出动军队（虽然作为一种结果我们也进行了反抗的预演，人们至少变得不怕坦克和军队了）。最后，尽管右翼采取行动的危险已很明显，他仍然不听众多的警告而去休假。他自己力图把他同右派的长时间的调情说成是策略上的需要，而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原注

止存在了。但是在它解体之际，事情变得混乱和难以预测了。西方最初只注意这种形势中的一个因素，即核武器的命运问题。但是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诸如尚还存在的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欧亚整个地缘政治形势的急剧和深刻的变化、许多主权和半主权国家以及类似国家实体的出现（那里民族独立远远超越了民主发展）、经济灾难的威胁，等等。

这种形势给苏联的继承国提出了许多复杂问题，首先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大国。使前苏联地区的国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的完全的和受尊敬的成员，这很重要。但是他们应该清楚地知道，他们为达到这一点需要做什么。

戈尔巴乔夫总统随同苏联一起失去了权力，因为他统辖的国家已停止存在。他的离去也证明了他的声誉斐然的策略是失败了。当他转向右翼，后来又企图转向中间和转向民主派的时候，他在政变之后发现民主派已不再信任他了。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历史慷慨地给了我们三次取得巨大进步的机会：1991 年 8 月政变的挫败，它为民主派取得权力铺平了道路，并沉重地打击了民主派的敌人。在政变失败的余殃中，领导上陷入了权力斗争而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一个在戈尔巴乔夫周围，另一个在叶利钦周围。这两个人的深刻的互不信任阻止他们携手合作。

大多数民主派沉浸于胜利后的欣慰感之中，显然也包括他们中的有些领导人，这给他们面对现实的能力蒙上了一层阴影。于是犯下了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不清楚和忽视了最重要的优先任务，特别是其中最为迫切的、实行影响深远的政治改革的任务。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讲。再是叶利钦在紧要关头出去休假了，这使每个人都感到惊奇，不久之后大家都熟悉了他在关键时刻消失的能力。

由于延误、没有把握住时机和政治纲领不集中的结果，政府

立刻就处于停滞状态，在前苏联的所有地方都感觉到了政府的瘫痪。许多政治结构瘫痪的深度和速度是很严重的。整个政府和思想体系的解体造成了一个谁都想去填补的真空，包括民族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和保皇派。统治精英也处于混乱之中。有些新上来的人相当有才干，有些则不是。许多上来掌权的新人缺乏经验和成熟的看法。他们的忠诚程度也是大不相同的。另一方面，老的精英还在继续工作。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成为公开的反对派。他们中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把他们自己融入到新的制度中去，企图适应它，但是更试图使新的制度适应他们自己。

所有这些发展都没有改变我不断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从极权主义向正常的民主社会的转型能不能转得较少痛苦、更平稳和更有秩序？我坚定地相信，至少在戈尔巴乔夫犯错误和 8 月政变破坏进化进程和引起一场革命之前那是可能的。任何革命，即使它会激化和加速社会变革，也会使社会变革变得不可预测、难以控制和具有很大的矛盾。

1993 年年关的事件对第二次俄罗斯革命的进程起了什么影响？现在作最后的结论还为期过早。现在只能看到一些轮廓，但是我感到十分失望和遗憾的是，这段时间中失败多于成功。而且不是所有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

鲍里斯·叶利钦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领导人，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还没有充分了解他，说实在的，他很可能是一个自己也还没有充分了解自己的领导人。我想现在对他作最后的结论还太早，但是我们最终总得要问这位领导人是否能够承担历史赋予他的伟大使命。他是不是能够领导国家走过一个复杂的改革时期，使国家免除灾难和混乱，在旧苏联建立一个国家联盟，而首先是在一个充满着冲突、互不信任和互不容忍的社会中实现公民和平？

我在 1991 年 8 月后能比较经常地见到他。我对他的单纯、直率和愿意听取不同意见有良好的印象。另一方面，他的固执和

过快地作决定的作风也给予我深刻的印象，特别当他相信他是正确的时候（后来的情况表明，有时他是错的）。他选择他周围圈子里的人的方法，或者毋宁说他让自己周围的圈子自生自长的方法也并不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很容易受周围圈子里的人的影响。他会不加解释地有时是很粗暴地随便开除忠诚和有用的人。

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应该感谢叶利钦，因为是他制止了我们国家回到苏联政治中的传统的保守主义和挫败了 1991 年的 8 月政变。由于他的异常的政治本能，他得以摆脱了许多极为困难的处境。但是他能否建立一个负责的、有专业能力的政府，能否保证这个政府正确和诚实地履行它的工作，能否选择和领导一个善于民主地管理国家的行政官员班子，能否在俄罗斯建立一个以法律的力量，而不是以力量的法律为基础的民主社会，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叶利钦像戈尔巴乔夫、勃列日涅夫和在他之前的其他苏联领导人一样，在当上最高领导之时只具有有限的治理才能和经济知识。人民一方面固然可以成长，特别是在历史交接的关键时刻，但同时他们也能很快就感到失望。所以，现在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叶利钦作为一个领导人的主要弱点是，他并未准备好用考虑成熟和精心设计的政策来回答事件的自发进程，而过多地依靠即时应对和他自己的政治本能。我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总统面对着成堆成堆的事件和问题，却不去恰当地使用我们国家的可由他随时加以利用的十分巨

大的知识资本。在他的许多资源中，除了总统咨询委员会[①]以外，还有科学院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具有理论和实践知识的专家。也有像雅科夫列夫、巴卡金等在改革的“第一次浪潮”中出名的值得信任的改革者。

我也不能理解，他在 1991 年 10 月作出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定时，为什么不同彼得拉可夫、亚夫林斯基或博戈莫洛夫等俄罗斯著名的经济学家讨论一下盖达尔的“休克疗法”。为什么他只同将军们讨论军事改革。为什么俄罗斯同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关系问题——我们外交政策中最优先的问题被疏忽了达一年多之久。人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类似的问题。

叶利钦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他比我曾为之工作过的任何别的领导人都更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不过他尽管容忍批评，但他对任何批评意见给予认真考虑的能力却是很有限的。举例说，他 1992 年冬天访美时提出了调整俄罗斯核导弹的瞄准目标和俄罗斯参加全球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议，我认为这些建议是考虑不周的。我在《消息报》记者采访时发表了批评性的评论。叶利钦从美国回来后几天，他见到了我。他说，“我读了你的评论，我要给你作些说明。”我打断他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了解我们的关系，总统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并不剥夺我在任何问题上具有我自己的意见和公开发表意见（当然是用适当的方式）的权利。”叶利钦回答，“当然是。”他做了一个用手划到自己喉咙的姿势说，“我们到此为止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他也容忍

---

① 我们中许多人不久就知道，就是这一品质也持续不久。当这个委员会在 1993 年冬改组时，其成员中曾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其他问题提过批评意见的一些人未被继续任命，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封希望他们将来继续提建议的很有礼貌、甚至富有感情的感谢信。这一姿态并未使我们感到多么惊奇或失望。事情越来越变得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利钦像许多其他的政治领导人一样，逐渐失掉了容忍不同意见的能力。——原注

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们对盖达尔的经济政策的批评，但是他仍然用我所不能理解的固执态度支持盖达尔的政策。他也不对批评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的错误的意见，包括认为他缺乏强有力的反犯罪和反贪污纲领的意见作出反应。我懂得了，只有容忍批评这一点并不就能保证不犯重大错误。

我的观察和经验告诉我，权力执掌者会迟早变得不太愿意接受批评（特别在事情进行得不好的情况下）。权力也能改变领导人的性格。随权力而来的巨大责任会有它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不可战胜感，这种感觉因周围许多人的盲目服从和奉承而更加强。领导人往往被他的班子同外界隔开，他的班子总是力图通过控制求见领导人的外人和控制上送的文件与信息的办法把对领导人的影响垄断起来。这是决策机制中一个很重要的杠杆，特别是就"后革命"政府而言。那里民主的宪法程序尚不够坚强，甚至常缺乏简单的秩序，泄漏情况和丢失文件的事时有发生，文件未经很好准备和讨论就提上来要求签字，这类事要比在已定型的民主国家中发生得多得多。

我现在想转而谈过去一年的一些决策。我将从外交开始。

当布什总统和叶利钦在 1993 年 1 月 3 日签署规定双方各裁减三分之二战略核武库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时，大家都对这个条约大加赞扬，我也衷心地参加这个合唱。确实，全世界的公民都值得为这一伟大的成就庆贺。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两国领导人在讲到这个裁军的里程碑时，似乎这完全来自他们个人的努力，似乎在这之前没有进行过多年的巨大工作，似乎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促使两个超级大国估算一下它们的武器库实际需要多少核武器和常规武器。

冷战是经过成千成百万男男女女的艰巨工作和英勇斗争才结束的。40 年前，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罗素首先提出了核危险的警告。大批普通人曾多少年来在伦敦、纽约、波恩和成百个

其他城市中结队游行反对核武器。当冷战还在进行的时候，许多有名望的公民冒着失去职务的危险对将军们和军事工业集团展开了直接的不妥协的斗争。一些专家集团，如帕尔梅委员会与争取核裁军和和平医生组织，勇敢地在公众和政治家中传播了关于核武器问题的真相。最后但也不是不重要的是，一些政治领导人在一些高峰会议上也为此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重要的是，要记住取得 1993 年 1 月 3 日胜利之前的历史，不仅是因为要给每个人以应有的地位，而且是因为我们应该学会诚实地对待过去。为了使将来的政策取得成功，让公民们了解巨大的变化是如何和花了什么代价取得的，这一点很重要。布什政府宣称，它在冷战中战胜了苏联，这是不是由于它的无知？当然，提出这个论据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帮助布什赢得总统选举。但是这不是全部历史情况。不管他喜欢与否，他说这些话对将来的含义就是军事力量仍然是有效的外交工具。

在 1991 年秋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为我们只有从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开始，我们的历史复兴机会才能有效。几乎每个人都把经济看作第一位的优先任务，但是现在回顾起来，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特别是因为我们最优秀的经济家和政治家都知道我们的经济危机不可能依靠一次迅速的休克疗法来治愈，这项任务需要许多年的不急不躁的艰巨的工作。休克疗法扭曲了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它造成了经济、社会领域和政治上的深刻的和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变化。大多数居民遭受了严重的和无法给予合理解释的痛苦，因而变得失望，甚至绝望。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孕育了一种危险，即许多人容易变成蛊惑言论的猎获物，从而严重地增加了在俄罗斯出现专制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危险。

文化、科学、教育和健康卫生不可避免地成了盖达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但是休克疗法的代价远远超过俄罗

斯人民的贫困、超通货膨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下滑。

整个 1991 和 1992 年，对盖达尔的改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些改革受到了两种人的攻击。一种人希望保持旧制度，另一种人像我一样认为盖达尔的改革远不能在俄罗斯建立市场经济，却会严重破坏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关系，造成严峻的政治危险。我们认为这些改革只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用来的“结构调整”模式的变体。这种模式是为第三世界国家设计的，特别是为了向它们索还借款，不论在哪里加以采用，它都有消极效果。

今天，已是一年半之后，盖达尔已经辞职了。我作为一个激烈和公开批评盖达尔改革的人感到得到了某种报偿。但是我对我们失去的机会感到惋惜，而且我仍然保留有一些怀疑并感到自己也有某些责任。不是因为我对我采取的立场有什么不肯定之处，而是怀疑我们同盖达尔进行的争论和论战是否妨碍了我们去明确主要的优先任务。挫败 8 月政变而取得的胜利为一场政治改革，而不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了独特的条件。经济问题在开头就必须抓，但是需要一个考虑周全的渐进变革的纲领，而不是设计粗劣的政策“大爆炸”。

在民主宪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持久和稳定的政治制度，这是极其重要的。这种制度要有真正的多党制、议会、总统、由负责的官员组成的文官制、经过改革的军队和安全力量、现代的司法制、有保障的公民权利，当然还有新闻自由。民主需要制度化。首先，它要有一套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制度，既能保护公民的权利，也能有效地打击犯罪和贪污腐化。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专制主义影响，缺乏民主传统和法制机构薄弱，又有众多的民族、宗教和长期的民族冲突的国家里，尤其尖锐地需要有一个健康的民族政策。

民族争端即使尚不尖锐也孕育着危险，例如魁北克的争端或小民族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也有北爱尔兰的流血的创伤，现在

盖过一切的还有南斯拉夫解体后发生的可怕冲突。横跨欧亚大部地区的前苏联和俄罗斯土地上正在酝酿着的形势有造成全球规模危机的潜在可能。

我们面临着如此复杂和众多的政治问题，我们却把一个考虑不周的经济纲领放在日程的首位，我认为，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失去了促使国家得到复兴的少有的机会。我仍希望，俄罗斯将很快重新确定它的努力方向，实现影响深远的民主和政治改革。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所有其他问题，包括经济问题，都可变得更好办了。可悲的事实是，我们紧接着挫败政变之后丧失了一次真正的机会，那时民主力量气势高涨，而他们的对手则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可是形势却开始变得相当糟糕和严重。

到 1992 年秋天，盖达尔的经济政策的失败已很明显。1992 年 1 月，政府承诺经济将在 4 到 6 个月内回升。5 月，说到年底经济会改善。这些估计的错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明明白白的，如果他不是一个瞎子或聋子，如果他不想在国家的经济混乱中捞取个人私利。（混乱常常培育犯罪和腐化，而犯罪和腐化使相当一批人得到了暴富的机会。）

我的印象是，俄罗斯总统是未能看清这种形势的少数人中的一个，而他的失误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对盖达尔政策的持续支持。

国家的经济危机具有不幸的政治后果。首先它引起了执行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的日益发展的对抗，这种对抗在表面上常常被看作是叶利钦总统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不幸的印象，因为它阻碍许多俄罗斯人和很多西方人去看清问题的实质，那就是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执行和立法机构双方都不愿对之承担责任。

我相信总统的圈内人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盖达尔和其他几个人（我只说他们中的一个布尔布利斯，是他把盖达尔介绍给总统，并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总统相信了休克疗法的好处，据

说总统在亲自见到盖达尔之前就签署了任命他为副总理的命令）很怕给予总统的紧急权力到1992年12月1日到期后消失，这时议会将有可能要他们报告工作并解除他们的职务。为了避免发生这种转折，他们开始推动总统同议会进行对抗。

事实上这就是意味着把最紧迫的经济任务放在一边，完全集中于对“敌人”搞政治斗争，如果没有敌人也要迅速制造一个，以图从政府引发的经济萧条中寻找一条出路。

于是，议会（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就被当作头号敌人，其根据是其成员中25—30%是真正的反对派，不是强硬的共产党人，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法西斯主义者。

议会的讨论过程，同总统机构和政府的会议不同，是在电视上广播的。这对立法机构是不利的。特别是当议员中的极端分子经常露面的时候，那种镜头是令人相当讨厌的，然而我并不认为政府机构的情况会好到哪里去。于是，那个在1990年选举叶利钦为主席并在1991年授予他推行改革的紧急权力的议会，现在似乎成了红色和褐色分子的堡垒。

议会中87%的议员是前共产党人。但是这个比例在执行机构中甚至更高些，包括总统机构在内。正如俄罗斯的成语所说的，他们都是用一块发面做成的，但是你能在两个集团中都遇见观点很不相同的人。可是，不论在俄罗斯，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也在西方，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

不管怎么样，到秋天，国家就顾不上建设性工作，而又一次被卷入了严重的政治斗争。社会越来越两极化；中间派日益被冲垮；温和分子不断失去阵地。由于电子媒介受到了政府的控制，而具有民主倾向的报纸越来越需要在经济上依靠政府的补贴，新闻媒体失去了它的一些自由。我认为这种发展是危险的，特别是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个国家几十年来养成了一种互不相让、互不容忍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以及对国内外“敌人”进行斗

争的传统。我们又一次看到，那种制度拒绝平静地退出，而表现出适应新的情况的巨大的活力和能力。

1993年5月，我已70岁了。我将难于继续从事政治了。到这个年龄，一个人不可避免地会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声誉和灵魂，而不愿意去随波逐流。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所不同意的事情，包括总统的某些政策不能保持沉默的原因。在1992年11月，在同叶利钦的一次个人谈话中，其后又在一次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坚决地反对正在形成的政治对抗倾向，起来维护妥协和联合的思想。可是，12月带来了进行尖锐政治斗争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继续到1993年，直至4月25日公民投票。虽然总统赢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但是斗争不像会消退。它首先在新宪法问题上，后来又在选举问题上激烈地展开了。这样一种形势，再加上经济的恶化，可以造成难以预见的后果，例如新的专制独裁的威胁。要结束这种形势，显然需要完全改变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然而，这里也需要指出，我们在莫斯科，还有大多数的外国观察家，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国家的大部地区都忙于为本地的生存而斗争，不太顾得上这些斗争。我们在这些地区和社区中所看到的成功的例子也许就是隧道尽头的亮光。

我同意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的看法，他最近作出结论说，来自“上面”的改革时期已经结束，一个基层改革的时期已经开始。不管怎么说，国家必须克服危机而生存下去。消灭极权制度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俄罗斯只有作为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国家，才能取得进步和稳定，并提高国际安全。我对我们国内有些土生土长的“民主派”的一种言论感到吃惊和愤怒，更不要提有些西方观察家的言论了，他们说什么我们应该追随皮诺切特、马科斯和伊朗国王的榜样。可是要知道，这些人不可能是民主派，而从来就是坚决的反

共分子!

我曾好多次感到疑惑不解，我们怎么能够按表面价值来接受盖达尔的改革。我国一般总是比较谨慎的领导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地相信一批既无突出的理论功底，又完全没有实际经验的不知名的经济学家。

我想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领导人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即盖达尔小组提出的建议是以最佳的世界经济理论和最繁荣的国家的经验为依据的。一方面，有很尊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专家的心理。另一方面，莫斯科把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采取的立场，看成是它们对盖达尔内阁思想的坚定不移的支持。我不知道这种看法是否有根据，但是西方是鼓励俄罗斯这样看的。也许西方领导人把能够迅速使俄罗斯转向资本主义的改革置于首要地位。这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保守派所特有的观点（盖达尔在经济问题上也是一个保守派）。他的纲领就是一种俄罗斯的里根主义。某些西方专家的意识形态考虑和过于自信起了主导作用，尽管他们对俄罗斯的知识和了解是很成问题的。但是我不同意有些国人所持有的并积极加以传播的一种观点，即认为西方是为了破坏俄罗斯经济和使我国非工业化而向我们有意提出那种建议，因为西方政治家们都清楚俄罗斯的垮台所能产生的危险的国际影响。

现在西方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抉择：对俄罗斯来说什么更重要，是民主，还是改革？我坚信这种抉择是存在的。没有民主，俄罗斯就不可能有能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发达的现代化市场经济。这一点特别紧迫，因为所采用的导向错误的经济政策已经对俄罗斯的民主力量造成了破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民主观念、市场经济和西方对俄罗斯政策的声誉，并增加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虽然我不想过高估计这种威胁。

如果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相信民主、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失败

是按西方建议办的结果，那就会破坏俄罗斯对不久前视之为敌人而现在愿视之为朋友的人的信任。

1985年春天，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带着怀疑和失望但仍然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为什么？我如何能够保持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对党的信心？我知道向公众保密的许多事情，我具有我的知识和经验，我了解世界，我不可能认真地去接受我们官方的宣传。

让我说明，我讲到党的时候，我不是指它的权力结构、它的机关和领导，我对它们的信心早已消失了，我指的是一种总的公平和公正的政治观念。一个信教的人可以保持对教会的忠诚，尽管他对神职人员感到失望。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不是相信那些粗糙的陈词滥调或语录，而是相信一些理论原则。我保持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不是把它同我国目前的现实或同它的宣传结合在一起，而是同多少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社会正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

我的信念不是盲目的。直到1987—1988年，我仍然相信党的新生是有可能的，党将能帮助这个制度进行改革。在1990年这种希望几乎完全消失了。而在1991年我认为苏共成了敌视公众利益的力量。

我看到了光明，我的政治观点和行为改变了。在斯大林逝世前，我相信我所受到的大部分教育，尽管我既不是狂热分子，也不是犬儒主义者。在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在苏共20大后，我从一个奴隶变成了公民，开始自己思考。而在参与有些领导人的决策中，我发现我自己最初是主张改革而不是破坏这个制度的温和的反对派。

在我为领导人工作时，我曾有机会，即便是微小的机会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各种机会往往有如幻影；但是当它们一出现，我总是认真地抓住它们。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我是把当时的实际可

能性看得过大了，但是我总是试图利用我得到的各个机会。

我的同事和我有时为我们在工作中取得的一些小的胜利而有一种满足感。在改革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当差不多每件事都突然变得可能的时候，我们更加相信我们过去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自然用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为领导工作，力图尽我最大的可能帮助戈尔巴乔夫。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情况下，顾问的角色，甚至非正式的顾问角色，对我都是合适的。特别是因为我当时那样强烈地相信戈尔巴乔夫，相信他进行勇敢的民主改革的坚定的决心。

但是这些改革和变得越来越尖锐的政治斗争的逻辑，迫使每一个人都要选择一个政治立场，即便是温和的立场。我开始参加报刊上、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和党的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参加戈尔巴乔夫召集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讨论。

我逐渐决定在1988年春天在我们的第一次自由（实际上是半自由）选举中参加俄罗斯议会的竞选。当时我遭到同臭名昭著的“纪念”团体有联系的反动的反犹组织的反对，因而我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我不听许多关心我的健康，要我不要为参加新的竞选多花精力的朋友们的劝告，我作了又一次尝试。这一次是竞选分给科学院的一个席位。这是一次艰巨和富有挑战性的竞选。我感到自豪的是我胜利了，并同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其他一些著名的苏联科学家一起成为出自科学院的苏联人民代表。

在议会里，我是相当忙的。作为调查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参与确立了这个条约的秘密条款的真相，过去苏联官员一直是否认这个条款的存在的。这是揭露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的罪行政策的重要一步。我也参加了另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它的任务是对入侵阿富汗的决定作出评价。

在1989年12月，我走了下一步，这一步把我推进了激进派

的行列。我在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发言中，主张大大压缩军事开支，根本改变在改革中几乎没有被触动的我们的整个国家安全政策。

我现在回忆这一些事，不是想吹嘘我自己，只是因为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很关心的。我是在战争时期成长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战争的可怕情景和军国主义对社会的可怕影响。1955 年我发表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其内容就是要证明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和我写的第一本书的主要题材。①

1985 年后苏联政治方面的变化给了我在政策制定中利用我的知识和经验的机会。特别是我同领导上进行辩论，主张尽可能早些结束阿富汗战争和单方面冻结核试验。我要求领导上停止在欧洲和其他地方部署 SS—20 导弹，并寻找尽快解决裁减欧洲常规武装力量的谈判僵局的办法，由于我们在那里所具有的优势，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单方面裁减，谈判是无法前进的。我反对使我国卷入反弹道导弹的竞赛中去，特别是联系到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和我们的海军建设。

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思想被吸收到官方政策中去了，但我绝不想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我的努力，许多人都具有这些思想，它们已经成熟，有些甚至是熟透了。但是从 1988 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在 1989 年，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政策正在失去它的势头。尽管国家的经济不断在恶化，但是我们却没有利用已经赢得的机会把资源集中用于国内问题上。情况越来越清楚，国家的主要危险是它的国内危机，而不是任何外部威胁。

---

① 在我从事学术和政治工作时我一直研究这个题材。也许这就是我被邀参加帕尔梅委员会的原因。在那个委员会中的工作帮助我加强了反对军国主义的信念并增加了我的知识和经验。——原注

有时候我这样解释戈尔巴乔夫的立场：他了解我们必须在裁军问题上前进，但是他遇到将军们和军事工业集团的强烈抵制，因此他需要帮助和支持。我力图给他提供这种帮助和支持。

1989 年 11 月，我写信给当时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戈尔巴乔夫是它的总书记），建议大大减少军事开支。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是有消息说海军刚得到了两艘新的航空母舰，同时建造第三艘的工作已经开始。但是我提出了认真改变我们的军事态势的更大的问题。

1989 年 12 月在马耳他首脑会议上，我当着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阿赫罗梅耶夫和其他人的面同海军上将切尔纳温进行了一场相当激烈的辩论。切尔纳温答应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回答我在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可是他并未作出回答。

就在那时候，我决定从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上批评我们的国防政策和巨大的国防开支。我在我的发言中说，作为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得到了“大大缩减军事开支”的一个机会。我们十分需要这个机会。停滞的最坏的现象和结果之一就是军事和国防工业为所欲为。它们实施了许多昂贵的，而且往往是没有道理的军事计划，有些甚至是违反现有协议的（例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雷达站）。现在它们是对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

我说，“我们的经济实际上是被军事开支抽干了的。”

我的发言受到了鼓掌，但是立刻遭到了反击。有些发言包含着谎言和诽谤。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反驳。戈尔巴乔夫那天晚些时候给我打电话说他喜欢我的发言，但认为我不应回答对我的批评。

那就是我同将军们和军事工业集团的辩论的开始，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 1991 年的 8 月政变。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开始了这场辩论。毕竟这是关于改革的一个中心问题——摆脱斯大林主义的

一场辩论。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我们除非大大裁减军备，就不可能使国家繁荣起来。这是我们得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建立法治和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建设国家的唯一道路；从外交政策说，这也是取得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

这场同将军们的辩论引发了苏联关于防务政策和军事开支的第一次公开讨论。最重要的是，我得以把我的对手拉进公开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他们失去了他们主要的传统优势——建立在国家安全依据上的神秘气氛。在公开的讨论中，更容易向我们的将军们提出一些他们过去总是顽固地不予回答的令他们感到不舒服的问题。虽然力量对比是不平衡的，我仍认为这是一个胜利。我在《星火》上发表了3篇文章，在《消息报》上发表了2篇，在电视上作了两次讲话。我的对手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其中许多文章超越了文明讨论的范围，更像是斯大林的告密者的报告，充满了捏造和诽谤。①其中最有份量的是在政变中自杀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写的。

但是同我们的将军们的斗争使我得到的并不只是攻击。我处在激进的反对派的地位，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包括一些诚实的军官。

正如我已说的，政变的失败意味着进化型发展的结束、共产党政权的终结和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

我肯定，发起和支持改革的人中没有人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这种结局也许受到国外和国内有些人的欢迎，但是在我的同胞们的心目中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因为在破除极权主义的一些残余的同时，整个政治机构的瓦解也引发了许多严重的不确定性的

---

① 特别是指责我企图“破坏”我国的“军事学说和防御能力”，意欲削弱“国防意识”，置“俄国于死亡”。那些作者提出了种种猜测，说什么“25年来由阿尔巴托夫院士领导的研究所里隐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或以色列的摩萨特的特务”，说我是“美国小暴君”，等等。——原注

问题。

我曾一再问自己：这一切——特别是消极事件，是否都是不可避免的？把所发生的事情作为生活的现实加以接受的时候，我同时需要表明我的真诚的信念：事情的发展可以是另一个样子的。那个制度必须退出。它要死亡，但不一定要自杀。我不是指极权主义的垮台，它垮台的不可避免性当然是值得欢迎的。我指的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必要的和代价很大的"副产品"。政变后的混乱的最明显的损伤就是经济危机变得大为尖锐了。另一个更加复杂的副效应就是党的瓦解。当然，党是极权主义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但是它的突然瓦解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和完全无组织的政治过程。能不能不是这样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如果我们领导人的政策能更有远见的话，党可以分裂成二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这样有可能打下一个多党制的基础，这是真正民主社会的一个绝对关键的因素。

我知道一个事实，即苏联领导人几年前在一个小圈子里曾讨论过这样一个方案。但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这种设想，并立刻投向党的领导层中保守的多数一边，实际上背叛了改革派。党的更新在原则上曾是有可能的，但是只有靠准备采取非正统步骤的更坚强的领导，才可实现这种可能。

我们在改革前宣称，我们生活所在的现实社会主义远远离开了原来的理想。而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粮食、住房、社会安全和人权保护等等，总之要建成一个正常的社会。我想这完全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并不需要先破坏经济，再在它的废墟上建立市场。毕竟旧的经济还是能够工作的（尽管工作不好），但是人们还是有饭吃的，经济情况要好于改革的五、六年。阻碍我们在改革中前进的是国家的糟糕的经济管理和领导上包括戈尔巴乔夫思想上的胆怯。直到他在职的最后一天，他未敢讲一句"土地私有化"的话。其结果是，在我们

这样一个自然和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里，保证人民过体面生活的任务却比过去变得更困难了。

不管国家的现状如何，我不同意说我们的失败已使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终结这种意见。社会主义思想是随文明的发端而诞生的，它过去有，现在仍然有追随者，它有真正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它已在世界上得到实施。它包含社会正义、对普通人的关心，包含和平、为普通人提供各种机会和参加决策的权利。

苏联人民给社会主义的祭坛提供了那么多牺牲品，却得到了如此少的社会主义成果，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给败坏了。但是我们的失败却帮助其他国家使它们的社会变得更像样，有些国家则变得相当繁荣。罗斯福的新政是最明显的例子。它从社会主义思想中借取了某些东西，有些甚至取自苏联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大规模的社会计划和经济计划的先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和臆想中的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甚至使反对罗斯福总统的保守派也更愿意接受（来自上面的）自由改革，以避免一场（来自下面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迫使了罗斯福（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去保存资本主义。它变成了新资本主义，具有人道的面孔，一种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反对的那个社会很不同的资本主义。

我们在承认我们的错误和失误之后，现在是否需要忽视这段历史呢？我们现在是否应该像经济学家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某些信徒和萨克斯所要求的那样在跨入 21 世纪之际去“建立”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呢？我深信这样一种资本主义今天将为美国和其他发达的西方国家所拒绝，可是在我的国家里许多人带着他们自己的失败包袱，却忘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的一面和不光彩的过去。

我们不需要走这条路。但是我不能确定，我们是否会有足够的智慧去注意世界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而不至于对我们不

幸的过去作出过分的反应。确实存在着这个危险，我们在改革开始之时行动既太慢又不坚决，而且在经济管理中也犯了重大错误，这一事实使这种危险更加大了。

我一方面没有丧失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核心的信念，这种理想更接近于社会民主的思想，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全盘抛弃马克思主义，不管我的国家取得了多少新经验。我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狂热分子，我在当大学生时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就不是很用功的。马克思主义中有些东西在我看来显得已过时、呆板或脱离现实生活，但是我确确实实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相当不少的著作和思想。我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父辈"，也把社会党国际的杰出的领导人，还有像葛兰西[1]、卢卡契[2]、布洛赫[3]和马尔库塞[4]那样的人都包括在内。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能为用它的名义作出的政治上的蠢事负责，也不能为把它变成一种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一种国家宗教这一事实负责。

法律和秩序的鼓吹者把改革看作是伴随旧社会的死亡和新社会的诞生而来的困难的渊源。他们认为根本不应该发动改革。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说，极权主义制度内部就存在着它自己垮台的种

---

①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13年加入社会党。1919年领导工厂苏维埃运动。1921年领导建立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1923年回国。1926年为法西斯匪徒逮捕，1928年被判刑20年，在狱中受折磨而死。——译注。

② 卢卡契（Lukace Gyorgy，1885—1971） 匈牙利哲学家，文艺批评家。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文化委员。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1930年起住在莫斯科。著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哲学史等著作。——译注

③ 布洛赫（Ernest Bloch，1880—1959） 瑞士作曲家。——译注

④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德国和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译注

子。它不是一种有活力的制度，至少从远期来看是如此。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具有活力，因为它并不提供真正的刺激，它把许多能人加以消灭，或把他们排除在领导职务之外，它导致对国家的智力资源的塌陷，特别是在国家的精英层次上。它从社会角度来看也不是有活力的，因为对民族的压迫和对人权和自由的践踏造成了势必会公开爆发的内部紧张。但是，或者是使这种制度的瓦解过程少一点痛苦和破坏，或者是去增加这个过程潜在的混乱和灾难，这是在政治领导人的权力之内的事（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如此）。

我们也许是在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期无法避免地失去了建设性地和用人道的方法影响这一进程的第一次机会。改革给了我们减少我们的制度解体中的破坏潜力的又一次机会：更稳当地走向民主和满足各共和国的民族愿望，走向实现经济和政治的渐进改革。不幸的是，这个机会大都被丧失了，而戈尔巴乔夫不管他过去有多少功绩，是应负很大责任的。当然他必须进行回旋，玩弄复杂的策略游戏，因为改革面对着十分强大的反对派。但是他在成为总书记之后，在继承了从斯大林搞的恐怖以来我们大多数人从心中都对之十分畏惧的巨大权力之后，却没有为人民的利益使用这种权力，这是他的过错。但是这里说句公平话，我们应该承认，这不仅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也是他的民主派伙伴的责任，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再低一点的层次上像我这样的人。

尽管有各种零散的和有时是勇敢的抵制行动，可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未能足够有效地组织起一个可充当改革基础的强大的民主运动。我们花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内部的争论，而不是联合起来同我们的共同敌人进行战斗。

最后我想回到这个补遗的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我们得到的第二次机会不仅是破坏极权主义过去的遗产的一次机会，而且是

建立一个能变得繁荣的、能保证人民生活福利的、能为世界面临的问题贡献出科学上、技术上和文化上的理性解决办法的社会的一次机会，不管这个机会还残余多少，我们是否还有获救的可能呢?

就当前来说，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回答似乎在于我们摆脱目前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如果我们不是固执地推行错误的政策，并能从我们近期的经验中吸取恰当的教训，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政策仍然令人失望。它在我们的后共产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成为我们的致命弱点。经济改革的失败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恢复。

即使在经济上取得普通的成就也能帮助我们解决其他一些大的问题，并使独联体的未来得到保证。如果我们能避免民族主义的危险（掉入这个陷阱的国家越大，其破坏性后果也越大），如果所有前共和国都是独立的，不必害怕它们的邻国的帝国野心，那么所有国家的民族利益能发挥其作用的余地就越大。正如我们已在西欧看到的，这种利益最终会把这些国家推向一体化，首先在经济上，然后在政治上。

在一个合适的国际环境中，所有这些步骤有可能带向一个体面的未来。前苏联处在它历史上一个极其复杂和难以预测的时刻。极权主义帝国已成为过去，很可能已永远成为过去。不清楚的是，它的继承国的转轨将如何进行，是平稳地还是痉挛地，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痛苦。但是俄罗斯和所有其他曾组成苏联的独立国家绝不会从地图上和世界历史上消失。它们的复兴只是一个时间和人的努力问题。如果付出的时间和代价能最小，那是符合我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的。

附录：跟随库西宁所做的工作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科书中含有一些具有新观点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想转述一下曾热心为我整理并提供过有关他本人对库西宁和编写教科书的一些片断回忆资料的别利亚科夫的话（我引用的是他的原文）。

“库西宁对这个问题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也可以说，该教科书在观念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由第14章专门论述这一题目是绝非偶然的，从本章的一开头就具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反斯大林的性质。这并非是执行某人的‘指示’，也根本没有这种指示。这是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长期的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

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策略”的招牌下玩弄一种“把戏”，长期以来库西宁就是这一把戏的见证人。列宁是统一战线政策的创始人，他是在1921年提出这项政策的，而他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早在1920年3月他就作出了这样一种原则性的结论（并在同年9月又重复了一次），“即世界革命速度变慢了”（《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2卷第59页），他当即提议在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关系上来一个转变（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4卷第25页）。

"然而共产国际领导人中的'左倾'人物(如意大利人特拉奇尼、匈牙利人贝拉·库恩之流,而这里还应把后来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包括在内)开始把统一战线策略解释为仅是一种'宣传鼓动方法'。在实践中这就是说,尽管共产国际不止一次地向社会党国际建议建立统一行动,但为此提出一些分明不能接受的条件(例如,承认"工人政府"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行动纲领)。这自然遭到社会民主党的拒绝,而这种拒绝又为进一步指责社会民主党叛变、'为资产阶级效劳'等等提供了口实。

"库西宁曾多次对我们说过,整个这种'左倾'的策略完全地颠倒了列宁的思想并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它加剧了工人运动的分裂。"

别利亚科夫继续写道:"这个策略的指导思想是斯大林那个众所周知的、已成为教条的观点:在革命进程中主要打击应针对可能最亲近的同盟者,在当时就是要打击'妥协分子',即社会民主党。

"法西斯的进攻迫使共产党改变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看法,西欧各国的工人群众在抗拒法西斯主义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签订了统一行动条约(1936 年);在奥地利,左派社会民主党与想夺取政权的法西斯分子展开了斗争。

"局势的要求很快就变得如此明朗,致使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多列士以及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得出了必须改变共产国际政策的结论。虽然如此,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还是被挪到了下一年(1935 年)召开。

"然而,在代表大会之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马努伊尔斯基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对党的积极分子讲演时仍然说: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性质的评价决不能更改。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速记报告在苏联没有出版。可是,事隔一年之后(1936 年)

却再版了1928年在‘左倾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保留了过去对社会民主党的所有评价。

“库西宁认为所有这一切证明了，斯大林最多不过是把共产国际在政策上的变化只是看作一种策略手段，其基本立场根本没有改变。

“与第七次代表大会相比，教科书大大地向前迈进了。在教科书中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社会民主党人与帝国主义势力同流合污、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等等，而是提议要对改良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中已成为专门从事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家严格区别对待。因为改良主义者虽在变革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途径等问题上与共产党人持不同的、在共产党人看来是错误的立场，但它却是工人运动中客观存在的。教科书接着详细分析了反对统一的人的论据，并对其作出了有说服力的回答，这就为取得统一开辟了现实的道路。这一章各节的标题本身也完全说明了问题：‘对待社会党人劳动者的态度’，‘意识形态分歧不是合作的障碍’，‘必须进行耐心的同志式的解释’。

“库西宁总是反复地说：区别对待不同阶层中的可能敌对者，这是一条政治公理。政治家的艺术在于不扩大敌对者的数量。无产阶级政治同样也不接受工人阶级对过去的剥削进行‘复仇的思想。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复仇对政治来说不是好谋略。’

“我们在所有论述策略的各章中都始终不渝地贯彻了这一思想。库西宁主张最好还使用‘资产阶级中有一个能正确对待变革的阶层’这样一个概念，这个阶层特别是在不采取国内战争，而是通过和平途径进行革命时是有可能出现的。”

对于别利亚科夫的精辟分析我只补充一点：库西宁通过自己理论上的努力和自己进行的政治工作，为克服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仇视态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还帮助探索出使工人运动中这两个派别尤其是在争取和平、裁军

及反对“冷战”上使自己联合起来的事业中合作的途径。

在对待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根据已由库西宁领导的编写组在理论上作出了论证的新认识，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现在对待改良，进而对待改良主义的态度已与以前有所不同了。以前改良这个词几乎是被当成骂人的话来使用的。事实上，改良和改良主义在社会发展中以及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也占有与革命一样的合法地位。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只靠单纯的改良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则是另一个问题。而就连这个问题现在也已成为争论的课题。

在标题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的这一篇中还包含有一些其他的新思想。在本篇的标题中没有使用惯用术语“战略和战术”的事实本身绝非偶然——在教科书中专门做了说明，认为把军事上的概念和术语移用到政治上来是危险的和无益的。在编写组详细讨论的过程中，大家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引起特别注意，在这方面还谈到了如何克服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问题。而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以及众所周知的从苏共20大政策后退之后，当“修正主义”（事实上它常常被理解为过于大胆和坚决地摆脱教条）在我国被宣布为主要危险的时候，教科书却强调要注视左的倾向和“左倾行动”的危险。库西宁力图揭示列宁遗产中《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的特殊意义，宣讲文中阐述的对共产党人的嘱咐的涵义。

在这方面他曾对我们谈到，斯大林忽视列宁的这一著作绝非偶然。在1925年斯大林甚至说：“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那他就会写出另外一本书——不是《……“左派”幼稚病》，而是《……右倾机会主义老毛病》。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他总是像回避小资产阶级的“左”倾“革命性”的危险那样回避这一著作。

教科书的作者们在恢复、而且是结合当前的现实来恢复列宁

的思想时，对群众争取和平、民主、国家主权进行的普遍民主斗争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不应把这种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对立起来，或者把参加这一斗争看作只是一种策略手段。况且在我们这个时代，除了这种斗争之外，根本就不可能有劳动群众的解放斗争和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

当然，如果是今天，无论是库西宁，还是我们编写组，在阐述这个题目上都会走得更远些。事实上，我们当时只做到了接近于今天的提法，比较果断地提出了阶级任务和全人类任务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密切联系以及后者的优先地位等问题。

现实和消除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的需要，还要求编写组必须重新考虑工人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消亡的条件等问题。库西宁的丰富经验和对理论的深刻理解在澄清这些问题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要知道，这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批判斯大林建立的理论（而实际上也是政治的）偶像中的最主要的偶像。库西宁说过的许多话（后来反映在教科书中），一开始在我们看来似乎也是使理论基础发生了“真正的震荡”，而在事实上则往往只不过是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上去。

例如库西宁强调指出：“必须使用暴力的结论根本不是出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请回忆一下恩格斯是怎样在《反杜林论》中论述这个问题的。该书中有两章是专门批判暴力论的。”恩格斯说，由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完全不要求把使用暴力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剥削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首先诉诸暴力时，才需要使用暴力。

在撰写工人阶级对暴力的态度一节时，我们力图写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过份颂扬暴力，同时指出，在工人阶级所能解决的范围内，他们应以采取非暴力方法为好。

现在这一切可能又似乎是起码的常识。但是需要回顾一下，在我们的理论工作领域长时间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占据了上风：

颂扬暴力、把是否承认暴力看作是区分“真正革命者”和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的标志之一。我不记得我们有过其他的著作，其中曾提出并强调过在一定条件下暴力会带来效果，但在其他条件下暴力不仅是无效，而且有害，迷恋暴力会导致滥用暴力，在政治上丧失道德原则等思想。当时不是这种时代！

在研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教科书中也坚持了这样一条路线。

尤其是摈弃了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个教条。诚然，这点是按照当时的规则做的，没有和斯大林直接争论。但是，当时已直截了当地说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学说，这就实际上勾销了斯大林的一个主要教条。接着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本身的解释与传统的概念有所不同，把重点由“专政”一词转移到“无产阶级”一词上来，也即转到依靠人民群众的工人阶级政权上来，同时谈到了出现“各种新形式的人民政权”的可能性，这些新形式的人民政权可能从比以往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联盟中产生出来，还谈到了它们必将使民主得到最广泛的发展。最后着重论述了这种现象的历史暂时性。

编写组在讨论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党应该在什么时候说，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库西宁倾向这样的观点：在苏联宣布“消灭了资本主义成分”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单独的控制力量和唯一的领导力量时”（斯大林 1934 年 1 月在联共（布）第 17 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党就应该说这句话。尤其在显示了人民和党的团结一致的战争结束后更应该这样说。库西宁强调说，作出这种声明对兄弟党来说，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将给他们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作用的历史界限。然而，直到党的 22 大通过了苏共新党纲时，才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在 22 大上，这位库西宁表

现出了主动性，他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与此有关的一份报告。

教科书作了引向这种思想的尝试。首先是恢复并强调了在建设新社会的进程中国家消亡的题目（在斯大林时期尽量想把它忘掉）。在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思想（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也仍将保留）相抗衡方面，教科书提出："国际条件一般说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但是却不能取消国内的导致国家消亡的进程。"接着又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与完善……乃是国家组织自然转变成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途径。"在教科书的最后一章中完全否定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保留国家的一切可能性，明确阐明了一切强制和不自由都将消失的理由。

教科书的最后这一章乃是当时勇敢地摆脱沿袭多年的刻板公式、陈规旧套的尝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设想将会创造出符合人的尊严的生存条件的未来社会的人道看法。库西宁给这几章赋予了极大的意义，他当时已经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到，把社会主义面目上那些在个人迷信年代粘满的厚厚一层污垢清除掉是多么重要、多么必要。

库西宁认为在这方面根本的核心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1953——1954年的改革之后，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那时大家感到，经济情况不错，党和社会公众没有感到很大的不安。在一次两人面对面的谈话中（他要批评与他共事的人时，喜欢单独个别说。而这一次他痛骂了一通向共产主义过渡那一章的最新修改稿，这一章他已经让我修改了好几次），奥托·维尔格尔莫维奇说，把民主问题形式主义地作为某种次要问题来对待是不能允许的，他认为那一章的写法使人感觉有这种形式主义。他指出，现在，当我们已找到解决问题的其他办法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以及我们的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吸引力就取决于能否顺利地发展民主。当代西方工人比较容易谅解我们的贫穷和不善

经营，但不太容易原谅镇压和专横——他曾多次重复这个思想。

在这方面我不能不再引用一段别利亚科夫的回忆。

他写道："1962年初，当我们在某地编写教科书的第二版时，我对库西宁讲，斯大林是怎样萌生出中央委员会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本杂志作出决定的想法的，这两本杂志都刊登过严厉批评阿赫玛托娃[①]、左琴科[②]及其他人的文章（这是从日丹诺夫那里得知的，1947——1948年我曾当过他的顾问）。那时，斯大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与美国和英国在反希特勒联盟内的合作导致我们这里谈论起民主来，出现了'自由诗'，应该'猖狂地打击这类东西'。

"库西宁全神贯注地听完后说道：'战争后人们期待着发展民主的某些措施，这是很自然的。人民长期作战，证实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都期望着战后新的生活。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感情，感情背后隐藏着严肃认真的、完全合理、正当的希望，应该考虑到这种希望。'

"他用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这次交谈：'社会主义意味着和平——我想，我们已证明了这一点。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证明社会主义也意味着民主。'（这些话大概是1962年初说的）"

我和别利亚科夫一样，不止一次听到过库西宁的这些见解。他还有一句自己非常喜欢的、曾在苏共中央1964年二月全会上讲过的一段话（这段话后来收入库西宁的演讲集），那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个人迷信的阴影下没有开放的花朵"。

---

①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年） 俄罗斯女诗人。191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此后写有诗集《念珠》、《车前草》等。写过《马雅可夫斯基在1913年》、《但丁》等论诗人命运的诗。1946年曾受到批判，50年代后期恢复名誉。——译注

②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1895—1958年） 俄罗斯作家，曾写过《再度青春》、《蓝书》、《克伦斯基》、《塔拉斯·谢甫琴珂》等中篇小说。40年代中期他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和《猴子奇遇记》曾受到严厉的批评。——译注